

# **与陈平对话**

## **—— 马来西亚共产党新解**

(增订版)

**陈剑 主编**

1999年2月22-23日澳洲国立大学  
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与陈平对话工作营”  
对话记录及文稿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12



## 《与陈平对话——马来西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

©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12 / 陈剑

本书版权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及陈剑所有。除获得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或陈剑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内容。

- 主编 : 陈剑  
英文版编辑 : 陈剑 卡尔·哈克  
中文版编辑 : 陈剑 文平强  
翻译 : 赖顺吉 陈剑  
审校 : 陈剑 詹缘端  
封面 / 版面设计 : 丁美凤  
出版 :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地址 :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址 :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  
电话 : 603-22734035  
传真 : 603-22734037  
电子信箱 : huayan1985@gmail.com  
承印者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Kuala Lumpur.  
发行者 : 华社研究中心  
版次 : 2006年8月 (第一版)  
2012年8月 (增订版)  
定价 : RM50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3908-19-6

鸣谢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慷慨允准本书采用英文版封面照片。

# 录目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Yu Chen Ping dui hua : Malaya gong chang dang xin jie]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 陈剑 编；[翻译：赖顺吉，陈剑]. --  
增订版

ISBN 978-983-3908-19-6

1. Chin, Peng, 1924- . 2. Malayan Communist Party--History.

3. Communists--Malaya--Biography. 4. Guerrillas--Malaya--

Biography. 5. Malaya--History--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I. 陈剑, 1940- . II. 赖顺吉

959.5104





马泰边境战斗行军中的马共游击战士。  
(陈剑 提供)



# 关于音译的说明

在今天，以音译翻译中文名字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可以用汉语拼音，“国民党”和“广西”就是 Guomindang 与 Guanxi。可是在 1940 至 1960 年代，这书中所涉及的主要年代，盛行的却是韦德贾尔斯 (Wade-Giles) 拼音系统，“国民党”和“广西”便是 Kuomintang 与 Kwangsi 了。

在马来亚，华人名字因着其方言籍贯而有不同的音译。有时，华人按自己的音译来登记他们的孩子的名字，或依靠登记的书记去音译。因此，常常产生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出现不同音译的姓。

马来拼音与一些马来西亚的地名也有了改变。我们只好使用在 1940-1960 年代最常用的名称。从而用 Johore (柔佛) 而不是现在用的 Johor, Negri Sembilan (森美兰) 而不是 Negeri Sembilan, Trolak 而不是 Terolak, Tanjong 而非 Tanjung, 如此类推。中文版则采用华人当时惯用的中文地名。

简而言之，在不同的时间组合、在他们的和我们的时代之间，没有音译的简洁方法。我们因此采用不同层次的办法来处理。首先，我们采用那个年代所谓“马来亚的用法”。人名方面，我们采用马来亚当时或大致那段时期、或 1970 年代写成的书最常使用的拼音。同样的方法也用于地名的音译。既然 1940-1950 年代，马来亚联合邦不包括新加坡与婆罗洲，我们以当时惯用的“马来半岛”或“马来亚”来称呼现在西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



其次，为易于辨识，在一些关键部分，我们以括弧注上中文名字（在中文版则注上英文名字）。有时候，当实在无法拼出其元音（不能确认其籍贯或方言身份），我们只得以汉语拼音代替。中文版虽没有这个问题，但英文的档案记录中没有当事人的中文名字，只得按其发音猜测其籍贯或方言身份，据之，拼出其中文名。

其三，我们在注脚里尽可能提供其人名字的多个写法，或他的一些重要生活情况。因为华人也常用多个别名，因此这不可或缺。

其四，当一位华人名字或地名在当时是并不常用者，而现在则以汉语拼音拼写，那我们便只采用汉语拼音。如：Beijing 而非 Peking。中文版则没有这个情况。

再者，我们提供了许多注脚以便于读者明了故事的背景。对从事斗争者十分熟悉的人与地，对其他人则可能是十分陌生而须加以说明。

我们的用意是为读者便于阅读，不论它从那一页读起，他应该能够因着人名和地名的重复出现而能跟随故事的发展。以上或不是最佳的处理办法，但起码可以使读者不致以因内容为着不同方言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转移而困扰不已。

# 简略词(缩写)

## 说明

ABL	Anti British League (抗英同盟)
AEBUS	Anti-Japanese Backing Up Society (抗敌后援会)
AJA	Anti-Japanese Army (抗日军)
AJU	Anti-Japanese Union (抗日同盟)
AMCJA	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
AN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洲国立大学)
BMA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英军政)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
CEC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马共中央委员会)
CI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罪犯调查局)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写法)
CPM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马来亚共产党)
CPSU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苏联共产党)
CSCSD	Centre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t ANU) (南方华裔研究中心, 设于澳洲国立大学)
CT	Communist Terrorist (共产恐怖分子, 从 1952 年起政府对马共的称号)

---

CTO	Communist Terrorist Organization (共产恐怖分子组织)
DCM	District Committee Member (区委)
DI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情报服务部, 设立于 1952 年, 后并入 DOI 及 EIS)
DO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情报部)
DOO	Director of Operation (行动总指挥或作战司令)
EIS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紧急状态情报部)
GCC	Good Citizen Committee (良好公民委员会)
ILD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简称中联部)
IN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情报与国家安全期刊)
ISD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内政部)
JI	Jemaah Islamiah (回教祈祷团)
JICH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帝国与英联邦历史期刊)
JMBRA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协会马来西亚支部期刊)
JSEAS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研究期刊)
JSS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学报)
KMM	Kesatuan Malayu Muda (马来青年团)
KL	Kuala Lumpur (吉隆坡)
MCA	Malayan (or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马来亚 [或马来西亚] 华人公会, 简称马华公会)
MCP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马来亚共产党的另一缩写)
MDU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马来亚民主同盟)
MNLA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以前错译为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简写为 MRLA)



MNLL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 (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
MNP	Malay National Party (马来国民党)
MPAJA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RLA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英文错译)
MSS	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马来亚情报局, 马来亚政治部的前身)
NDYL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NU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PAP	People's Action Party (人民行动党)
PKI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印尼共产党)
PMFTU	Pan 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泛马总工会)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s, England (大英档案馆)
PWS	Psychological Warfare Section (心理作战部)
SB	Special Branch (政治部)
SCO	Sarawak Communist Organization (砂劳越共产党)
SEAC	Southeast Asia Command (东南亚司令部)
SEP	Surrendered Enemy Personnel (投降敌员)
SF	Security Forces (剿共部队)
SO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特别作战部队)
SUPP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砂劳越人民联合党)
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马来国民统一机构, 简称巫统)



# 鸣谢

陈剑与卡尔·哈克

我们两位编者要感谢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历史学系的安东尼·李德教授 (Prof. Anthony Reid) 对 1999 年与陈平对话会的支持。我们也要感谢李德教授在担任编辑顾问所给予的不吝支援。有关 1999 年对话会的诸项安排，我们特别要感谢澳洲国立大学的克雷·顾恩特 (Clare Guenther)。

新加坡这儿，我们要谢谢黄冬葆在中文资料方面的协助。还有来自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的王贞平、黄大志和郑忠夏给我们提供语言和地志知识的辅助，以及卓文光替我们改正了一些的错误。还有凌运聪协助提供地图，以及杰弗里·韦德 (Geoffrey Wade) 提醒我们关注额外的华文及马来文资料。在英国，肯·格斯特 (Ken Guest) 慷慨寄来关于他父亲 P.J.D. 格斯特 (P.J.D. Guests) 和紧急状态初期的资料，而在澳洲约翰·科伊 (John Coe) 为我们审阅部份的手稿，指出其中的错误和文体的疵癖。

我们也要感谢伦敦憩幽园公共档案局 (现称大英档案馆)，让我们能够使用其照片和文献；感谢伦敦皇家学院林德尔·哈特 (Lindell Hart) 军事档案馆的托管委员会，准允我们使用英国的宣传材料；还有感谢约翰·李尔利允许我们使用原住民和英国保安部队的照片。

我们要特别致意予利昂·康伯尔 (Leon Comber)。他不只提供了数张珍藏照片，他还在学者情谊和难得的情报方面，一直都是支援的

泉源。

此外，我们谢谢两名不报名字的读者、所有参与对话会的人士、所有提呈论文的学者、所有协助改进文稿和删除谬误的人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把这份不寻常文稿付梓中提供的指导。最后，特别要感谢王文华（陈平）先生慷慨地献出他的宝贵时间，以及对他的批评者保持高度的容忍。

**陈剑另志：**中文版的出版经多番努力始完成，特别要感谢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教授接纳本书的出版，列为中心的丛书之一，以及刘秀梅、丁美凤负责出版具体事务的付出和耐性，华社研究中心前董事主席（现任名誉主席）张燦泉学长的大力支持，颜清文学长（已故）、林源德学长、胡万铎先生的慷慨赞助，以及许多关心此书出版的朋友。隆情厚谊，特此深深致谢。

本书的大量翻译工作主要由赖顺吉负责，特此鸣谢。他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便准确地完成了任务。其余部分则由陈剑负责翻译及校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一切均由编者负责。



# 序言

安东尼·李德

1998年2月3日，我在坎贝拉的一家高雅的餐厅跟陈平共进午餐。周围没有穿着宽大外套的人的踪影；事实上，在坎贝拉，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件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事件。他73岁，可爱而特别健壮，文静而举止沉着，总是在寻找着更好的英文用词，他一时说不出，但却知道那些词的存在。我们谈论着他的生活，他在澳洲和纽西兰的家人（他的一位侄女从悉尼来这儿陪他），以及他写回忆录的计划。我对他的这项目标给予强烈的鼓励，而我们同意让他较后回到澳洲国立大学来，花一些时间搞他的回忆录。

在这次别具意义的午餐以前，我对他的认识，仅是某种的标志——在1960年代我在马来西亚时令人惧怕的“敌人”。他只有一次出现在公共的目光下，就是在1955年华玲会谈时，而公众对他的形象的记忆，几乎就纯粹是他走出森林跟东姑和马歇尔谈判时所拍摄到的那个瘦小青年。除此之外，他生活在秘密的环境中——在地下，在森林，或是在中国，渡过了那最黑暗的日子。在为期超过50年的日子里，他一直领导着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战争时期如此，平时亦然。

1997年的某一天，我接到默尔列·力克勒夫斯（Merle Ricklets）的电话，他当时是我任职的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的院长。他问，口气就象是在提起另一件日常的公事，说他要请陈平到历史系来当客座研究员。默尔列之前是接到驻在曼谷替《财富》（Fortune）

杂志写稿的澳洲记者东尼·保罗 (Tony Paul) 的电话。就象他在后面的对话中所解释的那样，保罗先生从 1980 年代起就一直都想会见陈平，唯要到了 1997 年那层神秘的面纱开始去掉时，才通过泰国的军人联系见到了陈平。

陈平在 1999 年 1 月底正式回到坎贝拉，我们给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门上写着他的原名：王文华。中间的这段期间我们都有保持联系，他同意我的提议：他在澳洲的这段日子里，应该组织一次围绕着他的两日工作营。全世界研究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专家学者，当然很高兴能有机会来访问这个故事的失落环节。我们所知道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学者，几乎全部都答应出席。在所有用英文或其他欧洲语文写成的数十本书，都是站在战线的另一端写的，对于马共真正的心境，就只能够依赖情报局的报告，马共在性质上和法律上都是秘密，那些跟敌人交谈的都是叛徒，现在，命题改变了，冷战结束了，是不是可以最终了解到马共的目标和策略的真相呢？

筹备这项工作营和跟陈平联系的关键人物是陈剑，他那时正要移居坎贝拉，报读博士学位，研究马共。他拥有贴切的语言、知识和宗旨，在筹备这项会议上跟陈平密切合作。澳洲国立大学无法找出适当的类别来资助这位不寻常的客人，唯陈剑邀请他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利华瑟阁 (Liversedge Court) 共住一间公寓。他们在那儿的每日早餐上进行了许多历史的讨论。

这项工作营显然必须采取闭门方式，以确保陈平能够自由和坦诚地发言。可是，当他身在坎贝拉的消息传出后，学生和其他人士当然都热切地要听他讲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有点意外，对于要他在 2 月 8 日左右在亚洲学系茶室作公开演说的提议，他满口答应了。当我提议他讲讲关于他早年的生活时，他自动提出《为什么我成为共产党员？》这个题目。对于四十多位出席的人士，那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陈平讲述了他中学时代作为一个热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往事，只有在被母亲的阻止下才没参加国民党军队去打日本人。



1999年2月22及23日的工作营的最后成绩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本书。工作营是在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的赞助下举行的，虽然该中心并未给予任何资助。工作营过后三天，南方华裔研究中心在坎贝拉正式举行成立典礼，王赓武教授发表开幕词，移民部长菲力蒲·路德多克（Phillip Ruddock）是贵宾，而陈平则参与整个盛会的节目。

不幸的是所有的参加者在会后各奔前程。陈平回去泰国，而我们则无法跟他保持定期的联系。几个月后，我离开坎贝拉，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职。一直对编辑这本书充满热情的陈剑最后移居澳门。这本书的筹备出版自然就慢了下来。庆幸卡尔·哈克这位第一个签名确定出席工作营，也是最年青的成员，慨然分担了编辑本书的工作。从2002年中开始，我们三人得以在新加坡聚首，推速工作进程。

我们感谢所有参加人士对工作营的成绩所表现的耐心。我们特别要感谢陈平，是他的宽厚和创见，使这场盛会能够举行，而且令人回味。我们把这本书呈献给读者，作为对那些在一场漫长艰苦战争中，站在对面一方进行战斗，并生存下来，能够来握手和跟我们一起回忆这历史是如何发生并怎样走过来的。

# 中文版序： **历史的话语权**

关于《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一书  
及马共研究的一些说明

陈剑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群体必有其历史，或以之为荣，或以之为耻。对其历史的发生，过程与结局，都必有其说明和诠释。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或一个群体，其历史让他人随意扭曲和窜改，而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或甚至呈现历史空白的现象，那却是十分悲哀的事。没有了过去，也就缺乏传统与承传，那将来何以为鉴？一个被歪曲了历史的国家或民族或一个群体是可悲复可憐的。

历史的诠释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极为重要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历史的述评和诠释，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话语权。对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利害关系，因而有全然相反的述说和诠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话语权的运用。

谁掌握了历史话语权，便可以据之论述。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翁，因此，人民对历史才最有发言权。但是不论古今中外，都是由统治阶级掌握了历史话语权，根据其需要，把



黑的说成白，把白的描成黑。这在二千年来自有历史撰述的时代开始，便已经是存在的事实。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话语权一般都掌握在当政者的手中，并为着当前政治利益和目的去撰写历史，作为统一人民思想和历史认知的意识形态的工具。

过去，国家机器掌握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手中，一切反对他的统治的对立面，都视为敌对一方而采取种种打击和压制手段以对付之。更何况敢于拿枪杆子搞独立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共党人。因而，举凡马共的一切，都冠以叛变、暴乱的罪名。从事者都套上匪徒（Bandit）、共产恐怖分子（Communist Terrorist 或简称 CT）等帽子，以便达到其围剿捕杀的目的。

英帝国殖民主义者还巧妙地把这场为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称为叛乱而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紧急法令从而掩盖了他们蓄意发动的不义之战。这样做，显然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政治上的好处：虽则整个马来亚都是紧急状态的区域，但从大英帝国政治出发，它却是局部的叛乱。因此，任何军事行动只是师出镇压叛乱之名，而非战争之实。既然不是战争，一则不必经由英国国会的批准，仅殖民部大臣便可自己做主；二来，又可摆脱联合国的监督，也不必依国际公法约束。由于是隐蔽的战争行为，避开国内外政治舆论的围困。

二是经济上的好处：最显著的经济利益则因非战争状态，因而保住其投下的保险利益，不致受所谓“不可抗拒力”保险条款的约束。其胶园与矿场仍得继续营业。生产或受到影响，但对殖民地资源的剥夺仍不间断，有利于对宗主国物资的持续供应。

三是军事上的好处：既然不是战争，便不需按国际战争准则约束而为所欲为。军费无需国会审批，可任意调兵遣将，除动用各种在抵抗日本侵略都未曾用过的最佳武器装备外，尚调拨英联邦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军队参与其战。既然是以剿匪之名，英国剿共部队可以最残

酷的和非正规的战争手段从事，因而焚毁民房、强迫迁徙、任意逮捕、强奸妇女、殴打胶工、射杀平民、猥亵裸尸、曝尸示众、斩首剖阴等无所不用其极。对待俘虏或受嫌者，可不以战俘对待，可严刑拷打，极尽其残暴的逼供手段，搞死而不偿命。不理其是否土生，违背自定的法律，可将他们随意驱逐出境。凡此种种，与日本侵略军的兽行同出一辙。

四是宣传上的优势：套之以恶劣的罪名，置对方于不利的地位。英殖民政府动用一切国家宣传机器，并设立专司心理战术的心理作战部和所谓新闻部大搞抹黑马共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攻势。动用电台、电视、播讲车、飞机、报章等传媒；印制特别宣传资料，如传单，漫画等；做巡回展览，巡回电影等不一而足，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一般上，不管势力悬殊，战争双方具有对等地位。但在马来亚的情况，英帝国殖民主义者善用政治伎俩授马共以叛匪、暴徒和恐怖分子之名，使马共处于劣势。

于是英军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最不人道的罪恶行径都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其所犯的战争罪行，其紫紫大者如：

1. 随意砍下马共人员及游击队员的头颅，理由是便于从森林中运带出来供辨认之用。英国工人报曾登载一张某英军手持砍下人头当战利品的照片足证一般。

2. 将击毙的马共人员及游击队员，不论男女，一律剥光衣裤，裸体曝尸于警察局前地上或新村街市，并污辱尸骸，女性的乳房及阴部往往是猥亵部位，下阴常见插有枝条木棍。除显现剿共军警病态泄欲的卑下心理外，其用意在于以恐怖主义手段威嚇相关家属和村民，其效果却适得其反。

3. 不需证据，或仅凭线民告密，任意逮捕受嫌支持马共的村民。以令人髮指的刑罚，残酷拷打，严刑逼供。按备受摧残尚生还者言，刑罚名目繁多，如：“半夜摧花”、“骑白马”、“龙点睛”、“乌鸦



倒吊任飞翔”、“金鸡独立”、“关黑房”等等，不一而足。

4. 为杜绝后患，英帝国殖民政府不理其人是否土生或是移居的华人或印度人，随意将拘留者驱逐出境。按英国法律，当地出生者不能任意递解出境。单就自1948年6月18日始至1950年4月15日，这短短的22个月，遭逮捕拘留后而遭驱逐出境者便达3万5千人之多，这尚不包括自行出境者的数目在内。单就1950年3至4月这两个月间，遭驱逐出境者就达5千9百72人之多。

5. 非法破坏民生，捣毁山村民居。动用军队军车，强行逼迁，把村民原有的村镇民居全数烧毁，菜园果树悉数破坏殆尽。比如位处吉兰丹俗称牙叻顶 (Sungei Ulu Galas)、拥有上千人口、稻粮充裕的山村蒲莱村，由于曾是前抗日军根据地，村民多同情和支持马共，在紧急状态初期，便是第一个村庄遭遇这种噩运。村民被分散逼迁到四个不同地点，有一组村民竟被逼远迁至八百公里外的柔佛州去。村民的储粮不准带走而悉数焚毁，至今仍能在当地找到浩劫后的“火烧米”。后来英帝在全马各地实施“布利兹计划” (Briggs Plan)，一如对付蒲莱村样式，把在芭边安居乐业的工农全数驱赶到美其名曰为“新村”的集中营去。实行对马共采取切断其与村民或支持者的联系和补给，是一种有如日军坚壁清野的军事部署，企图断绝马共的配备，粮食，医药与情报的供应。自1950年始，全马在短短的两年内，遭遇逼迁而面对生活困境的胶工、矿工、森林工人及从事农耕的菜农、猪农、鸡农等各业工农，共达60万人之众，被分开集中到550个新村里，以铁棘篱围困而仅有一二闸门供村民出入；以荷枪实弹的军警监管；以限粮、宵禁、搜查、搜身等措施管制村民的生活起居。管制十分严厉，如任何人携带煮食用生油一瓶或一斤米糠（一般用来喂鸡）便有接济马共之嫌，即可遭逮捕、判刑监禁，并在狱中遭遇逼供殴打等折磨。英军警常以村民不合作为由，动辄设施二十四小时戒严令，村民被关禁家中，不得踏出家门一步，违令者格杀勿论。著名事例如丹绒马林新村，英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便因英军被杀而对此村实行24小时戒严令达数天之久，并配以饥饿政策，限制粮食供应，



并利诱村民提供情报来逼迫村民就范。

6. 剿共军警在胶园中经常任意骚扰、非礼和强奸妇女，数以千计。有者遭轮奸致死，便以马共论处。紧急法令授军警予特权，不必声明理由，不需逮捕令，即可随时执行逮捕拘禁任何受嫌者，并无需经法庭调查审判，即可无理用刑拷打，拘留监禁达数年之久，或最终遭驱逐出境。在胶林矿场，军警射杀，误杀胶工矿工事件时有所闻，然一律以涉嫌马共罪处置。著名案件如雪兰莪巴当加里（Batang Kali）胶园，英军射杀手无寸铁的胶民达 26 人之多，便是特别恶劣的例子，而涉案英军至今仍逍遥法外。紧急法令提供军警肆虐的保护伞而逍遥法外，不受惩戒。个别射杀事件则无从查考。胶工、矿工遭遇被杀强奸等情，有冤无处诉，任由鱼肉。

英国一再声称自己是个法制健全、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度。但在其殖民地却以双重标准统治，实行极不人道，手段极其恶毒残酷的镇压并开展违反国际公法的不义战争，打压寻求独立的民族民主解放力量。以上种种，形同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却在许多所谓的历史撰述中被粉饰成为英雄事迹和极尽其掩盖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正显现操纵历史话语权，为其政权服务的典型示范。

马共历史的全过程贯穿着几个不同的时代。它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殖民地时期，受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南来的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的南洋支部，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正式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主要从事工运，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存在，在英帝国殖民政府的镇压和逮捕下，挣扎求存。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及四十年代初，抗日运动带给马共发展的契机，迅速扩充党团组织，成为新马抗日中坚力量。在日本南侵前夕，英帝国殖民政权不得不与之结盟，训练马共人员成为敌后游击队。整个日占时期，马共组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人民抗日军兵员达 1 万人以上。可是，日降后，解散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回复到战前组织工运的状况，备受英帝国殖民政府的镇压和打击。终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图走回武



装斗争的道路上来。英帝国殖民政府先发制人，以紧急状态的名誉首先发动了战争。是谁蓄意发动战争？英帝国殖民政府把矛头指向马共，马共则预测英帝国殖民政府迟早必采取武装镇压而有所准备。应该说，英帝国殖民政权蓄意要全面消灭马共的所有组织及其影响。受二战后冷战思维的指导，英美以资本主义霸权领导者自居，要堵截世界各地各领域共产主义的进取和扩张。特别在其殖民地，容忍不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主导的工人运动，对抗其在殖民地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经济掠夺和剥削。从许多解密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到英帝国殖民政权的这种部署。对双方而言，战争都是无可避免的，是谁打出第一枪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责任和道德问题。

这场战争一开始，便就是个不对等的战争。英帝国殖民主义者前后共投入 14 亿 7 千多万英镑，前后共动员英军 139 个兵团，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罗得西亚、菲济等英联邦属地的 20 多个兵团，总军力以 1952 年正月高峰期各部队人数计：作战部队 4 万多人、警察部队 6 万 7 千人、特警部队近 4 万 5 千人、自卫团团员 30 万人，总共超过 45 万人。武器装备无数。单英澳战机出勤轰炸航次便达 2 万 5 千次以上，发射不少过 10 万枚火箭炮与投下超过 3 万 3 千多吨炸弹，这还不包括投下落叶剂等化学炸弹。以上数字也未计入在沿海巡逻的 6 艘军舰以及他们配合地面攻势所发动的炮轰。而马共的抗英游击队，在顶峰时期的 1951 年，也不过 7 千 3 百人左右，而其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在这样军力悬殊的格局下，英帝国殖民政权还得消耗十二年的时光，牺牲了数千军警才基本算是结束了这场战事，但却无能全然消灭马共和其游击队。英帝国殖民政权及其后来的执政者在这场战争中是真的打赢了吗？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最终仍然没有达到即定的全然解除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威胁的目的，能否称作胜利呢？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是聪明的，他或许读过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篇章吧？最终在军事心理作战部的强烈反对下，还是坚持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以相对优厚的条件给予马共一个体面的台阶，而结束了这场长达四十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



因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敌对者手中，因而人们对马共的历史讳莫如深，连基本的认识都没有，知道的仅仅是官方抹黑的宣传。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来说，历史学家这样论断：“人们对某一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的认识，只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一次过程是很难完成的，常要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多次往复，不断深入，才能达到逐步认识历史的目的”。因而对马共的历史的认识，不能光从各方的论述出发，还得掌握大量的史实才能从中理出一个历史的轮廓和脉络。史实是历史工作者据之掌握历史真实的资料。历史资料是历史赖以重现的重要依据，其真伪与存失对历史认知和研究至为关键。无论是敌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系统地储存着马共历史的全部资料，因此，对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的马共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核对、考证、辨别、立档是这历史工作的最初阶段。然后，从对这些资料的过滤、厘清和研究中，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轮廓和脉络、复原其历史过程是我们对马共历史认知的感性过程。从这感性认识的阶段出发，比较完整地去了解其历史全过程，分析其各时期历史事件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找出事件的癥结所在，对其各时期历史活动做出价值判断，从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为鉴诫，才算完成对其历史的理性认识。自马共历史发生以来，大量存在的其实都是依据政治需要而按某种设定结论所作的伪历史，是意识形态决定的历史结论。

马来亚这场持续四十年的战事，是二战以来持续最久的游击战争。在这漫长的斗争岁月里，马共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马共所从事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不同于一般民族主义的斗争，建立马来亚共产主义政权是它最终的诉求。可以说，马共的斗争是兼具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两重性质，肩负着很崇高的历史使命。在当时国际的情势和马来亚的人文环境，马共有否掌握住局势所提供的条件？在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政治的地缘环境，以及在一个狭长而丘陵为主的半岛上，条件是否允许武装革命？还是实质上逼上梁山别无选择？在漫长的斗争道路上，哪些决策犯了致命的错误？领导层的素质，队伍的素质，在在都影响着斗争的方向、路线方针的制定、策略



的优劣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在不同时期，以上各项都是否应情势的转移而改变？在民族问题上怎样解决彼此间政治觉悟程度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与经济条件的差别和宗教所带来的困扰和阻碍？在英帝国殖民政权刻意进行的种族分化，挑拨离间式的种族隔离职业安排和政治上的分而治之，马共有什么相应政策以对？马共一再地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接受中共的指导，这在马共的决策上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如何去理解马共在不同时期的斗争的反反复复？特别是怎样去看待那严重的内部肃反？路是走过来了，留下了许多伤痛的回忆，留下了无数有待解开历史谜团。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者和追随者因之牺牲，数百万的人民受到影响，我们将从这历史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马共斗争的成败，对后来新马华人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还，新马左翼运动日趋蓬勃，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后，因执政当局的残酷镇压和疯狂逮捕，加上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极端，新马左翼运动完全放弃了宪制斗争的途径，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走上街头，罢工罢市，示威游行，大搞议会外群众斗争。马共与左翼运动有怎样的联系？马共曾否主导左翼运动？还是左翼运动审时度势，最终选择转入地下，走“枪杆子出政权”的路子。以上种种问题都有待深入的探研和反思。

这个历史不是一个英雄、一个领导者的历史。而是一个伟大的群体，成千上万理想主义者投入的一个可歌可泣的运动的过程，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悲壮的血的历史。该肯定的应予肯定，该批判的应勇敢面对，要引以为诫应牢记在心，该更正的一定要更正，还历史以原来面目，还历史一个公道。马共的武装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无损于其正义性。

史料的残缺性或被蓄意歪曲都将构成人们历史认知的差异，当历史认知违背历史事实时，这种历史认知便是对历史认识或剖析的谬误。因此对史料的检验和认证的工作至为重要。在大量原始资料残缺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便变得举足轻重。陈平，作为马共总书记，对上述诸问题会有怎样的答案？会如何回应？或许有些问题他无

从回答，有些事他也无从回应，但他会有怎样的思考和判断？这些，人们都想从他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的口中，得到某种述评和诠释。其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提供部分说明。它具有填补一部分历史空白的作用，也是作为检验现存历史档案的另一依据。但作为个人的口述历史，很大程度受着个人认知的局限和记忆力的好坏的影响，因而对历史事件的述说与对历史过程的诠释，有着或深入或浮面的描述；更甚者是其主观意识和评价所做出的历史判断和对事件与人物的判决，因而必须特别注意免受这种主观意识对历史认知的影响。

这本二十位马共历史学者与马共总书记两天的冗长的对话录是一本马共历史绝无仅有的特别史料集。他不仅紧追时代的脉络，追根究底地盘问马共总书记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实情况，更兼带审视历史的眼光去查看历史过程中的盘根错节的历史真相。正是这个原因，这本口述历史比一般口述历史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它的发生，存在与出版也是一个历史事件。拿它与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对照着阅读，不仅是一件有趣的事，而是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某些真相。编著者为此耗费了许多不眠之夜，所为就是要为历史研究者和读者们提供一些马共历史的真实。





1940-60 年代的马来亚

(卡尔·哈克 提供)

# 目录

《与陈平对话 —— 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

关于音译的说明		i
简略词(缩写)说明		iii
文档照片		vi
照片与插图		vii
地图		ix
统计图表		x
鸣谢	陈剑与卡尔·哈克	xi
序言	安东尼·李德	xiii
中文版序: 历史的话语权	陈剑	xvi
关于《与陈平对话 —— 马来亚 共产党新解》一书及马共研究的一些说明		

## 第一部分 —— 背景资料

1.1 马来亚紧急状态简说	卡尔·哈克与陈剑	1
1.2 陈平简历	陈剑	41

## 第二部分 —— 与陈平对话

文件 I		49
工作营程序表		50
誊录说明	陈剑与卡尔·哈克	51
2.1 第一场对话	开场白 —— 欢迎仪式	55
2.2 第二场对话	马来亚共产党的早期历史	59
2.3 第三场对话	日据时期	79



## 目录

###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

2.4	第四场对话	1945-48年：合法时期	105
2.5-6	第五场及第六场对话	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及1948-55年马共的策略	121
2.7	第七场对话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游击战及英国的剿乱策略：为何输了这场战争？	151
2.8	第八场对话	1955年华玲会谈	179
2.9	第九场对话	反对马来西亚及与印尼共产党及婆罗洲友党的关系	195
2.10	第十场对话	从马来亚独立，到1970年代‘第二次紧急状态’到1989年停火期间的马共策略	213
2.11	第十一场对话	结束评语：陈平与马来亚民族主义斗争	233
2.12	第十二场对话	终场讨论	241

### 第三部分——支援文献与观点

	引言		251
3.1	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至1942年概况	杨进发	253
3.2	马共、莱特和日据时期：1942-45年	明石阳至	259
3.3	1945-48年合法时期：马来亚共产党跟马来人、英国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谢文庆	263
3.4	马来亚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及其作用	陈剑	269
3.5	马来亚共产党于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	彼德·爱德华兹	293

## 目录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

3.6	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之注释和关于 马来西亚半岛第一次紧急状态之问题	利昂·康伯尔	297
3.7	关于马来亚共产党斗争的问题	约翰·顾斯德中将	305
3.8	问关于马来亚共产党斗争的目标	安东尼·索尔德	307
3.9	1948-57年：马共政策及所获支持	卡尔·哈克	309
3.10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游击策略和英国的 戡乱策略：为何输了这场战事？	李察·史塔布斯	317
3.11	1955-60年：从华玲到独立	卡尔·哈克	321
3.12	1961-63年马来西亚成立及1963-66年 马印对抗马来亚共产党及其他左派 势力的角色	加米尔·麦克基	333
3.13	1960年代至1980年代马来亚共产党 历史的关键课题和问题	原不二夫	341
3.14	马来亚共产党与阿沙(原住民)	约翰·李尔利	345
3.15	陈平——寻找革命之路	陈剑	351
3.16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回顾 ——马来亚共产党是否有起义的计划	陈剑	391
3.17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 (1948年3月2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扩四中全会通过)		411
附录	附加图表与统计数字		431
	参加工作营名单 出现在陈平对话会的人士		435
	学者简介		436
	参考书目		443



# 文档照片

- |  |                                 |     |
|--|---------------------------------|-----|
| 1. 战事简述                                  | 大英档案馆                           | 49  |
| 2.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战果                           | 大英档案馆                           | 169 |
| 3. 马共军事教材——伏击战(封面)                       | 陈剑档案                            | 170 |
| 4. 马共军事教材——伏击战(内页)                       | 陈剑档案                            | 171 |
| 5. “十一决议”封面                              | 陈剑档案                            | 171 |
| 6. 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宣言                           | 陈剑档案                            | 201 |
| 7. 英军反共传单 1534 号                         | 伦敦皇家学院<br>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br>斯托克韦尔文档 | 220 |
| 8. 英军反共传单 / 通行证                          | 伦敦皇家学院<br>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br>斯托克韦尔文档 | 221 |
| 9. 英军反共传单 / 通行证<br>(附\$500 奖励)           | 伦敦皇家学院<br>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br>斯托克韦尔文档 | 222 |
| 10. 英军反共传单 / 通行证<br>(附 \$500 奖励, 三种语文传单) | 伦敦皇家学院<br>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br>斯托克韦尔文档 | 223 |
| 11. 英军反共传单(恶狗)                           | 伦敦皇家学院<br>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br>斯托克韦尔文档 | 224 |

# 照片与插图

1. 吉兰丹“牙叻顶”抗日军纪念碑	陈剑提供	6
2. 森美兰“葫芦顶”抗日军纪念碑	陈剑提供	6
3. 年轻的陈平（素描）	“小猎兔犬”期刊编辑 珍妮·李策提供	41
4. 实兆远——陈平出生处	陈剑提供	42
5. 实兆远南华学校	陈剑提供	43
6. 1999年陈平与历史学家们 在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 1	陈剑提供	51
7. 1999年陈平与历史学家们 在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 2	卡尔·哈克提供	52
8. 陈平、陈剑与约翰·顾德斯中将 于澳洲国防军事学院前	陈剑提供	67
9. 莱特	帝国战争博物馆提供	79
10. 原“九一”纪念碑	陈剑提供	114
11. 陈平与利昂·康伯尔	卡尔·哈克提供	132
12.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行军中	利昂·康伯尔提供	152
13.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阵亡战士	利昂·康伯尔提供	153
14. 特警岗哨	利昂·康伯尔提供	163
15. “白区”告示	利昂·康伯尔提供	164



16. 穆哈末·英德拉	利昂·康伯尔提供	175
17. 投降敌员刘汉与利昂·康伯尔	利昂·康伯尔提供	176
18. 政治部官员与投降敌员共餐	利昂·康伯尔提供	177
19. 王赓武教授在陈平对话会上 作总结	陈剑提供	233
20. 马来亚剿共侦察队	约翰·李尔利提供	346
21. 原住民自卫团	约翰·李尔利提供	347
22. 马来亚剿共侦察队员与原住民	约翰·李尔利提供	347

# 地图

- |                                       |         |     |
|---------------------------------------|---------|-----|
| 1. 1940-1960 年代马来亚地图                  | 卡尔·哈克提供 | xxv |
| 2. 抗日军布兰丹山营地与天定海岸                     | 卡尔·哈克提供 | 84  |
| 3. 吉兰丹、彭亨与吡叻三州交界图<br>(陈平拟在话望生地区建立根据地) | 卡尔·哈克绘制 | 152 |
| 4. 彭亨地图<br>(陈平于 1950-51 年活动地区)        | 卡尔·哈克提供 | 162 |
| 5.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分布图                        | 大英档案馆提供 | 193 |
| 6. 1960-61 年陈平千里途程往北京路线图              | 卡尔·哈克提供 | 229 |



# 统计图表

1.	1948-54 年度冲突次数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21
2.	1948-54 年度剿共部队死伤数目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21
3.	1951-57 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军力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26
4.	1952 年紧急状态事故月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431
5.	1950-54 年间紧急状态时交火次数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432
6.	1949-57 年间紧急状态事故统计表	大英档案馆	432
7.	1948 年马来亚联合邦各族人口比较图例	1951 年马来亚 联合邦年报	433
8.	1951 年马来亚联合邦各族人口比较图例	1951 年马来亚 联合邦年报	434

## 马来西亚紧急状态简说

卡尔·哈克 与 陈剑

马来西亚的紧急状态，正式于 1948 年开始，1960 年结束，总共花掉了 700 多万英镑。<sup>1</sup> 马来西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马共）与其武装部队——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过后继续在泰国南部基地活动，一直到 1989 年 12 月才达成和议。<sup>2</sup>

这项冲突，尤其是在 1948 年至 1955 年间最为激烈的年代，一直被当成是剿乱‘课程’的实例来进行辩论，而对它进行分析的专书则不计其数。<sup>3</sup> 只是，一直以来，都总是存在着一个缺憾，就是

- 
- 1 英国用了 520 万英镑，其中约 100 万英镑是用于英国及联合邦军队的正常对外防务。参阅 *Review of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from June 1948 to August 1957*, Director of Operations (DOO) Malaya, Public Record Office: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 2 关于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英国政治部人员在 40 及 50 年代译为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可是，根据马共当年的各宣传资料，以及陈平本身及陈剑的解释，用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比较能够反映原义。
  - 3 有关文献在以下书中进行探讨：Karl Hack, *"Iron Claws on Malaya":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30, 1 (March 1999), 第 99-125 页。还有本书的数位重要作者，特别是：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London, 1975);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少了那一个探窥马共及其总书记陈平的内心的窗口，由他们用他们的观点来叙述，说明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为什么而战斗。<sup>4</sup>

本书所要呈献的正是这个部分。因此，我们希望本书对于保安部队的专家和有关斗争的参与者都值得一读。值得一读，因为如果我们无法了解共产党人那一方用他们的观点讲出的故事，那么，我们对紧急状态的理解，以及它对参与双造个别人而言，将会继续保持不完整和不够全面。那意味着，我们得特别去了解在 1948 年至 1960 年间这个关键时代拿起武器战斗的那一代人。<sup>5</sup>

第一次看陈平，他似乎是个非常不符合当代典型的人物。1924 年 10 月，他在马来土邦吡叻的小镇实兆远出世，父亲在当地开店做生意，经营脚车、轮胎和电单车零件。他之所以突出，是因为他年方二十，就在 1947 年像彗星般升起出任马共的总书记。<sup>6</sup> 此外，大多数人所无法坚持下去的，他却坚持到底，当他的许多同志，或牺牲、或被捕、或已经改奉行资本主义后，他还是担任马共总书记

---

4 陈平原名王文华。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论述，参阅 Karl Hack, *Corpses, Prisoners of War and Captured Documents: British and Communist Narrative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4, 4 (Winter 1999), 第 211-41 页。也可参阅 Richard Aldrich, Gary Rawnsley and Ming-Yeh Rawnsley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London: Frank Cass, 2000)。

5 在本书出版前不久，陈平，Ian Ward 和 Narma Miraflor 推出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中译《我方的历史》)，其内容揉合了陈平本身的叙述、档案文献、书报资料，再加上 Ward 本身的说法。该书提供引人入胜的描述，资料丰富，跟本书采用的直接对话和直接引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在坎贝拉尝试提出的一些叙述后来出现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也同时作为对相关问题的回答，促成两本书之间存有共生的关系。

6 在参与共产党活动及二战的干扰以前，陈平接受华文教育至初中，有受一点英语的训练。他的儿女的生活却平凡得多。

至今。

然而，在某些方面，陈平却也不是特例，他跟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典型：出生在两个大战间的男女，在 1940 年代和 1960 年代之间，纷纷加入马共进行战斗。就像许多在 1945 年之前入伍者那样，他参加马共，是因为共产党在 1937 年以后，似乎成了中国抗日的最有效力量。他也是很典型地在 1937-1941 年间被吸引加入抗日组织，然后在战争时期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时期，对陈平人生的塑造起了重要影响，使他的领袖才华在担任英国 136 部队联络员时表现无遗。136 部队由华人和英国官员组成，跟着人民抗日军在马来亚的丛林基地活动。他只是许多华人中的一位，其中一些虽然仅十来岁，却因为战争而被弹上领袖的地位。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段日子也是他和其他马共领袖突现他们的英雄事迹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先了解到抗日期间的历史和感情冲击，是不可能全面了解接下来的紧急状态的。按陈平和他的同志的观点，那许多被英国人指为共党老巢的地方，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其实是抗日战争的强有力象征。《与陈平对话》中间接提到的丹绒马林和话望生两个例子，显示彼此间的分歧是多么的大。<sup>7</sup>

第一个个案丹绒马林，位于吡叻州南部边界附近，在 1940-50 年代是个约五千人口的小镇。1942 年 2 月新加坡沦陷之前，英国军官史潘塞·查伯曼 (F. Spencer Chapman) 上校就是在这儿短暂发动第一批的三人敌后突击队。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的那一天，陈平也是在这儿走入森林，选择这里的一部分理由也是为了查伯曼。将近十年后，在 1952 年 3 月，丹绒马林再度成为重大事件

---

7 这一点在韩素英的小说中有提到。参阅《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第 38 页。该书是作者以下嫁政治部官员利昂·康伯尔和她本身作为一名医生为依据，参合虚构人物而写成。也可参阅韩素英的半虚实‘日记’，第 54-69 页。



的焦点。当马共在该镇附近伏击和杀死英人军官后，它被马来亚的最高专员兼作战主任邓普勒将军下令近乎全面的戒严，削减粮食配给。

假使丹绒马林表现出战争时期的抗争，那个在冲突中被杀的英国军官则是战时英国人精神的象征。他叫麦可·谷德纳 (Michael Codner)，是马来亚民事服务局的官员，他较为人知的事是从德国战犯集中营逃出来，然后‘跑回家’。他被杀，触动旧恨新仇，一方面由于他的身份，同时也因为那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在丹绒马林已经发生了好几回的最新事例。例如，马共的《工人快报》在1951年12月25日渲染说，在12月16日靠近该镇的战斗中，他们的突击队以四人打四人，杀死两个特别警员，一个印度书记和一只英国‘猪猡’，然后胜利夺走两挺机关枪。<sup>8</sup> 因此，在英国人的文献中，丹绒马林象征着共产党在搞破坏，也象征着新上任的作战主任邓普勒爵士的能耐。通过恢复英国人和民间的信心来打赢紧急状态这一战，成了他决心的象征，也几乎是这场冲突胜败的转折点。<sup>9</sup> 游击队员在1951年的人数是7,292人的高峰，接近陈平走入森林时的平均人数，下一年就减至5,765人，过后就一直下跌。<sup>10</sup>

话望生小镇，位于吉兰丹南部群峰环绕的森林中，很接近今天的国家公园，有着相同和双重性的历史。当地的战时营地在1942-43年时有120名左右的人民抗日军队伍。他们打日本人很成功，以至日军后来干脆撤离这个山谷，改用飞机来轰炸，尝试把游

---

8 《工人快报》第6期，译文。PRO: CO 1022/249。

9 麦可·谷德纳，Micheal Codner，当时在监督抢修被破坏的水喉。他‘逃跑回家’发生在德国 Stalag III 营著名的‘木马逃亡’之后。这一幕已拍成电影。邓普勒的苛刻措施包括宣布削减粮食配给和24小时戒严，一直到他得到所要的情报为止。他放了一个封口箱供村民提供情报，由他亲自开启。

10 *Review of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from June 1948 to August 1957*, DOO, PRO: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击队赶离附近的村庄。这支抗日军队伍也负责对付北部的其他叛军，他们称之为‘土匪’，或许包括国民党分子在内。在本书的第二部中，陈平讲述，在1948-49年底，马共再一次挺向话望生。陈平的党中央计划把这个相对偏远的山区变成他们的第一个解放区。如果计划成功，500名马共分子会再次在吉兰丹建立一个‘根据地’。英国人很幸运，共产党部队很快就撤退了。过后，陈平的部队再也没有能力把这么多的人员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了。<sup>11</sup>

从较大的层面来看，战时抗日军的3,500名战斗员中（1945年中英国人的估计），超过1,500人集中在战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争取支援时最有利及能提供持恒资源的两个州：西海岸的锡米之乡吡叻，和南部的柔佛州。在《与陈平对话》中的第二部分，他简略地提醒我们这段战争时期是多么重要，以及陈平和他的同志们，如果跟英国人比较，对这些不同的地形有什么样的看法。从地理上来看，那似乎不只是符合科学，它也是充满着想像和感情的政治及回忆的山河。

尽管时时可能有日本军警部队逼使他们逃离基地，尽管他们得低调地对来日的推断进行锻练，尽管他们之间有部分同志谈论着可能被逮捕和受酷刑，这段抗日时期对于陈平和他的同志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是一群士气高昂，坚韧不拔，纪律严明和自尊十足的战士，为保卫人民而对被仇恨的敌人进行抗战。<sup>12</sup> 两名

---

11 Capt. G. A. Garnoss-Williams RN Papers, for Lt. Col. F. S. Chapman and Maj. R. N. Broome. *Operational Reports following exfiltration from Malaya in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第7页。

12 这些英国人是相当坦诚的，可是，同一份报告的第49页，却也有所保留，把游击队形容为‘想像中状况几乎是最糟透的一群’由于眼睛的视力差，缺乏经验，弹药匮乏和缺少训练，加上所握的是英军在大溃退时丢掉的糟透枪支（那些丢进仕林河的浸在水中好几个月了）。紧急状态时，每一支叛军有20-30围‘陈旧及不可靠’的子弹，常常是用最新虏获的子弹来开始最关键的几枪。PRO: Air20/10377。





牙叻顶抗日烈士纪念碑。此碑立于牙叻顶蒲菜村附近丛林中，该处为抗日时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根据地。  
(陈剑 提供)



位于森美兰葫芦顶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原碑建于1945年9月，此集体纪念碑由日本反战人士赞助重建于1999年9月。  
(陈剑 提供)

跟抗日军一起生活的英国 136 部队军官报告说，尽管各方面匮乏，抗日军的战时营地，其中好多是驻扎在水平线上 2,000 英尺以上的高山丛林中，处处充满着此起彼落的热情奔放的声音：‘二、三十个人会提高嗓子高声辩论，喊声中带着爽朗的笑声，学习唱五、六首不同的歌曲，拍着枪支武器什么的，大家都一起这么干’。他们还有正式操练，政治课和对双周刊报纸进行讨论，常常是对他们的苏维埃的胜利抱着过高的热情。<sup>13</sup>

因此，也就难怪在 40 多年后，陈平跟 136 部队官员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s) 在伦敦会面时，陈平坚持要讲那些‘美好的往日’。对于戴维斯，史潘塞·查伯曼，布隆姆 (Broome) 和其他的 136 部队军官来说，陈平在开始时是朋友，虽然过后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sup>14</sup>

除了战士，这些战时营地还有几位伙头军，几位吃得较好以便执行重要任务的响导，一位学过中医的医师（紧急状态时，游击队员的津贴包括了看中、西医的款项），或许还有几位伤员，或有人因为懂得太多而得留下来。战士之中，也可能有一、两位会修理枪支弹簧和瞄准器的前机工。营地也有女人，一般上是在近百人的队伍中有五至八位，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年青女性，负责教导华语。因为许多新兵只懂方言或少许的简单马来话，教导华语是有必要的。她们也教导唱歌，当看护或担任领导的秘书，比较强壮的则随时愿意负起最繁重的日常杂务，包括迁营时抬着跟男人一样的重担。虽然有时候由于不足够而未被分配武器，妇女群在队伍中的要求，只有跟男性一样或可能更严格。夫妇被分开，派往不同营地，避免引发其他人有搞男女关系的想法，使问题复杂化。事实上，

---

13 Capt. Garnoss-William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14 约翰·戴维斯在 1941 年是马来联邦的警官，因此而涉及吡叻英军残留部队的渗透计划，残留部队人员主要由马共提供掩护。他过后担任 136 部队对马共之联络员。战后，他加入马来亚民事服务。



136 部队报告说，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sup>15</sup> 女性表现的英雄气概，比起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彭亨的文冬营被攻击时，英国人的情报指有两位女性坚持留下来，陪受伤过重而无法逃生的伤员。第三位妇女则用冲锋枪掩护高级领导逃走，一直到她被射杀。根据同一份英国人的报告，还没死的‘当然就被日本鬼子奸杀了’。<sup>16</sup>

虽然是生活有如被追杀的猎物，每一次被发现就得转移，游击队还是能够维持一个营地管理的大略轮廓。大多数营地主要设有一个供三至五位领导（包括一个政委，一个队长或同级领导，以及一位政治教官）总部营寨，营房，厨房，冲凉房，厕所，有时候还会设有病房。营地位于山地和丛林，设有放哨台，由守卫，或有时候由附近非法落户居民的鸡狗受惊动，来侦察是否有来人。<sup>17</sup>

无论如何，这个躲藏和生存的能力，得依赖他们不要鲁莽盲动地随便攻击日军。过多的活动不仅有暴露阵地的风险，也可能招惹

---

15 参阅 Lucien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第 213-4 页，中提到在寻找新工作时，父母和孩子或夫妇暂时分开在许多华人而言是惯事。可是，漫长的战争限制了重圆的机会，或对于未婚者，则造成难以实现早婚和早组织家庭的传统期望。关于妇女，可参阅 Ho Thean Fook, *Tainted Glor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0), 第 141-3, 158 页。作者何天福是吡叻乡区受英文教育的抗日军，他厌恶共产党的统治集团，显示了一些人是因为反日而加入抗日军，唯继续保持反共。可参阅 Chin Kee Onn, *Malaya Upside Down*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shers, 1946)，以了解另一个受英文教育华人的见解，作者 Chin Kee Onn 后来担任殖民地政府的情报官员。也可参阅 *Ma-rai-ee* (London: G. C. Harrap, 1952, also produced as *The Silent Army*); 及 *The Grand Illusion* (London: G.C. Harrap, 1961)，内容叙述‘Kung Li’这位‘好’共产党员幻想破灭后的觉悟。

16 Capt. Garnoss-Willaims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第 10 页。

17 Ho Thean Fook, *Tainted Glory*, 第 158-62 页。

日军对供粮支援家庭或曾与游击队为邻住户的报复。从一开始，陈平的同志都清楚知道，日本人在中国不只是攻击抗日战士而已，平民他们一样不放过。马来亚的情况也将是一样的。早在新加坡沦陷前，参加 101 特别训练学校（由英国人设立的游击队员训练单位，位于新加坡东郊）的 165 名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在马来亚成立游击队了。<sup>18</sup> 他们一站稳阵脚，就开始攻击日军的通讯，在 1942 年 1 月已经非常活跃。日本人在新加坡沦陷前也开始以牙还牙。在较早的抗日行动和日后的紧急状态之间，还是有一个环节串连起来的。马共在紧急状态初期的宣传的主题主要是把英国人描述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采用了日本人的手法：大肆抓人，无赖恶棍当线人，警卫团和烧光政策。

对于陈平和他的许多同僚，浸身于这些惨烈的血泊中，抗日情绪和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思想意识是第二位。的确，他的好多战时同僚从来就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开头，而不是因为身不由己，促使这一代人的其中一些人继续为这个事业奉献到终极。就如方壮璧（新加坡 60 年代马共领袖，被李光耀称为‘全权代表’）在他的诗歌《向吾师和同学致敬》（1997 年）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心灵相通的，这是苦难的一代，奉献的一代。’<sup>19</sup>

另外一个造反者，在马共领导层的另一端的，却讲述着在战后的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他参加共产党活动的那段期间里所作出的

---

18 必须注意的是，那是个渐进的过程。其他的部队，如陈平的情况，好像是过后才成立的。他们或使用预先匿藏准备抗战的武器，或使用英军溃退逃跑时丢掉的武器。

19 诗取自李兵，即方壮璧著《我们这一代》丛书：（3）《李兵的诗——一片生疏的天地》（雪兰莪大汉山出版社，2000 年）。此诗由前 136 部队成员已故余定敦（Seah Tin Toon）译成英文，他生前接受过 Karl Hack 访问。方壮璧于 2004 年 2 月 6 日病逝泰南。



牺牲。

林明，广东人，来自麻坡的武吉巴西（Bukit Pasir），是个平凡的造反者，只是年纪大了些，44岁。<sup>20</sup> 跟其他那些继续留在华人村庄附近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不一样，他的队伍经常缺粮。1948年10月21日，他在麻坡附近森林边沿的营地吃早餐，就是白饭，没有菜，<sup>21</sup> 他在红皮日记簿写道：‘...消灭了两个英国人...同志们填不饱肚子...大家都遭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可是，美好的日子将会来到，我们就可上酒馆喝酒和看戏。我们要乘汽车去新加坡，在南天酒楼享受一番，找几个歌女来唱歌，渡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在消灭上面所说的两个人后，他们放掉一个马来人去作宣传，他们缴获了三件军火。林明写说‘我们很肯定将会取得胜利’。

11月4日，他写到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说‘60万大军...挥向徐州、郑州、沈阳、京浦铁路、营口、苏州、杭州、南京、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山海关、荆州、济南、广州、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汕头、惠州、嘉应州、大埔县、三水县’。但是，林明未能看到红军在1949年10月的最后战果，甚至未能实现要去新加坡的梦想前，他的命运却开始转坏了。

1948年11月，保安部队加紧对他活动的柔佛北部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或许，我们最好让他的一位同僚锦鸿（Kim Hong）（又名建辉，Kiam Hwee）来继续讲从那个月中开始的故事。锦鸿的日记叙述十六晚的明月格外分明，他是那么感动。他闲聊着，看着‘同

---

20 此处的叙述据称是林明受盘问时的供词。他是林纪忠（Lim Kee Chong）的儿子，44岁，在中国出生的割胶工人，住麻坡十一条石的武吉巴西，以及据称是属于他的一本日记，那也许是跟他一道的投降者所写的。Rhodes House, Oxford, Brewer Papers.

21 原文是英文，写为没有任何 vegetables，即是蔬菜。其实，这里的‘菜’指的是‘菜肴’，也可包括鱼肉。

志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他下令准备的“饼干和咖啡”。因为他睡不着，就唱起了儿歌，蚊子则飞绕着他嗡嗡叫。这一切撩起了他的儿时记忆，他坐着沉思，一直到十七日凌晨。<sup>22</sup>

其他的人都醒了后，他告诉他们要马上进行转移，原本营地是在巴吉里（Bakri）路七英里的沼泽矮丛林里，要换去一个较小的沼泽地去。接着他就睡觉，可能就睡在他们用铺地防潮布所搭起来的简陋帐篷内。

他应该是在中午之前起身，在日记簿里写下上述情节。因为，我们知道，不久之后，有人报告说保安部队就在附近。他的同志们，3位马来人，1位印度人，其他都是华人，马上开始撤离营地，沿着环绕他们的营地，穿过沼泽地的小径。

可是却太晚了。林明过后回忆，‘军警已经到了，我们开始逃跑。我们跑向橡胶园，却发现路径已被警察拦住了。我们转回身，发现陷入包围了。跟着我的人有一些枪支，就开始开火。我有一支长枪，但没有开火。我落在队伍的后头。我受了伤，我的指挥员拿走了我的长枪。我尝试逃跑，但跑不远。我爬着离开，爬了两天两夜，一直爬到一座橡胶园。我没有吃的，露天而宿。这一天（11月19日），我爬到路旁去，喝沟里的水。我爬向三间屋子求助，但没人回应。过后，两位华人警察来抓我。...我告诉他们说我要投降，因为我没有吃的，就要饿死了。我带警察回到我睡觉的那儿，给他们看两件武器。’<sup>23</sup>

同一组人的三个马来人中的一位叫阿丹·敏·阿卜·卡林（Atan

---

22 日记簿标明在锦鸿口袋寻获，锦鸿好像是教官，大概是政治教官。  
Rhodes House, Brewer Papers.

23 跟许多投降人员的口供一样，事实往往混杂了旨在自我开脱的求情说词，如声称未曾开枪，说自己未获得信任，或自己是被误导，等等。



bin Abdul Karim)，是当地人，他向警察回述同一事件的经过。<sup>24</sup> 他说他听到从后面传来的第一响单一枪声，然后又听到第二响。他影射第二枪声是来自跟他吵过架的华人游击队分子，他指那位华人对自己的成就过度高傲，总有一天会死在保安部队手里。接着是更多的枪声，一颗手榴弹引爆了，阿丹乘机爬到沼泽边去躲起来。第二天，警察就在那儿逮捕了他。

于是，就在几天后，林明被警察拘捕，成了降员。他声称自己很迟才加入，而且是很不情愿情况下加入，除了煮食外，其他懂得都很少。阿丹被拘留时，热衷于向警方提供前同僚的一切情报。<sup>25</sup> 更为不幸的锦鸿则死了，在他的口袋里发现那本深蓝皮的日记簿，记录他的最后一夜和他最后一次所看到的月亮。<sup>26</sup>

就像许多叛乱和抗日期间那样，对事业的极端献身意味着像林明和锦鸿那样的战士得愿意去杀死自己人和敌人：华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甚至有必要，还包括女人。单单在 1951 年这个紧急状态的年头里，532 个平民被杀，而被杀的警察是 381 人，武装人员为

---

24 阿丹年 23 岁，来自二又四分之三英里的巴吉里，战前是一名胶工，战时是柔佛义勇军成员，战后任码头工人，有一度因为一些货物遗失被开除。他的一些前同僚成了特别警员，他却参加由莫哈默·英德拉 (Mohamad Indera) 领导的工会，通过这位召募人和麻坡地区的马来共产党人，走进了森林。像许多降员一样，他宣称自己是被误导走入歧途，在跟莫哈默·英德拉时，本来只是想受雇成为一名工头，他也在被捕时宣称自己一直都设法要离开游击队。

25 在营地共搜获四本写满爪夷文的簿子。阿丹是否受盘问关于簿子的内容，未有记录说明。更为不幸的锦鸿则死了，在他的口袋里发现那本深蓝皮的日记簿，记录他的最后一夜和他最后一次所看到的月亮。

26 日记用华文书写，归档方法使鉴定确实身份非常困难。资料的重建乃是经过多本日记，以及同一个档案中的降员口供的相互对照而成。Rhodes House, Brewer Papers.

124 人。<sup>27</sup>

日据期间的一个时期，在 1943 年底，几位妓女来到安邦新村（非吉隆坡附近的安邦，而是怡保附近的同名村庄）。同个地区也有好多游击队的支持者。有一位妓女每个星期都到怡保去，表面上是去探访年老的双亲。由于怀疑日深，抗日军就跟踪她，发现她真正回去的家是怡保的一个警察局。跟踪她的人总结是日本人在利用她来套取情报。他们用锄头把她打死，把满袋的衣服和首饰拿回营地去。

在马来亚设立第一支敌后破坏部队，过后成为 136 部队与抗日军联络官的史潘塞·查伯曼写道：‘告密者得用最速决的方法来解决，的确是要这样的。有一次，在表演晚会中途，布景骤然一变，我发现我们正在严肃和认真地审问一个报密者。虽然，像一般处理那样，他可以进行自辩和叫证人来为自己辩护，可是，在区区半小时内，他被判了死刑。台上的演出继续，有一组人则正忙着订行刑的细节。’史潘塞·查伯曼补充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带着枪，经常巡逻，或是驻扎在村庄，以便清理报密者。村民们为了自我保护，坚持一定要这么做。’<sup>28</sup>

对于抗日军和后来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支持者来说，这类行动是必要的，有时甚至认为，为了安全保障，过度的暴行也是无可避免的。对于诋毁他们的运动的人士，则是更进一步使用更残酷的

---

27 *Annual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1*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2), 第 6 页。武装部队则有 663 人死亡，平民死亡 357 人，失踪 135 人。

28 Capt. Garnoss-Williams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第 17 [打印号码], 58, 63-4 页 [手写号码]。那位妓女的故事也出现在 Spencer Chapman 在战后所写的 *The Jungle is Neutral* 一书中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第 318-9 页。



手法，以及滥用恐怖手段来强迫给予支持。破坏也好，杀人也好，两项暴行成了英国情报局能够加以利用的致命伤。战争时期有一个漂亮的女裁缝，父亲被杀害了。过后，紧急状态时期，她进行报仇。她带上面罩，跟政治部官员出入。对于英国人来说，她是去认人找出嫌疑分子。对她来说，她是在寻求公正，假使不是报仇的话。对于马共，她是走狗。<sup>29</sup>

这就是陈平在战斗中所上的残酷的一课。从最好的情况来看，紧急状态时期造反者的警备可是极端困难的，没有奢侈到能设立定点牢房，或进行看守以便作长期调查，而当局却不断地向华人施加压力以取得情报。‘杀汉奸’可能比杀军人和殖民地人员引起更强的情绪。1948年10月的一项记录叙述一个被冠以‘走狗’标签的人死前最后一刻的情景。造反者的一本日记簿描述一个涉嫌是‘逃兵和报密者’的人如何受审，‘但他却什么都不承认，一直到被（要胁）...带到已经挖好的土穴前。他接着高喊“马来亚共产党万岁”（译者按：原文为 Victory for the Malayan Communists，意为‘（欢呼）马来亚共产党胜利’，不符合相关的情节，可能是引文出处翻译有误。）过后，他被处决’。<sup>30</sup>行刑或是在个别的洞穴、有时是由被杀害者本身所挖掘、或是把手榴弹扔向‘走狗’及家人一起工作或生活的店铺，‘杀汉奸’会引发很大的激情。<sup>31</sup>不管

---

29 资料来自 Leon Comber，他是马来亚警察部队的前政治部官员。

30 关于‘杀汉奸’的描述（以及过后所引发的激情）出现在巫亚龙（Boo Ah Loon）1948年10月的日记的粗略译本中。有关日记的作者有所争议。Rhodes House, Hamer papers, Insurgent Dairy, 在1948年10月17日在巴吉里附近发现。

31 也许是因为对被出卖的长期恐惧而造成的激情。Spencer Chapman 和 Bromme 报告称战争时代的报密者被‘火烙、刀砍，和用藤鞭打至昏迷，然后才枪杀或砍死’，如果是妇女，则‘似乎更受垂注’。Capt. Garnoss-Williams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是称它为内部保安或是恐怖主义，这项行动也触及整个运动里所有人的生命，从基层群众到执行者，到位居党内权力最高点的陈平。

尤其重要的是，陈平能升到最高位，是因为他庆幸活了下来，他周围的其他人一个个被抓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之前那位总书记莱特的出卖。他反而能逃过前人的命运，原因可能是因为莱特在 1943 年时已经看出太平洋战争已经出现转机。随着英国 136 部官员开始乘潜水艇抵达马来亚，莱特现在需要刚擢升出任马共对 136 部队联络员的陈平继续活着。如果联军胜利的话，他需要转舵，改变支持的对象。要不是这样，陈平在 1943 年底受委出任吡叻州书记很可能是一道索命符。<sup>32</sup>

从 1930 年代开始，莱特先在越南担任法国特务，然后来到马来亚，先后为英国人和日本人服务，过后在战后至 1947 年逃跑前，又再一度为英国效劳。用英国或美国的说法，相当于罗斯福或邱吉尔竟然是叛国贼。一位 136 部队官员形容莱特的战时在抗日基地的地位是‘高乎于上帝’。<sup>33</sup>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时的马共领袖是活在随时被出卖、折磨和死亡的恐惧中。

莱特三重特务的出卖行为，以及这一切对马共的影响，很自然地成了‘与陈平对话’的主要论题。其中，陈平描述莱特的失踪如何促使马共检讨其战后政策，从公开政治活动和利用‘统战’机构，转变为 1948 年更激烈的方式（第二部分，第四及第五场）。那是随着英国人日益使用驱逐法令和私闯法来对付职工领袖，同时当时正好是国际共产党人转变策略，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取得一定成绩后，选择放弃在 1945-7 年间的公开及统战政治的路线。

---

32 陈平在 11 月至 12 月左右提任吡叻州书记，当时他仅 19 岁。

33 Capt. Garnoss-Williams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第 8 页。



在马来亚，这项转变造成 1948 年初发生多次跟工潮有关的暴力事件，一直演变到 1948 年 6 月 16 日，三位英国人和两位华人助手在吡叻被杀的高潮。到了 6 月 18 日，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项演变，陈平争论说马共没有充分准备，措手不及。

于是，三年的不稳定的和平日子结束了。抗日军退伍同志、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同情者被号召拿起武器。韩素英的半虚实小说《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描绘了许多人在这个时刻所处的困境。在小说中，一个战士在临死前对医生，即作者说：‘我立志要当医生，可是，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的一家，...，日本鬼子走了，英国人回来。我不能上学读书，他们说我超龄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有当苦力，一生当苦力。我的朋友都在里面。已经出来的也回去了。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我自己没路可走，我回到里面去，...。他其实只是重复许多青年已经讲过的话：他们的面前，根本没有引向未来前景之门，除了森林的青葱入口以外。’比起迷信和荒谬愚昧的停滞现状，共产主义提供了对解放、人格升华和现代化的追求。抗日军成员何天福（Ho Thean Fook）把这个形象艺术加工，用戏剧把这个形象用在一群当地工人的身上。他们受困在一家板厂内，他睡入一个刚做好的棺材内。他的同僚都跟着做，把棺材板当成床。造反者是不迷信的，虽然共产主义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为他们提供了某种世俗上帝和路径。<sup>34</sup>

拒绝屈从本身的经济地位或受殖民者统治的地位，或是拒绝眼巴巴等着被逮捕而选择共产主义，所付出的代价可不轻。不久后，

---

34 Han Suyin, 《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第 39-40 页。Ho Khean Fook, *Tainted Glory*, 第 201 页。社会学家 Lucien Pye 在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中对小说家汉素音（Han Suyin）关于现代性作出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能参阅降员的口供书资料，何天福说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是成为非华人，意思是要成为国际主义者。

除了恐惧和暴力生活的压力以外，造反者也必须承受英国对 1948 年 6 月事件所采取的反击。紧急状态宣布后，紧随着的是安东尼·索尔德（Anthony Short）在参阅官方文件后所描述的那样：即刻采取‘反恐措施’。<sup>35</sup> 连串的紧急条例，包括发出身份证，不经审讯逮捕，以及较后的粮食控制。

紧急状态初期，造反者的日记和声明把英国人的行动跟日本人的相提并论，讲述英国人烧毁财物及恐吓人民。在紧急状态的初期，在 1948 至 1949 年期间，接济游击队者的房屋有时会被当局烧掉。最极端的个案是全村遭殃，如 1948 年底在话望生附近的埔莱村。<sup>36</sup> 有时候，有人只是稍为受嫌疑就被射杀。1948 年 12 月在巴东加里（Batang Kali）村，紧张兮兮的苏格兰籍士兵用卡军把妇孺载走，然后把 26 名手无寸铁的男性华族村民召集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只有一人逃出生天。究竟那是冷血谋杀，还是过度紧张而触发开枪，至今还是争论的课题。<sup>37</sup>

支援者和战士都怕被逮捕，而英国人的收集情报方法也引人垢病。其中有一次，两位蒙脸的原住民站在吉普车上，车灯强烈的光线使受嫌者眼花缭乱，因为告密者指他们所看到的六十个人曾出现在造反者的营地（按当时英国人的用语，是‘匪营’）。被点中的人被绑起来，然后载走。<sup>38</sup> 锦鸿在 1948 年 11 月 10 日所记录的

---

35 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 第 162-8 页 for Batang Kali. See also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p. 4, *Rural Society and Terror*; an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36 埔莱村在 1948 年 8 月被共产党暂短占领后，整个村子被英军烧光。雪兰莪的加蕉，61 间房屋在 1948 年 11 月 2 日被烧毁。

37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第 72-7 页。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第 162-8 页。

38 Letter of 8 March, *passim* for this period, Rhodes House, Litton papers.



另一个事件中，写道：‘我像猴子那样爬上树，用望远镜看。上午10时20分，14个敌人走过〔而我〕...看到英国兵拿着机关枪走进一间寮子，企图强奸一个十八岁女郎。女郎挣扎，英国兵打她及侵犯她’。

事件的细节可能可以争议，但是这个时期的普遍气氛却是无可争辩的。一些游击队被保安部队打死后，尸体公开示众，以向当地村民‘证明’非假冒。其中一个情况是把尸体绑在门板上，绑在警车后面拖着游行示众。<sup>39</sup> 起初，在森林里打死的会被捆绑抬出来，或是如果地势不允许的话，则可把头砍下带回辨认。英国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在1952年4月及5月刊登系列砍人头的恶心照片，第一张是一个突击队员傲然笑着提着一个人头。邓普勒开始对禁止这种作法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告诉说，‘准确辨认死者身份必须这么做，我们不能放弃’。可是，伦敦的内阁却不这么认为，并在6月禁止砍人头的作法。与此同时，英国和马来亚的主流报纸都未刊登这些照片。<sup>40</sup>

到了1950年，这第一个阶段开始降温，政府的对策比较有组织性，善待降员，希望从中获取情报。政府发出赏金给提供情报者，改造俘虏，甚至送一些到村子去巡迴宣传。政府已经了解到最

---

39 刘观金被 Suffolk Regiment 所杀，尸体被带去巴生，‘绑在门板上，由警车拖在后面示众，‘目的是要证明他确实已被打死，但人们仍然惧怕他’。Herbert Andrew, *Who Won the Malayan Emergenc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95), 第66页。

40 Susan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1944-1960*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110-1页，《工人日报》在1952年4月28及30日，5月3，8及10日刊登有关照片。该报被视为亲共报纸。可是，英国的主要报纸都不刊登共产党受害人的照片。另一个个案是一个野战部队警员用手指点着警官桌面的5个人头，说，‘搞妥它’。Herbert Andrew, *Who Won the Malayan Emergency?*, 第17页。

好的宣传是言行一致，说真话，及让人们看到奖赏协助政府者，甚至包括前‘共匪’。但是，尽管改变了步调，马来亚继续是一幅乱七八糟和破坏累累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家属和支持者，被驱逐或遣送回中国，这种作法也在 1950 年逐渐停止。

这个时候，以从那年起出任有史以来第一位作战指挥哈罗德·布利兹（Harold Briggs）为名的布利兹计划（Briggs Plan），进一步制度化英国人的战略。这个计划从 1950 年开始实施，它要求军事单位驻扎在某些特定点，以取得控制和支配权。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小队巡逻。同时，另外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执行委员会，以便进行即时的协调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从联邦的层次，到州和县委员会。布利兹计划的里程碑则是备受争议的大迁居计划，也就是后来称为‘新村计划’。这计划把 400,000 住在森林边沿和各离散点的居民，在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底短短 18 个月内，迁离原本的家园。另外 600,000 人，大多数是园坵工人，最后进行重新集合，就是说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房屋迁移到彼此更近的距离，提供比较集中；容易防守的防线。

这项大迁徙在马来亚最后恢复和平上扮演重要任务，但是在 1950 年，村民所看到的可不是这样。典型的情况是，卡车和军队在黎明破晓时包围村庄，铲起那些能够带走的物件，然后把所有的房屋摧毁。居民开始迁入新‘家’的旅程，往往是离开旧工作地点或旧耕地好远的地方。早期，‘重新安顿’可能就是被丢在一个政府在地图所鉴定的坐标点上，提供木板，配给米粮，几个保安警察，以及或许一、两位行政官员去把物资、人和地统合起来，组成一个可以生活，能够防守的栖身所。必然的，许多地点根本就不合适，或是沼泽地，最好的也是对它的新居民造成巨大的不便。最早的例子当中，警亭开始没有无线电设备，米的配给不足，必须配黄梨。黄梨种遍地，或熬，或煮，或炒，或蒸，或烧，或生吃，以辅助三餐，一直到没有人再能忍受看到，闻到或嗅到黄梨。在比较广的层面，马来亚的蔬菜生产在 1950-1 年农民迁徙时期巨幅下跌，



在 1952 年过后才开始慢慢恢复。<sup>41</sup>

结果，重新安置的人数超过五十万人，而当时的人口仅有五百万多一些。这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十的马来亚人民，其中包括了大多数的乡区华人被赶出他们原有的家园。只有在 1952 年过后，大迁移之后出现的‘新村’才很慢地开始获得建立学校，民众会堂，流动医疗服务，甚至获准举行地方选举，以及能够重新种植蔬菜之后，才比较不像热带贫民窟和军事集中营。政府也在 1951 年底推行‘战事服务’（Operation Service），那是一项对协助公众人士的警察，后来包括其他公务员提供奖掖的措施。

可是，对于陈平的部队来说，政府方面加强宣传和促进公共关系，改善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治部人员的训练，再加上保安人员数目在 1952 年达到最高峰：67,000 名警察，40,000 名军队和 250,000 地方警卫团，却把他们置于更大的压力下（参阅第二部分，第七场）。<sup>42</sup>

更严格的控制和更完善的行政管理意味着对移置区四周围上更多篱网，以及在进出口警岗实行更严格的检查，制止私运供应品到森林去。脚车的轮胎得查看，看是否藏有白米或字条，甚至肩挑的粪桶也要检查，看除了肥料外，是否有其他东西被送到菜园去。在战时和紧急状态初期，物资的短缺会因为民运或群众庆祝新春联欢，演歌台或大戏，而获得解困。在现在看来，那简直是美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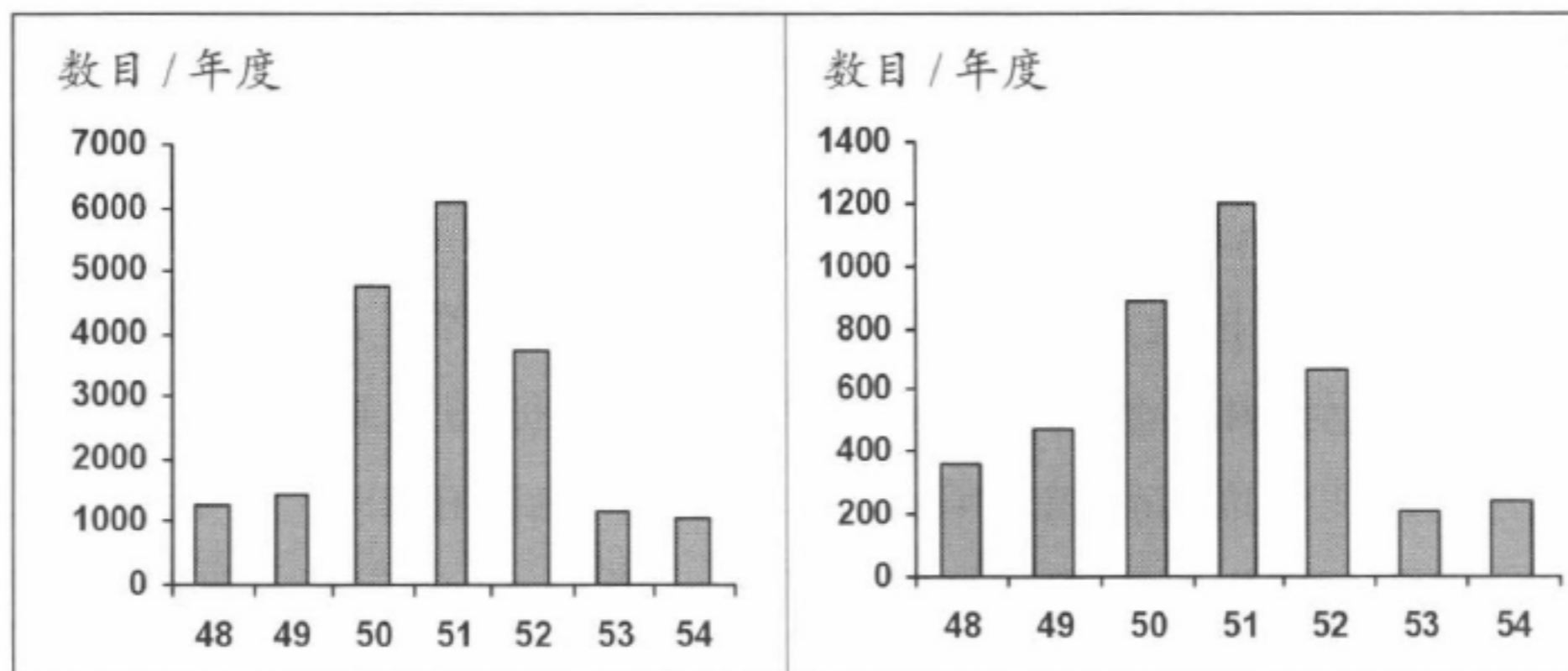
---

41 Ken Guest 至 Karl Hack 信函的附加资料，根据 P.J.D. Guest 参与重新安顿的第一手经验。

42 1952 年 1 月共有 67,025 名警察，1948 年 6 月仅有 9,000 人。这之中，22,187 名为正规警察，44,878 名为特别保安警察，再加上人数达 300,000 的地方警卫员。1948 年 6 月，马来亚有 10 个营的正规步兵（若包括相等的单位则有 13 个），在 1953 年高峰期有 23 个。*Review of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from June 1948 to August 1957*, DOO, PRO: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第 19-21 页, Appendix B.

表 1: 1948-54 年间剿共部队人员年度事故数字

表 2: 1948-54 年间剿共部队人员年度死伤数字



资料来源：大英档案馆档案 Air20/10377 作战司令‘紧急状态的检讨’。

子了。<sup>43</sup>

当政府对移置区周围地方加强平乱行动时，村子的戒严时间就会延长。罐头在出售前得弄破，以确保不马上食用会很快坏掉，而米饭是集中一起煮，因为，它不像干白米那样可以收藏和私运出去。有时候，控制链的某个环节会故意松懈，设下陷阱引马共成员和支持者入瓮。这样，就可以抓到意志比较坚定的民运分子，意志较弱的支持者就会更加暴露，进而放弃和投降。这些人于是变成了政府的特务，他们将继续供粮给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只是把其活动向保安部队报告。

于是，对于在森林里的陈平和他的同志而言，政府在五十年代中至末期的加强管制，等于是进一步的饥饿。这也意味着游击队难以进行突击，当他们在‘新村’周围日益受到严密控制的地区现身时，反而面临被狙击的危险。

43 Ho Thean Fook, *Tainted Glory*, 第 204 页。在第 218-9 页中描写过同志们下山到墓地去吃中元节祭拜先人所留下的食物：包子，烧猪肉块，鸡，蛋和腌姜。



与此同时，政府认识到：控制人民固然很重要，却也必须为他们的当前处境解困，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希望。1953年，‘白区’计划从马六甲开始展开。从那一刻起，‘解除’了造反活动的地区有希望看到绝大多数的紧急限制获得撤消。人们开始经验不受控制的措施，以及自由选择本身领袖的措施。市议会选举早在1951年12月举行，从槟城开始。1952年1月吉隆坡选举，联盟宣告成立，起初是由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盟提出保证马来亚各民族互相妥协方案，使全面自治政府看起来行得通。他们在1955年7月举行的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选举中，横扫52个竞选议席中的51个。

在这些竞选之前，联盟对公众呼吁跟共产党会谈，或退一步以尝试结束紧急状态，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公众的压力的最后结果是1955年12月的华玲会谈，陈平走出森林，尝试跟联盟领袖谈判，以求达成他心目中的光荣和平，但英国情报局却惧怕那将让马共回到社会，‘像蛆虫回到面包堆’那样。<sup>44</sup>

在第二部分第八场的对话中，陈平叙述他对这场在吉打北部华玲的一家学校校舍内举行的会谈如何进行策划，他是如何的失望，以及会谈如何最终宣告失败。同一部分的第十场，他接着描述会谈失败如何对马共的政策造成冲击。这时，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数目，包括统领机构和这时已经宣告武装的民运，总数在1957年8月锐减至1,830人。这项寻求和平失败的其中一项后果是，许多他们的同志继续显示他们对其事业的忠心，结果在马来亚的山峦和丛林里，遭遇类似流放或面对死亡的命运。

尤其引起争论的是，相当高百分比在华玲会谈前后投降了，被共产党称为‘走狗’，英国人的宣传则采用有些相矛盾的称号 SEP

---

44 *Madoc interviews*, Rhodes House, Granada End of Empire Papers.

(Surrendered Enemy Personnel), 投降敌员和‘自新分子’<sup>45</sup> 其中一部分已对共产主义和马共的幻想破灭了, 其他则单纯因为相信无法通过造反取得胜利而洗手。不管是那一种情况, 他们都在破坏他们一度参与斗争的运动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sup>46</sup>

前面引述的方壮璧的诗, 正是表达了这种献身和苦难, 而一位访问过陈平的记者则形容为‘爱恨交集’。但是, 方壮璧的诗却也增添了较乐观的语调, 说‘这是苦难的一代, 奉献的一代, 但也是开拓的一代, 胜利的一代。’<sup>47</sup>

这比较符合一般马共的说法: 搞革命以点燃‘消灭殖民地’的烈火和打倒英殖民主义, 虽然他们无法按照共产主义路线重塑马来亚和新加坡。<sup>48</sup> 他们假设, 英国人从1951年起加速推出选举,

---

45 到了紧急状态的较后阶段, 情报局——在投降敌员的协助下——能绘出几乎完整的马共军情资料, 包括人数, 姓名, 驻地和作战计划。投降率在1950-53年间维持上升, 从1950年的少过解放军的5% (201人) 到1953年的约8% (4,373人中的373人), 过后在绝对人数方面稍微下降。关于1953年后政府对投降的记录, 参阅Kumar Ramakrishnan, *Content, Credibility and Context: Propaganda, Government Surrender Policy and the Malayan Communist Terrorist Mass Surrenders of 1958*, INS 14, 4 (Winter 1999), 第242-66页。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第424页, 列出投降敌员的数目: 1949 (251), 1950 (147), 1951 (201), 1952 (257), 1953 (373)。

46 政府和投降敌员都对投降敌员采用‘自新人士’的称号, 参阅Imperial War Museum, *Harry Miller Papers*, 数期《新路报》, 包含数期政府的宣传刊物, 这是于1951年7月新加坡马共《自由报》的印刷设备被破获后, 作为心理战术新管理方式而出版, 用来抨击马共, 称马共为‘帝国封建主义马共’。它特别报道知名的投降敌员, 如蓝瑞, 用共产党的语言批判马共。政府宣传后来把‘走狗’反用于对手, 把共产党形容为‘凶狗’ (参阅相关文件第224页)。

47 方壮璧的诗: 《致老师和同学》。

48 参阅丘启枫在《亚洲周刊》1998年6月15-21日期的评论及访问。作者把陈平的历史性角色形容为: ‘马共的历史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



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击共产主义。那时，马来亚的领袖决心要结束紧急状态，而如果紧急状态被视为是独立的绊脚石，而他们却又非常坚持的事实，把非殖民化的涝门打开了。在华玲会谈前，英国人表明紧急状态并不是绊脚石，并在1956年初保证在1957年8月给予独立。但在那个时候，与其冒举行第二次华玲华谈的风险，还是对联盟的要求让步较妥当。马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1970年的广播中更生动地表达这个观点，他们指英国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横行霸道后‘在夕阳下喘着气’，被迫撤离。<sup>49</sup>

一位著名马来西亚史学家更进一步，提出说甚至在独立后：‘共产党人的武装叛乱一再地提醒不满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如果联盟政府对华人或非马来人权益不公的话，他们可以走入森林，壮大共产党叛军的势力。他们...对马来亚的多元种族政治起着“监督和平衡”的重要作用。’<sup>50</sup> 这类说法一直重复着，直到今天，构成马共故事的中心和正当性的特色。

自然的，这个版本的历史已经引发激烈的争议，至少有好些保安部队的退伍人员和新加坡都不同意。新加坡有本身独特的马来亚共产主义经验，像以下第二部分第九场所讨论那样。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在六十年代必须艰苦奋斗，避免让人民行动党落入共产党人和激进左派手中，以使新加坡在1963-65年间达成（倒霉的）加入马来西亚。毫不奇怪李光耀在他的《从第三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年》书中，把共产党人的故事说成是宣传。李光耀（但不是陈平）把1989年的和平协议形容为最后投降并说那是掩盖失败的幌子。李光耀写道：‘在他的儿子〔于1990年11月〕

---

49 引述自 John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昆士兰大学1993年博士论文，未出版)，第188-90页。

50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Affairs, 2002), 第80-1页。作者补充他们也扮演‘去稳定’的角色，而自由主义评论人则认为共产党继续构成威胁被合理化或被用作借口来箝制民权和自由。

抵达新加坡后不久，“全权代表”通过一位新加坡报人来信“要寻求和解”。他也送来一片题为《光辉的和解》的光碟记录片，那是典型的马共宣传：投降和放下武器叫作“光辉的和解”...’。<sup>51</sup>

同样的，英国的阐释是陈平的人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经被打败了。因此，他们的总部和一些其他部队在 1952 至 1954 年撤退到泰国边界，留下越来越少的战士在马来亚进行无比艰难和毫无价值的斗争。因此，英国人的观点是：共产党出席华玲会谈，是企图在军事上受挫折的边沿寻求政治的胜果。华玲会谈失败后，在 1957-8 年出现大规模投降，许多被俘虏，而马共的斗争陷入低潮，使紧急状态，除边界地区外，得以在 1960 年正式结束。按照这一个说法，共产党从泰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并在七十年代在西马本身增加活动，是在浪费生命和资源。

两造的两个故事版本，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所知道的是英国在马来亚之前给予印度，缅甸，以及在 1957 年 8 月马来亚独立的那十个年头里，让其横跨四分之一一个地球的庞大帝国的几乎每一个地区独立。新加坡则（在建设上）取得长足进展，以致中国在九十年代表明要向该岛国学习。经历所有这一切变化，马共和陈平作为其总书记，继续战斗，在进入新和后殖民主义世界继续战斗，甚至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派小队武装进入马来西亚，至到 1989 年最后放下武器为止。<sup>5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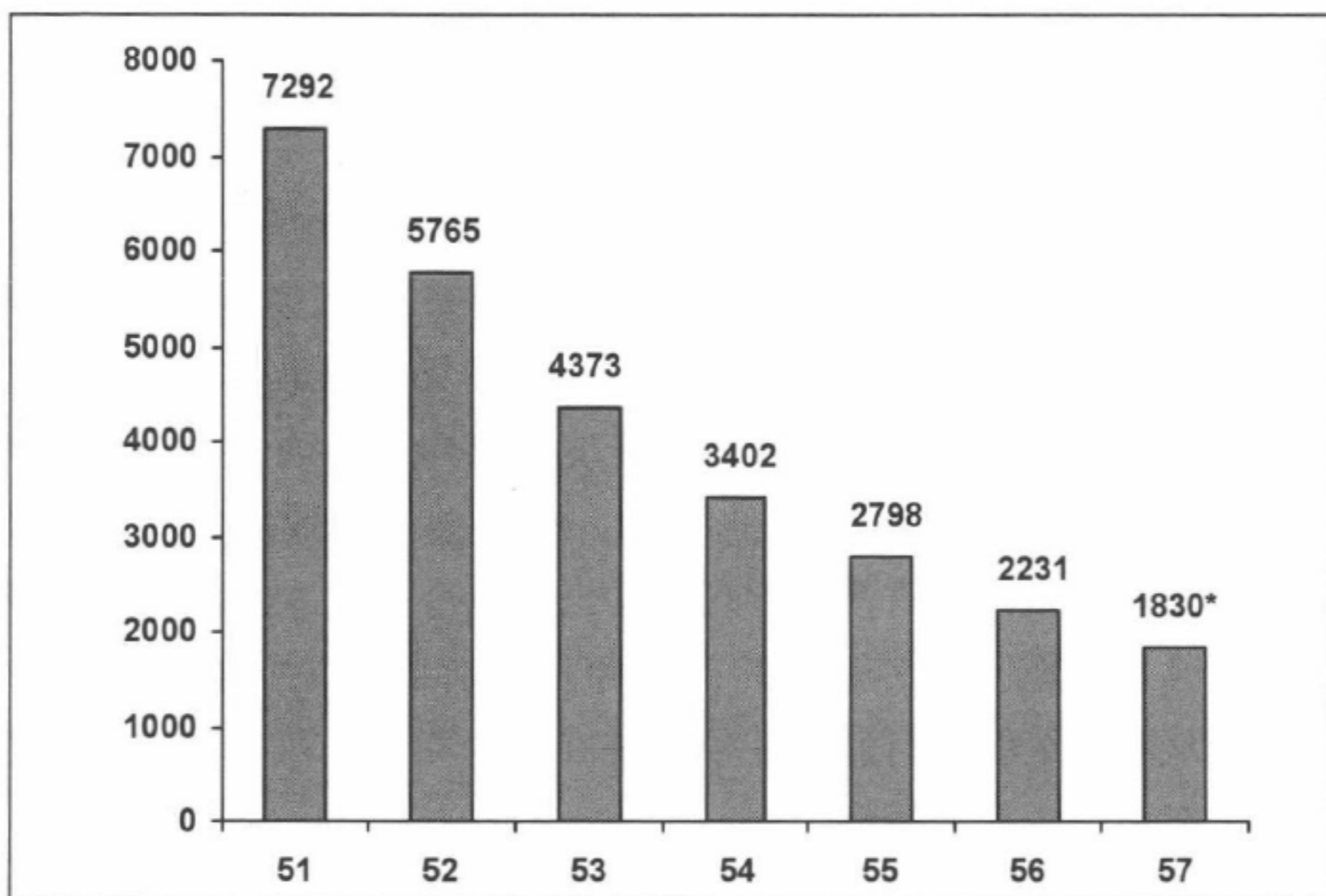
---

51 李光耀，.....。英国 136 部队也曾在 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1 月在 Blantan 会见莱特时，称他为‘全权代表’，参阅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 248 页。第一项合约是在八十年代，由泰国第四军团跟脱离马共中央的第二军区达成：1987 年 4 月，542 名游击队放下武器。

52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第 138-42, 714 页，补充说：‘全权代表的约 15 至 20 位追随者静悄悄地回来，向内政部交代清楚他们的过去的活动，然后住下来...像余柱业 [1989 年回新]，沙玛和全权代表的儿子，他们也感觉他们住在这里会更好。’李光



表 3: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军力 (英军所估计的马共军员每年年均人数)



\* 1957年的数字只按1957年8月31日为止估计，是马共总部、民运单位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总和。住在新村附近和芭边的支持者，从1952年起便具有武装。在最高峰期，‘超过百万的华人人口都至少是潜在的支持者’。按1957年8月31日的数字，1,830名仅存的人员其中200名为解放军员，其余的1,600名是民运队员和指挥部人员。他们的名字和所在地点都在政治部的掌握之中。从1948年6月至1957年8月，总共有9,581马共军员被消灭，有超过11,500名的男女曾一度是叛乱者。解放军90-95%是华人，1948年后，有部分马来和印族工运分子、激进分子和工人加入马共。其第十支队，崛起于彭亨，几乎全是马来人。

资料来源: *Review of the Emergency*, Director of Operation, Public Record Office: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陈平无疑是这个世纪其中一个伟大的生存者。人们也可以争论这场战乱是否对独立的时间和细节是否有冲击。可是，独立在1948年后的几年中，而不是几十年后取得，却很少引起置疑。

耀在1958-61年之间数次会见全权代表，当时后者是新加坡主要的马共联络人。

无论如何，以上引述的方壮璧的诗代表着比宣传更多的东西，同时尝试把意义赋予那些参与这项为期几十年的斗争的抗英同盟成员和群众组织，以及马共正式党员。<sup>53</sup> 随着方壮璧不久前的出版，加上这本陈平 1999 年的访谈录，那代表着一项努力：尝试通过系列的访问，回忆录和研究计划，把这个最动荡时期的共产党人的记忆写成文字。<sup>54</sup>

这串串细流，可能最后汇合成历史的大河，其流水将引导我们对共产党人的激情、战略、行动、经验和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sup>55</sup> 因为，单只是记忆和口述故事是不足够的。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只有书面文字写成的文献和书籍，附上完整的注脚这个历史‘工具’，才可当作是完整的历史。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共产党这一边一路来都受亏待。

多年在森林中的基地和在城市的避难所生活，意味着在 1941-1965 年间的共产党文献是零散的，共产党的文献也很少。得

---

53 战后抗英同盟收编许多反殖或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人士。他们也受马共控制，也作为党本身的过滤器。

54 方壮璧为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马共党员，一度跟李光耀联络，被后者称为‘全权代表’。他出版的回忆录和诗集称为《我们这一代丛书》，共三册：(1)《新加坡啊新加坡——一个独立斗士的呼声》；(2)《马泰边区风云——森林游击队生活片段》；(3)《李兵的诗——一片生疏的天地》。目前，香港和马来西亚都在出版更多的相关书籍。

55 关于此历史汇流，参阅之前提到的丘启枫对陈平的访问。陈剑持续对马共进行研究是将马共历史写成文字的一个尝试。也参阅 John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陈平亦明确地表示他将出版他的回忆录，这段期间，亦有对他的访问录与传媒的有关报导。例如：*Siapa Sebenarnya Shamsiah Fakhri*, Fatini Yaacob, Dewan Masyarakat。时间上是从 1991 年 2 月到 1992 年 1 月。关于‘英国’和‘共产党人’的各种论述，参阅 Hack, *Corpses, Prisoners of War and captured Documents*。



等到 1989 年 12 月马共跟马来西亚政府正式结束敌对后，一些前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和约下回国，同时在冷战结束之后，才使到共方的（至少一部分）记载能够从宣传需要高于一切的情况摆脱出来。只有在 1989 年过后，马共对各个事件能够重建本身版本的说法，写成文字，然后通过书报传达给更广大的公众。如今，马来亚于 1948 年 6 月宣布紧急状态超过五十年之后，有了一项记载，或该说是多重的记载，是可以从激进左派、华裔共产党或仅仅‘抗英’的角度来记叙的。<sup>56</sup>

基于好几个原因，以及对多类不同的读者来说，这一类现在才开始开花的叙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马共成员和受马共影响的抗英组织元老，它有着个人的价值。有如张开的油画布，让个人的生命可绘入其中，在更大的全景中赋予意义。

可是，对于起义者的敌人也一样是重要的。对于保安、平乱和反恐‘课程’有兴趣的政府，这类叙事价值连城。它提供关于颠覆运动本质和游击队思维的信息。它提醒统治者，不论‘敌人’是谁，或是 1948 年的马共游击队，或是今天东南亚的回教祈祷团（Jemaah Islamiah, JI）激进分子，那句需要认识敌人，能讲他们的话的格言依然是确实的。<sup>57</sup> 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剿乱专家懂得这一点：

---

56 当然，就算是在冷战期间，还是有一些英文著作是采取左派或共产主义观点的，如 Moahamed Amin and Maldcolm Caldwell (eds), *Malaya: The Making of a neo-Colony* (Nottingham: B. R. Peace Foundation, 1977).

57 回教祈祷团为立意要在东南亚诸国建立回教国的回教组织。2001 年底，多个回祈团成员被捕，有 13 名在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下被扣留两年（扣留期每年检讨），罪名是购置爆炸物及进行圣战：策划攻击新加坡跟美国有关的产业或与美国部队和目标有关的人士。自 2001 年 12 月以来，政府的反击一直持续，估计在 2003 年初，可能有高达 200 名成员逍遥法外。参阅 *The Jemaah Islamiah Arrest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Singapor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White paper, 2003)。

你能把谁抓进监牢去无关紧要，能对外面的人信任和加以利用以获取活情报才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投降敌员和转换阵营的共党同路人成了政府宣传和作战的中心。对于敌人不只是要使他中立化而已，而是要使他转过这一边来，同时立即把对方的人重新融入社会中去，这一直是对抗的重要经验教训，就像马来亚紧急状态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斗争所经历的一样。<sup>58</sup>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陈平和马共观点的故事的重要性，有如国家军火库的武器和内部安全官员必读之书，因为那是许多人的意识形态斗争、个人记忆和生命的经验教训的重要部分。不管你是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陈平本身，那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部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陈平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和评价。陈平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英雄的反面，是敌人或朋友，完全看你是处在什么位置。事实上，136部队的官员，如曾担任抗日军联络员及在战后在马来亚任官职的约翰·戴维斯，就把陈平视为是亦友亦敌。

这一厢，在当初，是四十年代的勇敢活泼的青年共产党人和抗日军联络员的形象，具魅力，勇敢，相当刁钻，能够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法，直闯日本人或英国人敌人的阵地，有时是乘着车子穿过空旷大路，在敌人的鼻尖下逃出生天。这是鼠鹿瞒天过海，骗过敌人，静静逃越森林。曾经对解放军作冗长采访的约翰·科尔(John Coe)写道：‘陈平是鼠鹿的保护神的化身...，〔他〕逃脱追捕，避过死亡，让敌人惊慌失措。他的活动笼罩在神秘之中...’在第二

---

58 虽然它未明确列出有关的融合策略（例如对蒂凡那等前共产党人），Kumar Ramakrishna 的著作却揭示了相关宣传之过程及投降敌员的作用。参阅他所著的 *Emergency Propaganda: The Winning of Malayan Hearts and Minds, 1948-58* (Richmond: Curzon, 2002)。也可参阅 Lim Cheng Leng, *The Story of a Psy-Warrior: Tan Sri Dr. C. C. Too* (Selangor: Lim Cheng Leng, 2001); 及 Lucien Pye 的经典著作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部分第二场中，陈平叙述他是怎么两次被日本控制的保安部队扣押，以及两次都告脱逃。<sup>59</sup> 他的这项魅力和勇敢赢得依赖陈平生存的 136 部队官员，如李察·布隆姆 (Richard Broome) 等人的赞赏。布隆姆后来对采访者说：‘我们总是发现跟陈平比较容易谈。他的确是个共产党人，没错。但是，我们总是认为他的话可以相信。而他是很坦诚的’。<sup>60</sup>

我们可以预期那些在马来亚日治期间受到他掩护的人对陈平发出某些敬意时，也可听到同样的反应是来自那些在战后跟陈平一起工作过，和跟他谈判过的人。格拉德·狄·克鲁兹 (Gerald De Cruz)，欧亚混血儿，受英文教育，战后在吉隆坡协助办共产党报纸时，跟陈平是同住一室的同道。他跟总书记一起打乒乓，感觉到他是个‘完美的绅士’，是‘热情、可爱的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sup>61</sup> 甚至是马来亚的第一任首相东姑，他在五十年代已经决心不让共产

---

59 有关鼠鹿保护神之说，取自 John Coe, *The Rusa Merah: Reflections on a Revolutionary*, in *The Beagle: The Record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Museum of Arts and Science* 5, 1 (1988), 第 163-73 页。

60 Richard Broome, interview by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Singapore, 9 April 1984, cited in *ibid*, 第 165 页。

61 Gerald De Cruz 访谈，Rhodes House, Granda End of Empire Papers。1945 年 12 月，他以共产党人身份，参与创立马来亚民主同盟，这是个团结左派人士及英文教育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他也是泛马统一行动理事会 (AMCJA) 的组织者。泛统会于 1947 年成立，支持马来亚联邦 (Malayan Union) 及反对以巫统当时所要求的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泛统会包括中华总商会等十多个政商等团体，与马来人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结盟。泛统会和人民力量中心无法阻止联合邦宪法的通过。民主同盟在 1948 年因为紧急状态而解散，之后 Gerald De Cruz 发言反共。他是马绍尔和林友福领导的劳工阵线的受薪秘书，并从 1959 年起在人民行动党设立的‘政治研究中心’任 George Thomson 的副手。该中心为政府公务员而设，传授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威胁的课程。

党人在没有给予最严格的保证下回归马来亚社会，他发现陈平个人是如何的和善。东姑后来告诉采访者说：陈平在华玲表现为‘...一个有原则的人...慈祥和蔼的人，他看来根本不像杀手。他样子太纯洁，不像革命者，他比较像个商人...’<sup>62</sup>

1999年，当陈平来到坎贝拉跟历史家会面作两天访谈（其结果就是编成本书）时，所带来的正是这一些很容易被认出的个人性格。还是有人认得出他是那个联络员和是一群人的领袖，总是对其他的人的需求和目的非常的敏感，表现得开放和直接，像慈祥的长者。简单地说，毫无疑问的是陈平曾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他的魅力。

在另一方面，对同样这一个人却有非常不同的图像。格拉德·狄·克鲁兹可能把陈平当成是共产主义人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认出陈平的和蔼可亲面具后的‘钢铁核心’：他是个完全奉献予党的人。<sup>63</sup>

再则则是在1950年代陈平作为妖魔的形象，陈剑写的陈平简传（第3.15章）记录说，根据一项说法，‘在紧急状态时期，仅仅是提到这个名字，就会叫号哭的小孩停止不哭。’<sup>64</sup>对英国人来说，他是从一个可信赖的抗日战争联络员，摇身转变成为‘土匪’（1948年起，英国人称起义者为‘土匪’）头子，过后又成为‘共产党恐怖分子’（1952年后的称谓）首领。<sup>65</sup>对于许多起义者来

---

62 Brain Lapping,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Granada, 1985), 第183页, cited in John Coe, *The Rusa Merah*, 第168页。

63 Gerald de Cruz 的访谈, Rhodes House, Granada End of Empire Papers。比较明确的倾向上, 他辩称说陈平忠于苏联的扩张, 同时会服从任何史大林的指示。

64 参阅第3.15章, 陈剑著。

65 ‘土匪’用意在于表明有关运动是犯罪性质, 不是政治性的, 同时适合‘紧急状态’这个词的用法, 不是‘战争’这个会引起保险业失



说，他可能看来是很遥运的人物。其中一些早期的投降敌员甚至不能说出谁是他们的总书记，而他从来没有出版任何系统文献，能够用来激发人们像追随毛泽东和列宁那样，或是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他的追随者的指南。从1961年起，当他到了北京后，他是更遥远了。

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失掉亲友的马华公会和公众人士，陈平可能看来更像笑面虎，他的自我克制和魅力使他成为个危险人物，甚至是对自己人，管他是‘同谋者’，为马共领导层献出生命的人士，还是被肃反者。

在1960年代末最激烈的肃反事件中，马共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高达200人死亡，更多被褫夺职位或被批判。那个时候，马共宣称，在1960年代初当绝大多数的党组织已经转移到泰南，到1968年正式展开新的战斗的期间，它在泰南所招募到的许多成员是保安部队安插的，或说是敌特。由于这项争端，再加上其他纠纷的结果，从1970年开始有两个反对派脱离马共中央，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1970年9月）和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1974年8月）。过后，两个分裂出来的派系合并，在1983年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sup>66</sup> 本书成稿时，马来西亚共产党和马共中央之间还在寻求最后的和解，共产党的核心领袖还是互相回避。

当这项最激烈的肃反行动展开时，陈平真的是在北京。他在1961年那段从泰国到北京的戏剧化旅程，在下面第二部分第十场

---

保的名词。但是，到了1952年则承认采用‘共产党’。‘恐怖分子’利用了马共在1951年10月所要克服的弱点。当时，他们通知部队要尽量把非战斗伤害减至最低，把更多注意力投在群众的具体利益上。这个方面的最新研究是 Phillip Deery, *The Terminology of Terrorism: Malaya, 1948-52*, JSEAS 34, 2 (June 2003), 第231-47页。

66 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于1987年4月跟泰国第四军区谈和，542名马西共成员放下武器。

中谈到。然而，就算这些问题是从远离获得解决来进行评估，陈平还是可以说是被证明了：对所有那些为那场事业奉献生命，而他没法带领他们朝向胜利的人来说，他还是危险的。<sup>67</sup>

西方对这项失败的阐释，可能会强调英国的领袖人物如邓普勒爵士（1952-4年作战司令兼最高专员）等人为替政府取得成功的正面因素。<sup>68</sup>或是反过来，它可能强调共产党领袖的不足之处，如太过年轻和缺乏知识的训练，这其中是莱特在1938年至1947年出卖许多老经验马共干部造成的结果。用另一种说法，则可以问一问，陈平的悲剧是不是因为他有魅力去领导，却没有足够明确的愿景要把他的人带去那里，和怎么带。

在我们的口述历史过程中，也就不奇怪陈平与他之前的共产党人所做过的那样，在解释马共的失意时，比较侧重马克思词汇中的结构问题，而不是谈论本身为一个失败的组织。<sup>69</sup>对他们而言，他们是英勇战斗，以击败英殖民主义在马来亚种下的种族和阶级

---

67 一位前政治部副总监作过如此描述，参阅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1995), 第 206-34 页。对于‘遥远’领导，绝望和差劣管理而造成分裂，参阅 John Coe, *The Rusa Merah*, 第 170 页。难以避免的，一些人企图涂黑陈平，指他在 1940 年代跟莱特有可疑的亲密关系。

68 传统著作一直强调各项步骤的总和的结果，包括系统的人口移置，在最高专员邓普勒强势领导下，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保安部队的高效，加上他增加争取民心的措施，如改善新村设备，更多选举，及从 1952 年底警察部队的‘作战服务’。有关的经典著作作为 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可是，对于同一版本的论述用在时段的另一端，参阅 C. Northcote Parkinson, *Templer in Malaya*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54) and Simon Smith, *General Templer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Malaya: Hearts and Minds,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S 16, 3 (Autumn 2001), 第 60-78 页。

69 譬如，可参阅新加坡国家档案局，前马共新加坡市委郭仁辉（Guo Ren Hui）访谈之誉录稿。



结构，而他们也在地理结构上处于劣势（第二部分第十二场）。在相对狭窄的马来半岛，很少的大拓居地距离军营超过一或两个小时的车程，这跟中国较偏远的边区有明显的不同。<sup>70</sup> 马来亚的解放军战士的确可以从海岸的平原地退进保安部队需要经过 1,000 小时巡逻、或 300 次伏击才能找到解放军开战的内陆山区。可是，这样却冒远离粮食和群众的风险，增加挨饿、痢疾、忽冷忽热的恼人虐疾，以及严重到无法忍受的溃疡。大多数住在森林里超过三个月的人都患上最后的那个病。这些不幸的人，有时因为缺乏阳光而血色苍白，首先会遭遇皮肤敏感，过后会起泡化脓，最后破裂流出恶臭的脓，最后留下疤孔。追击他们的日本人或英国人，可以用现代医药来治疗，可对于游击队，所谓的治疗可能就仅仅是用开水洗伤口，或敷上喝过了的温茶叶。<sup>71</sup>

马来亚山峦和丛林的背脊，由北至南穿越国家的中间，这一个地理状况下，马共唯有在能够维持跟乡区支持者的供应线，或是对这最艰苦的小群人来说，跟森林中原住民的联系关系，才具有实际的用处。<sup>72</sup> 同时，全国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在对话中，

---

70 马来人为主的东海岸比锡米丰富的西海岸落后（丁加奴的 288 英里的公路，在 1951 年只铺了 43 英里），但是，总的来说，马来亚的公路系统相当完善，特别是在相关紧要的地方。 *Annual Report o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1*, 第 247 页。

71 Ho Thean Fook, *Tainted Glory*, 第 161 页。何氏在进入森林之前替 Sybil Karthigesu 医生工作。该女医生因为承受日本人的折磨，包括看着自己女儿被悬在火堆上不屈而闻名。

72 英国这一方，Spencer Chapman 向 1942-3 年的双周刊报告关于虐疾的施虐，包括 17 天不省人事，‘黑色食水’，痢疾，造成寸步难移的脓肿性脚溃疡，牙齿问题，疥癣，以及食物恶劣时旧伤复发。还有引起呼吸和辨色困难的森林环境（虽然说在高处的营地是相对的冷），加上缺乏宣传品以外的信息。Capt. garnoss-Willaims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第 15 页。巡逻队数目，查看 *Review of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in June 1948 to August 1957*, DOO, PRO: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第 21 页。

陈平宣称‘连一粒子弹都没有’从外国送到他部队那儿。<sup>73</sup>

在重新评估马来亚紧急状态过程的这些不同解释时，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来考虑陈平，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人，以及了解他所影响过的历史。对于非政治的史学家（如果的确有这个东西的话），这本书所呈现的新故事代表着一个机会，去结合多方面的声音，相互冲突和不一致的描述，以产生更丰富和更全面的文献。<sup>74</sup>

至少，共产党跟英国人讲的故事分别很大，因此，就像爪哇皮影戏的摆弄师傅那样，史学家的技巧可能就在于把这些不同的世界平衡起来。史学家的工作是把这一切织成能够将不同故事的最关键因素的记录，就算是这个记录接着会引起辩论和进一步进行修整。这个，而不是经济发展，阶级战争和革命的铁律，可能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

这种视历史为多种不同较小叙事的相互交集的倾向并不新。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用相同方法来阐释革命的史家群人数令人耀眼。<sup>75</sup> 其中，马尔克·菲尔洛 (Marc Ferro)，提出说苏联革命在城市、平原和森林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年表和进程表。<sup>76</sup> 这个说

---

73 参阅第二部分第七场，第 158 页。

74 问题不仅是在于‘平衡’不同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人们尝试把他们在意识情况下朝向所坚持的目标的一生转述成故事。所以，了解人们如何尝试把本身的行动转述成故事，把本身套进所想像的情节中去，对于了解事件的‘为什么’可能是重要的。

75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88). Orlando Fig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891-1927*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7) 把各个人的故事——如 Prince Lvov, General Brusilov, Maxim Gorky --- 交织进入一个总叙事。对这些作者，革命并不是带领着个人的主叙事，而是各别较小社会和个人叙事汇集一起，使每一个革命有本身的独特冲击、步调和形状。

76 Marc Ferr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 (London: RKP, 1972, translation from French).



法可能证明对马来亚非常合适。在那儿，让情报穿滤过森林，从传递员到投信点、再传向更多传递员，最后才到达共产党领袖那儿，在时间上慢了数个月，这就意味着政府和马共中央的记事表彼此浮现差距。各自一方都是被迫对另一方消失中的政策影子作出反应。

为了解开不同记事年表和叙事的面纱，也为了开释陈平的故事，以及为了他们各别的议程目的，史学家、当事人和史家兼当事人如约翰·顾德斯（John Coates），利昂·康伯尔（Leon Comber），约翰·李尔利（John Leary）和安东尼·索尔德（Anthony Short），<sup>77</sup>于1999年2月集合在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一齐访问陈平。这并不是陈平的第一次受访，但却是最持久的，一连两天，集中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研究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专家。<sup>78</sup>我们相信，这也是全面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第一个这类访谈，同时是以学术及平衡的方

---

77 Anthony Short 在紧急状态的首两年在马来亚参加国民服役，然后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1960-1966）任职，研究紧急状态文献，写了第一本详尽的书。他的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还继续是一部最有用的研究，并重印为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John Leary 服务于马来亚的特别部队，并写了 *Violence and the Dream People: The Orang Asli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Ohi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John Coates 中将曾跟澳洲军队到马来亚，继而成为澳军参谋长，写了 *Suppressing Insurgency: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Leon Comber 是马来亚警察（1950-54）一位会讲华语的政治部官员。坎贝拉工作营一个最引人之处是陈平在过程中明显使用大量的出版文献，特别是他战时 136 部队同僚 Spencer Chapman，以及 Anthony Short 的著作。

78 随着陈平在 1990 年代初进一步曝光，许多记者自然开始追踪他。譬如，自由电视制作人 Richard Collin 的访谈中，显示陈平虽然严厉指责政府的政策，却表示布里兹计划和粮食控制是重要关键。他也发现，如以下的誉录，陈平宣称他在 1955 年华玲会谈中要‘帮助’东姑·阿都·拉曼。Richard Collin 于 1992 年 6 月 16 日在非洲与东方学研究所研讨会之演讲。

式来进行的。

本书包含了这个工作营的成果，加上从中引发的进一步研究材料。书名是经过细心的选择，为的是要反映这个新的历史记录是如何创造的过程。每一个与会者都要对马来亚紧急状态提出新解。因此，出席参加者在很短的通知下都准备了收录在后面（第 3.1 至 3.14 章）的背景文件，每一份都限在一定期限内，并列出了他们要陈平回答的主要问题。这一切，如果不是‘全盘照呈’，也尽量做到尽可能保有原状，以便让读者能看到口述历史作业的过程。

对话本身（第二部分）呈现陈平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共的故事，或至少是‘一种’马共的故事。尽管如此，陈平来到时，正值他开始要写自己的回忆录，因此，他不单只是要呈现自己的故事，但也要对故事进行检验，深化和修饰加工。<sup>79</sup> 在某种意义上，陈平有意在如安东尼·索尔德在对话的某个阶段（第二部分末，第七场）中笑称是一场‘审讯’的情况下交代他的故事。

编者陈剑和卡尔·哈克希望，所结集的书将有如书名——《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所承诺的那样。通过把马来亚和马来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及他在过去六十年所领导的党的故事公诸于世。本书丰富了对口述历史这门学问和冷战后历史学的发展。那不是总是欢乐与成功的故事，但却是历史记录的重要部分，同时它协助把制造悲剧和胜利的激情和意识重新放回到历史去，在个人，也同时在政治的层次。此外，正如书名所示，整个故事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孤立呈现的，在这儿也不是只单呈现它的一面

---

79 陈平，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r, *Alias Chin Peng* 呈现了陈平的故事。这是前报人 Ian Ward 的优秀写作和故事讲述。但是，比起分析和对话，它自然在故事性方面较强，也可看出是经过编辑，如果不是重写的话，把陈平的话，写成跟他在 1999 年所说的出现本质上不太相同的句子，模糊了政治回忆录和枪手记事之间的不同处。



而已。它的呈现，部分是对话，部分辩证，及有的时候，是的，是对陈平的审讯，由参加者和史学家参与其中。有时候，很明显他的故事跟部分参加者的见解相去甚远。事实上，有时候也一样明显，在参加者之间也意见相左。

为了让读者可以全面看清楚这些对话是如何再造的，我们除了列入对话录（第二部分），也收录了促成这项盛会的背景文件和研究论文。这部分主要是在对话会之前写成的背景文献（第 3.1 至 3.14 章）。这些文章在大家在坎贝拉相聚的前几天分发给每一个参加者，包括陈平。我们是按当时分派的原文收录这些文章。甚至连他们询问总书记的问题原文也保留，目的是给读者对这项口述历史的进程的完整感，充分了解到最终的对话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也收入了一份附加的研究论文，那是工作营在继续探索这个主题过程中所衍生的，即是：关于紧急状态诸多不同声音的并列呈现。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章，第 3.15 章，以陈平的新传略，提供了南大毕业生陈剑的见解。文中收编了一些在对话会中揭示的新资料。<sup>80</sup>

这份对话录，以及各参与者在本书所呈现的差异甚大的见解，反映本书编者视为后修正论倾向方式书写马来亚紧急状态的最佳走向。<sup>81</sup> 一直到一、二十年前，传统的西方著作倾向侧重政府的平乱经验论述，以及其最终的成功。作为对照，修正性，批判性和共产党的论述则趋向侧重共产思想，或批判如邓普勒将军之类人物

---

80 南大，即新加坡南洋大学，1956 至 1981 年为华社建立的中文大学。1981 年并入新加坡大学，成为今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81 后修正论 (Post-revisionist) 标签乃衍生自冷战编史学，尤其是 J.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7 (Summer 1982), 第 171-90 页。

推行的政府暴行。<sup>82</sup>

无论如何，比较近期却有迹象显示作者准备结合来自两方面的资料。从李察·史塔布斯 (Richard Stubbs) 的书《游击战争的民心动向》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开始，我们看到对更复杂范畴的探索。例如，见解日益不同，认为剿乱的成功不再视为是仅仅去争取民心，或以高压政策从事，而是两者间的细心监管的变化过程。史学家所问，不是答案甲，还是答案乙，而是对已经知道了的成分如何泡制他们独特的炼金术。<sup>83</sup>

史塔布斯在 1989 年出版的书是采用这项复杂方法的主要例子。它问这样的一个问题：1951 年 10 月左右，当最高专员亨利·葛尼中伏被杀时，政府和马共怎么会在同时决定他们都陷入惨境的呢？他的解释是双双都有严重的问题。政府面对领导危机和（冲突）事件几乎达到高峰，而解放军则挣扎着去应对人口重置的效应，但双方对危机的不同反应才是关键。共产党决定减少活动（按马共的 1951 年 10 月指示，陈平在第二部分第七场谈及），给政府打开了

---

82 相关的文献出现在 Hack, *"Iron Claws on Malaya"*; Smith, *General Templar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Malaya: Hearts and Minds,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S 16, 3 (Autumn 2001), 第 60-78 页; Kumar Ramakrishna, *"Transmogrifying" Malaya: The Impact of Sir Gerald Templer (1952-54)*, JSEAS 32, 2 (2001), 第 79-92 页。除了马共对政府的批判外，有 Victor Purcell 对邓普勒的攻击，见于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54)。

83 Hack, *Corpses, Prisoners of War and Captured Documents*, 第 230-3 页。Hack 的著作从强调对人和空间的压迫（作为 1980 年代文献过度侧重民心的更正），穿越到一个境界，人民及区域能有效地控制，确立了能够施行‘争取民心’措施以缓和反对情绪的情景。因此，政治和民事措施其实是‘有效控制’的从仆，因为后者而得以施行。但这一切只有在客观情况有利时才行得通，而危机点则作为克服顽固障碍和改进程序的良机，就如马来亚在 1950 及 1952 的情况那样。



机会的‘窗口’。若是这样的选择，政府有了呼吸空间，可以约束警察，即可对人民在胁迫其身时亦可赢其心。如果在重新迁置的人口控制政策上，增强政治措施，则可增加胜利的机会。根据史塔布斯，政府掌握了这个机会，在1952年初任命邓普勒为作战司令和最高专员，增强剿乱，及改进措施以赢取乡区华人的民心。

人们是否同意史塔布斯（他把其观点的概要写在第3.10章）并不重要。这类文章也不一定意味着是道德的判定或是道德的等称。要点是这种揉合不同观点的尝试，而不是更狭隘地看待冲突，或主要只看一套文件，可能对制造新的认识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所谓的‘新解’。<sup>84</sup>

为了显示这些新观点，以及揭示制造历史的根底，因此，本书没有呈现人造的门面或强加同意点。相反的，它跟随通过原背景文献促成历史辩论，所促成和形成的对话，加上过后继续的研究。的确，从美学来说，结果总是不太整齐和琢磨不足，而背景文献则参差，从短小精悍的仅仅列出问题，到相当全面的阐述。然而，这一点，加上参加者间的不一致观点，才真正是精要。<sup>85</sup>

---

84 这种趋向显然也出现在一些视紧急状态作业为‘传统’或‘修正’及采取保安部队持续不断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言论的模式。例如，Kumar Ramakrishna 的 *Emergency Propaganda: The Winning of Malayan Hearts and Minds, 1948-1958* (Richmond: Curzon, 2002). 还是用很大篇幅写共产党观点。编史学的一些最新尝试看来似乎是回避‘后修正主义’，但是却坚持要看到有邓普勒的支持者和贬毁者（或是传统和修正的叙事），事实是，1980年之后，有人尝试把更多的部分相组合。参阅 Simon Smith, *General Templer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Malaya*。

85 纯粹派或许要看到同样风格和长度的背景文献，唯口述历史的现实，如在坎贝拉的情况，是不同的长度和风格，激发更多讨论的是资料来源，不是其统一性。

## 陈平简历

陈剑

陈平，1999年时的年龄是七十四岁，还是马来亚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1999年时，他出任马共总书记已经超过52年。他在1924年10月的下旬，在马来亚吡叻州的海边小镇实兆远的一个福清籍小康家庭出世。他的父亲在1920年初来到这个小镇，在新加坡从事同样生意的亲戚的协助下，开脚车和电单车零件及服务商店。陈平娶至诚的共产党员李坤华为妻。他们有一女一子。



按陈平年青时照片素描的年青战士画像。  
珍妮·李策为 Beagle 所画



## 教育

陈平进入实兆远华文小学，然后在镇上继续中学华文教育。1939年底，他读完高中一后，学校宣布由于财务原因，高中部将关闭。次年，他考虑要去新加坡升学或继续在实兆远受教育。由于他已经介入参与的地下活动，也为了作为掩护，他报读英华中学，那是由教会办的英文学校。六个月后，因为害怕英政府的骚扰，他被迫离校，以专注搞地下活动。从此，他变成马来亚的一名专业革命者。



实兆远大街。陈平称中间左边，挂多多博彩招牌的店铺，是他孩提时代父亲经营的店，他就在这儿出世。

(陈剑 提供)



陈平的母校：实兆远南华学校。  
(陈剑 提供)

## 事业

1937年10月

身为爱国热血青年，又是具有知识和能力的中学生，陈平轻易地被吸纳入当时的抗日运动中，成为在1937年成立的华侨抗敌后援会的积极分子。那时，他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忠心追随者。

1938年初

在爱国激情的冲击下，他被国民党招兵运动所吸引，有意加入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可是，他的父母不允许，于是他继续在实兆远念书，继续在学校负责抗日活动。他负责三个学生组织，即：学生会，他自己成立的读书会 and 地下的学生抗敌后援会。

1939年

这时，他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已经转变成忠于共产主



义，虽然他还未被吸收入党。红潮已经淹到马来亚。他计划要去中国抗战的圣地延安，但被说服留下来，并被委派负责更多地下活动。当年年底，他考虑到新加坡升学，又被一位组织里的上线，他是马共党员，说服留下来搞革命事业。

#### 1940年1月

这个月开始，他被委予更重的责任，负责三个群众抗日组织，即：学抗、文抗与店抗。到了月尾，他被接受入党为后补党员。

#### 1940年7月

由于英国人的骚扰，他离家前往江沙，然后到太平一个多月，等待党发派新工作。

#### 1940年9月

被调往怡保任吡叻州常务委员。他在华侨抗日后援会的职责包括负责领导和丰及怡保四家华文中学的抗日组织，同年12月，他加入马共成为正式党员。

#### 1941年初

所有马来亚抗敌后援会都被解散。陈平调走，成为马共怡保区委。他领导三家华文中学的学生地下小组，以及党对店员、欧人家佣、砖窑工人和理发师的组织工作。

#### 1941年6月至12月

6月他受委为马共吡叻州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部，印刷和出版州委的报纸。接着，他在州马共干部会议上被选为州执行委员。那是在第七届全党扩大会议之后的事。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的吉兰丹登陆。

### 1942年1月

日军占据整个吡叻州，州委员会与马共中央失去联系。州委员会主动成立四组游击队，取名吡叻人民抗日军。他被委为南吡叻第四中队的党代表，负责敌后狙击队的联络工作。敌后狙击队用意在于跟在丹绒马林一带活动的英军合作。

### 1943年3月

吡叻州书记和副书记一起被捕。新委任的书记则在前往新加坡对党中央作汇报时，途中在雪兰莪被捕。吡叻的州书记于是悬空。

### 1943年5月

5月24日，136部队成员在吡叻的天定登陆。8月4日，他们会见党区委，区委过后上报州委。负责联络的州委被捕，陈平受委取代之。他向党总书记莱特报告，莱特委派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抗日同盟的代表，负责跟136部联系。他在9月30日会见136部队。在11月或12月，他受委为吡叻州委员会的书记。

### 1945年8月

8月15日，日本投降。陈平受指示到雪兰莪会见莱特。当他在8月18日抵达时，莱特已经离开，南下新加坡。他被雪兰莪州委书记告知已经跟刘尧一起被委为中央军委。

### 1945年9月

他跟数位其他州委书记到新加坡会见莱特，过后成立临时党中央。他跟杨果、陈勇和阿仲受委为中委。<sup>1</sup>

---

1 陈勇为柔佛州州委书记，阿仲为彭亨州州委书记。



### 1945年12月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解散。陈平任抗日退伍同志会副主席。他娶妻李坤华，在吉隆坡成家，1945-47年期间，他们大多数时间住在吉隆坡。

### 1946年1月

东南亚最高司令路易士·蒙巴登王公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府广场颁发缅甸之星有功勋章和1939-45战斗勋章，陈平是受封者之一。

### 1947年

陈平与李坤华生下第一个孩子，大女儿丽丽出世。满月后，由在檳城的岳母扶养。

### 1947年3月

莱特潜逃。陈平受委为代总书记，率领三人团调查‘莱特事件’。

### 1947年5月

调查团完成工作，证明莱特为日本特务。莱特因此被开除出党。在接下来的党中央第九届扩大会议中，陈平被推选为总书记。

### 1947年7月

陈平往香港和曼谷，对莱特作进一步调查，同时将莱特事件通知中国、越南和泰国三国的共产党。

### 1948年

陈平与李坤华的儿子武国出世。这时，他们两人已经决定转入地下。陈平的母亲坚持留下国武。国武最后在马来亚大学念法律。

### 1948年2月及3月

在—项党中央大会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者讨论当前充满敌意的政局，检讨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莱特的投降主义被批判。

### 1948年5月

英政府的镇压加剧。陈平召开另—次党中央会议。会议估计英政府最早在9月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会议—致通过以武装斗争来对抗这种镇压。

### 1948年6月

英政府在6月18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紧跟着进行全马马共高层和资深老党员、以及所有马共公开统战组织的著名人物的大逮捕，马共措手不及。各州党员毫不迟疑地成立游击队。1949年2月，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正式成立。

### 1953年6月

由于粮食供应情况恶化，陈平带领党和解放军的中央单位北撤，越过马来亚北界，进入泰南。

### 1955年12月

陈平带领马共代表团出席华玲会谈。

### 1960年12月

陈平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离开马共在泰南的基地，到中国去。

### 1961年6月至1989年12月

抵达北京后，陈平兼任国外政治局书记，主要任务是促进马共在国内外的地下活动，以及与其他共产党的联系。从这个时刻起，他从北京指挥党的政治活动。



1989年12月

陈平跟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协议，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敌对状况。<sup>2</sup>

注：这是在对话之前分发的背景文献，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在后面第3部分中阐述。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阅读对话前，大多数的读者需要先阅读这一份有关陈平的简历。

---

2 关于结束战斗的著作包括：Leonard Sebastian, 'Ending an Armed Struggle without Surrender: The Demi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1979-89) and the Aftermat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3, 3 (December 1991), 第 271-97 页；及 General Dato Kitti Ratanachay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sia and Thailand: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angkok: Dungkaew, 1996).

# 文件 I

摘录自：

《1948年6月至1957年8月马来亚紧急状态之检讨》

马来亚作战总监，1957年9月，Air20/10377

英国憩幽公园（Kew Gardens）公共档案局

## 战事简述

24. 在这九个年月里，战情的波动起伏大略可分成四个时期：
  - (a) 1948年6月—1949年10月。马来亚共产党开展暴力革命，企图夺取政权，共产恐怖分子（共产党人）撤入森林，重组准备打持久战。
  - (b) 1949年10月—1951年8月。共产恐怖分子在整个亚洲发动攻势，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英国）委派一位作战司令（哈罗德·布利兹爵士）来协调当时双双都出现严重弱点的民事与军事措施。1951年，暴力事件达到最高峰，唯随着特别部队战略的改善，歼敌数目也开始增加。
  - (c) 1951年8月—1954年7月。布利兹计划成功推行，散居的华人被集中，在控制底下，由于被歼灭人数大增，共产恐怖分子减少攻击行动。1952年2月，格拉德·邓普勒将军（现为陆军元帅）受委为最高专员兼作战司令，全权统管民事及军事资源。共产恐怖分子损失超过一半的军力，而特别部队和平民的死伤大幅度降低，不及1951年最高峰期的七分之一。造反的后援已被摧毁。
  - (d) 1954年7月—1957年8月。危机已过，最高专员与作战司令职位再度分开。共产党的力量逐渐萎缩，事端、冲突及双方伤亡也相应大减。马来亚政治领袖渐渐接过控制权，准备独立。



# 工作营程序表

陈平跟与会者、学者及评论员对话会

1999年2月22-23日

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

## ● 2月22日，星期一

- 上午场 一 开场白——欢迎仪式（安东尼·李德）  
二 马来亚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杨进发）  
三 日据时期（明石阳至）
- 下午场 四 1945-48年：合法时期（谢文庆）  
五 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彼德·爱德华兹、  
利昂·康伯尔）  
六 1948-55年马共的策略（安东尼·索尔德）

## ● 2月23日，星期二

- 上午场 七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游击战及英国的剿乱策略：  
为何输了这场战争？（李察·史塔布斯、约翰·顾德斯中将）  
八 1955年华玲会谈（卡尔·哈克）  
九 反对马来西亚及与印尼共产党及婆罗洲友党的关系  
（加米尔·麦克基）
- 下午场 十 从马来亚独立，到1970年代‘第二次紧急状态’  
到1989年停火期间的马共策略（原不二夫、陈剑）  
十一 结束评语：陈平与马来亚民族主义斗争（王赓武）  
十二 终场讨论

---

注：这是原定的程序表，具体讨论展开后，由于时间的紧迫，程序略有变动。

# 誊录说明

陈剑与卡尔·哈克

一个寒冷、散发着桉树香味的早晨，在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的校园里，陈平开始说话了。他的对话录音令好些与会人士感到担心。参与其盛的人士，除了历史学家，还有那些在那一场马来亚紧急状态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陈平；一位军人；一名澳洲正规军



1999年，陈平和史学家在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相聚。从左至右：陈平（背向），安东尼·李德，原不二夫，彼德·爱德华兹，约翰·顾德斯，李察·史塔布斯及安东尼·保罗。

（陈剑 提供）





陈平与史学家在坎贝拉进行辩论。陈平左边第一人为安东尼·索尔德，第二人为卡尔·哈克。

(卡尔·哈克 提供)

官；一位特别部队成员，和一位政治部警察。<sup>1</sup>

录音机所录下的各人讲话是否够能清楚呢？陈平的英语够强吗？是否足够表达关于造反论争和困境的细节呢？虽然，大家在小小的研讨室里都彼此表现亲切，可所要谈的东西却也很敏感。他会同意出版这项冗长的对话录吗？

茶水送来了，主人热情慷慨，只是送茶时却是吵兮兮的，茶壶跟瓷杯相碰撞，发出相当大的声音。这个时刻，对于尝试要捕捉一

1 除了陈平总书记本身，参与者包括约翰·顾德斯中将（他曾随澳洲军队在马来亚服务过），安东尼·索尔德（国民军，于1948-9年在马来亚服务，过后在六十年代任教于马来亚大学，再后在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执教，约翰·李尔利（马来亚侦察员，22 SAS），以及利昂·康伯尔（马来亚警察政治部官员）。

项历史性记录而产生的上述担忧，简直是达到了有点离谱的极点。

这些都是实际的担忧，而纸张的沙沙声响是会掩盖掉说话的声音的。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确定，整个对话会不会变成像陈平所接受的多个其他访谈那样：匆匆地，谈及的片段，只是适合某个特定的记者，或历史家去听，去记，和去重述：像考古学家所珍惜的陶碎片那样。

幸好，对于绝大多数的录音带来说，这些担忧都不成立。重听这些录音带，就会感觉到是回到实际对话的现场。陈平说话很清楚，很慢，他很替别人着想，讲话中途会停下来，去想那一个日期才是正确的，以及如何表达某个问题的措词。

然而，身为编辑，说话的誊录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不是结束。我们接下来的大挑战是如何对坎贝拉提到的两个不同世界进行翻译。中文名字和方言要怎么样誊录呢？对于当时人们的多个化名和别名要如何处理？我们也得决定该如何处理口述历史里无可避免会出现的失误。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几乎誊录出每一个听得见的词。我们略去的部分，是因为经过尝试后，证明无法誊录出那几段文字，同时也因为有几个字是重复的。编辑的干预，表现为用斜体字插入的词句，写在方括号内。方括号也用来插入参加者的中途插话，唯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斜体，同时附上说话人的名字。我们也用标点符号来记录所用词语的流畅性，在很多地方容许这种情况越过最严格语法的规则。总之，要旨是在于录音带的真实记录，不在于技巧。

我们的工作成果有它的实际价值。这是陈平的故事，同时是经由历史学家跟冲突的‘另一方’进行过一场辩证过程之后产生的故事。这些历史家确定题纲，提呈背景资料和论文，然后在那儿实际地进一步‘盘问’陈平。对话过程中，对一些论点要求作出澄清，对一些事实提出挑战，还有提出对立的诠释。因此，不管存有那一



些不足之处——而口述历史必然会有许多——我们整理出来的这本记录将永远超越出仅仅在替马来亚共产党作宣传，或者，就有如泰勒（A.J.P.Taylor）一度讽刺个人传记那样：写来愚弄历史家的口述历史。

虽然我们有意以原貌来呈现这份对话录，但是，当来到誊录这项辩证对话时，我们立即决定某些编辑的干预是必须的。注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所提到的个人，地方和事件可能对于好多读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所作的编辑将使故事更容易被接受，同时容许把争议点提升至文字证据的更广泛的范畴，使读者读原文时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

最后，参加者是来自许多不同的语言背景，主要的有英语，华语和日语，这当然会影响到发音。为了确保这份誊录尽量准确，它在最后定稿前经过了很多人手，或实际上是传给了多双耳朵。首先，它是在澳洲国立大学誊录，过后陈剑再做一次，卡尔·哈克也在新加坡做。比较难听清楚的段落重播了一次又一次，其中一些还进一步送到其他参加者那儿入审核。然后，由安东尼·李德最后一遍审阅了大部分的誊录。

这本书，就是这一切劳动，是澳洲国大作为承办机构的丰富想像力和慷慨赞助，是安东尼·李德对这个计划保持着持续不减的热诚，以及所有参加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 第一场对话

# 开场白——欢迎仪式

第一天早上场开始

**安东尼·李德：**欢迎大家来出席这一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将是非常重要的节目。坐在这个房间内的，是一群非常特出的专家组合，我们大家是在容许坦诚相对、同时是不会太迟的关键时刻集在一起。谢谢大家的光临。

请大家注意，我们对这项讨论作全程录音，因为我们要从中出版一本特辑，预料那将会成为一本重要的书。同时，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其他任何人作录音，因为我们不想它流到任何地方的情报机关去。至于其中有一些人在对话之后，针对此项对话会的实际举行，而要写点东西给报馆或学报的，我想，这没有问题。

**陈平：**没问题，但不是全部的内容。

**安东尼·李德：**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为了鼓励在这里进行最坦诚和开放的讨论，我想我们需要确保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跑到报纸那儿去。东尼·保罗是其中一个想要写点什么东西的，你们可以跟他讲讲，告诉他你不要他谈的东西〔笑声〕。对我们这些在这儿的人来说，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让王先生〔陈平〕感觉能完全自由去谈论这个历史的记录。这比我们能够出版些什么还重要。所以，请把这一点当作最优先的考虑。但是，作为这场对话实际有举行而作一



般讨论，同时是扼要地讲述，是没有理由不可加以报道的。对吗？好。在这第一场里，我们只是要解释为何会有这样的一场对话，而我并不是很适合作出解释，因为我只是把它接过手来而已。我只是在默尔列·力克勒夫斯对我提起时才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请陈平来当客座研究员，你认为如何？我听了当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不管怎样，让我请默尔列继续谈：你是怎样听到这消息的？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故事很大程度上要回到东尼·保罗那儿，或许由他来讲第一节，然后我接下去。

东尼·保罗：我想我对陈平的兴趣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当时他可是个‘死敌’——我那时候替英文版《亚洲周刊》（*Asiaweek*）写一篇专栏——他是‘死敌’，因为《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宣布陈平已经死了〔笑声〕。我从香港的消息来源得知他没死，因此在《亚洲周刊》反驳。然后，我就去找他，一次去中国，一次去马泰边境，都找不到。很多年过去了。我在一项宴会上跟同桌的一位泰国少将提到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但被告知他不在，他说：‘我会安排。’于是，我们就在英国人俱乐部见面。我邀他们两人到英国人俱乐部，我记得我对那个我现在只记得名字是平的绅士说：‘你介意坐在温斯顿·邱吉尔像的下面吗？’他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呢？他可是个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就这样，当时的话题换到他的回忆录上。他滞留在合艾，他说那一切都在他的脑海里，只是没有年表。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在合艾没有图书馆。但是我说可能坎贝拉的图书馆应该有。于是，一件事就导至另一件事，而我就跟大卫·占德勒尔（David Chandler）取得联系，他把我介绍给默尔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集合在这里。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的确，在那个阶段，当我收到东尼·保罗的电邮时，我得说我当然感到有点吃惊。想想，陈平正想着要写他的传

记，自传，同时希望能找到个能提供支援的环境，有人对他所作的东西有兴趣，加上有图书馆的资源。你不需要是东南亚的历史家也可以发觉那是多么重要的事件，但是，身为东南亚历史家，我当然即刻看出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历史充满着争端和不一致的看法，阐释各有不同，但是，显然在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历史方面，有一个声音从未获得公平的聆听，那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声音。而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有机会让它有了代表。

今天人脉的网络联系方式的确值得大书特书，接到东尼·保罗的电邮后，我马上意识到这事必然会发生，我有幸能够联络到围着这张桌子中的好些人。

我得说，做这一切的其中一个乐趣是发现到如果要联络安东尼·索尔德，就得传真到苏格兰的一家酒厂去。我有这么一张照片，安东尼好像是坐在酒吧旁等着我的传真〔笑声〕。可是，那一切促成了这一次盛会，是个历史性的盛会，而我想历史性盛会的重要处在于它必须进行下去，所以我在此打住。





## 第二场对话

# 马来亚共产党的早期历史

第一天上午场继续

安东尼·李德：下来的议程，我们或许要花一些时间看看刚发给大家关于陈平，或是王先生，生平的文件〔陈剑撰《陈平——生平简历》，参阅第一部分 1.2〕。请大家看看，然后看是否有什么关于他早年生活，还是个人生活的东西要问他。我得告诉大家他在两个星期前在澳洲国立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说，题目是‘我为什么成为共产党人’，对他早年的个人事件作了精采的讲述。如果大家要他讲述他上学念书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趣，〔以及他如何〕在较后时被卷入抗日战争中，并渐渐转向共产主义，被拉进抗日后援会。我们可以再叙述一次。〔与会者表明有兴趣〕请问你是怎样开始接触马共的，你能够进行补充吗？

陈平：可以。我想大约是在 1937 年，在芦沟桥事件——中国人称为七七事件——几个月之后。芦沟桥事件后，驻怡保的华文报记者来到我的学校。校长很爱国——那时候每个华人都爱国的——他办学很开明。他毕业自华南美国人办的大学，是浸信教会办的大学，在福建省的省会。所以，他答应了，他召开全体学生集会，那个记者，叫黄石，又名黄诚，就来了。他的真名是詹元豹。后来，我们得知他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仅在莱特之下。他是宣传主任。



[录音带在此录到写黑板的声响，参加者是在确定所提到的人的姓名。黄石、黄诚、詹元豹、莱特由陈剑写在黑板上]。

陈平：他真名詹元豹。来到马来亚以后，就是用这个名字。起初他当教师，用詹瞻希这个名字，过后改了名，姓却保留。他入党，参与地下运动时，取名黄诚，过后改为黄石。<sup>1</sup>

原不二夫：来马来亚以前，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吗？

陈平：是，他是他家乡兴化的负责人。旧时，兴化府有两个县：莆田和仙游。他的家乡在仙游，但在莆田受教育，中学也是教会办的学校。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好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只有厦门大学是中国人办的，由陈嘉庚出资。他后来在二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1925-7 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我们称为北伐，他成了该地区的青年领袖，我想，也可能同时是党领袖。

安东尼·李德：他对你造成深刻的影响吗？

陈平：我想〔造成影响的〕也包括黄耶鲁，又名黄望青，他后来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现居香港。〔编者按：黄望青 2003 年中在香港逝世〕。

杨进发：我这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黄诚，跟那个在 1939-42 年间最重要和最杰出的那个人，是否是同一个人？请问你跟他接触的印象。他演讲好吗？外交手法如何？思想意识强吗？

---

1 黄诚，又名黄石，1939 年马共中委的知识分子、组织主任，生于福建莆田。华校教师，后为报馆编辑。战时在新加坡被捕及受酷刑，1942 年 8 月牺牲。C.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77), 第 185 页。

陈平：他的演讲，使我们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想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也是教育家。我们深被他的演说所感动。他分析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事和国内的局势，以及我们在马来亚能够怎么样去支援中国，他说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他最后叫学生们加入抗敌后援会。过后，他通过一位中学部毕业生，在华人报当记者的校友，在第二天，把参加表格发给我们。谁要从军的就签名。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虽然那时候连正式的条例都没看过。抗敌后援会开始在1937年于基层成立。然后才在1938年成立全马总会。我读杨博士的著作，他说抗敌后援会在1938于金马仑成立，那是第一阶段。过后，我只见过他一次，但听其他同志说，他们都把他当成为是最特出，最深思熟虑和理论性最强的主要领导人。

在党内，有传闻，是某种蜚言蜚语，人们试图抹黑他。开始我们以为那是流言。当我们揭露莱特后，就对以前发生的事进行检讨，我们认为那是莱特一手操控的，目的是要抹黑他。<sup>2</sup> 在莱特被暴露之前，〔据说〕他敢就某些理论观点跟莱特辩论。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或许是关于统一阵线吧。

---

2 莱特，又名黄绍东，或名张红，或名黄金玉。越南籍华人，在越南出生，于1934年加入马共，自称跟共产主义国际有联系，1936年成为中委，1938年出任总书记。抵达新加坡前，法国特务机关把他移交给英国的政治部（他在印度支那的掩护身份已暴露）。他在日治期间替日本人工作，在英国人回来后采取‘统战’宪制路线，并在1947年3月卷逃党基金，避免被揭发。他的最终命运有争议之处。他的出卖行动，导致必须迅速提拔像陈平这样的青年。见 Yok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7-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49 (1994); and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dition), 第 81-9 页。根据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第 352 页，张红（莱特以此名会见 136 部队）号称‘全权代表’是个‘魅力十足的中年人，相当聪明，相当有效率。他有个大嘴巴，牙齿整齐，做事谨小慎微。



利昂·康伯尔：王先生，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莱特？

〔这时，陈平受促把正在讲的故事讲完，在较后时才讲莱特。〕

陈平：而在他下面工作过的都称赞他。

杨进发：黄诚讲得够多了。但我想重要的问题，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重大的事件激发陈平去参加马共？这是一项很重大的决定，从我跟他的谈话中，我似乎有一个印象，就是在年纪很轻时，他起初是要去中国从军，然后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要去延安。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在称为中国统一阵线的时期，陈平给我的印象是：蒋介石的无能或拒绝抗日造成了他改变倾向。如果是这样，显然那是重要的。其他还有谁影响了你呢？哪些中国的事件影响你加入左派，而不是参加国民党？

陈平：起初，如果我的父母允许我要去参加〔黄埔〕军校的要求，或许我已经参加了国民党〔笑声〕。那个时候，好几百个青年回去中国。在我的学校，就有超过十人。过后，这些回去中国的人，据我所知，大多数参加了国民党，替国民党打仗，起初打日本，后来打共产党。我不能讲得太确定。或许，如果我参加延安，我会打国民党〔笑声〕。但是因为我没去，因为我父母不准，不许我走，因为我年纪还太小。<sup>3</sup>

杨进发：在这段时期，他跟一位叫李良的中委关系最密切。<sup>4</sup> 李良其实是他的领导，而李良是个建筑工人，爱好运动，他们一起看足球赛。既然这样，或许你可以讲讲李良的个性。他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劳工可以成为中委？

---

3 陈平那时候大约 13 至 14 岁。

4 李良，又名白衣，是 1939 年的一位中委。原本是广东籍建筑工人，当时为吉隆坡党总书记，于 1942 年 11 月牺牲。

陈平：李良那时从新加坡调来吡叻，他是中央委员，也是州委书记。我在 1940，1941 年受他领导。我想他是个优秀的组织人才和优秀的教育家。

杨进发：当陈平告诉我关于李良是如何喜欢看足球时，我感到相当好奇。那是英国人的运动，而我也好奇他是不是曼联的支持者？一个共产党人对西方运动和西方娱乐有兴趣，显然他是个心胸宽大的人，而陈平受他的影响，爱上同样的东西。

陈平：那时候，有个著名球星李惠堂，我们大家都感兴趣。李良，他在发展吡叻的党组织，尤其是在采锡工人，胶园工人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奠定了我们日后斗争的基础。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在锡矿工人，胶园工人和一些农民中有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当我们谈到吡叻时，其实是说为什么吡叻那么强，是抗日期间的一个最强的基地，那是由于他所作出的努力，奠下了基础，培养干部，组织群众的支持。因此，日军到来时，我们马上就能够开展抗日游击战，尽管那时候跟中央委员会已断绝联系。日本人迅速挺进，我们死了很多人。

杨进发：我有另一个问题，是问关于马共的最后一道问题，关于马共的成立纪念日。马共还承认和接受 1930 年 4 月 30 日为建党日。这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可是他们还是继续庆祝，一年复一年。因为在那之前的一天，就是 1930 年 4 月 29 日，新加坡纳新（Nassim）路发生八位中委被捕的事，他们是在柔佛举行的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之后产生的。因此，建党日显然是更早，或许可能在 4 月中，或许可能再早一些。所以，我问，为什么？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这个看来是错误和不准确的日期被采用？

陈平：起初，当我们入党时，我们不知道党是在那一天成立的，我们甚至问都不问。只有到较迟后，我们收到共产国际的刊物《为



争取永恒的和平和人民民主》。其社论谈及马来亚之战。那是唯一一份在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刊物。文章里提到（马来亚）共产党有长远的历史。它在1930年7月1日成立。当然，我们即刻就相信了，因为那是来自共产国际。我们立即把它当作党的成立日。过后，我们的两位高层领袖路经河内，我想那是在1959或1960年，会见胡志明。我们的党成立时，胡志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代表共产国际出席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于是我们的党员就问胡志明关于我党的成立日子，并告诉他说那是4月间，但他忘了确实的日子。或许那是在柔佛州的某个地方。过后，这位同志立即作了报告。我们弄错了，我党创党日不在7月1日，从胡志明那儿取得的最权威来源，是在4月间，或许是4月的下半个月。那么，我们就在4月找一天。为了方便〔笑声〕，我们说4月的最后一天是我们的立党日。为什么？因为比较简单，靠近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为什么我们敢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听说甚至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日也不是很正确的，他们只是有大略的概念吧了。在延安，他们把日子定为7月1日，在解放后，他们发觉那日子并不是很准确，但他们并没有改它。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为了方便，我们并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去年收到杨博士所著的书时，读到纳新路事件时吃了一惊。当然，我们弄错了。因为他引述自政府的资料，是错不了的。

**杨进发：**那并不是政府方面的资料，而是从报纸得来的。报道相当全面。所有的名字都有，当然可以看出那都不是真名；相关的领袖，等等。不仅是政府资料，而是报纸，那是一宗重要的法庭审案。

**陈平：**它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对它要怎么办？〔笑声〕那我们得改它吗？我们得考虑考虑。

**大卫·马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有同样的问题。好久的一段时间，他们以为创党日是在1930年1月，过后却出现证据指它应该是在2月初。他们还是在争论着，主要是因为阴历和阳历所造成的问

题。我在想马共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

陈平：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事儿。

本尼迪德·特拉·克基列德：我只是要问一点对 1937 年和 1938 年书面声明的补充，关于爱国主义。我想知道那个爱国运动是建在什么基础上？我假设那是中国吧，只是，是否有马来亚或以马来亚为中心的华人爱国思想，程度如何？在那个阶段，你在这个方面的角色如何？

陈平：起初，我当自己是中国人，不是马来亚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马来亚的概念。你要嘛就在海峡殖民地出世，那是英国的殖民地，你被当作是英国子民。那些不在这儿出世的都是外来人。而我们是出生在马来土邦，称为英国保护邦，而我们也取得英国保护民的地位，不是英国子民。我们自然得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时，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自己办的，政府只是给一点点的津贴。那时候，华人社会自己办学，用本身的课本，只有英文是用当地的课本。

后来，我改变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尝试要去中国，在中国打仗。我把这么做当成是服务祖国的最佳方法。后来，在我看了很多书之后，社会主义的书，我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同时，有一位密友在这个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影响。要不然，我会去中国延安，参加毛泽东的军队。那个朋友对我说，你是马来亚人，你的战斗岗位是在马来亚，不是去中国。你得在马来亚奋斗，你也可以在马来亚打日本人。我想从那天起，我决定不去延安了，要留在马来亚，我想那是马来亚爱国主义。

约翰·李尔利：那是在哪一年呢，当你作那个决定时？大约。

陈平：我想是 1940 年。



约翰·李尔利：你那个朋友，他也是福州人吗？

陈平：不。他会讲流利的福州话，但他是闽南人，在厦门一带。你可以参阅查尔曼的书 *The Jungle is Neutral*，书中把他称为李福 (Lee Fuk)。他名字叫赖来福，参加第二批 101 特别训练学校，他精通双语，英文非常好。<sup>5</sup> 后来他被日本人逮捕，牺牲了。一般上日本宪兵不会送人去法庭的，日本人却把他送去法庭审讯。他跟日本主控官争辩，他自行辩护。他说：我没有罪，你们才有罪，你们侵略我的国家。他被判死刑。只有在不久前，我读了李尔利先生的书，你在写龙妮 (Noone) 的那本书中提到。

约翰·李尔利：不！我没写那本书，但是在我的书中有提到她。

陈平：你那本关于原住民的书，对吗？是不是一本关于帕特·龙妮 (Pat Noone) 的书？

约翰·李尔利：对！是她的兄弟写的，约翰·史林明 (John Slimming) 也写过。<sup>6</sup> 还有一本是赛比尔·卡地加苏 (Sybil Kathigasu) 写的，她被日本人逮捕和用刑。<sup>7</sup> 但是，她很坚强，战后，她被颁乔治勋

---

5 101 特别训练学校于 1941 年底在新加坡成立，以训练特别部队，结果，它训练多位共产党提供的人员，这些人后来形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几个核心支队。

6 陈平可能是指 Leary, *Violence of the Dream People: The Orang Asli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Ohio: Ohio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或是 Richard Noorne, *Rape of the Dream People* (London: Hutchison, 1972).

7 赛比尔·卡地加苏 (Sybil Kathigasu), *No Dream of Merc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约翰·史林明 (John Slimmering) 是马来亚警官，出任副原住民保护官，是 *Temiar Jungle* (London, 1958) 和以紧急状态为背景小说 *In Fear of Silence* (London, 1955) 的作者。*Temiar Jungle* 描述 1956-57 年在吉兰丹森林一据点如何进行原住民工作。



陈平与约翰·顾德斯中将和陈剑于 1999 年在坎贝拉澳洲防务军校合影。  
(陈剑 提供)

章。她的书提到赖来福。

安东尼·索尔德：陈剑写的传记，说那是在 1939 年初。他写道：这时候，他自己已经从孙中山的信徒变成共产主义的追随者。

陈平：1939，是 39 年初，不是 40 年，对不起，我弄错了。

安东尼·索尔德：一会儿前，你提出说你或许一直是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兴趣。那么，中间是否有过渡期呢？在某种意义上，我想‘三民主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sup>8</sup>你实际上是怎样从社会主义转向

---

8 由国民党创立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为民族，民主、民生，先为同盟会采纳，后在 1924 年国民党大会接纳，著有《三民主义》阐述其内容。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呢？是否有什么你可视为是桥梁或是转捩点的？

陈平：过后，我读了很多书。有解释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同的书。那些书说明，作为理论，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我相信这说法。

安东尼·索尔德：但倒底是什么影响你转向共产主义？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读了什么的，或那仅只是一种感觉？这一点似乎非常重要。

陈平：那天，我告诉你们中的一些人关于抗战的事。我当自己是中国人。抗战从〔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爆发就开始了。约一、两年后，中国的半壁河山被日本占领，〔中国〕连吃败仗。为什么？我寻找答案，要知道为什么。蒋介石看来是没有能力领导抗战。接着，我读国民党一些最著名战略家的著作。其中一个蒋百里，另一个是杨杰。我读他们的理论，不太有说服力。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败再败。为什么在短短时间内，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河山。关于怎样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当我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它解决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被打败，怎样打赢战争。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战争’的理论。从那时候起，我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有兴趣，我读了很多。然后，我读一些关于俄罗斯，关于苏联的书，还有，我那时还很小，我读每一本我能弄到的书。因为这样，我在学校成立了个读书会。我还记得我读一本约翰·史德拉撒（John Strachey）的书的中译本。在紧急状态的初期，他是〔英国的〕战争部长，他来到马来亚，检阅军队。他带着长枪进入森林。我想我读他的书是很滑稽的事〔笑声〕。我好像还记得那本书的书名是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安东尼·索尔德：*The Problem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难题〕。是 *Problem of Socialism*，中文的译

本。同时，我阅读安娜·路易士·史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关于苏联民主的书。<sup>9</sup>当然书中对苏联民主诸多赞美，而我慢慢转变了。然后，我读艾德加·史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sup>10</sup>我想那是渐进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然后是普世社会主义。那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马共有没有把毛泽东的著作交给你和读书会？你是怎么样取得到那些书呢？

陈平：那个时候，我想英国的管制在战争爆发后有点松。我想他们以为所有来自香港和上海的书都是抗日文章。他们没有过滤，没有检查，所以其他一些在几年前被禁的也进来了。我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尼赫鲁的 *India's Discovery* 的中译本。<sup>11</sup>

---

9 安娜·路易士·史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美国记者，从1920年代起写了很多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书，其中包括：*From Stalingrad to Kuzb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USSR* (London, printed in USSR: Modern Books, 1932;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wo Years of Russia's New Life* (London: Labour Publishing Co., 1924). 也可参阅 Tracey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10 艾德加·史诺（Edgar Snow）从1928年开始在中国当记者和（Chicago Tribune 等报纸的）国外特派员，并在19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课。他到西北部的陕西省采访共产党领导人，在1936年出版 *Red Star Over China*（原意《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取名《西行漫记》，也有取名《二万五千里长征》），内容有精采的毛泽东关于1934-5年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叙述。战后他回去美国，被约瑟·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为共产党，他离国，在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逝世。

11 *Discovery of India* 于1946年出版，是尼赫鲁在1944年4月至9月在阿末纳卡尔城堡（Ahmadnagar Fort）监狱写的。书广泛谈论历史，宗教，甘地，以及改变印度的必须性。



安东尼·索尔德：这里有个关键点。紧急状态时，在营地搜获几十本，或许几百本上海出版的史诺的书。但却很少，甚至是没有毛泽东的著作。所以，我想毛的著作大概是没有吧。或许你已经背到滚瓜烂熟了〔笑声〕？

陈平：我不了解你的问题。你是要问什么呢？

安东尼·索尔德：我只是说当时在营地好像找不到太多的毛泽东著作，或许你们带有跑动的图书馆。（译者按：英文的‘走动图书馆’有指把东西记在脑子里的人的意思。）

陈平：那当然。

安东尼·李德：我可以回到关于黄石的问题吗？当他来到学校，发表抗敌的演说时，对当时的他纯粹是指为中国而战吗？他那时已经在中委会里头，应该是第二号人物。他那时还纯粹是中国人吗？你提到你想法上转变为马来亚爱国主义，或是在马来亚打日本人。那是不是要等到日本侵略马来亚后，马共才产生作为马来亚人的思想？

陈平：不，我想要比那还早。当然，黄石来的时候，他懂得情况，而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不认为我的学校可以找到一位英籍民。大家几乎都是在马来土邦出世的，有些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他当然不能说‘你们是马来亚人’。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祖国是中国，我们必须为保卫祖国而战。或许我在时间上弄错了〔陈平向陈剑询问有关的时间〕。黄石来到马来亚，被国民党追捕。他1934年来到马来亚。1936年加入党。所以当他在1937年来到我们的学校时，应该是负有相当任务的党员，当时是不是中委，我不太肯定。1938年，他被选为中委。

杨进发：1939年9月6日。

陈剑：1938年。

陈平：1938。三十八年。我们参阅我们的文献，是三十八，不是三十九。

杨进发：好，我们等着看看。

陈剑：1939年是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会议。

陈平：那时候，在他中选为中委的同时，也中选为常务委员。有五个成员，他是五人中的一个。他是第二号人物。肯定是那个时候，1938年。在他们成立抗敌后援会的时候，当然，宣传时是全体华人，包括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和在中国出世的华人。就这样，在较后时领导发现了这个毛病。如果你要发动群众，就得用这一个爱国口号，带民族主义的口号。较后他们发现，得告诉人们，在马共的领导下，不能把自己当中国人。后来，来自中委会的文献，由黄耶鲁撰写的。他提出了马来亚华人的理论。那时，我们肯定是马来亚华人，但我们有时对华人用得很松散——华侨，是海外华人，马来亚华侨，是在马来亚的海外华人。后来，我们改换成马来亚华人。身为马来亚华人，我们有双重职责。一方面我们得对抗日本，协助中国。不是回中国去，而是在其他方面协助中国，我该说，大多数是捐钱。另一方面，我们得为解放马来亚而战。我想这才是主题。因为马来亚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主要角色是为马来亚革命而战。现在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政纲，第一份的政纲。当我们在第一次大会上成立党的时候，一定会有党的政纲，但我们找不到。我们找到最早的那份是1932年。这份政纲是为马来亚而斗争，要把英国帝国主义赶出马来亚，设立苏维埃共和国。

杨进发：请让我快快补充几点。这个抗敌后援会显然是中国导向的，慢慢地转变，最重要是在1936-41年期间，当时，马共和其他



如马来青年会<sup>12</sup>等组织乘机利用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共产党在动员学生、工人、青年和各行各业的雇员方面做得很好。因此，共产党取得佳绩，但却付出了忽略争取马来人支持的代价。跟马来人隔离的代价是很大的。其次，马来亚导向的运动有另一个方面。在1936-41年，有两个不同浪潮的工潮，而共产党取得佳绩，因为他们提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这是其中一个口号。再说，在1936-41年期间，经济萧条已过去，但是工资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甚至连政治部都承认，共产党利用这个不满是合理的。而工人间第三项最重要的不满是契约制度。如果要雇用劳工，得立契约；承包工头剥削工人，有时给低薪，有时给恶劣伙食和住宿。因此，他们不喜欢契约劳工的制度。于是共产党说，瞧，我们要自由谈判，更好的条件等等。共产党乘机活动，通过救亡运动和劳工阵线，争取到很多工人加入。1936-41年期间是高潮，代价是特别忽略了马来人。在1938年，有200名受英文教育的印度共产党员。马来人有参加其中一些罢工，但他们不是党员。玩爱国主义的牌代价很高，也就是说，要应付抗日的当前急务。

**彼德·朋斯 (Peter Burns)**：这个时期英政府非常关注要确保马来人不会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例如，在1939年，英政府发现有一些马来人被送到苏联受训。这叫当时的官员震惊，这样的事竟会发生。过后就可能限制接触了。

[录音带在这里出现混乱，因此相关部分的对话略去。]

---

12 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M，为激进马来组织，要推翻本土的封建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1941年，它跟日本有接触，其领袖如 Ibrahim bin Yaacob 和 Ishak bin Haji Mohamad 被英政府扣留。一部分成员在侵略前参加日军。Ibrahim bin Jaacob 在日据时期替日本人做事，期望跟印尼联合取得独立。许多成员也在战后参加马来国民党，国民党则在有限政治目标方面与马共联手，如争取更激进的政治改革。不出奇，当英政府在1947-48年加紧限制和逮捕，部分马来国民党成员逃走，最后跟共产党人进入森林。

陈平：我们从未受通知这件事。莱特总是把它当作秘密。我想有人接触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Jaacob），当然他们向中委会提呈了报告，最后是到了莱特那里。我想他破坏了那项接触。我从未看过关于马来青年会的存在和活动的文献。我当时不知道，只有在我在国家被日本占领时担任州委时，我们才发展马来人的工作，只在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有马来青年会这个组织。在那之前，我们不知道。我想大多数的党基层都不知道有马来青年会。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我可以简单问一下关于胡志明的忠告那项情报吗？你是不是告诉我们你进党时已经知道有这项忠告，而人们是在谈论着这项忠告。

陈平：是，是。我有听说。当我们揭发莱特时，我联络在曼谷的一位党元老。那时他领导泰国共产党。但是，在三十年代初，他在马来亚。<sup>13</sup> 我问他。他告诉我，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已经尝试招募某些数目的党员，我忘了数目，一些马来人，一些印度人。他说有三、四位马来人，三、四位印度人要送到莫斯科去受训。可是不知怎么通讯线却割断了，或许是上海发生了一些事，以致这个计划无法进行。

王·迈克：谈到马共跟非华人族群的接触。我要引新加坡的情况。新加坡的共产党是处身于华人环境这个事实，他们所关注的显然必须是华族。从这一点上，对其他非华人族群缺乏影响和接触可能是一项因素。讲到你早年的日子，我的一个问题是：除了老师和记者，以及中国政治的教育，在你的同龄群中，是不是有哪一个个人主导了你的决定？鲁西安·拜尔（Lucian Pye）在其关于游击战策略的著作中论称很多人入党是因为社会因素，不是思想因素。你的情

---

13 这是指李启新，又名闵德才。



况，你的朋友，说‘我们大家一齐走去做点事’的激情的成分占了多少？或有没有任何个人在你的生命中起关键性或特别重要的影响？  
〔陈平保持沉默，显然不能确定要如何回答〕。

安东尼·李德：看来相当奇怪，你的整个家族中，你是唯一成为共产党的。没有人激发你走向那条路吗？

杨进发：总是有坏小孩的吧〔笑声〕。

陈平：我想我的父母对我的弟弟看得很严吧。

安东尼·李德：那你是长子？

陈平：我是次子。

王·迈克：你在那一天的演说中，你说你要参加国民党，而你们都已经准备好要去当中尉了。后来你的父母知道了。过后，你说党叫你留下来。在那个阶段，正式上是党，或是你的朋友呢？这是我想问的。

陈平：刚才，我说到赖来福。<sup>14</sup> 他是我的同学。我念初中一时，他在初中三。他早两年毕业，然后上英校。

卡尔·哈克：我可以对家庭方面谈多一点吗？我简略地发现到，有许多华人家庭，在众多孩子当中，只有一，或是两位参加共产党，其他都没有。那么，你想你是否有那一方面是跟你的兄弟不同，或是仅仅是因为机缘和运气呢？

---

14 据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 214 页 (注), 李福‘约在 1943 年 7 月被日本人抓了去, 施刑至死, 最勇敢地拒绝批露情报’。

暂停

**安东尼·李德：**是什么造成你跟其他兄弟不同呢？你参加了党，而他们却没有？

**陈平：**我想或许是我小的时候，我读很多中国的古典小说，精采的故事，中国的经典。我八岁或十岁时，就想着如何为正义而斗争，如何协助穷人。有点像罗宾汉那样的事。不是政治性的。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有很多这类的英雄，像《水浒传》、《三国演义》。

**哈罗德·克洛切 (Harold Crouch)：**回来谈马来人。马来亚共产党是否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跟印尼的党有联系吗？在日据之前。

**陈平：**我了解。

**安东尼·李德：**在日据之前。

**陈平：**我想我们有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印尼共产党面对镇压时，第一个避难处就是新加坡。他们逃到新加坡来。甚至在某一个时期，他们的好多位领袖就住在新加坡。谢文庆先生在他的《从印尼共产党到共产国际》 (*From PKI to Comintern*) 那本书中提到这一点。在莱特被揭露后，我从老同志那儿听说，一个接一个，在那时候，许多印尼人跑过来。我个人有接触过阿里明 (Alim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他路经马来亚的时候。<sup>15</sup> 他住在马来亚一段短时

---

15 玛斯·阿里明，Mas Alimin (1889-1964)，早期的（印尼）人民党领袖，及后来在爪哇领导印尼共产党，去过莫斯科和延安。他早在1924年就访马，宣称是到来发展共产党分子。1926年12月，他在柔佛被英国人逮捕，后获释，因为他没有涉及反英国当局的颠覆活动，所以在技术上不能使用驱逐法令来对付他。（该法令过后作出修改，以包括任何传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参阅 Yong, *The Origin of Malayan Communism*, 第79, 83页。



期，莱特派我帮他偷渡回印尼去。他回印尼去，过后死在印尼。他告诉过我说，三十年代初，他来到马来亚，他如何在马来人中进行工作。他告诉我他最深刻的印象是，跟三十年代相比，马来人改变了很多，更政治化了。我带他去接触一些马来民族主义领袖，包括布哈努汀（Burhannudin），布斯达曼（Boestamam），因为我要安排他回印尼，需要时间。因为我们得照顾他的安全。<sup>16</sup> 于是，他在吉隆坡住了几个月。后来我们请他协助设立马来干校，马克思主义学习班之类的。那些马来民族主义者听过他的名字，因为在二十年代印尼发生起义、造反。一次在爪哇，一次在苏门答腊，我忘了那些名称了。<sup>17</sup> 他也告诉我好多印尼人来马来亚住一个短时期。问题却是他们都不在马来亚住。如果他们在马来亚长住，我想我们的马来人工作会发展得更好。

安东尼·李德：我想我们是不是该在这儿停一停。

杨进发：这是关于马来人的非常重要的课题。共产党是有策略去招募马来人的。当南洋临委成立及进行扩展时，他们有统战组织，所

---

16 布哈努汀医生，Dr Burhannudin al-Helmy (1911-69)，受马来文及宗教教育，毕业于阿里卡赤（Aligarh University），念同种疗法医学（homeopathic medicine），任记者，1938年为马来青年会的创立人，任日本人顾问，1946-7年为马来国民党主席，过后为泛马回教党领袖（1954-64），他曾三度被扣留。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 (1920-83)，真名为阿都拉·山尼·拉惹·哥基尔（Abdullah Sani bin Raja Kechil），1938年为马来青年会创立人，在日本人下做青年和宣传工作，创马来国民党（1945），在1941年和1948-1955年两度被扣留。参阅 Ramlah Adam, *Ahmad Boestamam: satu biografi politik* (Percetak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4)。

17 他是指印共在1926年11月在（爪哇）班登（Banten）及1927年1月在苏门答腊发动、因准备不足而告失败的造反。结果约13,000人被捕，打击印共势力超过10个年头。

谓的抗帝同盟。有 200 名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其实是成功了。只是，是谁发动了这些人的呢？他们是住在马来亚的前印共分子，他们协助发动的。其次，在 1920 年代，有一些海南籍共产党员是懂双语的，在沟通交流方面的双语能力，不只是写，还会讲和沟通，拥有商业联系的人脉。马六甲是这一切的中心，而他们招募了好几个，然后 1931 在瓜拉庇劳。<sup>18</sup> 当传到英国人时，英国人很关注。在 1929 和 1939 年，翁雷德 (Onraet) 受促作报告，说：要确保华人和马来人不互相参合，等等。<sup>19</sup> 于是在 1930 年 4 月中的成立大会前，马来人有受到邀请，但他们没出席。为什么马来人不出席呢？因为他们的六位领袖被抓起来关进牢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 1931 年，有一位约瑟·德克洛斯 (Joseph Decroux)，是法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国际代表，代表远东局，他在 4 月来到新加坡。他住了两个月，受到政治部的监视。他带来约一万美元，而他的其中一项目的是要开展马来亚共产党的新支——马来人，要资助马来人。他跟傅大庆 (Fu Daqing) 等人取得联系。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在 1931 年 6 月 1 日被捕，造成胡志明在香港被捕，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粉碎了。所以，没有成功。但是却已经作出了尝试。钱准备了，政策也有了。你不能有一个总是由华人支配的共产党——马共。他们的确有作出尝试，只是没有成功。英国人的镇

18 森美兰州一小镇，当时只有一条大街和几条横巷。

19 翁雷德，Rene Henri de Solminhac Onreat (1887-1952)。毛里求斯出生，1907 年加入海峡殖民地警察，从 1925 年任新加坡警察政治部副主任长达 10 年，1931 年刑事调查局主任，1935-9 年任海峡殖民地警察总监，1945-6 年马来亚英国军政顾问。参阅其 *Singapore---A Police Background* (London: Dorothy Crisp, 1947)。对这部分誉录的一般背景资料，可同时参阅 C. F. Yong, op. cit, Ban Kah Choon, *Absent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pecial Branch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15-1942* (Singapore: Raffles, 2001); 及 Peter Elphick, *The Far Eastern File: The Intelligence War in the Far East, 1930-1945*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7)。



压，就是说，他们的情报工作非常好。他们把他们一一抓起来，隔绝他们，孤立他们。所以，就很难成立‘统一阵线’，多元种族的政党。那是英国这一边。更为重要的是马共本身的主观努力。他们没有足够可以讲马来话的人员。如果你不会讲华语或英文或华人方言，你怎么能跟我沟通呢？所以，那是很重要的障碍。过后在1930年代，在1930-5年，那是段很糟的时期，共产党几乎崩溃，遑论组织马来人。有几个前印共人员带着希望招募一些，但没有成功。然后是来到1936-41年的民族救亡时期，都是讲中国，都是抗日。所以，我不能怪共产党没有作出尝试。

安东尼·李德：我们暂停，茶点时间。

暂停

## 第三场对话

### 日据时期

第一天上午场继续

明石阳至：我准备了约七道问题，而其中一些问题，陈平先生传略（陈剑，第 1.2 章）中已经回答了。让我问多几个问题。第一，陈平先生，你在 1924 年出世，十五岁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然后在 23 岁时，你是马共的总书记。从你在党内的地位那么迅速的擢升，有人推测你一定是非常接近莱特。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莱特的庇护，你的迅速擢升是不可能的。你跟莱特有多密切呢？

陈平：你可以那么说：庇护。〔笑声〕。但我不同意庇护这个词。我的迅速擢升，用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他的出卖行为。因为一个又一个领袖被他出卖，被日本宪兵逮捕，被日本宪兵抓去。最后，我是州委仅存的资深党员。他被迫擢升我，否则就没有人接手了。

明石阳至：他们说莱特一直称你是‘我的人’。



陈平之前的马共总书记，  
三重特务莱特。  
帝国战争博物馆 照片



陈平：那是企图贬低我。我不是莱特的人。我没跟他住过，从来都没有。日据时代，他来见我，或他叫我去见他。我可用手指算出他来了多少次，差不多是五到六次。

明石阳至：是在那些情况下呢？

陈平：有三回是他到吡叻来。为了 136 部队的事，他必须来，不是因为要擢升我。他要跟英国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英国人回来的话，他可继续干他的肮脏勾当。在那之前，我想我从 1942 年开始见过他三次。第一次，他叫我去吉隆坡附近某个地方见他，在吉隆坡北部，靠近间津，靠近黑风洞。为什么呢？我回头想，我想日本宪兵已经嗅到一些东西了，〔关于英国人〕登陆，所以他叫我去见他。那是第一次。当时，在州委中，我是第三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书记。第二号是书记处成员。我也是书记处成员。书记处有三名成员，一名书记和两名成员。第一号人物是书记苏友明，<sup>1</sup> 第二号是张明今。他提供了许多情报，有真有假。他在 1943 年初某个日子被捕，两个人都是，所以我得接手。我尝试联系党中央，或应该说重新建立联系。他们被捕之后，我去吉隆坡，见蔡克明。后来，他派另一位中委去吡叻驻扎，任州书记。这个人来到吡叻，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李小平。他来到吡叻，说道：我现在接任书记。我当然得帮他，替他找住所等等。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受到中委会，受到莱特通知，得去新加坡开会。从新加坡回来后我们讨论工作。但途中他被捕了，也是被莱特出卖的。我想他被出卖之后，莱特才要接触我或其他清楚懂得当地情况的人。然后他就联络我。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或许我之前已经给他写了报告。我们的地委已经跟〔英国 136 部队的〕登陆小队——戴维斯

---

1 苏友明，又名梁友明。

的那组人<sup>2</sup>取得了联系。〔编者按：英国战时特别作战执行单位的远东支队在1944年3月取名136部队。那之前，第一支‘136部队’乘潜水艇在1943年5月24日抵达马来亚，队员有约翰·戴维斯队长（他在1930年加入战前马来联邦警察部队，后来在战后服务于马来亚民事服务）和5名华人特务。这是顾斯塔勿斯I号（Gustavus I）行动的一部分。过后到9月前还有三次的渗透登陆，包括国民党兼136部队官员林谋盛。136部队跟陈平的接触是在1943年9月30日。〕

他们呈报告给我，我马上通知党中央。当然，那时候的总书记是莱特。后来他叫我去会见戴维斯。我犹疑，因为没有党的授权，我怎么样去见戴维斯呢？我是以什么身份见他呢？所以，我想我那时候是先作了报告，请示党中央的指示。过后，他叫我去吉隆坡，在黑风洞附近的地方。然后，我回来，以抗日同盟和抗日军的代表会见戴维斯，不是代表党。人们弄错了。所以，我得到总部的授权，因为我们的总部代表抗日同盟，我们的群众组织和抗日军，我们的军事组织，去会见戴维斯。但是，戴维斯没问我什么问题。为什么呢？我回头想，很早很早的时候，至少是在新加坡沦陷前夕，约翰·戴维斯已经知道莱特是英国的特务，所以就不需要他来问〔笑声〕。他是总部派来的。

彼德·朋斯：我有兴趣知道，莱特是怎样来到马来亚的，我跟约翰·戴维斯在相当久以前讨论这一点。

---

2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dition), 第73页, *passim*。戴维斯后来从1947年起在马来亚民事服务局服务，职位包括新村联络官，在1955年12月的华玲会谈负责护送陈平。英国关于136部队的记录，在公共档案局开放予公众，编号为HSI系列。



陈平：那时〔1943年中〕我才擢升为州常务委员。刚刚才升上去。在那个会议里，我们讨论派代表参加黑风洞会议。我们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因此，我们〔吡叻〕的军队获得中央的承认，以后可以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称号。那之前，当我们主动组织游击队时，是采用‘吡叻人民抗日军’。是有不同的。当你用‘马来亚’时，你是受到党中央承认的。我军派出两个人：一个是张浪斌，另一个是杜龙山，又名赖来福。党州委派一名，苏友明。那时的州委员会，在张浪斌从州委员会调去〔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不是第六，<sup>3</sup>之后，张明今已经是第二号人物。

日本人来了，不久后，我被州委员会委任为第四中队的党代表。州委决定建立四个中队，一中队在北吡叻，一中队在近打地区，另一中队在巴都巴辖〔按：应该是华都牙也〕，在怡保一带的。第四中队是在丹绒马林。为什么设在丹绒马林呢？因为我们已经接触到查伯曼那组人。<sup>4</sup>

因此，我被派南下去组织这个中队，同时也成为去联络查伯曼那组人，后留部队，的吡叻游击队代表。起初，他们用的字眼是‘残留部队’〔笑声〕。他们后来改用‘后留部队’，展开敌后破坏工作。<sup>5</sup>

约翰·顾德斯：你是不是在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训成员抵达之前就

---

3 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种观点，参阅 Ban Kah Choon and Yap Hong Kuan, *Rehearsal for War: 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Singapore: Horizon, 2002).

4 史潘塞·查伯曼 (F. Spencer Chapman), Gordonstoun 学校的一名舍监。战争把他拖进军队去，他指挥新加坡沦陷前成立来训练华人义勇军的英国 101 特别训练学校。关于陈平跟 136 部队的联系，参阅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第 112, 116, 240-2 页。

5 陈平再次展现他对敌对者的著作的熟悉程度。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 39 页，提到：‘以前那些日子，他们被称为残留部队——这个称号在我看来是多余而被遗弃的。’

开展了游击战？你们已经开始了，那是你们一直以来都关注着的，是吗？

陈平：是的，按照计划，第一批必须到达吡叻。可是，由于日军挺进得太快，他们只能够来到雪兰莪北部，于是他们就留在雪兰莪。第一组的成员主要来自雪兰莪，训练后，他们的目的地是吉打。第二组几乎都是吡叻的党员，其中一些是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一些是吡叻遣派的，完成训练之后，他们应该回到吡叻来。然后，第三组去雪兰莪和第四组去森美兰。按照计划还有第五组，但第五组没有实现，因为日军已经来到非常靠近柔佛了。因此，只有四组人受训，学校就关门了。过后，第二组的一些成员，因为想念家乡要回来，申请又申请，其中一些成功回到吡叻，包括了赖来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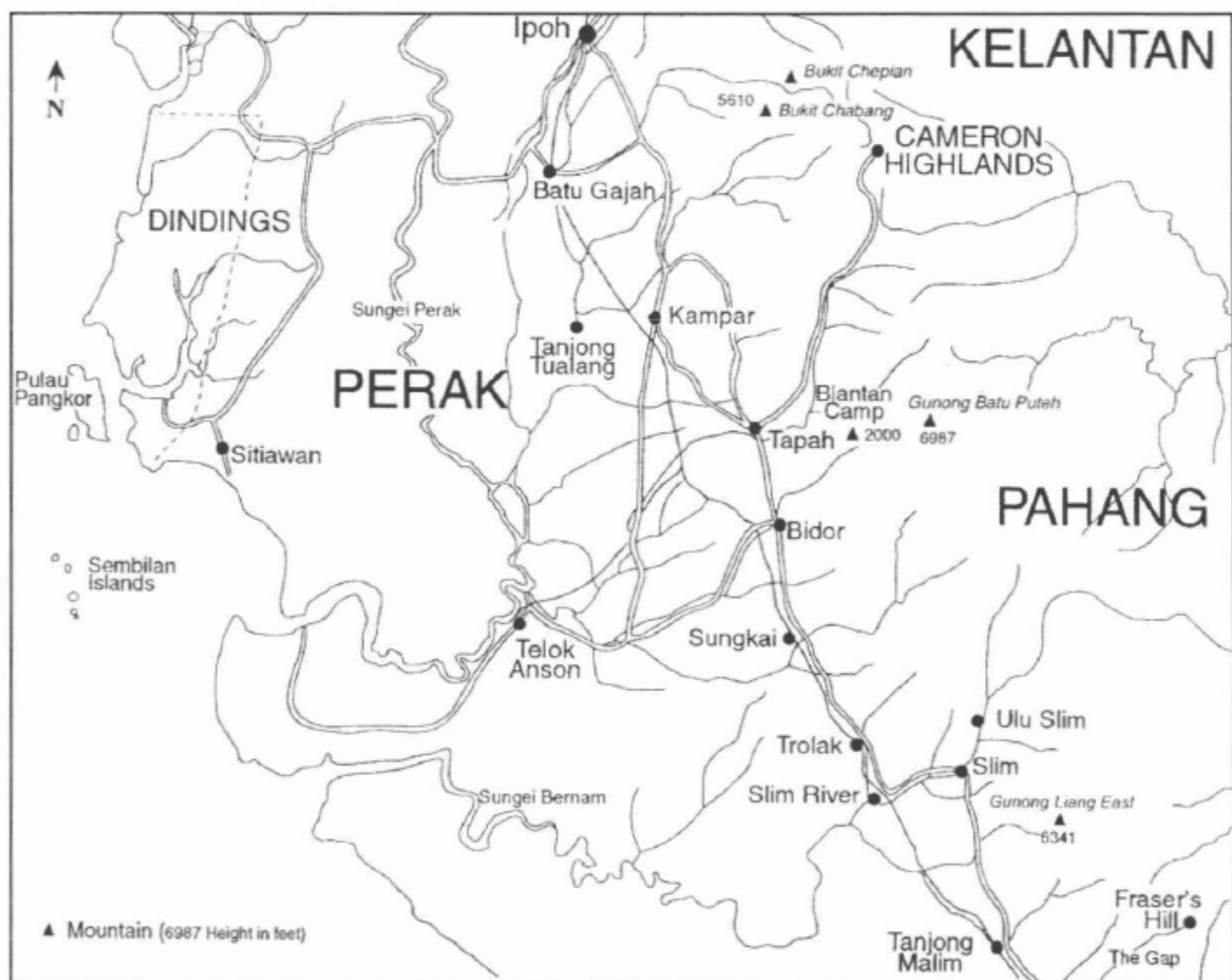
明石阳至：看来你有相当的地位和权力去领导党，可是，香港1992年出版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正史中，你的贡献和成就却没有提到。是什么因素造成你的名字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中除名呢？

陈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提我的名字。我没问过他们。你得去问他们。但是，关于我在日治时期的贡献，实际上我不是中委，因此我的贡献仅限于吡叻州。而在游击队里，我任第四中队的党代表只有四个月。我们成立于新加坡沦陷之日：2月15日。那一天，我带领二十个人，大约二十个人，分成两组，骑脚车从督阿冷南下丹绒马林。<sup>6</sup> 用上一天的时间。半途中，日本卡车经过，高喊‘万岁！万岁！’。我们猜不透是出了什么情况。当我们抵达仕林河，看到那儿的海报，大海报，庆祝新加坡沦陷，他们用的词是‘攻

---

6 督阿冷，Tanjong Tualang，位于吡叻中部，位于实兆远西面内陆，离约三十英里，靠近主干铁路。陈平描述的行程，是南下超过五十英里。丹绒马林在吡叻州最南部，毗邻雪兰莪州。





抗日军布兰丹山营地与天定海岸

占’。他们攻占了新加坡。但我们继续前往丹绒马林。我在军中仅四个月。然后，我被调到州委员会去，成为州委成员。那时候，我们的制度是党组织和军队在州内是平行的，同等等级，由向党中央负责的党员分开领导。因此，州委不能干预军务。只是从旁协助，互相协调。或许，就是这样，对于抗日军来说，我的贡献微不足道。过后，我担任其中一名州委数个月，或是一年后吧，我的主要职务变成是跟登陆（联军）联络。我不认为他们把这个当成是什么贡献。

陈剑：在那本书中，你的名字在有关跟 136 部队联系的部分中提到。

原不二夫：等一等，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叫陈平的人。

陈平：有，有，有另外一个陈平。他在彭亨第六独立队负责政治工作，不是政委。他还在，我想，在新加坡。

陈剑：他就是赖文明。

约翰·李尔利：看来，对于你在抗日战争中的努力和贡献，英国人比你的同志对你持有更高的敬意。

陈平：当然。我帮了他们很多。没有我，我想他们不可能生存。

哈罗德·克洛切：而在那个时候，你才不过是十八，十九，二十岁。根本就不是最高领导。

[陈平这时开始较详细地描述他如何跟在马来亚登陆的英国 136 部队人员取得联络。第一次是约翰·戴维斯队长在 1943 年 5 月 24 日由荷兰的潜水艇渗透进来。该潜艇名顾斯达勿斯 I 号，在邦咯以北，靠近石加里 (Segari) 处登陆，包括约翰·戴维斯，吴再兴，和另四位华人。136 部队的许多华人乃由国民党招募，其中林谋盛在中国有高层的接触。陈平从 1943 年 9 月 30 起会见 136 部队，从 10 月 8 日起协助他们转移到内陆美罗的布兰丹营地。]<sup>7</sup>

陈平：就连他们从吡叻滨海区，要如何转移进入丛林中，是我给他们策划的。起初他们拒绝转移。他们当时在邦咯岛。在邦咯岛和半岛大陆之间是很窄的水道。他们要绕圈，避开水道，出深海，然后西转进入吡叻河。我告诉他们那很危险。他们以为跟日本鱼雷艇保

---

7 进一步细节和精采描述，参阅 Ban and Yap, *Rehearsal for War*, 第 149-71 页, *passim*。这里指定是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从邦咯开始，经吡叻河，到仁德拉打 (Jenderata) 登岸，从那儿走路到龙谷 (Lungkup)。



持远距离会安全。那时候，日本人得到了消息，在邦咯岛驻扎了三艘鱼雷艇，进行夜间巡逻。我就告诉他们，最安全的途径就是从他们的眼下那边穿过去，不是经过深海。他们〔日本人〕已经在看住深海了，在那儿巡逻。他们将永远不会想像到我们竟敢在他眼下经过，就走过他们的身旁。另一个原因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故，你可跳下海，游回陆地去。还有生存的希望。在深海，你跳下去，就会被淹死。结果，他们最后接受我提出的方法。

**安东尼·李德：**你是不是说你是跟英国方面的最主要接洽人，因为你懂得英语？是不是？

**陈平：**我不认为是这样。是因为我是吡叻州最资深的党员，其他更资深的党员都被捕了，因为被莱特出卖了。

**杨进发：**可否容许我简略讲讲这一点？我想陈平一直对他在吡叻的角色表现得很谦虚。我想他掩护，保护和养饱所有这些 136 部队人员，而我也想约翰·戴维斯〔和其他人〕都非常感激马共的保护、掩护和友谊。当约翰·戴维斯在千里达（Granada）一项有关‘The End of Empire’的节目中受访时，他很清楚地说：‘如果没有像陈平这样我们可以信赖的友好人士，我们可能无法生存’。他们不能信任莱特〔笑声〕。<sup>8</sup> 在另一方面，同样的问题，如果陈平心情不好，他可以杀掉这些人来作为回报。所以，我想陈平在这个方面非常谦虚。这是我的观察。

**大卫·马尔：**在这个方面，我要问一个关于无线电通讯的问题。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你得完全依赖英国人以获取由无线电从海

---

8 Granada, *The End of Empire* 节目的访谈后来结册成书，可在牛津 Rhodes House 参阅。

外传来的情报。这个对吗？如果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弱点，比较越南的情形，他们那儿不只听德里和许多其他电台，还有发射机，因此本身之间能够进行接洽。你们是否完全依赖英国人以取得无线电情报？

陈平：哦！不！不全是这样。我们的无线收听站不设在游击营地。我们设在州委宣传部控制下的村子里。我们有一台很大的菲力蒲（Phillip）收音机，就这样取得新闻。只是，从平地的村子，把情报传到戴维斯的营地得花一些时间。

安东尼·索尔德：这么说，在马来亚是有很多人收听德里的广播，其中有一些被捕和被处决了。

陈平：对。我们也是这么样。我们联系到市镇区的一位欧亚混血儿。他从秘密渠道取得情报。当日本人来到时，有一些时候他们充公收音机，有一些是任由你，日本人当他们是可信赖的，叫他们为守法良民，让他们拥有收音机。但他们会替你把收音机调到不能收听短波，只能听本地电台，中波而已。确保你听不到外国的消息。

大卫·马尔：马共是否有发报机，让你们随时随地自己可以使用？

陈平：没有。这个我们得依赖英国人。

佐摩：我这个问题是要问明石阳至。日本方面关于莱特的记录是什么呢？日本特务渗透马共的情况有多广泛？

明石阳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日本宪兵在1942年3月中的某一天逮捕莱特。几天之后，或可能是几个星期的审问后，就像我在我的文章〔第3.2章〕所写的那样。莱特同意跟日本宪兵合作。根据我对大西觉（Onishi Satorou）所作的访问，他说完全没有什么折磨



或用刑之类的。<sup>9</sup> 根据大西觉这位作为对付抗日军的宪兵头领的说法，‘他作为一个合作者的作用在黑风洞事件的情报后就完结了’。〔黑风洞事件：1942年9月，马共领导在黑风洞附近的农村里召开高层会议，由于莱特的出卖，日军包围会议现场，多位马共及抗日军领袖牺牲。〕

过后，日本宪兵获知莱特跟英国人和抗日军有连系。因此，在1942年9月过后，大西觉对于利用莱特这个合作者就非常谨慎。明显的，1943年10月过后，日本宪兵不再利用莱特来获取有效的情报。相反的，宪兵是依靠本身的情报人员。

**佐摩：**日本宪兵对马共和抗日军的渗透程度是不是仅限于莱特？没有其他的渗透了，对吗？

**明石阳至：**当然，当时掳获很多文件，也有被捕马共分子的供词，当时，黄望青〔黄耶鲁〕担任被捕马共党员的翻译。

**佐摩：**为什么他跟抗日军和英国人的联系会成为问题呢？本来就是要他这么做的，因为他是跟抗日军和英国人接触的党领导。为什么他会不再对宪兵有任何利用价值呢？

**明石阳至：**宪兵那时候已经从掳获文献和被捕的抗日军那儿取得足够的情报。莱特的情报只是用来核实宪兵本身所取得的情报。

**陈剑：**大西觉有说过他有意在发现莱特已没那么有用途之后除掉他吗？

**明石阳至：**没有，就算是他作为合谋者的有效性已证明不太有用，可是，大西觉和宪兵保留他来核对所取的情报。

---

9 大西觉大佐 (Maj. Sartoru Onishi) 当时在新加坡任日本警备副司令。

利昂·康伯尔：一个简单的问题。李察·布隆姆〔另一位英国 136 部队官员〕是什么时候抵达的？<sup>10</sup>

陈平：盲登陆是在 1943 年初〔顾斯达勿斯 I 号，于 1943 年 6 月 15 日登陆〕。<sup>11</sup> 布隆姆和戴维斯跟一批中国国民党人一起来。

利昂·康伯尔：布隆姆和戴维斯一起来，乘潜艇，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陈平：然后布隆姆回去汇报。我弄错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不起全部东西。比较准确的资料可参考 *The Jungle is Neutral*，我也是参考这本书的。这么多年，我忘记了〔笑声〕。戴维斯先来，然后回去作汇报。第二回，他跟布隆姆一齐登陆。

明石阳至：布隆姆跟林谋盛一齐来。<sup>12</sup>

陈平：不，不，不。林谋盛，是我〔在 1943 年 11 月〕去接他的。那艘潜艇里，有林谋盛，有庄惠泉，是第二号人物，林谋盛的副手，那时他以‘杨先生’为名。只有在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名。林谋盛也用别名：陈金声，不，是陈春林。因为我自己用陈金声〔笑声〕这个名字。那是一艘荷兰潜艇：克罗德尔·芬纳

---

10 李察·布隆姆 (Richard Broome)，马来亚民事服务在吡叻的一名地方官，有华民保卫官的经验，1941 年 12 月 26 日加入 101 特别训练学校，后逃出参加 136 部队，战后回马来亚任官职。

11 1943 年 5 月 24 日，约翰·戴维斯和 5 位华人特工离开潜艇，在半夜时摸黑登陆。

12 布隆姆跟三位华人特工一齐抵达，但过后跟戴维斯回去。陈平的说法正确，林谋盛跟芬纳在 11 月初的另一次登陆时抵达。顾斯达勿斯号共有 6 次登陆，最后一次在 1943 年 12 月。



(Claude Fenner),<sup>13</sup> 林谋盛, 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三人说要〔在1943年11月〕登陆。我说不行。他们计划是要芬纳离开潜艇, 可是那地方有日军在巡逻。<sup>14</sup> 我说我不敢答应, 我可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从美罗到槟城, 沿途都有日军在巡逻, 非常危险。

明石阳至: 你有见到芬纳那组人。

陈平: 那时候, 布隆姆和戴维斯在森林里。我在潜艇会见芬纳, 林谋盛和杨先生。后来, 我同意我只敢带一个出去, 这个人不可以是白人〔笑声〕。我怎样去给他化妆? 怎么样掩护他?

利昂·康伯尔: 芬纳可是个大个子啊!

陈平: 我们得经过两、三个哨站。所以我说不行。后来我答应只带一个人, 就林谋盛跟我。<sup>15</sup> 我带林谋盛进森林。我们用私人汽车, 装扮成商人, 经过哨站, 从巴眼拿督到美罗, 一路上被检查。总共有三个哨站, 我们得停下车子, 让日本人来查看。幸好, 他们没问任何问题。我告诉林谋盛: 你不要出声。而我则应付几句, 仅够回答他的问题。通常, 日本兵会问: 要到那里去?

---

13 克罗德尔·芬纳, 后为 Tan Sri Sir Claude Fenner。第三位是夏里森 (F.P.W. Harrison)。芬纳从1936年起在战前的马来联邦警察部队任职, 然后在战时任职特别作战部队。他的知识后来因升任要职而被充分利用, 他在1954-8年担任高级副警察总监 (政治部主任), 及在1958-9年任首相署保安及情报局副秘书长, 并在1963-6年升任警察总长。

14 芬纳在潜艇里,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设法登陆, 失败。

15 那是大约在1943年11月。原本是李察·布隆姆得去接潜艇的, 可是他病得太严重, 故由陈平代劳。这件事在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241页中有描述。

陈剑：回到关于莱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问 Yoji，也是问陈平的。有说法指莱特本身发现到自己会被大西觉抓起来。因此，日本投降前约一年，他要求党给他一个小队约 10 至 15 位警卫员的特别庇护所，然后他就住在文良港，吉隆坡东某个地方。

陈平：那是 Setapak。〔译者按：陈平以为 Setapak 和文良港是不同地方，其实 Setapak 就是文良港〕。

陈剑：这是真的吗？我想那个时候，莱特已经害怕大西觉要杀他了。你问过大西觉关于这事吗？

明石阳至：没有，我没问过大西觉这件事，而据我所知，他告诉我说对宪兵而言，莱特在从抗日军和英国人那儿取得情报还是有用的。

陈剑：那么，他是不是真的被藏在那个地方呢？

陈平：不，他一直都是住在新加坡。

安东尼·索尔德：这是关于日本人跟莱特间关系的问题。既然已经知道他战前已经是英国人的间谍，同时看来很担心 136 部队抵达马来亚，为什么日本人不跟踪莱特，在他出巡的候，可能他是去跟 136 部队联系。136 部队只损失一名成员。这一点，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人的一大失策。因此，我不知道为何莱特不被跟踪。他们也没怀疑他可能跟英国人再度联系，及联系抗日军。

陈平：我想莱特来见我们的时候，是不敢不让日本人知道的。他得告诉宪兵。因为他住在新加坡，在进入半岛时，得用日本人提供的车子。他得告诉他们。



安东尼·索尔德：或许日本人根本没想到 136 部队已经登陆马来亚了。

陈平：我不这么想。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登陆后，这些国民党人，之前在马来亚的华人。他们四处走动，因为在那个时候，华人都比较同情〔抗日〕。就连我也敢回去我的家乡。我会见旧同学，有人认识我。那时候没有人出卖我。<sup>16</sup>

明石阳至：大西觉说关于 136 部队的情报是直接 from 其他来源获得，不是莱特那儿。

陈平：我想开始时可能是这样，可是，当他们〔日本宪兵〕知道后问莱特，莱特不能够说他不知道的。

明石阳至：显然，莱特不要背叛英国人，因为他知道，日本投降后，他得再次跟英国人合作。〔笑声〕

陈平：我相信你的说法。起初，当他收到我的报告时，或许他没告诉日本宪兵。可是，当他要过来时，第一次会议是靠近吉隆坡的某个地方，过后的三次是在吡叻，都在吡叻的美罗地区，我想他一定是作了报告。否则，要是日本人知道了，他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因为，日本人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情报来源。

安东尼·李德：你现在知道这情况，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些吗？

陈平：不懂。有人要跟我讨论，可是，我说他们只是在掩饰本身的

---

16 这句评语是指普罗大众而言。查伯曼感到惊异的是那么多被捕的抗日军如何出卖本身的同志。参阅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 319 页, *passim*。

罪行。他们说：为什么莱特乘着汽车来，而你却不怀疑他？可是，我本身用公路到吉隆坡，也是乘汽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人在日本公司工作，能够弄到通行证贴在窗口，在挡风镜上。我们过了关，没有问题。

众人：你应该知道莱特被捕了。因此，应该会怀疑为什么他会被释放。

陈平：对，有很盛的传言，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回，日本人到来之后，展开我们所说的肃清。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把全体华人集中在几个地区，抓拿嫌疑分子，杀死了很多人。他们说只有几千或几百。我们计算是超过 50,000。家属到来报告：我失去丈夫，我失去儿子等等。<sup>17</sup> 然后是那个大规模的扫荡，我们的党员一个都没被捕：我是说主要领导人，或也许是普通党员。过后，我想大概是 4 月的某天，党员之间有传言说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不是宪兵。他被释放出来后，经常骑一辆红色的运动脚车。

陈平：传言指他被捕了一段日子。我忘了那情节，几个小时后，一天或是两天，日本人就放了他。因为他很精灵，传言说，他尝试掩饰自己，让警察相信他是‘守法良民’。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怀疑他。你当然要问为什么。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吧，我有一度被日

---

17 陈平是指日本人对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族男性进行大检证，然后用卡车把私会党徒和抗日分子载去海边或偏远地点杀害。日方资料宣称共 50,000 华人被杀，新加坡约 30,000 人，马来半岛约 20,000 人。肃清看来是后期所用的字眼。参阅 Kelvin Blackbur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Malaysia 73, 2 (December 2000), 第 71-90 页；及 P. Lim Pui Huen and Dianna Won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2000)。

本人逮捕。不只一次，是两次在进行活动时被日本人逮捕。一回是靠近督亚冷，我骑脚车靠近三叉路口时，日本人躲在草丛里伏击。我的脚车抵达时，他们走着过来，所以我跑不了，只得停在那儿。当时是一群人，不只我一个。莱特就不同，他总是自己一个人的。我们被逼在太阳下站了好一阵子，那是当时的一种惩罚方式。过后他检查，他们检查你的手指，看你是工人还是读书人。他们检查我的手指。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村子里拿锄头。所以他们检查时，我的手脏，起老茧。可是，其他一些人被捕，当嫌疑分子施刑。我没有任何伤害。

另一次日军来到我们的游击营地。我们已从丹绒马林转移到乌鲁仕林，在仕林河附近。以前那儿有仕林河桥的地方。我从山上走入村子的工人宿舍。突然，日本人来驻在那儿。我无法躲藏，只得跟着民众，包括家属在内约有近百人。我留在那儿，日本人也进行检查。不是军事警察，是宪兵。他们抓了一些人。那时，我患疟疾，很苍白，于是他们把我当嫌疑分子，我们共三、四人。他们把我们带回他们的营地，就是他们的驻地。我们发现他们是神枪手，他们用冲锋枪打飞鸟，不是用猎枪。他们当然是枪法很准。因为他们全神贯注在射下的鸟，追逐着鸟儿。然后，有人劝我移到另一边。我移到另一边。另一边被视为是非嫌疑分子〔抑制笑声〕。另三个人不敢走过去。我过去了。救了自己一命。另外三个被带回驻地去施刑，甚至用猴子咬他们，还用上了猎狗。三个都因为受刑而死了。如果我告诉人家这个事，而他们把它跟莱特的相比较，人们会说‘这不可能！或许你是被日本人收买了，要不然，怎么可能只你一人逃生，另外三个都死了。’

因此，那个时候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地下分子。或许是这样吧，他有办法叫日本人相信他是个良民。

**安东尼·索尔德：**我有个不太成熟的问题，我希望能听取两方面的说法。在日军和抗日军之间，总共有多少次战斗、军事行动呢？我想在某个方面，假使能显示作为抵抗势力的抗日军战士的确有参与



枪战，将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公信力和威信。事实上并没有多少次对日军的作战行动。日军与抗日军之间，实际冲突或枪战有多频率呢？还是说它主要是歼灭汉奸，不是真正去打日本人？日军和抗日军的对抗是怎么样的层次和规模呢？

约翰·李尔利：我补充一个问题：直接攻打日军主力，而不是攻击马来亚警察、马来人和印度人等附庸的行动有多少次呢？

陈平：对不起，我没有统计数据。但是，就算是日本的资料，我们也可知道一些详情。虽然我想所宣布的数据比起确实数目是大大缩减了。我想有人的文章有引述这个数据来源。

原不二夫：日军有多少人被杀？根据一位前军人所写的历史书，包括马来亚的战事〔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1945 年 8 月〕，6,900 军人被杀。〔明石阳至：包括病死的吗？〕不，单单只是战斗的。这数目包括进攻马来亚战事中死亡的 3,000 余人。因此，总共有 3,000 加数百名兵士被抗日军打死。这个数目跟抗日军所提的数目相去不远。<sup>18</sup>

陈平：就算是只根据这些数据，你们都看得出我们是如何打日本人。我们可是靠自己本身的武器，不是 136 部队的。

陈剑：我在〔第 52 期〕《南洋学报》写过一篇文章。<sup>19</sup> 在第 181

---

18 Louis Allen, *Singapore 1941-1942* (London: Frank Cass, 1992 edition), 第 271 页，提供日军至 1942 年 2 月 15 日在战事中死伤人数为：6,150 伤和 3,506 人死。

19 陈松沾著《日治时期新马华人的处境》，《南洋学报》52 期，(1998 年)：第 161-88 页。

页，我引述由前抗日军分子组成的新马侨友会提供的数据，估计被打死的日军约 5,500 人。而被歼灭的汉奸约 2,500 人。当然，关于这点还有其他不同的讲法。日本的记录显示约 600 名日军，加上本地警察，即马来人及其他约 2,000 名。<sup>20</sup> 同时它引述抗日军伤亡数目为 2,900。因此，数据之间出现一些差距〔关于日本人的数据分析，参阅注 20 及 21〕。

安东尼·索尔德：看来是有说法指日军伤亡人数是 600。

陈平：是的，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引述自谢文庆的 *Red Star Over Malaya*。

安东尼·索尔德：在没有计算尸体的情况下，双方都很难证明〔本身的数字〕。无论如何，战争结束时有成千的日方记录，假使这些

---

20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Appendix B, 'The Statistics of Casualties during the Resistance Campaigns' (according to GSI HQ 29 Japanese Army), 截至 1945 年 8 月 31 日为止，总共：

日军 600 伤亡（至少 250 人被打死，单在 1945 年 8 月就有 63 人）；

警察 2,000 死伤；

抗日分子 2,900 死伤（包括至少 928 人牺牲，及约 2,000 人被捕，至于被捕后有多少牺牲则不详）。

日本报告的资料则本自 1945 年 11 月 28 日第 11 期的 *twenty-fifth Indian Weekly Intelligence Review*。同一份报告指单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31 日就有 212 次抗日军的进攻，其中约一半是攻打日军（42 宗）和警察局（66 宗）。地理分布方面，这个月中超过一半（121 宗）的攻击发生在陈平的根据地吡叻州。这 121 宗里，28 宗攻打军事目标，40 宗攻打警察。下一个抗日最活跃的州雪兰莪，同期只记录 38 宗攻击。

抗日军则宣称单在 1942 年至 1944 年 9 月，有 251 战斗，4,021 日军被打死，2,542 名汉奸被歼，而抗日军只 104 人牺牲，参阅 Ban and Yap, *Rehearsal for war*, 第 203-4 页。

没被带回日本去，或是烧了，或是英国人收集到其中一些。所以，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可靠性呢？

**明石阳至：**日本方面的数据是在投降时刻由设在太平总部的 29 军所提呈的，显然是准备来提呈给英方的。因此，这是日据时期，不包括马来亚进攻战，日方伤亡的唯一情报来源。

**安东尼·索尔德：**你会不会同意那数目是 600 左右，因为我通过英国向日本取得的数据是 2,300，抗日军杀了 2,300 人。

**明石阳至：**我无法证明日本数据的可靠性。显然，那是在 1945 年 9 月提呈给英方的正式伤亡名单。

**陈剑：**其实，谢文庆在他的《红星照耀马来亚》（*Red Star Over Malaya*）一书中，有引述一组数字。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31 日之间的两个星期内，有正式的数字，506 名日军被打死，抗日军则是 550 人。所以，单单是在两个星期，这就是伤亡人数。<sup>21</sup> 因此，在 3 年 8 个月中，不可能只是 600 [安东尼·索尔德：但也有可能]，因为抗日军跟日军进行了超过 300 次的交战。

**陈平：**那个时期，我们已经是用英国的武器了。空投来得很迟。之前，我们跟 136 部队有联系，他们带来了几件武器。潜水艇怎能带太多武器呢？他们有任务去攻击敌人的运输。

---

21 谢文庆在该书提供在该期间内的数据如下：

日军	121	(63 死, 56 伤, 4 失踪)
半军事人员	14	(3 死, 11 失踪)
警察	388	(31 死及伤, 357 失踪)
抗日军	126	(78 死, 48 被捕)



安东尼·索尔德：抗日军有没有像越南的情况那样，在日本投降后掳获大量军火？

大卫·马尔：越南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法国人只负责到 1945 年 3 月，因此不是很多敌人被杀。1945 年 3 月后，有几次交火，但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前，最多不超过 100 人或 200 人被杀。8 月 15 日后，我想你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你是面对完全不同的情况。<sup>22</sup>

安东尼·李德：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从陈平这儿知道的是：马共的真正策略是什么。是要尽量打死更多的日军？还是尽量打死更多的汉奸？或是你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把马共置于革命领导的地位？<sup>23</sup>

陈平：马共中央的指示是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势力，不是着重在杀日本兵。组织群众和发展游击队。到了后期，我们检讨这些，认为我们有点保守。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明石阳至：战后，抗日军走出森林，他们说日本人不是敌人了，事实上，他们变成了朋友，而抗日军从这个时候开始要打英国人，争

---

22 136 部队起初是要收编抗日军作为情报用途，不是所谓的展开敌后破坏。

23 136 部队的 1945 年报告对这个课题有以下讲法：‘一般的政策是要保持低姿态：(a) 保护外围群众不受到报复性攻击，(b) 让日本人没有借口来捣乱主要的供粮线，(c) 保持那非常有限的军火和子弹供应，(d) 保持和平，以进行训练和组织。唯一受到鼓励的行动是全面歼灭间谍特务和汉奸...我一直是支持这样的政策，虽然我认为狙击行动如果能取得弹药和无线电组件可行，可只是要杀日本人...是一种对珍贵资源的浪费。’它继续说，‘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在建立具潜能的有用力量。Capt. Garnoss-Williams RN papers, *Operational Reports following exfiltration from Malaya in May 1945*,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第 10 页。

取马来亚独立。抗日军反过来要日军交出枪支和弹药。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枪支和弹药转交给了抗日军，那是违反联军的投降条件的。

**陈平：**是的。但那却是另一个故事了。那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指示。什么都得靠自己。有一些人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其实是莱特的指示，不要打日本军。根据蒙巴登的命令，他们有义务要维护这段期间的法律和秩序。其中一些，则因为在更早的阶段，莱特尝试掩盖他的出卖，制订一项策略。当英国人展开反攻时，我们得跟英国人比拼，尽量占领更广阔的土地，并设立本身的政府。我参加了那一次的会议。我们的军队必须马上改名为民族解放军。抗日同盟改为解放同盟。这一切，我想都是在1944年10月制订。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靠近双文丹，在吉隆坡和万挠之间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时，所有的人这时已被通知。于是，一些收到党中央的命令，停止战斗。一些尝试跟日军谈判，要求把武器交给我们。而一些日军则主动跟我们谈，达致一些协议。如果我们不攻击他们，他们会把部分武器交给我们。

**明石阳至：**我访问其中一些跟你们进行谈判的日本兵。

**陈平：**我要提出来，实际上莱特出卖了我。幸好我逃脱，死里逃生。迟一些，我会解释。有一些人，他们还是执行旧命令，攻击日本人，解放更广大的土地。因此，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有一些甚至是接到了命令，却依然进攻。那发生在安顺。他们攻击日本警署，但失败。因为日军集中他们的军力，超过一百人。所以，那是非常混乱的时期。

**陈剑：**那时候，在你所说的会议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否改成解放军之类的，莱特有出席会议吗？

陈平：有。

陈剑：那么他有出席。过后，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八大主张，违反会议的议决。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莱特那时提出八大主张，而党中央对这项突然而来的策略改变如何反应？<sup>24</sup> 我想这很重要，我记得吉打的抗日军，重新命名为第八独立队。他们已经挂起旗帜，换名为解放军，过后被令改回来，因为〔1946-48年〕英国军政对这很不高兴。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陈平：他们没收到新命令，因此继续按旧命令办事。

明石阳至：我可以问多两个问题吗？

陈剑：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我对宪兵有兴趣。<sup>25</sup>

---

24 1943年的纲领提出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可是，1945年8月，马共却在战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及联合国新诞生的情况下，发表新的八点纲领或宣言，称为‘八大主张’，包括：

1. 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新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
2. 实行民主制，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普选的民意机关；
3. 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
4. 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
5. 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6. 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
7. 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分子；
8. 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简单地说，其策略是要争取统一阵线，在英国人回来后，第一时间争取‘自治’。

25 据推测大西觉是新加坡日本宪兵队头子大石正行大佐下面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四个知道莱特人士中的一个。



陈平：在不同的时期，大西觉的宪兵部，我们有人渗透进他们那儿，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到了1943年，我们的人跟我们失去联络，〔过后〕就不知道任何东西了。只有到了最近，我读到一位英国官员，叫特别作战人员之类的。<sup>26</sup> 他有提到，在日本投降时，大西觉其实是驻扎在打巴，靠近我那儿。我也是在那儿。于是我就想起，既然大西觉是驻扎在那里，我当时其实有去跟宪兵谈判。但我是已经收到了新指示，知道新政策了的。我为什么去呢？因为我要跟他们谈判，要他们把一些武器交给我们，而我们是要收藏起来供以后用的。我去他们那儿，我掩饰身份，用另一个名字。我要跟他谈话。他说：我最多只能给你一些多余的武器。我问有多少。他说或许是十至十五件吧。我说，那太少了。我知道你们的多余武器肯定比这多出许多。然后他告诉我，如果你要谈，叫你们的领袖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王平。他那儿有一张地图，打巴的地图，他指着我的所在地，那是〔离我确实所在地的〕一平方英里范围内。我当然不会去承认我就是王平〔笑声〕，而只是说好。因此，我以为是没有结果了。我想是还有另一批的宪兵，不属于大西觉的宪兵部的，因为大西觉专长于对付共产党。不久前，是几年前吧，我读到那本书，心底就产生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这一切呢？如果那是大西觉，那么当然是有可能是莱特提供的情报。莱特最后一次来，就住在村子里。他走后，我们被日本军重炮火攻击。我想他们派出约300人，不是宪兵，是驻军。他搜查每个角落，搜一切东西。我们无法逃，不能转移，因为被重重包围了。但我们终需转移。我采取这样的策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就躲在路旁的矮灌木丛里。那其实是条小径。日本人走上走下，却没发现我们。他们搜查了一整天。于是，我回想日本人怎么会知道那地方，我想或许是有一些东西跟这项攻击有关联。莱特开会离去后，他向

---

26 可能是指 Richard Gough, *SOE: Singapore 1941-42* (Singapore: 2000 reprint).

宪兵出卖我们。那是接近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想我对他不再有用处了。但是，这些只是我的猜测。

**明石阳至：**我还有两个问题。日本投降后，至少有 200 名日本军事人员和平民参加了抗日军。当你们在 1989 年跟马来西亚政府达致和约时，只有两名日本人还活着出现。<sup>27</sup>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据你所知，那些跟着抗日军一起战斗的日本人的命运？第二个问题是：是谁在维持泰国境内和平村的生活。根据我从日本方面取得的资料，泰国的皇室在支援你们的村庄〔陈平：是泰王〕〔笑声〕。你们的村子现在命名为朱拉蓬（Chulabhorn）公主村，是皇室公主的名字。<sup>28</sup> 根据资料，泰国皇室每年一次供应药物和粮食。我只是要向你求证这是不是真的。我这里有张照片，你，阿陈在左边，中间有两个人〔明石阳至拿出照片〕。显然，中间的两个人不想暴露身份。你知道他们是谁吗？〔笑声〕这是 1997 年在村子里拍的。

**陈平：**1997 年，那不可能是在村子里。1997 年我不在村子里。

**安东尼·李德：**让我们回到原本的问题，关于那 200 位日本兵。他们怎么了？

**陈平：**〔之前〕你告诉我说日本国会议员告诉你说我跟他谈判。可能是真的，或也可能是另一个人。那时候，我们有另一个人跟太平的最高指挥部文事监部（Woon Sai Kan Pu）谈判。他们的军事行

---

27 他们两人的照片在报上出现，他们在 1990 年 1 月露面之后被遣送回国。两人皆著马共军装，载红星帽。John Coe, *The 1989 Hat Yai Accords*, *The Beagle*, 7, 1 (1990), 第 128 页指二人名为桥本惠之 (Hashimoto Shigeyuki), 71, 及田中清明 (Tanaka Kiyooki), 77 是 15 人组中仅存的两人。

28 公主名为 Chulabhorn Mahidol。

政已经从新加坡移来太平。在太平进行最高层接触。

**明石阳至：**两个人在森林游击战中活了下来。其中一个桥本<sup>29</sup>在他死之前告诉我他在森林中的生活。

**陈平：**关于那 200 名日本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知道事情的经过。可能在马来亚，按照英国人的数据是 200 人。我不知道雪兰莪，森美兰和南部柔佛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吡叻和吉打的情形。吉打的那一批你可以从田中和桥本那儿听到。他们会告诉你。起初，他们有二、三十人，渐渐的，有些投降，一些较后向英国人投降，一些在战斗中牺牲，一些病死。最后剩下两个人。在吡叻，粗略的是有两组，一大一小。小的那组，大概不超过十人。他们留在和丰一带。马来亚紧急状态一开始，他们就加入我们。一些在战斗中牺牲。他们很勇敢。每一次战斗，他们都在前线，日本战士。一些病死，一、两位向英国人投降。

大的那一组，另外那个大组，不超过 100 人，我忘了准确数目，可能是 50 或 60，包括一些空军，他们驾战斗机。这是个大组。他们驻在江沙地区，靠近马依。这个大组给我们造成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改变了政策。他们以为我们会继续打下去。于是，他们尽量招募不愿向英国人投降的日军。起初超过 100 人加入。然后，他们发现我们并不要打英国人。渐渐一些逃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怎样了，可能是向英国人投降了。我们猜想，如果他们不是向英国人投降，大概是逃过泰国去，找门路回到日本去了。或是也许他们到印尼去，参加那儿的战斗。于是剩下大概六、七十人，相当大的一批。怎么处理他们呢？吡叻州委于是向莱特作了报告。可能通过

---

29 译注，根据方山编写的《见证和解与回马——纪念回马十周年》，桥本在 1999 年 9 月 9 日逝世。另一位田中清明则在 2000 年 4 月 1 日逝世。



我，或是直接，我忘了。莱特下令：干掉他们。杀！他要掩盖这件事。如果英国人知道了，他可就很难脱离干系了。〔再说〕我们还包庇着百多个日本兵。

第一天上午场结束。

暂停

## 第四场对话

# 1945-48 年：合法时期

第一天下午场开始

谢文庆：刚才我想问一个引导我们进入 1945-48 年时期的问题。那是关于战后马共展开的斗争的形式。英国的军官艾格德·奥巴兰兹上校 (Major Edgar O'Ballance) 在他所著的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in Malaya* [《马来亚共产党叛乱之战》] 一书中提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莱特考虑要在英国人回来之前夺取政权的方案。<sup>1</sup> 这种想法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之间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个方案是抗日军司令刘尧所建议。<sup>2</sup> 此外，柔佛还有一项建议要歼除抗日军营地中的 136 部队人员。

但是，莱特否决了这个想法，决定采取合法斗争形式，即马共将欢迎英国回来，施压英国政府作出让步，承认马共战时的功劳，尤其是马共抗日军与英国的抗日结盟。于是，这就开展了马共的合法活动时期。可是，英国人抵达之前，136 部队人员拍无线电到哥伦比亚，告诉蒙巴登，说马共发表了备忘录——那是指 1945 年 8 月的宣言——列出八点声明。其中一个关键的要求是要一个民选政府，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当然还包括要求言论自由，职工结社自

---

1 Edgar O'Ballance,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2 刘尧是被莱特委任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名中央军委之一。

由等基本权利。

这个无线电情报收到后，转传到伦敦，蒙巴登和英国外交官双双都对 1945 年 8 月宣言给予好评。他们说这跟他们对战后马来亚的计划方案，即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接受，应该跟马共合作。<sup>3</sup>

我的文章〔第 3.3 章〕带出 1945-48 年时期的一些关键问题。我认为马共当时是受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以致用更广大范畴的马来亚战后问题作为代价。例如，马共没有要求独立，只是要求自治。这项政策在 1947 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共产党大会上受到批判。印度共产党代表批判马共没有提出独立的要求。而如果我们看看东南亚各国兄弟党的要求，马共的要求的确是很温和的。但是，后来就变了。这变化发生时，已经是很接近紧急状态了。因此，简单地说，我要说马共在这个期间内没有突现本身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没有真正采纳民族主义思想。因为这样，当马来人反对马来亚联邦而造成巫人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崛起时，马共就被挤去靠边站。马共被削弱成为仅是一个由思想意识主导的政党，对朝向自治、巫统的民族主义目标，甚至是独立的论说，贡献非常非常小。马共的更多时间是用在群众运动和解决莱特的党内问题。

我想在这个时期，陈平的角色非常重要和关键。他要到了 1947 年才露出头角，而一直以来，党内的印象是他非常接近莱特。他是莱特的‘小哥儿’（‘Little Boy’）。他是莱特栽培的，我在我的书中有一些有关他们间密切关系的描述。因此，当有关莱特是日本宪兵特务的谣言在战后时期涌现时，这就很引起注目。我想是檳城的报纸首先爆出这件事——东尼·索尔德在他的书中也有写到这事——是关于对莱特展开的调查的。

---

3 英国计划在 1945 年提出把半岛的九个马来州属（不包括檳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统一组成单一殖民地，解除马来人主权，让华人成为公民。这个安排是在为所谓的朝向自治政府的渐进、稳健和民主进程铺路。



对于这项调查，我有一些问题，到底是杨果本身发动这项调查，或是陈平本身有参与。但是，我想最后是，大家都可以看到陈平的胜利。他成为总书记。我想这儿有些问题，研究人员将会很有兴趣。还有两点。第一是马共跟巫统、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里的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特别是跟民主同盟的关系。马来国民党和民主同盟都被视为是‘统一战线’组织。那就是说有马共成员相当公开地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中。那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民主同盟里有伍天旺，<sup>4</sup> 过后欧斯曼·基那（Osman China）也在那儿。<sup>5</sup> 陈平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有关在这个时期里马共跟巫统、国民党和民主同盟的关系？

陈平：首先，我要澄清一些事实方面的谬误。根据我的记忆，我们不曾受到帝国共产党大会的严厉批判，批判我们的不是印度共产党，是锡兰共产党。你可以说那是严厉的批判，或是用另一种说法，他们问为什么。我不认为那是严厉的批判。因为，他们怎么可能严厉地批判我们呢？他们本身可是连参加一天的武装斗争都没有呀！在共和联邦内，是我们马共展开了三年半的武装斗争。根据伍天旺向我作的报告，他们问‘为什么？’。那时候，我负责国际

---

4 伍天旺，战时游击队员，战后马共新加坡市委书记，说流利英语。他是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年12月）的创党人之一，因此，他被战后英国军事政府委为新加坡咨询委员。另一位受委者为李球。他在1947年的大会提呈《马来亚共产党》的报告，唯他没要求大会（像印度，缅甸和越南要求那样）提出独立的主张。紧急状态时，他负责英文宣传。1952年，他是政治局委员，英国对他的悬赏金是活捉廿万元，打死十万元。可是，他却在1969年的肃反运动中，在泰南被处决。陈平当时在北京，据称因听到消息太迟，无法干预。

5 欧斯曼·基那（Osman China）是讲英语的马来造反者，是彭亨州的主要宣传家，负责出版《战斗报》。他在1950年代中投降，过后批判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对待群众的手法。参阅 Noel Barber, *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 (London: Arrow, 1971), 第 250-65 页。

联系。我们受到英国共产党的邀请，书面邀请，我于是向莱特报告。当然，我们将会派代表出席。派谁呢？这由他来决定。派三个人：一个华人，一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下来，出席大会得准备报告。那就是伍天旺的报告。那是根据《南岛之春》<sup>6</sup>而写的。莱特叫他写，再由莱特批准。因为我参加党较迟，不懂党的历史。我们被责问，有些党起来替我们辩护，包括英国共产党。

第二点，你说我是莱特的‘小哥儿’。我想，据我所知，我不认为那是广为人知的。不是很多人知道。我没听任何人讲过我是莱特的‘小哥儿’。

谢文庆：我想是布隆姆或是戴维斯说的。我引述。<sup>7</sup>或许是戴维斯。

陈平：刚才我告诉那位日本朋友〔明石阳至〕，在整个日治时期，我只见过莱特六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回忆五十多年前的事，连我都得参考查伯曼的书 *The Jungle is Neutral*，以便找出是何时何地，所以，我只能估计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什么时候见过他。主要的课题是 136 部队的登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吉隆坡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收到实兆远区委的报告。他们已经会见戴维斯。然后是戴维斯的第二次登陆，我想是 8 月或 9 月的某个时候〔编者按：1943 年 6 月 15 日〕。我接到报告后，马上向莱特和中委会作出报告。那

---

6 《南岛之春》是马共文献的合集，从战前时期开始，由马来亚出版社出版。

7 谢文庆在其著作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dition), 第 92 页中提到这个词，说明是参阅 Yap Hong Khuan, *Perak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1957 年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论文) 第 33 页。该论文是参考政治部档案而写，起初属于禁阅文档。

时候，中委会就是他一个人。后来，我们发现，那之前，还有三个人。我想在1943年中起，蔡克民被捕和牺牲后，另外两人也被捕了。

约翰·李尔利：这么说，会不会是英国人误解了莱特跟他属下的关系呢？（马共的情形）不像英国军队那样，有命令链，军官有权利，可是你完全没有权利，你是完全在他的控制底下。不管他做或说了什么，结果却必须由你来负责。

陈平：我得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其实在那时候就是莱特的命令。第一次我去了那儿，我们讨论怎么办。因为戴维斯急着要联系党总部的代表。我没有权力那么做，于是我作了报告，然后，他叫我到吉隆坡附近的某个地方去。他的指示的要点是用抗日同盟和抗日军的身份去谈，不是代表马共。他授权我用抗日同盟和抗日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去见戴维斯。

第二次，他到吡叻来签署布兰丹（Blantan）条约，根据查伯曼的书，那是在1944年1月1日，不是其他书所说的12月31日。<sup>8</sup>他化名张红。他们假装彼此不认识，但我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互相认识的。当然，按查伯曼的说法，他是在新加坡见过莱特。

谢文庆：莱特那时是戴黑眼镜。因此，我想当他们在森林中第一次

---

8 布兰丹（Blantan）是打巴东约六英里游击队营地的所在地，靠近金马仑高原，毗邻原住民群居地，是马共与136部队达致第一次合约的地方。合约是关于双方的军事与物资供应的合作（政治乃刻意被搁置一旁）。那是在1943年12月30-31日，一方为戴维斯，查伯曼，布隆姆，林谋盛担任中英翻译，另一方是莱特（用化名，被英人称为‘全权代表’）和陈平。参阅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第248页。按查伯曼的说法，合约最后签署是在1944年1月1日。



不戴黑眼镜会面时，产生了不同感觉吧。〔编者按：莱特戴黑眼镜的会面发生在1941年12月18日，当时英国人寻求马共与国民党人协助招募华人进行军训。那时，戴维斯是警官，而史潘塞·查伯曼是101特别训练学校的教官。〕<sup>9</sup>

陈平：对了。莱特的特点是很容易辨认的。我想他是在假装，我没问他这事。现在查伯曼不在了，自杀了。无论如何，总共是六次。

大卫·马尔：你今天早上讲到你跟他，加上其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会议，以及会议讨论的过程。在我看来，好几个（共产）党在这个历史性的阶段，面对从武装战斗转向和平斗争的大问题。假使你看看越南，其实其他地方也一样，南斯拉夫有同样的问题，还有希腊，从很多方面来说也包括中国。回顾一下下来三个年头的那段日子，从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那将近三年之间，是不是有些事是你该做而你却没做的呢？那是不是从手中溜掉的机会？或者说，你是不是受到既有的时局所困？

陈平：我想我们得从日本投降谈起。我想日本投降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包括蒙巴登。没有人预料到那天会投下原子弹。那时，我在吡叻参加州委会议。我还记得会议开始后一、两天，我们的侦察队告诉我们说：日本投降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们还在预期会有战斗。我正在前往参加一项会议的途中。当我抵达时，人们告诉我说原子弹投下了，可能是第一颗还是第二颗。然后，会议开始举行一或两天后，有人来报告说日本宣布投降。那是8月

---

9 那是战前的一场会议，英国人与马共对战事开始进行协调，同时招募人员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参与会议的有查伯曼，德文雪儿（G.E. Devonshire）（政治部），英纳斯·特隆勒德（Innes Tremlett）（政治部）和另一位华人。莱特戴黑眼镜，作为高层情报间谍，他的身份可能只有很少几个政治部人员知道。

15日。于是，我们立即讨论如何实践莱特在1944年10月所订下的计划。我参阅查伯曼的书。他说那时候我不在那儿，是远在雪兰莪总部参加一项会议。那时，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不存在，只有莱特和另外一个人，他远在关丹，莱特无法出卖他。因此，他召集高干会议，不是中委会议。

陈剑：全马党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陈平：我想那时他所作的声明，是预期着联军会进行反攻，以及要如何进行掩饰。在那项会议中，他简要地讲述他如何跟联军，英军见过面及进行了安排。但不是完全讲。当然，我本身已经知道合约的细节，扼要的。过后，没有人提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在他的将来计划上。我们跟英国人进行了安排，跟他们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如果联军登陆，我们自己得尽量占领大片的面积，以及各城镇。当然没有提到吉隆坡。我们必须为人民委员会设立本身的行政结构。我们的军队必须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改为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抗日同盟改成马来亚人民解放同盟。他甚至（好像是很有经验那样）说如果攻占市镇，第一个攻击目标，除了警察局以外，就是邮政局和银行〔笑声〕。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时候只是想到攻击警察局。所以，那使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取得自由操控权，我们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时机一到，就去接收英国人的军火。有一天，他们会空投军火，因此，我们的军队要分成两支，一支叫‘公开队’，负责接收英国军火和跟英国人合作。另一支我们叫作‘秘密队’。‘秘密队’不让英国人知道。时机到来时，当英国人开始空投军火时，我们会假装是武器装备奇差。所有的最好的武器，自动步枪，我们将尽可能转移给‘秘密队’。我们的最优秀干部，干练战士，通通都编入秘密队，准备日后的战斗。在公开队，我们只是维持基本的老练干部作为军队的骨干。我们从后备军招募的所有新战士，所有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料子，都加入‘公开队’。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详细的安排。有多少位英国官员会跟着我们，他们会给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没被通知。过后再召开另一次的会议，在下一年，1945年4月。这时候，136部队已经重新建立跟吉隆坡的无线电联系。这时，我们已经在每一个州作好详细的布署，要设立若干个巡逻单位。这些单位不用正规的军号，或我们只称它为连队。每一个州成立若干连或营〔相关的文献一般称之为‘团’〕。势力约是500至1,000人，看州而定。大的州是1,000或800，如吡叻。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安排〕打动了。看来那似乎是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唯一方法。我们一方面跟他们合作，接受他们的援助，他的战争物资供应，而在另一方面则保存我们的主力，置于我们的控制底下。因此，我想所有的州委都不对他有所怀疑。日本投降，新的指示来了。有些人没收到新指示，就按旧指示行事。甚至一些是知道了也自行其是：人人都自我行动，于是我们失掉了中央控制权。让我转回去谈日本投降。日本投降过后，我们开会，讨论如何执行新的指示。一天，我接到雪兰莪州杨果的信息，说莱特叫我到吉隆坡某地开会，其实那是在双溪毛糯。我知道那一定是跟日本投降有关的。于是，我乘火车南下，到吉隆坡，再去双溪毛糯。在我抵达时，莱特已经离开，前往柔佛和新加坡。杨果传给我莱特的声明，或指示。有人说有关决定是经会议通过的，其实并没有。他发下了指示，没有讨论，所讨论的就仅是如何去推行。〔谢文庆：为什么是由雪兰莪州委来发出呢？〕不！是他发出的，以党中央的名誉，包括了八点纲领。为什么过后在8月27日将它公开呢？我记不起。但我想那必定是莱特。因为他得过另外一关。在雪兰莪，他会见雪兰莪州书记，彭亨州书记，或许还有森美兰州书记。那时，我们全都不是中委，我想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莱特的口头指示，是要我即刻到双文丹会见戴维斯。那时候，戴维斯是在雪兰莪。我想几个月以前，他的总部是在吡叻。在5月或6月的某个时间，我忘了，突然，他说他要转移到雪兰莪。他写信给我，叫我跟随他。当然，我不能。没有莱特和党中央的批准，我不



可以离开吡叻州。但我忘了我给了他什么理由。我没跟他。那时，我想他也不知道总部是预计要在9月进行‘拉链战斗行动’（Operation Zipper）登陆计划而命令他转移。<sup>10</sup>因此，那时候，莱特跟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的州书记开会。会议后，他去雪兰莪见戴维斯。我想查伯曼的书指的是这个。戴维斯被上头指示去接洽日本政府。莱特去见他，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个雪兰莪联络员，叫波尔卡斯（Borgass），我忘了他的全名〔按：其全名为 Anthony Borgass，安东尼·波尔卡斯〕。他后来成了新加坡的CID〔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罪犯调查局〕主任，我们叫他‘白先生’。他有中文名。

杨进发：我想这儿有另一个课题，可能是理解紧急状态的关键点。那就是对莱特的清算。这一点我有几个问题。陈平是在什么时候确实怀疑和揭露莱特是个叛徒呢？再则是在1945-47年期间，在这两年里，采取了什么行动呢？然后又是在1947年3月莱特卷逃的时候达到高潮的呢？陈平在这点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是1945-48年期间的最重要转折点。

陈平：刚才我提起8月声明，以及为什么我们放弃争取独立和夺取政权的纲领。当然，在那之前，在日据时期，在1942年，紧接着黑风洞事件后，党中央〔谢文庆：几乎完全被铲除了〕。不，还剩下三个中委，我必须感谢我们的日本朋友，他们保留这个情报。我们怀疑，这三个人是遴选委员会的核心。根据日本的资料来源，他们实际上成立了新的常委会。在战前，甚至是战时，我们没有政治局。〔谢文庆：是采用政委制〕对，那是政委制。为什么？那是根据跟英国合作〔的需要〕。我们不能设立政委制。莱特说，在‘公

---

10 ‘拉链战斗行动’（Operation Zipper），乃英国计划在1945年8月或9月，用十万以上兵员在马来亚西海岸登陆，进攻和重占马来亚和新加坡。以上马共‘公开军队’所指要支持的就是这个计划。原子弹促使‘拉链战斗行动’变成了和平的重新占据。



1946年建立的九一烈士碑，原位于1942年9月日军屠杀马共领导地点的树胶林内，在吉隆坡北黑风洞附近双溪都亚一个山丘上。原址于1990年代末因发展而消失，纪念碑移至吉隆坡南部汝来孝恩园。80余位老抗日军于2003年12月7日出席纪念仪式。

(陈剑 提供)

开队’设立政委制不好。‘秘密队’是在党的控制下，一些是由州委控制。不因为他们被铲除了，如果检查名单，政委干部被杀的仅两、三人。

因此，根据日本的资料，紧接黑风洞事件后，新的委员会成立了，三人常委会：莱特、小平和蔡克明。<sup>11</sup> 我们知道，那时只有3人，另一名远在东彭。他们在间津附近的一个村庄开会，采纳了新的抗日纲领，我想是〔1943年2月的〕九大纲领。第一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

11 1942年9月1日，马共在吉隆坡北黑风洞召开党军高层会议。莱特通报日军。日军包围会议现场，杀死至少18位马共领导，包括两名中委：李振宗和资深海南籍领袖朱日光。1939年的约14位中委，到了1945年，似乎只有2人还活着（莱特和后补中委吴田）。单单在1942年就有6位牺牲。参阅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第185-8页。



因此，日本人投降后，我想莱特知道了。他当时是在雪兰莪，他在那儿会见州委，并立下跟英国人合作的新政策，以及争取自治的新纲领。然后，他去见戴维斯。或许，他已经通过戴维斯传达了这项信息。〔谢文庆：那么，是戴维斯转告吉隆坡的〕是，我想是这样。或许有人可以去档案局查核。或许根本没存案。过后，他赶下柔佛，去跟南马柔佛和马六甲的干部开会。过后，他回去新加坡。那时他留下另外一个会见戴维斯的指示。我得立即去见戴维斯。为什么呢？戴维斯催他提供名单，各中心和总部的名字。他要向锡兰的总部报告。他〔莱特〕告诉杨果，他已经给了名单，他自己本身是中央军委主席。我是军委委员，因为我一路来就用军委的身份跟136部队打交道。另一个人，为方便起见，他们委任雪兰莪游击队的政委为另一名成员，他是刘尧。这个军委是临时的组织，只是为了应付英国人的要求。他不能完全走向公开，为什么呢？如果他走出来，可能马上就被暴露。因为，在新加坡有个越南人社区，200多人在那儿。大多数的越南人都知道他在日治时期的活动。我们全然不知。只有在他逃走后，我展开调查，并即刻发觉了。通过跟我们接触的越南人。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一些东西，但却不敢告诉我们。

**大卫·马尔：** 这些人是来自新加坡的社区，还是越南？

**陈平：** 来自越南，他们接洽新加坡市委。其中一些越南人是左派人士。他们作了报告。他们是驻曼谷的越南负责人。

**大卫·马尔：** 那你是在这个时候遇见庄本周（Chang Ban Chow 音译）的？

**陈平：** 对。不久后，他调走了。另一个人接手。连月权（Nien Nget Kueh 音译），是驻曼谷领事馆公使。

**谢文庆：** 他们去那儿的原因，是不是要招募前抗日军去参加越南革



命，而英国人却不准许？

陈平：是。

〔这时，陈平回到上面的事项，讲述他如何被指示去会见戴维斯。〕

陈平：其实，陈平这个名字也是他造出来的，他得呈上名字。他忘了我的名字，只记得人们叫我‘阿平’。于是，他问我的其他同志，刘尧或是其他人，是不是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党名是王平，可是人们叫我阿平。他忘了我的姓，于是问周围的人，可能是刘尧，或是戴维斯，或是国民党人。他们记得我的名字是陈金声。所以就把我的名字订成‘陈平’。当我抵达那儿时，这个名字已经是人人皆知。根据指示，我即刻去见戴维斯。戴维斯叫我转移去吉隆坡。他是总联络，已经被擢升为上校，他要我转去吉隆坡，跟他在一块。等英军登陆后，他将叫我检阅所有的部队，跟刘尧，检阅所有部队及加强控制。我同意了。但我必须回去。既然他要迁去吉隆坡，他得等一些日子，待日军空出一栋洋房给我们。他同意了。于是，我赶回吡叻，把新指示传达给吡叻州委，刚巧在那时候，吉打抗日军跟党失去联系。他们派人到吡叻尝试重新建立联系。我跟他们的人到吉打，过后才回来吉隆坡。

这就是事情的过程。我想他是在那个时刻作了改变。我想在那个时候，他〔莱特〕采取了部分的主动。他也没想到日本会投降。每个人都没想到，要怎样去应付这个新局面呢？他即刻对纲领进行修改。他的理由相当有说服力。只有在那时候，我是在中央总部，那之前不是。甚至是在布兰丹合约时〔1943年12月31日—1944年1月1日〕，我没有资格签名，连观察员都不是，只是他的副官之类的。<sup>12</sup> 他用张红的名字签署。联军方面是四个人，三个英国军官

---

12 1944年1月在布兰丹，查伯曼发现莱特很有魅力，亲热地叫他为‘全权代表’。查伯曼，约翰·戴维斯和李察·布隆姆，加上翻译林谋

戴维斯，布隆姆，查伯曼和林谋盛。你可参阅查伯曼的书。

大卫·马尔：你是否多谈一些关于调查的问题？我们可能在 5 分钟后暂停。

陈平：我可以说我和杨果在暴露莱特方面扮演要角。有人指责我对党没做过什么好事。我说至少我是两人的其中一个，另一个已经牺牲了，我们在暴露莱特一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sup>13</sup> 为什么呢？起初，黄耶鲁传阅他那封信，我们不相信，因为他是跟许多其他人一起被捕，其中还有中委，黄耶鲁那时不是中委。他的地位相当于市委。<sup>14</sup>

日本方面的资料，马共的组织〔这是原不二夫从日本方面取得的马共组织图〕跟我们所知的有点不同。日本是在 3 月至 4 月间取得。我们在那一年的 6 月召开州委会议时就有了。为什么呢？我们怎么会有呢？因为，有一位英国时代的警官混进去假装替日本人工作。当他取得那组织图时，即刻就传给我们。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图，

---

盛，代表 136 部队。抗日军同意合作联合抗日，换取武器、财务、训练和医药供应。参阅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第 248 页。布兰丹山的营地，位于打巴东南 6 英里，约海拔 2,000 英尺处。

13 作出这项指责的是另一名中委陈勇。

14 黄耶鲁，又名黄望青，生于中国福建，1935 年在厦门大学修经济（法学）学位，开始参加学运。来到南洋后，成为抗敌后援会领袖，1938 年在马来亚成为马共党员及干部。他首次在 1943 年发现莱特的出卖行为，并在 1945 年 10 月暴露他。可是，这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华校中学教师在 1942 年 4 月被捕后，担任大西党的翻译，或许因此而获得保命，却也使莱特能轻易化掉他的指责。战后从商及写作，后在 1970 年代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大使。他在 2003 年 6 月 12 日逝世，年 91 岁，李光耀出席其葬礼。参阅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第 252-3 页；The Straits Times, 5 July 2003, 第 H7 页，6 July 2003, 第 32 页。

文化委员会是在这个右边，不是在左边。因此，我想这不是原装版本，或许是第二或第三版〔笑声〕。黄耶鲁和李安东负责文化活动，直接在中委会下面，在第二号人物黄诚下面。那时，我们的第二号人物黄诚和阿宁或郑声烈，第三号人物，组织委员会主任及成员，包括李良。

**陈剑：**就是白衣。他们全被受严刑折磨。李良，又名白衣因此在狱中牺牲。

**陈平：**他们都熟悉彼此的行为。只有这两个人，黄耶鲁和郑声烈，只是经过第一轮的施刑，只是教训一下他们，未受严刑。<sup>15</sup> 他们投降了，要跟日本人合作。其他都受到严刑折磨，过后被判死刑。有些受不了，自杀了。我们的第二号人物，或者应该是第五号人物李良，中委会第四号人物是〔陈剑：林江石〕<sup>16</sup> 林江石。他们写信出来，谴责〔黄耶鲁和郑声烈〕为汉奸，或是我们华人所说的软骨头。那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判他们 10 年监刑，经过一段短时间后他

---

15 郑声烈，又名亚宁，福建籍知识分子，马共中委，槟城钟灵中学毕业。被日本人逮捕后替大西觉工作，据说是在 1944 年看到莱特跟日本警备人员走入乌节路的咖啡室，因而在柔佛被处决。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第 192 页。

16 林江石，又名黄伯遂，出生广东，移民吡叻，在锡矿公司工作，约在 1937 年加入马共，1939 年任中委，先在吉隆坡，后在新加坡领导马共的组织活动，为新加坡市委书记。1941 年被英政府逮捕，于 12 月被释，受委为华侨义勇军首领，跟英军一起进行新加坡保卫战。1942 年 4 月被捕，于 1942 年 7 月受酷刑后牺牲。相关资料，参阅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第 187 页；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 年）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 年）。也可参阅陈松沾《日治时期马来亚华人之处境》，南洋学报 52 期（1998 年），第 161-88 页。



他们就获释，替日本人工作。黄耶鲁那时替日本人工作，可以自由出入在欧思礼坡（Oxley Rise）的宪兵总部。他穿日本制服。

原不二夫：那你是认为那个结构图是黄耶鲁或郑声烈提供的？

陈平：也许，原表是由大西觉的宪兵按照莱特的供词而绘制的。

原不二夫：党是是如何看待为何宪兵会取得这个表的呢？他们怎么取得的呢？

陈平：起初我们怀疑某个人。每个人都怀疑，那或许是来自那些被捕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呢？当我们开会时，常务委员的一名中委小忠，我想他在那时候没被捕，他代表中委参加我们的州委会议。<sup>17</sup>我们的州秘书给他看那个表。他看了，很惊奇。他说怎么日本人会知道黄绍东（即莱特）这个名字。这是非常机密的，因为只有在跟中国共产党沟通时才会用这个名字。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这么说的时侯，我们在当场并没问什么，但是我们心中都在说，也许在被捕的高级干部之中，其中一个已经叛变了。但我们不知道是谁。那时候，没有人怀疑莱特。过后，当我们作调查时，我们怀疑他。经过思索后，我们知道那肯定是出自莱特，〔谢文庆：那是在战后。〕对，那是在战后。

大卫·马尔：好了，我们现在该暂停喝茶。当然，其中的一些论题可以再继续讨论。

暂停

---

17 小忠，李振宗，茶商之子，幼时从福建移民来马，于1938年入党。1939年，年仅19岁，即受委新加坡市委书记。在1942年9月黑风洞事件中，他是其中一名被害的中委。



## 第五场及第六场对话

#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及 1948-55 年马共的策略

第一天下午场继续

〔由于时间不足，与会者决定第五和第六场应连续进行，中间不暂停。这两场的进入讨论点是：1948年6月，英政府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6月16日，三位英人园坵经理在同一天被杀，英政府随后宣布吡叻（陈平的故乡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枪杀地点离州首府怡保不到二十英里。三位被杀者（约翰·阿里逊 (John Allison) 和助手伊文·克里斯帝森 (Ian Christison) 在和丰遇害，以及阿瑟·瓦克尔 (Arthur Walker) 在爱菲尔 (Elphil) 园坵被杀) 因拒绝跟罢工的华人胶工解决纠纷而闻名。<sup>1</sup> 到了6月18日，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同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马来亚共产党随即被查禁。这一场对话从探讨这次紧急状态，即1948-60年第一次紧急状态的起源开始。到底这是英国人对长期策划及受到国际的共产主义阴谋鼓动而造成的日益猖獗的暴力的简单反应吗？还是那完全出乎共

---

1 Margaret Shennan, *Out in the Midday Sun: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60* (London: John Murray, 2000), 第309页; Donald Mackay,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60* (London: Brassey's, 1997), 第1页; and Harry Miller, *Menace in Malaya* (London: Harrap, 1954)。



产党人的意料之外，根本就毫无准备?]

彼德·爱德华兹：我的文章，以及我想利昂的文章（第3.5及3.6章）的内容，我深信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不敢加以赘述来烦大家。有两个问题是我和其他人都会珍惜能听到陈平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撇开对加尔各答大会的机械化阐释，<sup>2</sup> 这是关于罗伦斯·沙克基（Lawrence Sharkey）和接受指示的说法。<sup>3</sup> 对于紧急状态的发生，国际层次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按定义，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也得是国际主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得关心其他地方的友好共产党，不管是掌权与否，其想法如何？是不是有提供援助的建议呢？是否有表现出对未采取某种路线，或任何其他事而进行批判呢？在发生紧急状态期间内，跟其他共产党的联系和接触的性质如何？

- 
- 2 参阅本书的第3.5及第3.6章以获取其背景。为方便读者，以下为简短摘要：1947年11月，苏联在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一版的报纸中传播其政治局成员齐达诺夫的两个阵营理论。其理论称世界已分成两大对抗阵营：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及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民主阵营，两阵营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问题是，经加尔各答1948年2月两项大会（第一项为2月19-24日举行的东南亚青年及学生争取自由独立大会；第二项是2月28日至3月6日的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的传播之后，这条路线是否触发了1948年初的系列东南亚叛乱。两项大会都有马共代表出席，而澳洲共产党领袖沙克基则在从加尔各答回澳洲途中在新加坡暂歇，正好就是在马共作出增加使用暴力，及准备人民战争这项关键决策的前夕。也可参阅A. J. Stockwell, "A Widespread and long-concocted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in Malaya?" *The Origin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i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3 (September 1993), 第66-88页。
- 3 罗伦斯·沙克基（Lawrence Sharkey），当时澳洲共产党主席，于1948年3月中（3月20日）到访新加坡。参阅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 第52页。

第二个问题，我要提出这一点：在1948年初作出所谓的武装斗争，准备拿起武器的决定后，怎么可能在6月宣布紧急状态时，马共及其党员显然却未准备好应付这场最终爆发的斗争。显然，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是掉在后头。

陈平：我想你如果有看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的话，我已经解释了：影响我们决定拿起武器的重要因素是英国当时的政策。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被挤到墙角，慢慢的，回到了墙角。我们根本没有空间可以移动。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国际因素有起一些作用，但不是那么决定性的。那时，共产党情报局已经成立了，在1946年11月，不是1947年。当我从香港回来，在1947年11月，当然，我们有做了传达，那著名的齐达诺夫（Zhdanov）的文件和报告，那时候，他被视为是史大林的继承人，后来死于心脏病。那份报告，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形容世界已经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阵营，好战的阵营；另一个是和平阵营，社会主义阵营。<sup>4</sup>另外一点是，最大的危机在于国际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过低估计了本身的势力，过高估计敌人或敌对阵营的势力。这给我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然而，这还不至于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或检讨我们的政策。我们还是继续（旧政策）。我们还是认为由莱特订下来的政策是对的。那是在1947年底。我从香港回来，带回了他们的忠告，同意我们继续和平斗争以实现自治政府的纲领。

我回来后，我想我们开了一次会，在11月，没有想到要武装斗争。没有想要那么做。还是想要如何继续这〔旧〕政策。为什么这项由莱特订下的政策还是被当成对的呢？<sup>5</sup> 因为，它很有说服力。很有

---

4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第44页，记录说陈平在1947年的某个时间在香港跟中国共产党接触，带回一封周恩来的信，指大气候有利造反，但是马来亚的事业应考虑其本身的主要状况而定，而他对此并不太熟悉。

5 莱特在1947年3月逃走，促使陈平展开调查。莱特的叛党行为渐渐往下向低层党员揭露，整个过程为期几个月。



说服力，因为当时马来亚的局势就是如此。经过三年的战争，人民渴望和平。因此，发动新的战争不会为人民所接受。其次，我们的影响力出现不平衡，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强，可是在马来人社会的影响却很弱。如果展开武装斗争，我们会有麻烦。而华人之中，大多是倾向中国的。因此，它符合当时的局势。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它，甚至到了我们逃（入森林）时，我们都不认为它是错的。

而我们是这样来合理化的：不是所有间谍，特务所提出的政策都是错的。假使是这样，他很快就暴露自己了。所以，他有时得提呈一些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考虑要检讨那项政策。再说，那时候，虽然在东南亚，印尼有独立运动，越南宣布独立，缅甸为独立而战，可是我们还是自我肯定。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发生什么事呢？他们有很强的抵抗力量，但战争结束后，他们缴械，参加政府。我们就这样肯定这项政策，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印尼和越南不同。至少，他们没有我们这里的多元种族问题。

**彼德·爱德华兹：**那是真正的中心问题吗？还是最重要的问题？

**陈平：**那就是为什么莱特走了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的原因。只有在1948年1月底，我们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出这个问题，当我们在吉隆坡举行政治局会议时，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他是在1月31日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天是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sup>6</sup>他说他感到怀疑，为什么？经过三年的和平斗争，尽管我们成功发动了群众，组织总罢市，大罢工和工商界全面休业。<sup>7</sup>我们取得这

---

6 马来亚联合邦取代1946年4月提出的马来亚联邦。联合邦旨在安抚马来人对联邦的愤怒，恢复各州的马来君主权。

7 全马统一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AMCJA-PUTERA）于1947年10月支持总罢市，为抗议英国从马来亚联邦倒退到较少中央集权的新联合邦。总罢市前，马六甲和吡叻的怡保在9月发生罢市。



样程度的成果，在马来亚史是空前的第一次，可是，我们却无法逼使英国政府作一丁点的让步。因此，继续和平斗争还有什么用处呢？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大家同意讨论他提出来的这一点，是他提的，不是我。第二天，2月1日，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从大草场传来隆隆炮声，庆祝联合邦的成立。<sup>8</sup> 我们继续讨论，最后，大致上同意我们得对这项政策作正式的检讨。但那时候接近华人农历新年，我们就休会，在新年后再聚首开会，最后，我们得出结论：莱特的政策：结束武装斗争和只争取自治是错误的。然后，我们决定在3月召开中委会讨论。

那项3月会议（1948年17-21日）在新加坡奎因街的党所举行。会议批准必须采取新的政策。<sup>9</sup> 沙克基在这方面没扮演什么角色。沙克基有出席会议，他出席首一天半或两天的会议。我叫他出席，以讲述他对第二届印度共产党大会的印象。<sup>10</sup> 那时候，我们密切关注印度的局势发展。因为，我们读到《真理报》（Pravda）评论员

---

8 大草场，雪兰莪俱乐部草场，在吉隆坡中心。

9 相关的共产党文件和英国在危机后的分析可在 *Memorandum on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24 November 1948*, Commissioner-General's Office to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Ref 648/71/924, Public Record Office: FO371/69695。关于3月的中委会议，附有两份文件：

1. ‘国际斗争的当前情况’。此文件附合‘齐达诺夫思想’宣称世界已经‘被分隔成两大阵营’，合作不再可能，英国工党政府已被证明是‘资本家的工具’，为华尔街服务并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根据下层劳动阶级的统一战线，订立新的对策和追求实现‘完全独立’是绝对必要的。因而武装斗争……人民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2. ‘马来亚局势的当前问题’。文指工党政府三年以来只是‘彻头彻尾地成了美帝的附庸’和‘撑高资产阶级角色的工具’，以其‘在殖民地对人民斗争的疯狂镇压’。即是说，英国的目的是把马来亚作为进行无休止剥削，以生产美元的工厂。

10 第二届印度共产党大会于1948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

的一份特稿，著名及深有影响力的尤里·固伊可夫（Yuri Guikov），印度局势的评论员，他着实地批判了尼赫鲁的国大党。我忘了原本的用词，好像是勾结英国人，对英国人卑躬屈膝等类的。这是新的论点。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国大党是民族主义政党。他们有优点，也有弱点，但从来不曾视他们国大党为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党。这是第一篇这样的评论。<sup>11</sup> 第二点是指给予印度的独立根本上未改变印度的政治状况。即是说，印度还是个殖民地。我忘了所用的准确名词。所以，我们密切关注第二次大会所接纳的议案。当他前往加尔各答途中，暂停在新加坡时，他来到我们党所跟我们联系。〔编者按：根据英国文献，沙克基约在2月22日途经新加坡，前往加尔各答。他大约在3月9日再回到新加坡。跟马共出席加尔各答青年大会的青年领袖李送（Lee Soong）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并住了好几天。〕

利昂·康伯尔：他来之前有联络过你吗？他有从澳洲写信告诉你们他要来吗？

陈平：没有。他就是这样前来，因为船停泊在新加坡，我想他得换船从新加坡去加尔各答。从澳洲去没有直接航运。我不知道他是在那儿上船的，或许是布里斯班，或其他地方。

彼德·爱德华兹：但你知道他是谁，在此之前曾有过某些联系？

---

11 印度共产党中央于1947年12月在孟买举行的会议上终于决定停止跟印度政府合作的政策，共党指政府存有‘机会主义的幻想’。这项议决促成在1948年2月28日至3月6日举行的第二届印度共产党大会上，总书记佐西被从1946年起就鼓吹暴力的拉纳狄夫所取代。暴力活动过后增加，造成政府在1948年4月增加反暴力镇压行动。Macolm Kenned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As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7), 第475-6页。

陈平：不。我们听过关于他的事。但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之间的联系是交换文献，党出版物。澳洲共产党送来他们的刊物，而我们把我们的寄给他们。

彼德·爱德华兹：对于像这样的一个人受邀出席政治局会议，探讨诸如改变为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你有感觉到不安吗？那可是对他的信任跨出了一大步，不是吗？

陈平：我想我们没考虑到那个。当时我在现场。

李察·史塔布斯：他在前往加尔各答时没出席中委会，回程时却有参与，这对吗？

陈平：在回程时。〔陈平接着转去讲述沙克基在约2月22日时第一次的接触情形〕。他来到党所，我想他只是要跟我们取得联系，了解日据期间发生的事。我想他听过很多我们的斗争。他要拿第一手资料。他来到党所，刚巧我在那儿，于是由我接待他。我在那儿见到他。〔利昂·康伯尔：那是在奎因街党所，是吗？〕对。

李察·史塔布斯：第二次会面是什么时候？〔众人：回程时，在3月。〕

陈平：你们有准确的情报，他住在新加坡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彼德·爱德华兹及其他人：是在莱佛士酒店？住了一个月？〔笑声〕

陈平：我想他住一个星期。<sup>12</sup>但他跟我们只是两天，最多是3天。<sup>13</sup>

---

12 根据政治部的情报来源，他在回程时于3月9-20日住在新加坡，马共的中委会则在3月17-21日开会。

13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第52页，指日期是在3月9-20日。



第一天他来告诉我们他到了。我告诉他：刚好我们明天要开中委会议，你来出席，不需要只对我一个人讲。第二天他在上午或下午过来，或许是一天半，最多是两天。

彼德·爱德华兹：但是你们的开会应该不是用英语吧？对吗？

陈平：不。我跟他说英语。他参加会议时，他用英语作报告，翻译成华语，因为我们的中委，大多数不懂得英语。

彼德·爱德华兹：这么说，他在实际的讨论中，是没有参与的份啦！

陈平：没有〔他的份〕。

约翰·顾德斯中将：假使他提出消极的论点，那会不会有份量呢？假使他到那儿后，如果说在加尔各答说出对武装斗争非常负面的谈话，那会不会有任何份量？我只是在假设他的出席所可能代表的涵义。

陈平：也许我们会，这是个假设，〔约翰·顾德斯：这是个假设〕或许我们会跟随他，听他的忠告，或许我们会自己做出决定。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内的局势，因为我们对这一点感觉非常强烈。一件一件接踵而来，成立联合邦，然后按劳工法律的规定，把我们的所有党员踢出职工会。我们在有关法案提呈给立法议会之前就知道了。为什么呢？政府印务局的工人，我们在那儿组织的印度工人，传了一份给我们。<sup>14</sup>

---

14 1947年末起，政府和雇主加强对工会的镇压——如利用阻止闯入的法律（私闯法），阻止工运领袖进入园坵，以及用警察对付罢工——工会和共产党人也以暴力作为反应。雇主和政府也同时尝试推动更多的当地协商，以削减共产党人的影响。职工会法令最后在

安东尼·索尔德：可是当我们在伦敦会面时，而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向澳洲的听众重讲一遍，你告诉我说沙克基曾经告诉你们他如何在澳洲对付工痞的经验，在某些矿场以极端的偏见干掉他们。

陈平：采矿业。当然，在先进国家来说，在城镇地区杀人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向他要求的唯一忠告，因为我们在讨论着罢工，何以总是没有结果。当时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那三年里，几乎每一次的罢工都面对工痞的破坏。

众人：工痞。好个澳洲词。或是英国词。<sup>15</sup>

利昂·康伯尔：你对沙克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形成什么印象？

陈平：我们视他为老共产党人，是很有经验的工运领袖。我们知道

---

1948年5月31日修订，除同样行业的工会外，禁止联合会，限制唯有相关行业的工人可出任相关工会的执委。有两个作者视劳工斗争为关键（以及双方都专制）：Tim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及 M. R. Stenson, *Repression and Revolt: The Origin of the 1948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9)。

- 15 对马共劳工政策造成阻碍的人士受到恫吓，3月以前就已发生，但是，有证据显示对付‘工痞’的政策，是团结巩固群众支持，以便在较后必然地走向武装斗争的方法的一部分。Memorandum on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24 November 1948, Commissioner-General's Office to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Ref 648/71/924, PRO: FO 371/69695, 第8附件，包括1948年7月审问在6月被捕的吡叻客籍马共成员的供词。文件称：‘为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马共）决定的第一件事是消除所有的反对者。任何人不支持马共的就是反马共，必须加以歼灭——就这样发生最近的屠杀。所有反对马共的都普遍被安上“工贼”。通过消灭反对势力，马共将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而民主政府就可以成立。’

他出身工人家庭，而当时澳洲的工运，他们的码头罢工，是很闻名的。他们的罢工可以坚持很久，如抵制荷兰船运以支援印尼的斗争。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

**利昂·康伯尔：**沙克基回去澳洲之后，有跟你们通信吗？或说你有没有跟他通信？

**陈平：**没有了。

**利昂·康伯尔：**没有再接触了。

**陈平：**那之后，再没有接触了。到了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就完全空白。完全没声音了。

**约翰·李尔利：**我激赏你一见面就接受一个不讲华语的人，一个像沙克基这样的欧洲人，来忠告你们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事，以及关于你们的前途。

**陈平：**不是给我们忠告，而是让他报告他对第二届大会的印象，就是在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上发生什么事，和他的印象。当然，他向我们作了汇报，而我们则作出结论，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接纳的议决是很激进的。他们没说要展开武装起义，只是侧重于乡村农民。我们于是就有这样的印象，这情况会变，迟早他们是会起义的。过后确实发生了，在德冷加纳（Telengana）州。<sup>16</sup> 第二项变动则是更换领导人。在位好长一段时间的佐西（P.C. Joshi）被撤换，

---

16 德冷加纳是海德拉巴（Hyderabad）尼占（Nizam）大君国的一个讲德鲁古（Telugu）语地区。该地反对强迫劳动和地主的斗争从1946年发展成为游击战，数千共产党人和农民活动家最后被杀或投入监狱。尼占大君的统治于1948年结束，印度军队接管，唯有关冲突一直持续到1951年。



选出新的领袖：拉纳狄夫（Ranadive）。<sup>17</sup>〔编者按：几位与会者指出路特·麦维伊（Ruth McVey）关于加尔各答大会的书不赞同这两项大会是同年东南亚革命的导因。<sup>18</sup>她在书中挑战英国保安单位在1948年末出现的说法，指责加尔各答大会导致暴乱。〕

利昂·康伯尔：让我从这儿倒退一年。我对国际，尤其是国外联系，或是你们本身曾经开过会之类的特别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从你到曼谷和香港谈起。首先，你会不会同意说你到这两个地方的主要目的是向他们汇报莱特卷逃党基金的事，并请他们帮忙找到莱特。或是说那只是你造访曼谷和香港的部分原因而已。因为，我相信在曼谷时——我是说这不一定正确，情报不一定准确——你出席了曼谷的泰国共产党的会议之类的。〔编者按：这时，利昂·康伯尔和陈平同意另一份有关陈平在1948年2月到曼谷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下一个录音带开始。陈平开始讲述他在1947年到香港和曼谷的原因。〕

陈平：有些写历史的人说我是去作一些深一层的调查。这不是百分百正确，部分正确而已。在他（莱特）失踪后，当天早上我们在安邦路开了个会。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还在。〔利昂·康伯尔：在吉隆坡附近〕。会议或许是在九点开。通常他都很准时。那天，直到九点半，他还没来。每个人都担心了。接着会议决定派我和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去调查，到他的家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家当时是在吉隆坡，他在吉隆坡的太太，住在鹅唛。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其实已经在怀疑他了。我怀疑他，另一个却没有，因此在路上，他说或许他可能被英国人绑架了。我说等着瞧吧。我有想法或许他已

---

17 拉纳狄夫早在1928年就加入印度共产党，到这个时候他是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8 Ruth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陈平与利昂·康伯尔摄于澳洲国立大学。

(卡尔·哈克 提供)

经逃走了，但是我不敢说。我们到了鹅唛。他的太太说‘他早就离开了’。接着，我们请他的太太向会议作汇报。路上，我们四周张望，找他的车子，看会不会是发生了意外。我们找不到他的车子。我们抵达会议现场时，他太太报告他离家的时间。一时间，大多数人说：他一定是被绑架了。看来我们的会议是在英国情报局的监视中。于是我们总结出继续开会很危险，必须散会，否则会被捕。我们只议决了一件事：成立调查小组，继续调查。

我被委任为调查小组主任，另有两名组员。两名组员中，我只记得一位，另一位我忘了。或许是杨果，或许不是杨果。因为我们已经制订了本身的计划，在我们揭露莱特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否则我们会被歼灭。我们三个人中，另两个都信任莱特，只有我怀疑他。在首一、两个星期内，没有展开任何调查。我决定，最好还是藏起来，不住在莱特知道的地方。因此，那时候，我们躲在甘榜巴汝（Kampong Bahru），吉隆坡地区的一个马来乡村。村子旁边有一些华人店屋。我们躲在那屋子一个星期，过后感觉到这么躲藏不太



好。如果我们继续藏身在一个地方，当然会被英国特务发现。我们已经达致结论：他是英国间谍，也是日本间谍。过后我们进行讨论，杨果最好还是回到他的岗位去。他的岗位是在槟城。那时他是槟城市委的州委书记。我留在吉隆坡。另两位不怀疑莱特的住在吉隆坡某处。过后，我召开会议，只是形式上。他们说很难找到他，也不知怎样找。我同意，但我继续往另一个方向调查。

很巧，从曼谷来的越南人也要联络莱特。通常联络必须经过我的手，他们得先联络我。那时，我意识到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东西，我充满信心。这之前，我不敢对他们说我有所怀疑。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这些越南人会不会去告诉莱特，他们都是越南人，所以我们不敢。在莱特失踪后，我们才敢告诉他们，告诉那些越南人说莱特失踪了。他失踪的原因，我们之中，有的说他被绑架，有的怀疑他隐瞒某些东西，或许是他在进行掩盖。

**彼德·爱德华兹：**可是，那时你们已经知道钱都被淘光了，不是吗？

**利昂·康伯尔：**那些钱可能收藏在那儿呢？

**陈平：**我们没有完好的系统。他要钱，可以从州财库那儿拿，没有财政的。我们可向州委，向州书记拿钱。唯有在他失踪后，在我们作出总结后，才开始对各州委进行调查。我们中委知道谁给了他若干钱，多多少少知道，但是从州委那儿，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调查之后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他控制某个数额的钱。当我告诉越南人时，他们马上告诉我，他们其实已经怀疑他了，但却不敢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从新加坡的越南社群那儿发现，在日据时期，他跟日军的接触非常密切，而他有两个妻子，越南籍妻子。他第一个太太的父亲是承包商，在越南人之间算是相当富有的。于是，我们马上就取得好些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就叫他们给我写一份报告，用越南文写，再翻译成华文或英文，我记不起了。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人懂得越南文，它应该是译成华文，以让大多数中委



能读得懂它的意思。凭着这个，我们想足够让我们写报告了，让我写报告呈给调查小组。他们马上就认同我的结论，我们就把在日据时代听到的故事连接起来和凑起来。我们首先向政治局会议汇报，然后呈到中委，最后到中央全体会议。在那次会议中——我想是在1947年5月月的某一天，因此，是在他失踪后仅仅两个月——我们已经总结和议决他是日本的间谍。在日据期间，他出卖了很多东西。我们决定把他开除出党。

接着我们选举新的总书记。我在那时中选。只有在那时候，我才出任总书记。〔利昂·康伯尔：那日期是什么时候，你大约记得吗？〕那时的大会是在1947年5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全体会议接纳议决，选我出任总书记。过后，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如何继续下去。为什么在我们的议决中没指他是英国人的间谍呢？

我们非常肯定他是，因为他已经是日本的间谍，我们揭开战前日本时期发生的事，每一次有人被捕，都跟他有关系。他每一次都逃脱，或是未现身，我们认定那都是他造成的。从越南那边的情报，我们得知他之前是越南党员，却突然消失无踪。

在早期，他们〔越南人〕来跟莱特接触，要求在财务上协助他们，他们要我们帮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有很多武器埋藏着，他们要用来进行战斗。他们也要组织义勇军去越南战斗。在较后的日子，越南派一组人到吉隆坡，他们以为我们会把一批藏在柔佛东海岸某处的武器给他们，至少有500件。〔彼德·爱得华兹：那是1947年〕是1946。那组人来了。我们给他们武器，用渔船，有粮食和清水，足够的粮食和清水去航行到越南南端的加茂（Ca Mau）。<sup>19</sup> 他们派出领航员，离开柔佛的东海岸之后，他们可航向加茂，他们当时的解放区。

他们来了，都是年青人，二十多三十位，莱特去见他们。这组人，我忘了是4个或5个。有个青年认得莱特，但他没有在莱特面前说

---

19 加茂半岛，在湄公河三角洲与西贡南，为越南的最南端。

出来。莱特认不得他。因为他会见莱特时，说自己当年还是个小女孩。莱特是在某个地区活动，我忘了那地名。不管怎样，那是在越南南方。然后他说他突然失踪，他没想到他会来到马来亚。他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扣住了这份报告。他们不要告诉莱特。只有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对他起疑，他们才告诉我们这故事，完整的故事。新加坡那儿发生什么事，他们从新加坡越南社群知道了些什么，以及那位青年回国后作了什么报告。在莱特失踪后，我叫他们试试找这位青年。但他已经回去越南，在前线那儿。后来，我们不再追踪这事了。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在他们动身离开前，他们从越南和曼谷听到消息。那地区被法国军攻击，战斗可能维持好几个月。因此，没有必要叫他们留下来等，叫他们回去曼谷那儿等。当局势平静之后，他们再来。时间将近一年。他们没有耐心等下去，就把那组人送回南越去。

利昂·康伯尔：那500件武器怎么样了？

陈平：我们没送出去。后来造反时我们拿来用。如果当时送出去，柔东，从丰盛港到边加兰就没有武器了。

陈剑：这些武器是不是要跟志愿人员一起去越南呢？

陈平：不。不可能！志愿人员得空手到越南去。英国人禁止这么做，政府不准许这么做。没有志愿人员可以到越南去。

利昂·康伯尔：那么，你在11月去曼谷的目的是什么，陈平，那是1947年吗？当你到了曼谷，有人接触你〔陈平：泰国人和越南人〕。泰国人和越南人。我可以问一问，你那时的目的何在？是尝试找出莱特在那儿吗？

陈平：我们作出议决，但议决没有指责莱特是英国特务。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基层中，有一些还狂热崇拜莱特。除非我们有一些证据，扎实的证据，否则不能服众。<sup>20</sup> 只是我们的推论，这个和那个。对那些崇拜者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得找新证据。那就是为什么我被派出去寻找，是否可以找到关于他的战前活动的新证据。我们知道他战前去过香港。

彼德·爱德华兹：你找到了什么证据呢？

陈平：没有什么可信服的铁证。在香港，人们告诉我们说从一开始他们已经采取保留的态度。我们问为什么。他们说他们请莱特讲他本身的故事时，莱特给他们的印象就是不太坦诚。因此，他们有一些保留。当然，莱特不敢告诉他们他替共产国际做事，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工作的谎言。那是他告诉我们的故事。他不敢告诉中国共产党。

利昂·康伯尔：有一份政治部的报告，指你陈平在曼谷的时候——我不知你在那儿住多久——我想那是你前往香港途中，你会见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们是用替中共拥有的《全民报》工作来掩饰身份。《全民报》听起来显然是曼谷的一家报纸。这情报正确吗？

---

20 讽刺性的是，莱特向日本人的出卖可能反而激升了他的地位，因为在这么多人被逮捕的情况下，他有本事四处行动可视为是勇敢和精灵，跟陈平的情形没两样。查伯曼记录道‘他和张红〔莱特跟136部队打交道用的名字。他也被称为“全权代表”，一直到1945年底136部队人员似乎没认出他就是战前的间谍莱特。〕是唯一两位可以平安抵达平原的华人’。Spencer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第352页;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dition), 第246-7页。



陈平：我在秘密地点会见泰国共产党领袖，但却在明处会见越南人。他们设立非正式的大使馆，没有升旗。泰国政府提供他们一幢大别墅，门口有人站岗，警察在看哨。〔彼德·爱德华兹：泰国警察〕。是泰国警察，他们进进出出。他们有大轿车，挂上越南旗。他们未受到正式的承认。他们非正式受大使馆的待遇，他们可以设立无线电跟河内通讯。我在那儿，跟他们住在一起。

彼德·爱德华兹：在国际阵线方面，你们跟缅甸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吗？

陈平：那个时候没有，哦，只有一次。在独立前，英国设立自治政府时，昂山是首相。而粮农部长是缅共领袖吴登佩（U Thien Pe）。<sup>21</sup>他来新加坡参加东南亚粮食大会，由基勒尔恩（Killearn）爵士主持。<sup>22</sup>他来到新加坡，来我们的党所寻找联系，遇到伍天旺，不是我或是莱特。我们有一些意见交流。过后，伍天旺作了报告。那是战后唯一的接触。

利昂·康伯尔：关于香港的那部分呢？曼谷之后，你住在香港会见中共代表连贯，或许跟他的太太，还有方方将军？

陈平：说来可话长。我怎么见到他真相是部小说。我在曼谷的唐人

---

21 原注：Thakin Thein Pe 又名 Thein Pe Myint。译注：吴登佩敏（U Thein Pe Myint）（1914-1978），缅甸作家。望濂人。原名登佩。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曾任《缅甸之光报》记者。1945至1946年曾任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后被开除党籍。1958年创办《先锋报》，任总编辑。后任缅甸作家协会主席。1952年曾到中国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22 1946-8年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负责协调区域的复苏和克服战后粮食危机。

街碰见他〔莱特〕，在跟耀华力（Yaowarat）路平行的大街：石龙军路（Thanon Charoen Krung，意为‘新路’）。我在那儿碰见他。我到达香港，他跟在我后面。过了几天，或是一个或两个星期，...，我记不清楚，或许康伯尔先生可以查一查《南华早报》...在我向中共作出报告有关莱特的事之后，他们叫我等。我想他们得向上头报告。我得等相当久。住在香港的酒店是很闷的。于是我看报纸，英文报，中文报，将近每一行字，包括广告，我都读，以便消磨时间。突然我发现有一栏是入境和离境的访客名单，从空路或海路来的，名字全在那儿。通常是今天的报纸刊登昨天的出、入境的名单。说明昨天，从曼谷抵达的旅客，搭什么航班。就在那儿，国泰太平洋班机有一名 C.H. Chang（莱特的别名之一）。因为我在曼谷碰见他，现在他到了这里，我意识到这家伙或许是跟踪我到香港，以制造麻烦。因为，你看，他的护照，C.H. Chang 是由我经手的。我替他搞护照，他用 C.H. Chang 这个名字。在抗日军协会里，当他中选为会长时，以及他跟 136 部队联络时，他采用 Chang Hong（张红）。因此，他只有一个 C, Chang Hong 可以是 C. Chang, H. Chang, C.H. Chang。他加了个 C 在 H 前面，所以 C.H. 是 Chang Hong，而 H. Chang 是 Hong Chang。〔这时，利昂·康伯尔要求陈剑把张红的中、英文名写在白板上。〕

于是，我即刻通知中共的人说这个家伙到了香港。几天过后，前政治部头子，姓黄的，在战前声名昭彰的那位〔其实他不是头子，但在被调往香港之前，却的确是属于马来亚政治部〕，他在吉隆坡抓了我们的好些人。那时，他调去香港，改了名字。在吉隆坡，他的名字是黄文宝。〔他是广东人，也称 Francis Wong〕。<sup>23</sup> 在香港，他改名黄崔威。他去找中共的人，说他们听说马共的领袖莱特已经到了香港，而中共的人假装不知道。两天后，莱特现身来见中共的代表。

---

23 编者感谢利昂·康尔伯作此解释。

他制造个新故事。他在参加会议那天被捕〔指他在1947年初本应出席马共中委会，却没有出席〕。他要出席会议，半路却被绑架，跟他的摩里斯·奥斯汀轿车一起被扣。他被关了一段日子，然后放逐到泰国去。现在，他从泰国来到香港，来通知中共这一切。中共的人问他：你的目的何在？他说：我会回去。三天后，我回去，途经泰国，到马来亚，因为在我被捕之后，党一定出现一些混乱。中共的人再问：你需要我们给什么帮忙吗？财务上或是旅行证件？他说他需要一些钱。这就是他的故事。在我完成跟中共的事务后，我乘飞机回到曼谷。

我回到曼谷，立即通知泰共和越南人加紧注意。可能他会回来，或是他已经身在曼谷。最积极找他的是越南人。那时候，他们越南社群在曼谷的组织非常好。他们马上设立...不是特务队吧...他们的半军事部队，属于地下性质的，到处去寻找。后来我们知道，他主动尝试接触越南人。不是经过那非正式的大使馆，那时候要接触越南人，还有一个越南新闻社。他去那儿联络他们，留言叫他们联络他。他住在旅馆，留下了房号。当越南人派人要去抓他时，他却已经退房离开了。显然，他离开是先要去接触泰共。因此，他离开时，他被泰国警察抓住了，因为他企图喊叫，被勒死了。〔彼德·爱德华兹：你是说泰国警察吗？〕。是泰共。他们尝试抓他。我现在忘了，或许我有对泰国人、越南人和香港的中国人说过：可能的话，试把他抓住，帮我们一个忙。泰人抓到他，勒死了他。他很弱，小个子。泰共派了三个人，都是壮汉，他们勒着他一段时间，窒息他。他当场死了。根据泰人说，他们只是把他放进〔利昂·康伯尔：麻布袋〕麻布袋里，然后丢进湄南河。

杨进发：那是什么日子呢？

陈平：我记不起。简单地说，那事完成后，我问结果如何。泰共告诉我：你不用担心。你回去告诉同志们，他已经受到最后的判决。



众人：他们是有意要杀他的吗？或那只是意外？

陈平：没有意图要杀他。那是意外。有些人说难以置信，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突然，三个壮汉出现要抓他。当然他尝试喊叫，挣扎。因为那是在闹市，有商店，有邻人。如果邻人发现了，可能报警。他们经验不足啊。<sup>24</sup>

众人：你知道那街名吗？

陈平：不，我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他们没告诉我，只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些被派去抓他的人泄漏了这个故事。

杨进发：就为了历史来说，我想对于你的报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在什么时候被接纳和通过呢？是1947年，或是1948年？文件的翻译本，英文本，The Wright Document〔《莱特文件》〕是在1948年5月出现的。

陈平：对的。我回来之后，向中委作了汇报。不只是对政治局，也对中委会报告。那非常重要。结果如何呢？我作了一份报告，下来我们就决定如何向基层传达。中委会里有两个人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据时期，他们被捕，变节，然后还是回来党。那时候，我们有一条政策，在中委未被捕前的中委会议上通过接纳的。那并不是莱特的个人看法。那些被捕后变节的，他们可以回来。我们鼓励他们去立功，然后回来。比如，他们可协助歼灭更多的反动分子，或效忠日本的人，杀掉他们。或是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动手去杀。那么他们可以回来，我们接受他们。或是

---

24 参阅 Chin peng,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r,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the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第190页。

他们回来时带回一把手枪。如果我们认为他立了功，他们可以回来。但不接受他们回来作党员，遑论升任党领导人物。这两个家伙，之前是森美兰芙蓉的州书记。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日本人抓了，变节，过后他们尝试要回来。其中一个杀了一个叛徒，另一个我忘了他立了什么功。过后，他们回来，莱特庇护他们，替他们掩盖，把他们调去另一个州，但却不告诉他们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说他们碰巧被捕，然后出来了。

你们得记得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一些干部，被捕和被监禁一段日子后，被放出来。但他们很可靠。因为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们被捕后有叛党。譬如说吉隆坡的刘尧。他一度被捕。然后他尝试逃狱。日本人送他去劳作。在日本的守卫有点疏时，他成功逃脱，再回来参加抗日军。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说他叛党。因此，他回来之后，继续保留总部党员身份，较后擢升任雪兰莪政委〔以及再过后成为抗日军中央军委三名委员之一〕。

这两个回来后，一个派去吡叻，另一个派去彭亨，过后日本投降了，我们开会选新的中委会。新的中委会名单由莱特所建议的。这两个人在名单里。当然莱特建议的人都中选。这两个，不只没降职，相反的还擢升。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只有森美兰的代表在会后发出怨言，但不敢公开说。他向另一个人诉不平，这另一个人刚好跟我相当亲密，就告诉我关于那两个人以前在森美兰变节的事。

**原不二夫：**其中一个黄国平吗？

**陈平：**不是，黄国平是跟我们的。那是阿三和另外一个叫阿里的〔陈平跟陈剑讨论阿里的常用名，为罗须磨，中英文名写上白板〕又名罗须磨。

**原不二夫：**他是不是高克平？

**陈平：**不是，高克平非常忠于日本宪兵。日本投降前夕。他被我们

干掉了。他是马六甲州书记。

**彼德·爱德华兹：**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或许得加速讨论这个主题。利昂有个简短的问题。

**利昂·康伯尔：**这是东尼的书中提到的。<sup>25</sup> 陈平，你从香港带回了某些信息，似乎是周恩来发出的。

**陈平：**我现在无法确定那是不是来自周恩来。我只能说有一个来自香港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不是来自周恩来我就不敢说。那个意见其实没有鼓励我们去发动武装斗争。没有！

**安东尼·索尔德：**所以，大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因素触发了它？党一片混乱。你们正失掉你们的前同志会，因为它不再激进了。因为新的立法，你们在工会里将面对麻烦。因此，为了使党保持完整，如果我是总书记，我将采取一些相当激烈的作法，如发动造反，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你在伦敦曾说到有计划在9月造反。当你在电视节目中表达的时候，以及我想也是我对你今天较早谈话的理解，那也是一种回应行动。但是假设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去触动这个反应。你们会不会依然继续发动造反呢？

**陈平：**不会！那时候，我们想到罢工。我们如何发动罢工呢？因为我们发动了很多次罢工，但每一次都失败。或是被警察镇压，或是没有基金继续下去。于是我们讨论是否可以采取某些形式的暴力去对付工痞。在那个会议中，如果不是沙克基在那儿给我们提供意见，我们不会采取干掉工痞的手段。但因为他介绍这么做，我们没

---

25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第44页。这张便条据说指大环境有利革命及适合造反，但是周恩来不懂得马来亚当地的情况，所以无法具体地说出武装斗争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问题。因为中央会分成两组意见，一组行，一组不行。过后，我们接纳了，可以用暴力来支援罢工，来让罢工继续下去。过后，政府当然会反应。用新的讲法来说，就是我们升级，政府也升级。

**安东尼·索尔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你想是不是双方都未去计划让它发生，它却是发生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和马共似乎是在相互对抗的行动中跌跌绊绊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因素引发的，它一旦开始，你们实际上希望做些什么呢？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知道这些的某些部分会延续到明天关于马共策略及剿乱的讨论，但是你的计划是什么呢？而我特别是想到大战略，以及手法。你谈到要攻打熏房如何的困难，因为防卫良好。但是，你们本可以杀死更多更多的种植人和矿家的。那是你们想法的一部分吗，以为欧籍资本家会真的放弃？留下园坵，留下矿场，那就是你们天大的机会了？

**陈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时候，在紧急状态以前，我们预期英国人的进攻会升级，达到封闭工会，禁止党，或变相查禁的程度。我们预期那会发生。因为我们罢工时采用暴力，带进了暴力，政府当然要反应。过后，或许他们最后会查禁我们的党，或是依据那部立法〔1948年5月31日职工会法令修正法案〕，假使它被殖民地立法议会通过的话。在旧殖民地时代，立法议会也只是个胶印。那如果发生的话，立法将生效，我们的工会就会被查禁和完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把那当成是全面的进攻。<sup>26</sup>如果他们禁止我们的工会，或用其他的方法使我们的工会瘫痪，或他们公然查封我们的党和抓我们。那么，如何回应呢？最后的一着，我们唯有发动武装斗争。

---

26 5月30日职工会法令修正案限制单一行业者组工会，并限制在相关行业有经验者方可任领袖。政府于6月13日宣布总工会和联合总工会为非法。

安东尼·索尔德：可是《民声报》在6月初已经谈着武装斗争。<sup>27</sup>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陈平：那是在准备公众舆论。那时候的局势已经绷得相当紧。同时在那时候我们估计，政府最早在9月展开攻击，最早，或许会再迟几个月，我们没有说会是多少个月之后。因此，我们得准备好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的核心在9月前准备好。不是在9月前武装起义，而是在9月前作好准备。当全面攻击发生时，我们能够应付。我们的计划是在每一个州都成立，视他们的能力，只要能够支持他们的自己。我指的是财务上。如果州可以自我维持，可以成立两大队。否则，就至少成立一个大队为某种核心。到时我们就能即刻扩展它，发动武装斗争。

安东尼·索尔德：那说，对于武装斗争本身，你设想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假使你有时间好好准备的话？就这方面而言，和丰的谋杀应该是个糟透的错误，因为它引发了政府的还击，比你们想像的快〔陈平：对，确是如此〕。如果你们有时间准备好在9月开始的武装斗争〔陈平：它可能在9月发生〕你会做些什么呢？会有更完善的计划吗？另外一个附加问题：你们本来可以杀掉那么多的欧籍官员，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为什么没有城市恐怖政击？为什么没有像巴勒斯坦那样的长枪党？

陈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根据日治时期的经验。游击战是最好的

---

27 《民声报》为马共喉舌，先由马共外围人士任社长，于1946年6月1日正式由马共接管，由马共吉隆坡公开党代表，牙买加出生的欧华混血儿刘一帆任社长，直到他在1948年6月9日被捕为止。Short在*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提到6月15日的社论，唯没有进一步细节。6月15日的突击逮捕中，警方再逮捕20名职员。马共起初尝试变卖，过后把部分机器移进森林中去。

形式。为什么我们没有周详计划，只有个很大略的想法，没有作出计划。我们计划在9月前开会。我们的最后一次中委会会议是在5月。会议后我去吡叻，因为我们缺钱，要从那儿拿钱。我去了吡叻。杨果则到槟城去向家人告别，因为，我们计划在7月或8月再开一次会。所以，6月时，我们北上，我差点在吡叻被捕，杨果也差一点在槟城被捕。

谢文庆：我想你说过有作好一些准备，因为你说已经有了‘秘密军队’。你们藏起136部队给你们的枪支。那是准备未来发生的事，因此，你们应该已经知道那些地点在那里了，就只剩下动员的时间了。

陈平：对！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总动员，只是局部而已，建立几个大队，作好准备，时间一到，就全部挖掘出来。

彼德·朋斯：为什么你们会相信英国人不会在9月前采取行动？

陈平：这也是英国广播电台问的问题。现在，回头想，我想我们非常缺乏经验。那时，我们都非常年青。为什么我们不会想到，就算是没有三位种植人的事件，英国人也会突然发动攻击的。因为当你进行武装时，这已经是非常挑衅的步骤。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用这个借口来打你的。

安东尼·索尔德：得作出这样的决定，进行武斗争，真的是遭透了啊！不应该是你们所要干的——我是说即使自己的生命置于危境，党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但却是完全没有计划方案。

陈平：我们有一个大略的计划方案。如果展开武装斗争，我们会以彭亨作为总部。我们会解放吉兰丹的一些地区。是非常粗略的想法。



利昂·康伯尔：那是把毛泽东的战略用在马来亚。

陈平：对。

杨进发：那时候，你们想斗争会维持多久？20年吗？或是更长？

陈平：我们的决定是武装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但要多长的时间？对我来说，我想或许是十年。但总体上，有些人很乐观。他们说以前我们打日本人才三年半，现在或许还要短。这是一些老战士的看法。我听他们的看法。我说，每个人都可以明确发言。就是那么回事。

约翰·李尔利：对于秘密军队是否会响应，及他们会不会太老，或过度生锈而没有太大的作为，你的信心如何呢？

陈平：他们之中只有很少会太老。这些年纪太大的，就算他们要加入，我们也说服他们别参加。他们可留在村子里活动。

大卫·马尔：随着莱特失踪之后，你们肯定你们能掌控全国各地的各个单位吗？

陈平：我们当时非常有信心能争取到人民，前抗日军，包括秘密和公开两军。我们非常有信心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跟我们。

大卫·马尔：虽然那时莱特失踪，而你们必须解释他是个叛徒？

陈平：不错。

安东尼·索尔德：但事实难道不是他们之中只有很少人有响应吗？

陈平：我们没有统计数据。我们未曾作过调查。

安东尼·索尔德：我只是想知道，一旦展开之后，如果没有太多老抗日军响应，你会不会失望呢？

陈平：那个时候我们没感觉到那样。人人都非常振奋。好大百分比没有跟我们，那是真的。有多少人则我不能确定。

安东尼·索尔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革命爆发是因为局势日益变好，或是日益在变坏。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就业率开始上升，没有战后那些饥饿和必需品匮乏。也许，在1948年时，人们不是有太高的革命情绪。

陈平：我们在日据时期有这么样的经验。当我们刚刚开始时，局势并不是很有利。但那时候，虽然人民全都反日，痛恨他们的屠杀，但在另一方面却有点害怕。

起初人们有点害怕。我们开始时，开始时人民要战斗。他们痛恨日本人，要杀他们。我不是指普通的日本人民，是日本军队〔笑声〕。但是他们却对我们是否能打赢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开始打日本人，他们就会反击。他们有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反击的话，我们如何去保护他们？他们知道我们势力还弱。我们只有很少武器，其中一些是相当落后的。因此，以当时的局势，你可以说那不是革命的局势。可是，当我们展开之后，他们才慢慢加进来，他们比较有信心了。他们于是说，我们能够维持这场斗争。就算是我被日本人杀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有人会替我们报仇的。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经过考验的案例。当我们号召党员参加越南战争的志愿军时，那是外国，有超过千人申请。因此，我们相当有信心大多数的前抗日军会跟我们。

彼德·爱德华兹：时间所剩不多。我们的对话明天肯定会接下去。

有谁要提出最后一点既深刻及切题的简述呢？

**卡尔·哈克：**这是东尼（安东尼·索尔德）的研究范围。你执行 1951 年 10 月议决或是决定，你怎么叫它都无妨。然后，在 1952 和 1953 年，你们转移到金马仑，再于 1953 至 1954 年转移到泰国的勿洞。我非常想知道的是：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你们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你们是要到勿洞去，或是你们有否想过金马仑可以成为新的主要根据地呢？或可能是一个解放区。以当时的情况，你是在什么时刻决定要、如果你要用这么个词的话，‘长征’？

**陈平：**我将在明天回答这项课题。我要回到关于双方都未作准备的讨论。我们这一方，我承认是这样。至于英国人那边，我怀疑，因他他们经验老到。

**安东尼·索尔德：**可是，开始时他们也不太确定那是一场共产党叛乱，政府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查封马共。

**陈平：**对。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他们聪明的伎俩，政治上他们取得了主动，却把责任推给我们。我们开始了，他们很被动，甚至表现到毫无经验的地步，他们的情报局似乎是奇差无比，他们的政治部无所事事。我不相信那一切。我想英国情报局是相当精明的。

**谢文庆：**我想在三名欧籍种植人被打死后，他们得采取行动。

**陈平：**对的。我读到一份现在已经解禁的文献。<sup>28</sup> 他们建议查禁

---

28 陈平本身去过位于憩幽园的英国公共档案局。许多会见他的人也给了他不少的资料。



马共。那时候的劳工部长，殖民地大臣有所迟疑，他们对此有某种保留。我想伦敦从某些利益集团那儿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些代表园主、矿主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施加很沉重的压力。<sup>29</sup>

约翰·李尔利：你是否曾经有把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对紧急状态政策的不同当作一项考虑？你是不是认为工党政府不会象保守党政府那样残酷？

陈平：只有在我看过那份文献之后，我才意识到有某种手法的差异，如何对付共产党。我第一次认识到是读谢文庆的书 *Red Star Over Malaya*。你引述蒙巴登在战争甫结束时对马共的评价。蒙巴登视马共的效忠对象是马来亚，而国民党则是效忠中国。因此，蒙巴登是正面看待马共的。

第一天下午场结束。第一天对话结束。

---

29 这些辩论和讨论记载于 Stockwell, *A Widespread and Long-concocted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in Malaya?*,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3 (September 1993), 第 66-88 页；and Nicholas White,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Malaya, 1942-195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第七场对话

#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游击战 及英国的剿乱策略： 为何输了这场战争？

第二天上午场开始

约翰·顾德斯：我是不是可以提出两道问题来作为开始，两道题都是很笼统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马共的观点，在那些年之中，何时是高峰？第二题较长：你们是不是输掉了这场战争？或是马来亚政府和保安部队有没有赢得这场战争？两道都是相当笼统的问题。也许先让你有机会笼统地谈，我们再加入我们各别的提问。

陈平：我想高峰是在1949-50年。战争开始后的首半年中，大多数的时间是专注在重新动员我们的部队和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武器，到了那年年底，我们完成了部队重新武装的过程。1949年起，在我们举行了中委会议后，我们开始按照总计划展开进攻。总计划是争取主动开展全面攻击。那时候，我们设想解放吉兰丹的南部。于是，我们在北部成立了约500人的大队。我忘了准确数目，约五到六百人。那就是说集中在金马仑的主力部队向东挺进，尝试解放话望生。<sup>1</sup>





1949年马共尝试解放南吉兰丹。  
卡尔·哈克



保安部队照片，鉴定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部队在1948年穿越过胶林。  
(利昂·康伯尔 提供)



战死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雪兰莪双溪威最早期交火的其中一次战斗中，七名游击队员被打死。他们的尸体被带到吉隆坡谐街中央警署的庭院供辨认。在这场行动中，一名英军战死，另一名受伤。

(利昂·康伯尔 提供)

占领话望生的第一场战役并不按照我们的计划。〔1948年6月〕紧急状态之后的第一场战斗，我们驻扎在话望生附近埔莱村的部队，发动攻击和占领了话望生，向南挺进到吉兰丹和彭亨交接地带

---

1 话望生，Gua Musang，吉兰丹南部县区及小镇，处于中央山脊山峦和森林的边沿。话望生接近彭亨边界，即今为国家公园和西马半岛第一高峰大汉山（超过2,000米或7,186英尺）。就此而言，话望生给游击队提供相当高的期望。在这样的河流上游荒山野岭区，该地有相对高比例的华人人口。1948年，这儿是火车铁道的终站（今天的火车则是由西南的金马士，经此，贯穿东北到哥打巴汝）。话望生是日据时期的一个抗日军重要据点。



的马拉坡 (Merapoh)。<sup>2</sup> 过后英军展开反攻。他们派出飞机，轰炸机，进行轰炸，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那个连队的司令，他是个少校，乘着吉普车率先进入，增援部队跟在他后面。那时，我们已经在马拉坡的附近布署好伏击。我们杀死那少校和几个随行兵士，<sup>3</sup> 逼使他们撤退。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彼此互相协调的空、陆联合进攻。以前，当我们打日本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他们立即召来飞机，因为我们开了火，阵地暴露了。于是，下一轮，他们出动两、三架轰炸机，对我们的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我们被迫撤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阵地所在。最后，他们重占话望生，在飞机的掩护下，再向埔莱村挺进。于是，很快的，约在三天内，他们收复了话望生。那是当地的主动出击，并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

1949年，我们的计划是集中我们的一连部队，尝试再解放这个地区，重夺话望生和埔莱。我们预计有足够能力控制广大的乡区。如果英军反攻，他们最多可以收复话望生。另一方面，在南部，我们在柔佛的主力部队受指示向北挺进，进入彭亨，尝试配合吉兰丹的战事。如果英军向我们吉兰丹的部队展开进攻，柔佛的部队就对彭南展开攻击来转移〔敌军〕。可能的话，他们得试试解放几个像直凉等接近彭亨、森美兰交界的小镇。如果可能，他们可解放这几个

---

2 埔莱村于话望生南部十英里处，靠近吉兰丹——彭亨边界。村子偏远，当地人民因此以为马共军势强大。似乎连埔莱村村长都支持抗英军。1948年8月，英国人烧毁整个村庄。参阅 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 第103页；及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73页。

3 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第102-4页，提供英方关于这场攻击的说法，包括在1948年7月初该少校之死和使用轰炸机。话望生战斗中，一些警察，还有埔莱村的华人村长，向马共部队投降，他们各获得20元和一杯咖啡，话望生被占领共5天。



小镇及切断铁路交通。<sup>4</sup>

但是，这只是很粗略的计划。付诸行动时，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出现种种出乎意料的事。首先，在吉兰丹，我们成功集合了我们的部队，但却在等待敌人攻击我们。很快的，英军获知我们在那儿集中。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或了解我们的目的，但至少他们知道有大部队在那儿集合。他们采取主动，展开攻击。首先，进入村子，他们派兵，率加兵进入话望生周围的村子。因为我们集中了大部队，而他们已经采取了主动，我们就不再能够展开突击了。于是，我们得等待适当时机以展开伏击，伏击来攻的部队。但却很难找到易于进攻的目标，因为他们是大队行军。他们没有分散他们的部队。他们什么时候小队行军，我们得等待，但那需要时间。

时间拖下去，我们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依靠原住民支援。我们把超过500人集在一个地区，吃完了他们的木薯，他们的主粮。接着我们被迫分散，因为我们无法维持下去。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只得回到吡叻去。因为粮食不足，我们相当苦。

在南部，从柔佛来，有约500人的部队行军上来，移向彭亨。当我们抵达彭亨时，我们面对一些内部问题〔利昂·康尔伯：蓝瑞〕，对，蓝瑞。过后士气很低。于是我们得先解决这个问题。在好一段时间里...我想不需要进入细节，...，它花去了约一或两个月的时间。<sup>5</sup>

---

4 铁道在西南部的金马士分叉，一支沿西海岸，另一支向东北，对角跨过马来亚，到哥打巴汝。

5 蓝瑞事件是更大的批党‘柔南事件’的一部分。在1949至1950年，马共中央受到几个方面的严厉批评。小刘，为一名前教师，是柔佛和马六甲边界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他提出马共误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没有提出重新分配土地来争取农民，以及应该放弃武装斗争。中央几度试图限制其批判，唯失败，最后，他在1951年初被杀。蓝瑞为前职工领袖，当时任柔南区委，也对中央作出批判。其中，他的批判导致党中央在1950年1月编纂了两本小册，取名‘柔南事件’。蓝瑞被开除出党，并被指为前内奸。他在1950年6月投降，写了破坏性极大的《我的控诉》，政府在1951年大量印刷分派。

北方，我们未收到他们进攻的任何消息。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无线电通讯。我想通讯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弱点。于是，当时一直收不到任何消息，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改变为展开转移战。由于 500 人的部队已经到了彭亨，怎么利用这个部队呢？所以，第一阶段，解放部分吉兰丹的计划已经失败了。我们接着决定要利用这个部队，同时也向全马各地的部队发出指示，展开我们所说的小规模进攻。

约翰·顾德斯：那也是你们进行重新训练的原因吗？<sup>6</sup>

陈平：不，是因为在其他地区，我们要长时期，譬如说一个月，集中 500 人的部队相当困难。我们无法解决粮食的问题，以及后勤布署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营的大部队，当然，在正规战里，一营是很小的军力。对于 500 人的大队，如果没有短期内可攻击的目标，我们就得把它分散成小队。小队比较容易掌控，后勤供应也容易。

那个计划失败后，我们在全国发动小规模攻击。我想那是从 1949 年 6 月开始。党中央接纳发动用一连或一排军力的小规模进攻的议决。这维持到 1950 年和 1951 年。这段期间我们很成功。英军的所谓‘剿匪月’宣告失败。<sup>7</sup>

约翰·顾德斯：他们本来抱着很大的寄望，认定那肯定不会失败。事实上，他们对你们的了解不够深。

---

6 1949 年初，马共进行重组，尤其是针对其民运群众组织。这时，叛乱活动在下降。

7 ‘剿匪月’从 1950 年 2 月 26 日起，至 4 月 2 日。政府召募数千人协助设立路障，检查站和其他活动，唯成效有限。于此同时，马共也在那时增加他们的活动。

约翰·李尔利：谁控制你所集中的那 500 人？

陈平：是一位叫老马的中委。老马是花名，真名是嘉信。<sup>8</sup> 在日据时期，他是〔吡叻〕副州委书记，我是州委书记。

利昂·康尔伯：你是说老马和嘉信是同一个人？

陈平：对，我们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叫老马。

利昂·康尔伯：1948 年 6 月紧急状态开始时，民族解放军的军力如何？

陈平：起初我们称为抗英军，但不是统一的名称，有些地方称为民族解放军。在日据时期，我们有计划要把抗日军改称为民族解放军。于是，一些人建议改成民族解放军，一些人则说日据时期是抗日军，现在应该是抗英军。〔1949 年〕2 月初，我党中委开会，决定采用统一名称：民族解放军。我想他们把 National（民族）翻译成 Race（种族）。

利昂·康尔伯：哪一个才正确？

陈平：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MNLA〔民族解放军〕。

利昂·康尔伯：不是当时所用的 MRLA（Malayan Race Liberation

---

8 老马属吡叻第 5 中队，在 1948-9 年如所述的来回吡叻与吉兰丹之间。他在 1949 年 12 月被武装部队杀害。Short,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作者，是少数注意到这儿所叙述的共产党活动的历史家之一位。可是，从保安部队的观点，这一点和从彭亨的转移看来并不是总计划的一部分。参阅第 109 页。他也提出，跟中国不同，政府对这种‘解放区’的增援部队，只需几天，不是几个星期。



Army)。把‘民族’译作 Race，很差的译法。你的战斗部队军力在早期有多大？

陈平：总动员之后，正如我昨天所说的，在紧急状态前，我们在大多数州成立了核心部队。其实我们在丁加奴很弱。那儿的武器，主要的埋藏点被政府破获，因此，我们失掉了在那儿的武器。每个州我们成立一个排，或最多两个排。在紧急状态之前，最多我们只成功成立五或六个排。柔佛有两个排，彭亨我不太肯定。雪兰莪或许只有一个排，吡叻成立两个排，在吉打成立一个。紧急状态之后，中委未发出指示，每一个州都主动进行动员。那时我们的中央指挥线已经瘫痪，因为我们都分散到各处了。我是在吡叻，我们的第二号人物在雪兰莪，其他的，有的在彭亨，有的在柔佛。按照计划，本应该在 8 月某个日期举行中委会议的。当英人突然进行攻击时，我们中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散居各地。我们甚至无法召集会议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局势。

可是，每一个州都遵循我们的 5 月决定，我们预计政府最早在 9 月展开全面进攻。应对方案是，如果那情形发生，我们将全面动员我们的人。于是，每个州的按照那个方案，采取主动，挖出武器。到了 1948 年底，我们已经全面动员，大约是 3,000 人。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可以问一下你们是从那里取得弹药吗？

陈平：我们在战后，在抗日军复员之前埋藏的。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你们没用完吗？你们有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吗？

陈平：没有，没问题。但这显示我们的一个弱点，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外援，外来的资助。有人怀疑我们从其他国家，如中国或其他国家，取得一些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连一颗子弹都没有。

安东尼·索尔德：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顾德斯的主要问题，因为，我想我们所尝试要建立的，隐约地，是在解放军的立足点中，有没有离成功就只是咫尺之遥的。如果有，那可能是在那一年呢？在什么样的局势下这种情况会出现？或许是在1950年初中国领事抵达而带来的威胁吧？<sup>9</sup> 英国人肯定对这个非常担忧。或者那是在葛尼死了之后？你想是不是有哪一个点，只要在其他方面再作出一些更大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这个珍贵的机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陈平：我想并没有什么机会我们能够成功。没有外国援助，就算是我们把军力扩大到10,000人这个我们所能做到的最高极限，也是无法打败英军的。在紧急状态的最高潮期，我们的估计是——由于没有完善的通讯，所以没有正确的统计——因此，我们之间有不同的估计数目。我的估计是在紧急状态的最高峰时期，我们有5,000人。我的一位同志的估计是在1951年紧急状态的最高峰期有8,000人。所以，数目差距在5,000至8,000之间。

安东尼·索尔德：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想是没有成功的机会，那是在参加一项必败的事业。或许，你是否希望会发生什么事的呢？

陈平：因为当我们失掉解放某个地区的机会之后，所能做的最多就是继续进行游击战。我们使用普通的游击战略，小规模攻击，遍及全国。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做，我们只能够打击敌人，但却无法打败他们。我们无法打败他们。我想，我们的战略是按照毛泽东的理论。

---

9 虽然马来亚政府反对，英国政府在1950年1月，基于更广泛外交政策的理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不是因为韩战的介入，有人相信这项建交可能容许中共派领事驻马，因而进一步鼓励马共。

**安东尼·索尔德：**持久战。

**陈平：**持久战。不只是持久战。我们还得设立游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没有根据地就不能赢得战争。根据地就是说我们得解放某些地区。那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要利用泰国的南部。

**李察·史塔布斯：**你是说那个时候你从未感觉到有机会取得胜利？或是在说事后回想，现在回头想，根本没有任何时刻是你可以打赢的。

**陈平：**事后回想。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尝试，反复地思考。或许，我们解放任何一个地区的最佳机会不是在市镇或村子，因为马来亚是个太小的国家，而交通系统发展得很完善。我们的对手却拥有现代化器材，可以派部队到任何地点，甚至进入村子，因为所有的村子都相当靠近大路，靠近交通线。显然的，中国是个大国，乡区广阔，非常广阔。如果你要进去，得用两只脚走。那时，国民党军队一点灵活性都没有。他们无法派遣军队，无法空投他们的部队。他们无法派出直升机，他们没有直升机。他们甚至无法用卡车载送军队，因为都是乡区，只能靠走，没有其他方法。可是，在我们的情况，在马来亚，从任何一个点，在东海岸或西海岸，都有发展完善的公路系统。因此就能派遣部队，英军，从他们的军营，仅几个小时路程就可到达任何一个点。再下来是走路进入村庄的时间，最多是一天。

**李察·史塔布斯：**那么，你们继续打游击，想维持持久战，期望会发生一些事，而所发生的事将促使英人决定离开，是吗？

**陈平：**昨天有人提起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决定，事实上是不是可以试试设立两个森林基地。我们称为依赖原住民的森林基地。一个设



在彭亨，在彭亨北部立卑附近，在劳勿和金马仑之间。<sup>10</sup> 另一个是在彭亨南部，在〔约翰·顾德斯：伯拉湖（Tasik Bera）〕伯拉湖。<sup>11</sup>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发现彭北无法设立那个基地。

**安东尼·索尔德：**如果你能让我在这儿打岔。那是1951年，你们正从人口较多的地区撤离。只要你们跟民众有接触，取得华族农民的支持，还有有机会成功的。在这个时刻，我想我们得注意到英国的政策已经作了怎样的改变，平乱政策，特别是把华人农民重新安置到新村去。你们是否有假设过，英国人绝没有能力去负起这么大规模的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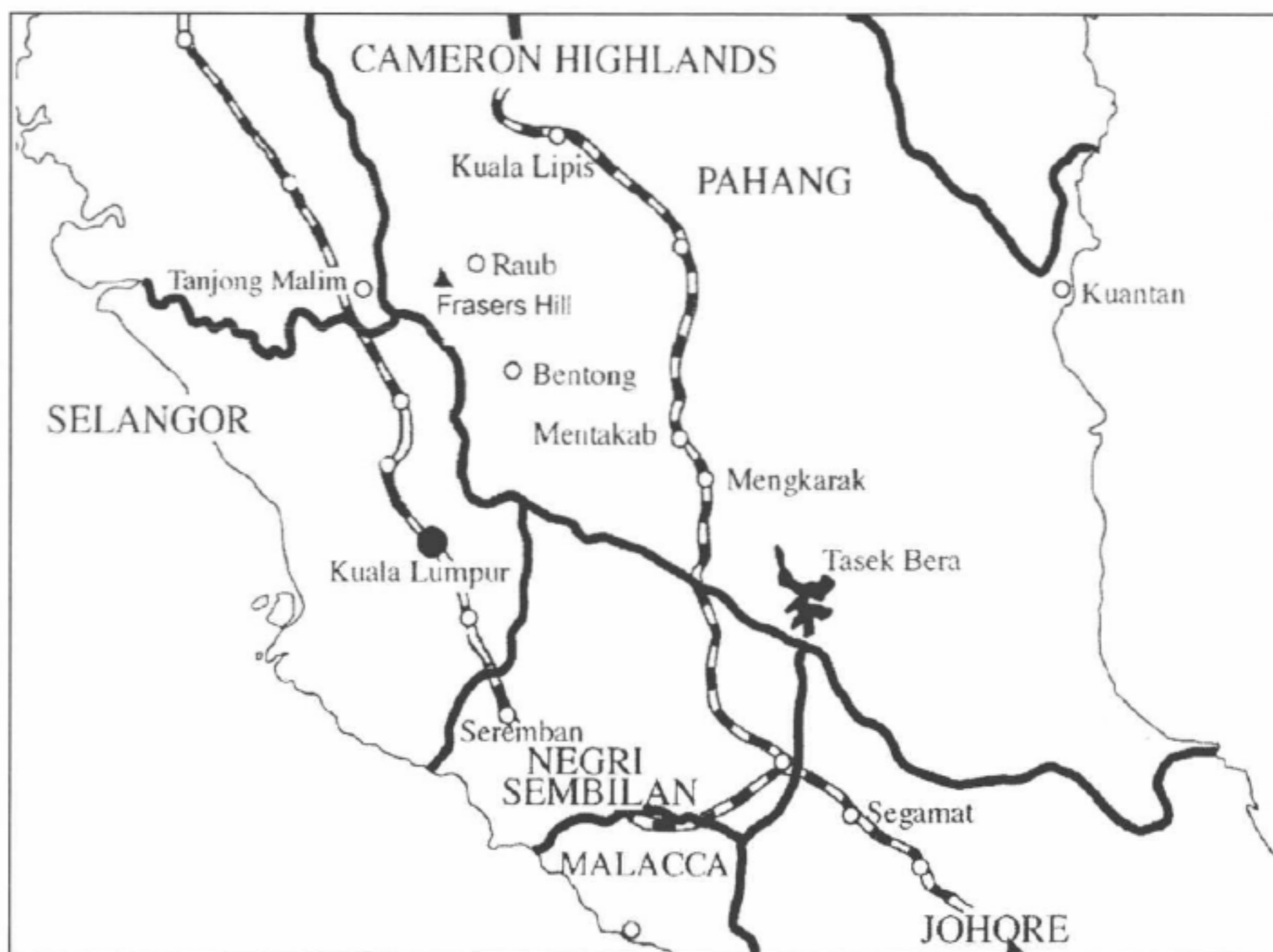
**陈平：**我们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动员人民、群众、农民去抗拒搬迁，英国人〔设立新村〕就会成功。于是，我们发出指示给农民，抗拒搬迁。〔编者按：1950年8月政治局发出的指示‘反搬迁运动指南’〕<sup>12</sup> 但那不可能。我们发现那太乐观了，因为人民不能反抗。英国人不告诉你他们什么时候来。他们突然来到，包围村庄，强迫村民搬。军队搬掉你的东西，不管你同意与否，他们强迫你，强迫性帮助你搬。如果你坐住不动，他们把你所有的家产搬走。不是全部，只是他们认为必需的。然后他们强迫人们离开。一些人还是反抗，不走。

---

10 劳勿，位于西彭，靠近福隆港，约在吉隆坡和金马仑的中间。立卑则比劳勿更深入内陆。虽然是同属彭亨州，两地却由整百英里的森林隔开。

11 伯拉湖，Tasik Bera，西马半岛最大天然淡水湖，位于西马中央山脉及丛林之南。还有靠近原住民部落之优势。

12 参阅 John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Unpublished D. Phil,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3), 第 167ff 页。Coe 访问多名前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关于这份指南，在现有文献著作中罕有提及，几乎不存在。



1950年至1951年在彭亨的活动。卡尔·哈克档案

约翰·顾德斯：尽管是搬了，村子里还是有你的人，陈平，不是吗？

陈平：对。

约翰·顾德斯：那应该是众多事情中一件告慰的事。你们至少可以知道村子里发生什么事。

陈平：我们无法叫人民整天、或整个月保持警戒。我们不知道军队什么时候会来到。通常他们清晨到。人们得出去工作，不能留在家中。

安东尼·索尔德：你是否认为那是英国人所采取的最有效行动？

陈平：他们迫你走，烧掉你的房屋。如果你要反抗，留在屋里，他



典型的特别警卫亭，用沙包，设在橡校园进口处。

(利昂·康伯尔 提供)

们可不管，把你一起烧了。有人留在屋子里，不要搬，虽然他们搬掉了所有的家产。而英国人，他们有命令，可以放火烧，强迫你离开。如果你不搬，可能会被烧，活活烧死。

**李察·史塔布斯：**他们散居，或是在新居地，有不同吗？如果他们支持你和你的党。有什么不同呢？

**陈平：**不，他们最后成功强迫人们搬迁。起初，我们估计可以动员人民不要搬。因此，还有希望可以击败那项计划。可是当我们获知政府是采取这样的伎俩，就不行了。我们不能叫人民为这个而失掉性命。





‘你正进入到马六甲州的白区’。绝大多数被重新安置的人们在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12 月的 18 个月中搬迁到新村。从 1952 年起，政府增加学校，民众会堂之类的设施，及安排红十字会的造访，以及在村子周围发动军事活动时加紧控制。1953 年，‘白区’计划推出，承诺在某个地区被宣布为没有严重的反叛活动时放松戒严和粮食控制。

(利昂·康伯尔 提供)

卡尔·哈克：我可以用另一种问法吗？一旦人们在新居地安居下来，你可说一说你想初步地位怎么样？我想他们，李察·史塔布斯和安东尼·索尔德所指的，可能所指的是：他们重新定居下来后，你还是能进去和拿到粮食等之类的？还是它相当快速地影响你们的情报和供应呢？

陈平：是。当我们破坏搬迁的指示失败后，发出另一项关于依靠群

从的指示，那是1951年指示〔安东尼·索尔德：10月指示〕<sup>13</sup>的要旨。

杨进发：是不是该问问陈平，是否可以确定或是否定，葛尼事件，即是他在邓普勒到来之前被杀，是不是马共运动的高峰？就国内、外的冲击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葛尼不去，邓普勒可能不会来。

〔亨利·葛尼（Henry Gurney）爵士，马来亚1948-51年最高专员，于1951年10月6日，随车队上福隆港途中，在森林边的狭路被解放军的一个部队伏击，被打死。结果，邓普勒被委派‘至尊’官位，出任民事的最高专员，兼任所有保安部队的作战司令。他在1952年2月抵马，留马2年。<sup>14</sup>〕

安东尼·索尔德：我想这个问题很合理。你是否要考虑它呢？我们

---

13 马共发出的‘十一指示’英文版本可在英国公共档案局找到：CO1022/187。共有六页和7份文件。指示包括：

1. ‘党的成绩与错误’，总结党必须把‘群众组织’列为‘七大要务’的第一项，军事活动改为第二，包括减少恐怖主义以争取‘群众’；增加渗透和政治活动；加强马来人、印度人和原住民的工作。也呼吁对要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华人。
  2. ‘争取在战斗中的更大胜利’，描述战事为国际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预测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3. ‘中央政治局对履行党务之职务指示’，详细讲解如何推行‘七大要务’。
  4. ‘砍伐与种植’
  5. ‘物资供应与保健’
  6. ‘马来人与印度人工作’
  7. ‘民运分子的安全’
- 14 亨利·葛尼被委派，乃基于他在战后巴勒斯坦冲突时期作为民事行政人员的经验。邓普勒则有战后德国军事政府的经验，也曾指挥情报和军事活动，使他特别有资历来协调军事、民事和情报活动。



在问你关于游击战的最高峰。现在，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答案〔笑声〕。你可以肯定或是否定吗？

陈平：我们没有〔这样认为〕。我们伏击和打死葛尼。那不是我们的计划。那是一项意外。在我们的解放区计划失败之后，我们派出了一支部队。而柔佛的部队，500人，在重新教育之后，我们建立增援连队，称为26连队，约300人，尝试在彭亨中部展开攻击，看看是否能成功占领一或两个市镇。但英军发现了这儿有大队人马。他们派了6个营的辜加兵和英军包围我们。那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被迫转移。他们在后面追，发生了好多次的交火，打了好多回。约3至4个月，我们的部队在彭亨中部的山区移动，非常累。

陈平：最后，我们解散我们的连队，化成排那样的小队。那次失败之后，我们再度尝试设立森林基地，但森林基地的计划也失败了。那时候我在劳勿〔福隆港东约10英里〕。我们没有决定要迁移我们的总部。开始时，我们的总部在文德甲〔在彭中〕一带。然后转移到文冬〔文德甲西北约30英里，福隆港以南数英里〕。最后到了瓜拉....。

〔这一部分录音不清楚，但陈平是指彭亨西北的另一个地点。由于他是用较大的市镇来作为大约的地标，瓜拉立卑（Kuala Lipis），似乎是最接近的搭配。〕

（译者按：由于陈平上面说明他当时在劳勿，下文则提到说党中央是在文冬，由于立卑离劳勿和文冬都相当远，又属不同县署，猜测或有误。在文德甲和劳勿之间，有瓜拉吉流（Kuala Krau），此地毗连山区，可能应是指此地。）

陈平：我们从那儿发出成立森林基地的指示。〔即上面提到的1951年10月指示或议决〕。北彭亨的单位已经尝试执行了。过后，我们发现在劳勿的供应线被切断。因此，我们的总部面对问题：要不要



化整为零呢？那时候我们大约是50人，非战斗人员约10位，40位是警卫队。我们的中委有三位：我本身，我的副手和另一位未被莱特出卖的中委。

利昂·康尔伯：中委是谁呢？

陈平：我本身，我的副手李安东和另一名阿仲。

〔利昂·康伯尔请陈剑把他们的中、英文名写在白板上。〕

陈平：那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要留在那儿，我们得化整为零，分散力量，这就是说将不再有总部。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跟着其中一组警卫员。从另外一个角度，安全不能获得保证了。于是，那时候我们决定转移到吡叻去，因为我们在日据时代比较熟悉吡叻的森林。因此，总部的转移和彭北森林基地的成立差不多同时进行。〔在此，陈平暂停一会儿〕。我想我最好还是回答关于伏击葛尼的问题。

过后，那儿还留下一个连队，人数减到约100人。他们在寻找目标，一些易取的目标，以便抢些武器。就这样，他们在福隆港地区埋伏。那不是我们的计划，是州委的计划。第26连增援部队是由中委直接指挥。我们派一名代表在那儿。

当我们听到伏击的消息时，关于葛尼被杀时，当然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住在附近，在文冬。

利昂·康尔伯：你是说党中央是在文冬？

陈平：是在文冬。我们的消息是来自收音机，不是我们本身的通讯。当然我们视它为一项大胜利，但却未把它当成是转折点。我们不知道它引起的震撼，只是在后来，在许多年后，当我们读到一些书时，才知道英国方面的震惊。就因为那个最高专员被杀了，并不能决定整个命运。任何两、三个人的死亡不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就

算我死了，整个运动不会就这样完蛋。

**杨进发：**谁给你们提供这项情报？不是有故事说是最高专员家中的一位海南籍工人吗？

**陈平：**不是。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情报。我们只是在那儿等待机会。完全没有情报。

**约翰·李尔利：**我在泰南时，跟一位参与伏击的梁成谈过，而他说那纯粹是一个偶然的伏击机会。他们恰巧是在那儿，而他们甚至不知道打死了什么人。

**陈平：**对，他们甚至不知道打死了什么人。首先，车队经过，下来是皇家海军军官，副海军司令，警卫森严。我们让他过去。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只是后来从报章上获知的。我们的司令员没有接受辨认官阶的训练。那唯一守卫森严的必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他的车子前面的挡泥板上插一支小旗〔利昂·康尔伯：英国国旗〕。从那小旗可以辨识是海军上将或是陆军将军。车子大辆必然是大人物，于是他们就进行伏击。接着就是葛尼的车队来了，他的警卫疏落。他前面有两辆装甲车，离他的车相当远。上福隆港的路弯弯曲曲。后面的卫队也是两辆装甲车〔陈剑：其中一辆坏了〕。一辆坏了，离得相当远。他们发现那是易于攻击的目标，就开火了。

**约翰·顾德斯：**陈平，假使我可以把你告诉我们的并合起来。看来你们的确想过你们可以解放某个地区，那是高峰。但是那之后，因为需要养活所有人来维持他们集中的问题，你们得化整为零，而从那时起，你们其实已失去主动。当像布里兹抵达后，他们看到这个用重新安顿村民来把人民跟你们隔开的方法后，对你们继续进行活动就更加困难了。

陈平：我不认为在我们的解放区计划失败后，我们就失去主动。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进一步发展新的主动。所以，我们想要建立森林基地，用较小的部队进行小规模广泛游击战。尝试争取回主动。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又得作尝试，那时我们决定成立森林基地的计划。

李察·史塔布斯：那么，1951年政策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8)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六大支队战功表

以下是各支队机关发布的战绩简报，除第十二支队为一年的战绩外，其他支队都是一年半至两年半的统计。

支队名称	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	第五支队	第六支队	第八支队	第十二支队
时期	2年 6/48-6/50	1½年 6/48-12/49	2年 6/48-6/50	2年 6/48-6/50	2½年 6/48-12/50	1年 1/50-12/50
歼灭、受伤及捕获	357	223	488	500	450	87
被消灭叛徒	335	140	379	280	181	5
缴获枪械	89	57	115	149	257	43
缴获弹药(颗)	2692	3795	4289	4193	11965	3511
缴获手榴弹	-	3	-	12	20	29
砍毁胶树(亩)	208	212	164	1635	613	-
被毁建筑物	37	20	80	144	126	-
胶片被毁(捆)	-	25	232	2293	1350	-
被毁车辆	33	10	24	43	27	3

上图记录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六大支队的战果。此图表被政治部查获，译成英文。

伦敦大英档案局，CO1022/146



陈平：政策的改变是在我们发现无法阻止居民重置之后的事，我们无法击败重置计划。因此，我们得面对现实。要如何继续下去。

李察·史塔布斯：确实不是因为你们的军事行动造成过多的支持者脱离你们吗？太多你们的支持者，不满你们转向军事途径，以及马共似乎是太过急进，杀了太多人，不是吗？

陈平：不，不是。

李察·史塔布斯：在较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大迁徙。

陈平：大迁徙。那之后，我们得靠新居地的人民来供粮。

李察·史塔布斯：韩战造成的繁荣有没有在粮食方面造成问题，或是它使到获取金钱和捐助更容易了？<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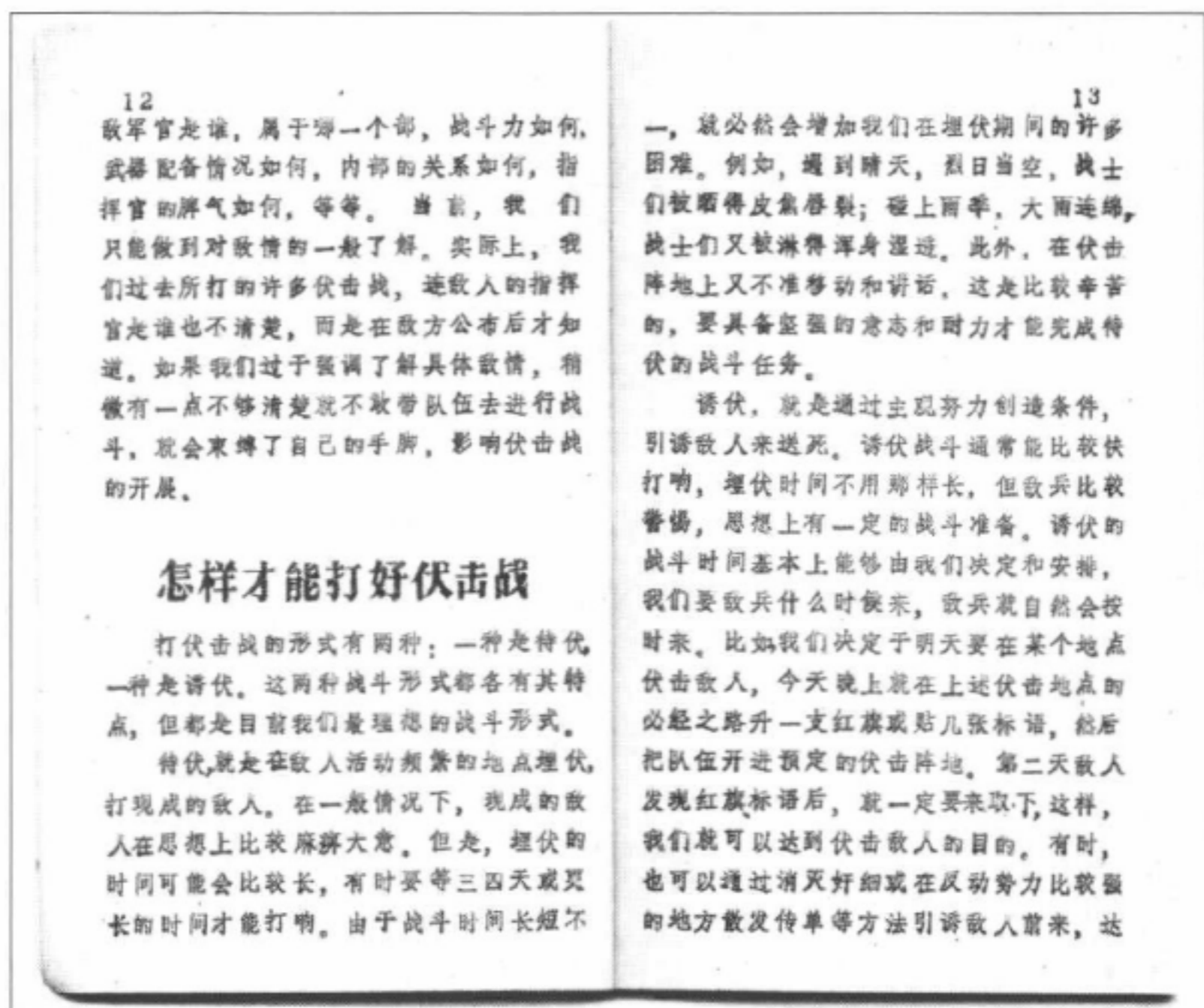
陈平：那时的确很容易拿到钱。那时，我们的人也这么说，我们有整麻包袋的钱。于是人们又说：我们有很多的钱，但却找不到一丁点的粮食〔笑声〕。假如这些都变成米，多好。



马共军事训练手册《伏击战》的封面，由烈火出版社于1978年8月出版。

陈剑收藏资料

15 1950-1年，工资和政府的税收大增，是韩战的间接效应，因为各国都增加囤集橡胶和锡，两者都是马来亚的主要出口。



《伏击战》内页：怎样才能打好伏击战？

陈剑收藏资料



马共1951年“十月决议”小册子之封面。

陈剑收藏资料

安东尼·米尔纳 (Anthony Milner)：看来当时的国际局形势的走向对你们非常有利，韩战，加上越南共产党越来越靠近胜利。你们那时认识到这一点，有对此寄予希望吗？

陈平：有。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些外援。〔笑声〕。

安东尼·索尔德：不只是外援。有没有中共的非军事党员，或是八路军的兵士在那时候来过？他们曾来过吗？据你所知，他们从没来过。

陈平：从来没有。

卡尔·哈克：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们在 1952 年转移到金马仑。在 1954 年进入到泰南的勿洞。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只是重述一遍：你们转移到金马仑时的计划是什么，你们又是在什么时候转移到泰国，为什么？看来，那是一项大转变。

陈平：我们转移到金马仑时，决定在那儿设立总部。我们会见吡叻州书记〔陈洪〕，跟他讨论。当他考虑到我们的期望，他说他们的情况相当困难。他本身，甚至吡叻州总部，不能以组合操作，必须分散。他本身为州委书记，得住在一个地方跟一组的警卫员。那只得回到我们的旧地区，靠近埔莱一带。因此，我们抵达时，发现不可能支援我们部队 50 人的粮食。于是，我们最后决定，没有其他路可走，必须越过边界进入泰国南部。其实，那不是我们总部的计划，我们被形势所逼，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向北移。最后，我们得进入泰南。要不然，另一个作法就是分散党总部。

卡尔·哈克：有人说，在 1951 年，有很多本史诺著的《西行漫记》在传阅，而有关长征的部分非常受欢迎，并被视为是很合时宜。你



可以说说这是不是真的吗？或那只不过是人们在较后才附会的？<sup>16</sup>

陈平：据我所知，在我们的总部没有许多本史诺的书。在柔佛一带或吉隆坡一带可能是吧，那儿可以容易取得供应。他们整批订，三十或四十本，然后传阅。

安东尼·索尔德：但你读过那本书，不是吗？

陈平：有，在我还是学生的时代。

安东尼·索尔德：而你留下深刻印象。

陈平：当然。

约翰·顾德斯：陈平，在越南，美国喜欢什么都炸，他们一度告诉我，用 B-52 轰炸机来进攻。轰炸是否曾经使你们担忧？英国的轰炸有令你们担忧吗？

陈平：起初，我们不担忧。他们的轰炸从来未击中目标。但是从 1953 年起，我想他们已经制订了某种方法。当他们点中一个目标后，他们派出重型轰炸机，林肯轰炸机，发动地毯式轰炸。第一批的炸弹当然到不了地面，都击中树顶了，只是树受了伤。我们所担心的是树枝跌下来会打到我们。〔笑声〕我想他们维持轰炸，一轮

---

16 约同期，政府俘获马共出版的《自由报》（1951年7月），按其格式另行出版及发行，采用共产党语言及风格书写，唯在一个角落印上英国旗，新版之第一期在1951年8月15日发行，侧重马共通过破坏摧毁生计，以及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肃反’。蓝瑞写了《帝国心态与封建主义之马共》。马来亚英国协会档案 V, Cambridge University, Onraet Papers。

又一轮。我想那时候他们发觉我们的总部在金马仑。过后我读一本书，提到他们接到情报，有大部队在行军。然后他们派出奥斯德（Auster）侦查机。

**杨进发：**一个短短的问题。陈平本身承认 1953 年是失败开始的年头，而你们撤过了边界。你们曾经想过那是失败吗？瞧，‘这是一场失败，我们撤退了，我们不再打了，我们承受不了这一切的，我们承受不了这一切的创伤，障碍和压力’。你本身会承认那一年是大失败呢？或者，身为共产党人，从未承认过？

**陈平：**1954 年。其实我从来没承认那是一场失败。〔笑声〕。那是暂时的挫折〔更大笑声〕。暂时的挫折。当我们决定进入泰南时，还有另一项计划，只是没有推行。当我们抵达勿洞时，我们调查当地情况。我们决定组织，重新组织我们的部队，成立约 200 人的狙击连队。然后我们要找武器和火药，发动进攻，试试占领靠近边界的森林据点或小镇，宜力或是玲珑。以我们的经验，小镇是由警察亭守护的，通常没有军队在那儿守驻。军队只是驻扎在某些地区的基地，不是每一个市镇，除非他们展开军事行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占领一个小镇或新村，占领警察局，那将对军队，对英方造成震撼。

〔陈平这时把讨论中的时间改变，提前一些时候，以便提供一个经验实例，显示占领市镇的策略行得通。那个实例是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第四独立队于 1950 年 2 月 23 日短暂占领名为武吉哥蓬（Bukit Kepong）的马来村庄。占领行动由一位马来人穆哈末·英德拉（Muhammad Indera）或末·英德拉（Mat Indera）指挥。他来自麻坡地区，乃是一名工会领袖，从事抗英活动，1948 年 6 月走入森林，逃避英人之逮捕。他的重要性，可从一个马共投降人员看到他的照片时的反应看出。该投降人员叫道：‘那是穆哈末·英德拉。如果政府能够抓到他，我肯定所有的马来人都会走出森林投降’。同一个投降人员补充：‘他是柔北马来人的总指挥。该地区包括巴株巴





穆哈末·英德拉。在柔佛被捕后政治部所拍摄的照片。有人相信他刀枪不入，只有银子弹伤得了他。他是在咖啡被人下了曼陀罗的迷药才被捕的。他协助执行1949年武吉哥蓬的攻击战，1950年代初是马共柔佛——马六甲边区区委。

(利昂·康伯尔 提供)

辖，麻坡，昔加末，东甲和整个马六甲’。<sup>17</sup> 当时，政治部接到的报告指称，至少一些人相信他刀枪不入，除非是被银子弹打到。他过后被俘虏。武吉哥蓬由约20位马来正规警察和特警保卫至将近最后。其保卫战被刻画为当代马来人对紧急状态之回忆。武吉哥蓬位于柔佛北部，离新加坡约120英里，沿麻坡河，从西海岸线往上

---

17 警方审问阿丹·敏·阿都·卡林 (Atan bin Abdul Karim) 之供词。阿丹前为码头工人，于1948年11月17日，在其所属的柔北华、巫游击营地被保安部队伏击时投降。Rhodes House, Oxford, Brewer Papers, Johore 1948 file。他宣称于1948年6月13日加入，当时英德拉骗他，使他相信要替他找一份工头的工作。英德拉带约18名马来人到一间亚答寮子，给予训练。



游约 40 英里处。当时，该地没有无线电通讯，道路只能说有几条小径。居民约千人，有几间华人商店。<sup>18</sup>]

陈平：因为我们有攻占武吉哥蓬的经验。那并不是党中央的指示，是州委决定的。在我们攻占武吉哥蓬警局时，我想警局约有 30 名警察。防卫很好，他们有壕沟。所以，在我们开火时，所有的警察



化敌为友之一：著名投降敌员刘汉与政治部的利昂·康伯尔于 1951 年 2 月 9 日摄于柔佛永平 / 拉美士路 21 条石。刘汉提供了大量有关马共军情资料。照片中，两人正往吉隆坡途中，要去协助分析所缴获的共产党文件。

(利昂·康伯尔 提供)

---

18 在受到攻击时，欧籍伍长正好出外，留下约 19 名正规警察和特警，和数名乡村警卫。居民最后用猎枪和各种武器加入战斗。共产党在放火烧警局后撤退。此为事件过程。至今，有一部电影 *Bukit Kepong* (1980 年 Jins Shamsuddin 导演) 和一本书，Ismail Johari 著 *Bukit Kepong*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9)，书在一些学校指定为阅读书籍。穆哈末·英德拉是当地人。



化敌为友之二：1951年马华公会宴请‘投降土匪’的午宴。报章出现反对意见，唯善待手不染血而且愿意合作的‘投降敌员’，当时已成为政策。左边为戈尔·波维尔（Kerr Bovell），后任肯雅警察总监，右为利昂·康伯尔。

（利昂·康伯尔提供）

都跳下壕沟。警局是座浮脚楼似的建筑。我们开火时，他们跳下壕沟。一些留在楼上。他们开了灯，继续守卫。最后我们只好用汽油和火水放火。我们包围它，然后到附近的店，拿了些汽油和火水，然后放火烧警局。最后，他们有的被迫投降，或有一些被烧死。

安东尼·索尔德：你可知道里边还有妇女跟儿童。<sup>19</sup>

---

19 警局范围有家属。参阅 J.J. Raj,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Kuala Lumpur: Pelanduk, 2000). Brian Stewart, *Operation Sharp End: Smash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Newark: Acorn Press, 2003), 内有其中一名名为金妹仔 (Ching Moi Chai) 的攻击者的声明。



陈平：当然。那之后，昔加末或拉美士一带所有的小警局，所有的小警局都撤掉了。就集中在昔加末和拉美士两地。但是，那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没有炸药。如果我们当时有炸药，战斗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结束。那次的战斗花了两或三个小时。增援部队得用船从麻坡运来，没有其他方法。紧跟着我们撤退后，增援部队到了，从麻坡来的。因此，根据经验，如果我们包围警局，有足够的炸药，就可以在半小时内解决战斗，警方的增援部队根本不能来救。当增援部队抵达时，我们已经撤退了。我们在想着用这种方法来打败迁徙计划。如果我们成功这么做，如果我们能够占领一、两个重置区，那么英国人一定会派增援部队，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我们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使用同样的手法。

后来韩战结束。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签署了〔安东尼·索尔德：1954年〕，在1954年。我们就决定取消那个计划。

约翰·李尔利：你们是否知道英国特别空军勤务部队（Special Air Service, SAS）预备了几营人员，随时准备增援被攻击的警察据点，要是你们的人越过边界来攻打的话。那会造成你们改变策略吗？他们会用降落伞空投。

陈平：如果我们在一小时内结束战斗，你就没有时间派出增援部队。当你收到求救讯号时，你派出空投部队，那需要时间。

安东尼·索尔德：我们留住你一个半小时了，我想你在我们的盘问下，一直表现得很了不起。〔笑声〕这是不是恰当的时刻，让我们都去喝杯茶，然后回到卡尔的文章？这样，我们可以作一个过渡点。我们已经来到1954年。那个大计划取消了，而现在你们在商量方法来走离那个地位。

暂停



## 第八场对话

# 1955 年华玲会谈

第二天上午场继续

[1955年12月29日，在吉打北部举行了华玲会谈。会谈一造为马共的三名代表：陈平总书记，陈田和阿都拉昔·迈汀。另一造为三个宪政政党的代表：巫统代表东姑·阿都·拉曼，为马来亚首席部长；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以及新加坡的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联合邦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正在向英国施压以更快取得独立。]

**安东尼·索尔德：**现在来到卡尔·哈克，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吧：华玲会谈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呢？目的是什么？结果如何呢？

**卡尔·哈克：**我们来到一个恰当的点，因为你提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sup>1</sup>有趣的是，1955年11月，当陈田会见英国人时，你要列入议程的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任何和平之后，你要在马来亚设立国际

---

1 1954年中的日内瓦会议，达致印度支那停火协议，越南分成南北越，由国际监督委员会监督。帕特寮〔寮国共产党〕领袖得重涉政治，而帕特寮部队编入正规军。

和平委员会。那意味说你想着日内瓦，以及巴特寮游击队在日内瓦取得让他们并入寮国的事实。

我要提出两组问题。先提出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马共赢得和平，长期计划会是什么呢？

但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或许绝不会有协议的三个层面：三个你必须清除以便能达致协议的关键性障碍。

首先，就政治让步方面，你们的最低要求是什么？会不会是组织新党的权利，你建议说，可以不用共产党为名？或是你们会接受只要获准加入其他政党，那是东姑的立场。还是撤消关于扣留的紧急法令呢？

第二个方面是：马共同意放下武器后对其人员的调查问题。你们的让步底线是什么呢？有一度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许多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在会谈中，你似乎把调查的问题放在正中。你甚至问：假若我们之中很多人回中国去怎么样？或许其他可以留在他们家中，而政治部可以偶而上门来确保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你应该会记得东姑说‘不行’，那需要太多的警察。你那时这么提，到底只是要让人看穿英国将会何其无理？还是你确实认真地把它视为是一个解决方案呢？

最后的一个领域是关于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一个人说过，你在华玲会谈之前，有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忠告，不是指示。你说：我们从未曾进行过任何谈判。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们的忠告是：你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交出武器。所以，你来到华玲时，你很小心地说：假使你东姑能控制内部安全，我们将〔放下武器〕，放下武器。那是指你们会把武器藏起来，以防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们还是有武器。你们不会把武器交出来。这一点很精采。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天的爱尔兰，<sup>2</sup> 那儿的爱尔兰共和军，可以理解的，

---

2 这一点在 1999 年之前确是如此。有关问题过后渐有进展，在‘独立的解除武装国际委员会’之监督下，再加上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臂

在面对很多的新教徒对他们恶脸相向的情况下，不太愿意交出他们的武器。

这是我要专注的三个领域：第一：政治让步；第二：调查；和第三：解除武装。你们会走到什么程度呢？

陈平：在准备会议阶段，我们要求设一个保安区或停火区。我们的所有要求都获得同意。<sup>3</sup> 只有一点他们不同意。那就是，让我们至少有一次机会跟报界作简报。在会谈后会见报界，那是说，就算是在会前，或是会谈进行中，我们都会同意。英国方面都拒绝了。不是东姑方面拒绝。那时候，东姑有他的助理，一个华人，是副部长。英方则派出韦利（Wylie）。

利昂·康伯尔：他是副警察总监。

---

膀新芬党展望在该区域政治中能分享权力，爱尔兰共和军的第一批匿藏武器在 2001 年 10 月缴械，第二批在 2002 年 4 月。尽管如此，新教组织继续保持警戒，至今未以书面作出示好回应，因而惩罚性殴打和驱逐离开某地区继续为该地之问题。

- 3 陈田于 10 月 17-18 日在仁丹，Klian Intan，以及在 12 月 13 日 13:15 点至 15:45 点于高乌小机场的一营帐中，会见保安官员。10 月在仁丹，政府警告：在发布新闻稿之后，马共不得利用该联络会议进行宣传。副警察总监〔当时为代总监〕韦利建议会议长 2 至 3 日，共产党人要求更长时间。

在高乌，报界被隔离。陈田受告知首席部长得在 1 月前往伦敦，因此建议 12 月 28 日为会谈日期，约翰·戴维斯将出任执行官。但没有订下会谈议程。相反的，马共要求设会议议程，并制订的一个议程，包括新村、不查禁政党、国际和平团等等（参阅 14 章）。陈田受通知‘首席部长的目的是向陈平更详细地谈现有的大赦条件〔叛乱分子若投降将获善待，经调查后，若未犯大罪将获释〕。首席部长亦同意聆听陈平可能提出的任何观点。Public Record Office: CO1030/27, Commissioner-General Southeast Asia to Secretary of State, 10 December 1955.



陈平：战时，他是在柔佛空降的联络员，所以认识我们的代表陈田，很熟。陈田那时候是柔佛的司令员。

所有的主要谈话都由韦利发表。东姑的代表只是坐在一旁。他拒绝了。在某个阶段，我们考虑要取消会谈。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澄清会谈及过后发生的事。我想那位东姑的代表，叫朱运兴，他向东姑作报告。下一轮会谈，他跟韦利来。在韦利面前，他当然什么都不敢讲。对话过程中，韦利上厕所，于是他告诉我们的代表陈田：我有一项东姑的个人信息要传达给陈平。他在两分钟内迅速讲完，因为不要让韦利听见。‘不管发生什么事，东姑希望陈平会出来，如果会谈没有达致任何成果，他保证从伦敦回来后继续谈’。<sup>4</sup> 他向我们保证。我们相信他的保证。将会有另一场的会谈。<sup>5</sup>

卡尔·哈克：他不是说可能会再谈？你是指你们以为他肯定会再谈？

陈平：对。所以，在陈田回来向我作了报告之后，我们决定去。否则，我们不会去的，就不会有华玲会谈了。让我先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在会谈的过程中，我看到根本没有可能达致任何协议。会议

---

4 东姑此次去伦敦，及出席马来亚宪法改革会议，订于 1956 年 1 至 2 月举行。

5 英国皇家记录没有关于上厕所的那段记录。可是，在 10 月 15 日，东姑确实有坚持他将不会受限于仅仅解释大赦条件，12 月 7 日由麦·基佛莱 (MacGillivray) 的电报中，记录‘东姑日前的态度显示他可能准备采取他那远远超越我们视为最后底线的立场。’ PRO: CO1030/27。尽管最高专员在 11 月 30 日已向马来亚立法议院重新作出保证：‘女皇阁下的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在现阶段，视紧急状态之继续，为马来亚联合邦朝向自治之障碍’。易言之，英方担忧东姑会献议开价叫陈平放下武器，以取悦其支持者热衷和平的愿望，以释放社会及经济发展之资金，以及如果他想像需要这么做以影响 1956 年 1 月伦敦会议之独立课题。关于马共无法被击败的想法像在鲜面包放入蛆虫般（如政治部头子顾伊·马多 (Guy Madoc) 在 1990 年代所说的），让他们害怕。

一直受到英国的严密监视，他们甚至控制了录音机。

**卡尔·哈克：**对，你的同僚停下来敲打那麦克风，不是吗？他要求看看那录音机。

**陈平：**是，我是故意的。用这个动作，我要向东姑传达信息：你在英人的控制下，你没有自由。但我没有大声说。到隔壁房去检查录音机没有什么作用的。然后我说：如果你在伦敦会谈能够拿回内部保安，我们将放下武器，停止战斗。那是跟东姑的保证关连的。我暗示他：我希望有另一次的会谈。这次会议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暗示他：如果你能拿到一些东西回来，如果你有某些权力，我们准备停战。那就是说我们希望重新会谈，只是我没说出来。那是很模糊的，因为我没有说成那么样的句子。‘放下武器’不一定指缴械。后来我告诉他，我担心他是否了解我的意思。

**安东尼·索尔德：**你当时是讲英文吗？〔陈平：不，不，讲华语〕。讲华语，那么，是否有不同的意思呢？是不是很粗略的翻译，‘放下武器’，那是指‘停火’或是‘缴械’？还记得吗？

**陈平：**放下武器的意思，如果你用现在的字眼‘解除武装’。它可以是我们缴械，或是我们继续保有武器，只是停火。

**安东尼·索尔德：**你们心中想的是什么呢？

**陈平：**我的心中？我们的底线，或最低线，如果所有的条件我们都能接受，那么我们准备销毁武器，不是缴械。在监督下销毁武器。一种方法是找个‘国际监察团’，我们比较会接受的安排。我们假设英国会即刻同意。如果他们同意，我们会同意设立各造组成的监察团，包括马来亚各政党，特别包括反对党。或是，如果有一些马

来亚的显要名人，来设立本地监察团，我们都准备接受。<sup>6</sup>

**卡尔·哈克：**你现在是把一个完全不同角度放在你对华玲会谈的想法上。你是在去华玲时就这么想：我所要做的，是保持东姑和马绍尔好的一面，以便在他们有更好的谈判地位谈放下武器之类问题时再跟他们有更多的会谈？或那是在华玲会途中的某个阶段，你想到，好了，我只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边，希望下来会有跟进会议？

**陈平：**会谈途中，我认识到根本不可能达致任何协议。

**卡尔·哈克：**在哪一点？什么造成你那么想呢？

**陈平：**我忘了〔谢文庆：是关于受承认的问题吗？〕承认的问题很简单。我提到的第一点是承认马共。东姑说：‘我们不能承认共产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杀了很多人，包括企图谋杀陈祯禄。’<sup>7</sup>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底线是成立一个新党，不用共产党为名。他的回答也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能承认你们马来亚共产党，但是根据我们的宪法，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成立政党，什么名字都行，但不是共产党’。

**卡尔·哈克：**在马绍尔和东姑之间，我想马绍尔比东姑更进一步。这叫我惊奇，因为英国人的理解是马绍尔比较硬。但他确实是这么说：‘在我们的宪法下，你们可以成立政党’。东姑看来是比较硬一点，他提出你们得完全放弃政治思想。任何有共产主义味道的都不行，你们得参加另外一个政党。

---

6 这就是说陈平愿意超越马共所建议的议程，其中一条为成立由外国成员组成的国际监察团，以让两造履行合约。

7 1949年，马共向陈祯禄正演讲的讲台投手榴弹，使他受伤，大量流血，血衣重复用漂白剂清洗都无法清除血迹。



陈平：不。如果你参阅录音的逐字记录，我所记得的是，他只是说：‘你有权利组织政党’。<sup>8</sup> 在一个阶段，他甚至说：‘我们不会介意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你们不鼓吹暴力。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忠于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但他们不进行任何暴力，所以我们容许他们’。因此，我想他已经同意了，没有进一步谈。<sup>9</sup> 下一点是关于我们的自由，我们安全的保障，行动自由等等。他说：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们必须经过审讯。审讯之后，你们可以有自由。他讲得有点模糊。我的理解是我们会被关在某种形式的集中营，像战俘营之类的，必须经过盘问？盘问什么呢？我问他。他说：以确保你们对国家的效忠。就我所理解的，就是作自白。

卡尔·哈克：我想现在的政治部把它叫做转向〔笑声〕。

陈平：于是我反对，没有盘问。

卡尔·哈克：这么说，你是说实际的集中营不是问题，关于效忠的想法才是问题。那想法是他们倒底真要从你们取得什么。

陈平：我不这么想。我想他们是要羞辱我们，强迫我们。如果他们说清楚，直截了当：你得签某份文件保证对国家的效忠，那没有问题，我会接受。但是，我的理解是他们要强迫我们签署摒弃共产主义的文件。这我不同意。

谢文庆：你也反对那个想法，那个字眼‘投降’。

---

8 相关的文献在伦敦：PRO: CO1030/29-31，内含两份记录。其中一部分的全面逐字记录是摘自在首席部长名下出版的版本。

9 PRO: CO1030/29 记录东姑强调凡表现‘效忠’者将在社会中取得正常地位，隐喻包括了政治权利。他也分别思想意识和‘共产活动’，唯只是进一步提出共产思想为外来，不符合马来亚社会。

陈平：对，在最后的阶段，因为他不用投降的字眼，我们准备跟他讨价还价。因为在一个阶段，东姑说：你们的党是一个很强大的组织。我们得维持某种形式的监督。然后他说：我不要成为另一个蒋介石。蒋介石有台湾可以逃，马来亚太小，我没有地方可逃。因此我想他很担心，如果我们取得政权会逼他走。然后我开始跟他讨价还价：不管你是否担忧，我们都会削减势力。于是我向他提出，我们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准备回去中国。他于是要我们提供数目。如果数目大，他会取消盘问。但是留下来的必须经常向警方报到。这我反对。马绍尔问为什么？在整个过程中，马绍尔的态度逼人，他扮演打手〔笑声〕。东姑呢，是到了最后才采取这种态度。在会谈过程中，他采取安抚的态度。那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或是马绍尔在向英国显示他比较可靠的人，以便英国人在行将举行的伦敦会议之后把自治的政权交给他。

卡尔·哈克：你可以聊以自慰，马绍尔对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笑声〕。

陈平：然后，我说：不行，这等于是投降，叫我们定期向警察报到。然后他说：我们怎样控制你们呢？我说：你们有很多侦探嘛。他说：我没那么多钱去请那么多侦探。然后我告诉他，假使他坚持这一点，我们不会接受。

然后，他在最后阶段讲出很粗暴的话。他叫我的名字，然后说：陈平，你必须认识到你们得接受某种形式的投降。他讲了这些话。于是我反击：如果这样，我们将战斗到结束，到最后。我们的计划是，如果会谈相持不下，我们将建议暂时休会。但既然他已经讲出很粗暴的话，我没有要求恢复会谈。

卡尔·哈克：这么说，你是带着希望出席会谈，希望能跟东姑讲一些合理的条件，以便在他向英国人取得让步之后，可以实际上推动一些东西。可是，从你的讲述，你离开会场时一定非常失望，假使

不是愤怒的话？

陈平：没有失望，只是生气。但是在那时候，我还是认为东姑的态度是要向英国人表现他坚持反共。而我还是希望他在伦敦的会议能取得一些成果，让我们在他回来后可以恢复会谈，因为他作过保证。他们得到所有的要求，而英国人也同意，那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没想到英国人会同意确定独立的日期。

陈剑：你的原意是不是有意要协助东姑呢？

陈平：协助他赢取一些成果。

卡尔·哈克：具讽刺性的是，你们的确有做到了，因为英国人决定，如果东姑可能给你们作出让步，倒不如由他们给东姑几乎他所要的一切。所以，你们可以声称，你们帮了他，他却没有帮你们。

陈平：其实我们是被出卖了。还有另外一个情节。会谈之后，戴维斯送我回去。他企图建立另外一条通讯线。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周围准备好一批无线电人员。如果我们同意让他们带领这批无线电人员跟我一同进入森林中，以便我们可以直接跟政府交谈，以厘清问题。于是，我即刻回应：不，我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就连你自己进来，我都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要再有另外一个直接跟吉隆坡的会谈。那是说直接跟英国谈。那将会削弱东姑在伦敦的谈判地位。这一回我去伦敦，去英国，我尝试接触戴维斯，我其实见到他。我打电话给他，他同意见我。但他没提出见面的条件。我知道那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只是友善地谈‘过去美好旧日子’。<sup>10</sup>

---

10 指日治时期戴维斯在 136 部队时那段日子。



陈剑：你们支持东姑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们认为支持东姑比让其他势力取代他为好，对吗？

陈平：对。

卡尔·哈克：联盟必须〔在 1954 年 6 月〕展开抵制，只是要取得一点点让步。<sup>11</sup> 你是否感觉到在东姑和英国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因而你们可以协助他？

陈平：当然。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党可以选。支持东姑，或是拿督翁。或是，另外一个选择是双双都反对。那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在 1954 年，我们的党写了一份报告给帝国共产党大会。日期是 1954 年 4 月 21 日。因为我们没派出任何代表去英国，所以报告只是在会议上读出来。我们交给英国共产党，他们叫林丰美，他是马来亚的激进分子，是对抗性人物，在会上读出那份报告。我们在那份报告中提出了七点计划。就是改变我们的政策，是从那一天开始，不是我们在 1955 年寄出信的那个日子。我想那之后，我猜测，陈祯禄或许取得了有关情报，可能读到有关报告，后来他告诉报界，说他准备到森林去见我，以结束紧急状态。当时政府不允许他。那时候，事物发展得很快。接下来是立法议会中联盟跟英国的纠纷，那是关于民选议员是否应该组成议会的大多数。

拿督翁的党名称独立党，但是他的政纲，他的竞选宣言是要以四年争取得自治，再多四年取得独立。东姑的党虽然不称为独立党，比较激进得多。他们要两年取得自治，再两、三年取得独立，比拿督

---

11 1954 年 6 月，联盟抵制立法议会。他们要求在 1955 年选举中选出较高比例的民选议员。政府计划议会由 52 名民选及 46 名委任议员组成，使要通过民选议员取得大多数非常困难。政府最后同意依主要政党的建议，委任 5 至 7 个代表同利益集团的委任保留议席。

翁激进多了。我们看出英国企图协助拿督翁。那时候，拿督翁是所谓的阁员，掌管〔谢文庆：内政〕内政，我想他也掌管乡村和工业发展局，他是主管，董事主席。立法议会批准了五百万元的预算给乡村和工业发展局的各项计划。那意味着英国人支援他，给五百万元协助他赢取群众的支持。那是公开正式的，但是非正式的渠道呢？因此，英国人给予他全面的支持。我们因此选择支持东姑。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拿督翁的宣言没有触及和平解决以结束紧急状态，和平方式结束紧急状态。东姑的宣言触及这一点，提供大赦以和平结束紧急状态，实现和平。所以，我们决定支持他。

杨进发：陈平，你说东姑有外交手腕，温文有礼，马绍尔则很放肆嚣张。那么陈祯禄怎么样？

陈平：陈祯禄一直都在那儿静静坐着，消极被动。〔笑声〕。

卡尔·哈克：他提出一件事，说你应该会同意紧急状态花了太多的钱〔笑声〕。

谢文庆：可他那时已经是病重的人了。

利昂·康伯尔：关于 1954 年帝国共产党大会，1954 年 4 月 21 日。

陈平：我不知道大会的确实日期，只是我们的文件志期 1954 年 4 月 21 日，大会应该是在这个日期前后的时间。

利昂·康伯尔：你说你们未派代表出席大会，而是通过英国共产党把报告传达给大会的。可是，那时候在伦敦，据我所知，你们有一个非正式的代表林丰美。为什么你们不经过他来传达报告呢？

陈平：我不太肯定。或者是我们那时跟他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去

那儿深造，同时出任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驻伦敦代表。或许我们并不太确定他会不会同意替我们读出那份报告。假如他代我们念出那份报告，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马来亚共产党的代表。

**利昂·康伯尔：**陈平，第二点或许在某方面而言是较令人吃惊的。最近，我收到一份在《南华早报》刊登过的报告。那是伊文·史特瓦德（Ian Steward）写的专栏。长话短说吧，在那份志期 1998 年 6 月 18 日的《南华早报》的报告中，作者说：50 年之后，前马共领袖将在明天成为英国广播公司访谈的主角。他在种植人被枪杀后而宣布的紧急状态中逃避过每一次的逮捕；同时，他或许至今都还不知道，他逃过一次笨拙的谋杀企图。谋杀阴谋是由英军情报局泡制的，当时是 1955 年，马来亚的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和新加坡的首席部长马绍尔正准备在马来亚的华玲会见陈平，进行一场以失败告终的通过协商来结束紧急状态的会谈。马绍尔只是在他死去〔约于 18 个月之前，年 87 岁〕之前的不久获知这项刺杀企图。当我在新加坡的一场宴会上告诉他我要迁移到吉隆坡后，他问我是否听过关于刺杀陈平的阴谋。当我摇头时，马绍尔告诉我他不久前碰见一名前英国军事情报人员，他说很可惜被陈平逃脱了。马绍尔指出该共产党领袖是应该逃脱的。他获得了免被对付的保证，可安全出来出席会议及安全回到森林去。可是，却出现了另一套计划，如果和谈失败的话。根据那位前情报员说：‘我们受命令跟踪他进入森林，然后干掉他’，他继续说：‘但是我们让他给逃脱了’〔笑声〕。马绍尔大吃一惊。马绍尔告诉我：‘我对这个根本就毫无所知，如果知道的话，我一定反对。’所以，我把这个加进你的回忆录中〔笑声〕。

**陈平：**我向你道声谢谢。其实我们不懂得那件事，但却有预料它会发生。起初，我们设法骗他们。我们的警卫员，我们号称有 60 人，其实我只带了 20 人。我们的警卫员住在森林边沿。陈田告诉他们提供给 60 个人的给养和设施。20 个人比较容易移动。会议后，我



回去，拒绝戴维斯护卫我进入森林。我拒绝，告诉他不要再向前走。我不让他知道准确的数目，过后，我要送他回去，他拒绝。他用代表大英帝国的语气，说：这是我的地盘〔笑声〕。因为不要他留在附近，他走了后，我们留一阵子。然后我们派出侦查员，看看是否还有什么人留在附近。没有人。我们决定走另一条路，捷径。我还是遵循那个原则：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我们不是在森林里走动，而是在旷野，在橡胶园。我们预计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们敢走这条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穿过那个危险区。如果英国人企图伏击，会在那个地方埋伏。他们以为我们会走进森林。其实，我们走进附近的村子，在森林边沿。

**杨进发：**华玲会谈时，邓普勒已经退休，回去伦敦。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把陈平抓起来。他的答短而贴切，他说：就因为那不太光明磊落嘛〔笑声〕。

**陈平：**现在已经确定那是英国情报局第五局 MI5 所做的。去年，我从一位官员那儿听到这消息：‘你可知道那时候高乌的区警察总监企图要埋伏杀掉你？<sup>12</sup> 幸好我们发现了，英国政府发现了，阻止他去进行伏击。

**安东尼·索尔德：**这在憩幽园的公共档案局里有记录，有一个档案。

**卡尔·哈克：**马来西亚还是有内部安全法令。如果逮捕和扣留的权利，预防性扣留，还是在那儿的话，你是否有可能从森林走出来？你们有可能会接受吗？倘若马来亚政府这么说：‘我们还是有权在未经审讯情况下逮捕你们’。如果其他你们所要求的都得到了，但

---

12 高乌，现为彭加兰·巴汝，Pengkalan Baru，位于华玲及勿洞之间，离泰国边境约 7 公里。

马来西亚政府说：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有，政府必须有未经审讯来抓人的权利，譬如，如果再出现种族骚乱的话。你们会不会在那种情况下走出森林？有没有那样的可能？

陈平：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暂时，我不能即时给你答复。

谢文庆：为什么你告诉他〔东姑·阿都·拉曼〕说我们要你把内部安全抓在手中？当你告诉东姑时，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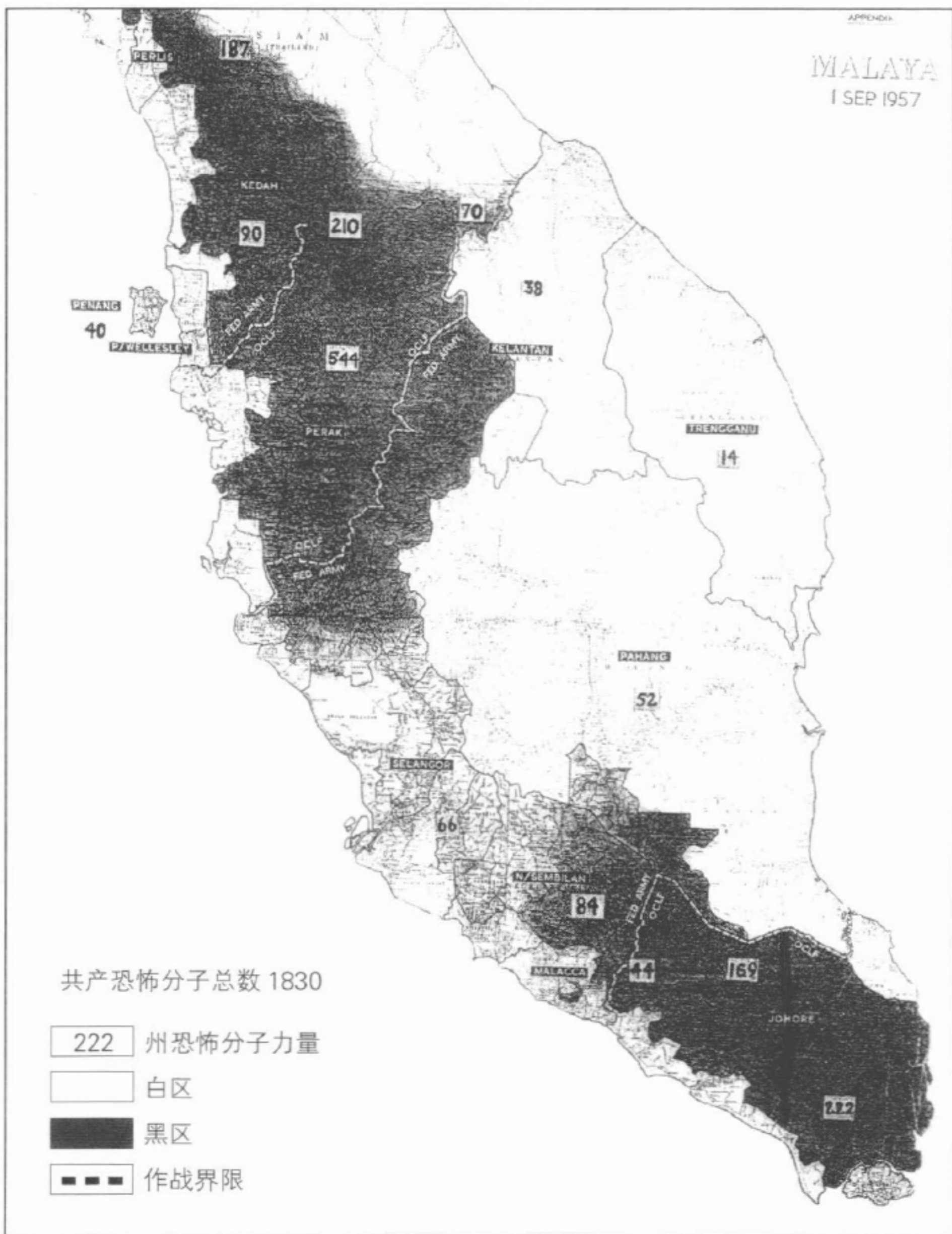
陈平：如果他有那个权力，他就有权决定跟我们达致协议的条件。

谢文庆：不是来扣留你吧！

陈平：对，不是来扣留我。

第二天上午场结束。

暂停



1957年9月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军力及布署。1,830名军员中，只有200名留在解放军内，其余属民运或在司令部。

摘引自：《1948年6月至1957年8月马来亚紧急状态检讨》，作战司令，1957年9月，附表D，图显示解放军军力，白区和军事界线，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s, London: AIR20/10377.





## 第九场对话

# 反对马来西亚及与印尼共产党 及婆罗洲友党的关系

第二天下午场开始

彼德·爱德华兹：我荣幸能主持这一场，那是关于马印对抗和马共在 1960 年代后的角色。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出的评论员来替这一场作开场白，引导我们进入讨论。他是我们大伙儿视为是马印对抗权威著作的作者加米尔·麦克基。加米尔，你要开始吗？

加米尔·麦克基：我大概会问的问题，关于马印对抗的会较少，比较多将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和马共在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角色。我写了那些文字后〔第 3.12 章加米尔·麦克基文章〕，我重温由丹尼斯·布勒兀特（Denis Bloodworth）的《老虎与木马》*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这本具备新闻从业特色，但却很引人入胜的著作。我认识到，那书里头有很多问题是我该挖出来的。我只是想说，我是将那两个过程视为是同一个银角的两面。那就是说，我不认为你可以谈关于马印对抗，而完全不触及马来西亚如何诞生，以及在印尼引发了那一些反应。在第一段里头，我也论述到：我认为，要尝试了解导致成立马来西亚的主要推动力，最重要的应该是 1961 年 5 月至 6 月人民行动党分裂的斗争。正是那个时候，马共的公开阵线组织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从人民行动党分裂

出来。

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广义上同意我所做的评估，就是我说马共似乎是跟马印对抗这个情节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说有关系，我们可以进行一场争论——同时我认为也是跟马来西亚如何诞生的重要性是相对的小。虽然我会同意左派的确是作出很大的努力去反对它。

但是，我想我要问的主要问题是：在森林中的马共领导，跟新加坡的领导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尤其是被李光耀指为‘全权代表’〔方壮璧〕的模糊人物。我想知道他在马来亚或是其他地方是向谁报告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整个时期内，你们在森林里的一群对李光耀是什么态度呢？不单单只是1961年。譬如说，在1955年人民行动党崛起为新加坡的强大力量，到1963年他显然不站在你们那边的这整段时间内，你们如何看待李光耀？

文章中，我还要进一步问你一个问题。我指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社阵实际上是马共的公开阵线组织。我好奇要知道，它反对马来西亚，是受到马共中央的指示，或在那时候，是不是有任何来自北京的指示，或那纯粹是本身所作出的决定。

我想我的最后一个是：马共和印尼共产党之间，是否有更多超出我所假设的接触呢？我的假设是非常少，或是根本没有。

我想你不需要假设马共是在接受印共的任何指示，它可能曾经在协调其政策。

这些是我的问题。但基本的问题是你跟新加坡党的联系。

**陈平：**我们在森林的时候，在初期跟新加坡的地下党维持直接联系，那大概是在1948-9年。1949年，我们在彭亨设立总部。那期间，约一至两年，我们跟新加坡的组织有直接联系。过后，发生连串的逮捕，新加坡市委的负责人全都被捕，其中一人叛变。

**加米尔·麦克基：**他们向你负责吗？



陈平：向党中央，不向我。我们有个政治局组织。

利昂·康伯尔：我了解到他们是向柔南区委负责。

陈平：不，不是柔南区委。我们成立了南马局，领导新加坡和柔佛的工作。但在柔佛的南马局出现状况，他们在森林中，那时，他们受到军队的猛烈攻击，因此他们就没有定时的联系。于是我们就接过头，我们跟新加坡作定期联系。

哈罗德·克洛切：你们怎么做呢？你们跟自己的单位联系都有麻烦，如何跟新加坡保持联系呢？

陈平：我们有地下人员〔诸人：交通员〕。发生事故后，我们的联系切断了。我们于是托付给杨果。那时大约是1951年，他驻在雪兰莪。他到那儿去督导工作。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后，就托付由杨果跟新加坡联系。南马局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其中一个负责人患了肺炎，我们送他到中国去治疗。他们也跟组织建立，重新建立联系。但我想主要的联系是雪兰莪的杨果。<sup>1</sup> 新加坡的一批市委被逮捕。我们擢升另外一批，后来也被逮捕。过后，我们改称它为市工作委员会。最后，杨果牺牲了，市工委的主要成员，因为他们在新加坡不安全，转移去印尼。<sup>2</sup> 南马局也遭受一些损失。最后，我想

- 
- 1 杨果早在战时就是雪兰莪的主力。他早在1946年即对莱特有所批判，当时，他联合其他中委暂时把莱特排除在强大的组织委员会外。在莱特潜逃之后，他联同陈平领导揭发莱特。
  - 2 杨果在1956年8月牺牲，时任马共副秘书长。据一篇查获的政治部档案文章，杨果对新加坡共党成员不满。他在1956年初写信给南马局书记何浪，批判新加坡斗争的暴力，以及因而可能暴露学生的身份。何浪因此寄信坚持必须打击‘左’倾向，而斗争保守合法及公开。从1956年10月暴乱看来，有关指示显然未产生效力。参阅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是在五十年代末，这项工作由我们设在中国的国外政治局处理。在我抵达中国之前，有一位政治局委员负责。不是我，因为我还未到那儿。

**哈罗德·克洛切：**当你说党员在新加坡不安全及转移到印尼时，那发生在什么时候？

**陈平：**我想是在五十年代中的后半期。

**加米尔·麦克基：**那时，印共有没有帮忙他们匿藏在地下？据称他们是去廖内群岛，是吗？

**陈平：**是廖内群岛。但不是在印共的掩护下。他们有本身的联系。一些马来党员，苏汀（Sudin）在那儿，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哈罗德·克洛切：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沙末·伊斯迈，他是以《马来前锋报》这份由新加坡前总统〔尤梭夫·敏·依萨（Yusof bin Ishak）〕创刊的著名马来报章的编辑身份公开去那儿。<sup>3</sup>

**安东尼·李德：**你在当时有把他当成你们的一分子吗？

**陈平：**沙末·伊斯迈嘛，其实他属于抗英同盟。他有没有加入马共，我不能确定，或许是有加入，然后他退出。

---

3 Utusan Melayu, 《马来前锋报》是当时马来亚最大的马来（爪夷文）日报。沙末·伊斯迈是在余柱业，1949年马共领导的影响下加入抗英同盟。他在1950年成为《马来前锋报》的主编。从扣留营释放后（1951-3年），他和蒂凡那（Devan Nair）参加人民行动党。他过后加入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及《每日新闻》。1976年，他又再度被捕。

**加米尔·麦克基：**你谈到设在中国的国外局，这设在那里？什么时候设立？那是中国的外交局，还是你们的局？

**陈平：**我们的局设在北京，是在我抵达后正式设立的，成立于1953或1954年。我抵达之后，要给它取个正式名称。我们就按照印共的经验取名。在三十年代，当印共的组织被瓦解后，他们在另一个国家设立国外局，我忘了是设在什么地方，或许是在荷兰，或许在莫斯科。他们称为国外局。<sup>4</sup>

**彼德·爱德华兹：**回到那个问题，你到北京及负起马共在北京的国外局的书记职之后，你跟新加坡，加里曼丹，砂劳越和沙巴的左派有些什么联系呢？

**陈平：**我们在砂劳越没有任何联系，或说直接联系，但有通过耶加达。

**加米尔·麦克基：**以近乎30年前的情况来看，砂劳越共产党（砂共），我根本不认为它会倾向耶加达。有说法指他们非常倾向北京。砂共在那个时候是否有可能视自己是附属于马共呢？我想他们肯定会视自己为直接从北京取得指点。

**陈平：**在1950年代初的较早时期，一些砂劳越人来新加坡的华校念书，他们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他们回去后就展开他们的组织。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学生是受到身属中共党员的老师的影响。这两组人合起来，组织砂劳越... [加米尔·麦克基：砂共，砂劳越共产党] 砂共。

---

4 原名称为马来文 Biro Luar Negeri。



哈罗德·克洛切：是英国人叫他们砂共，共产党不这么叫。〔笑声〕

原不二夫：不是有个人联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吗？

陈平：人联党，那是个公开政党。他们模仿我们在新加坡的方法，左翼人士跟李光耀合作之类的。他们跟王其辉和杨国斯合作，设立人联党。

哈罗德·克洛切：在那个时候，那些在新加坡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的人，跟你们在泰南的人有怎样的关系？彼此是不是有任何的联系？

陈平：我想在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一些不是共产党人，像李绍祖。我们当他是激进左派。<sup>5</sup>

安东尼·索尔德：林清祥从来没有跟在泰南的马共有任何接触，有吗？

陈平：我不认为会有。我不认为会有。林清祥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安东尼·李德：你是否可以比较广泛地谈谈，从马来亚独立到马印对抗这个时期里，所谓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什么？那是对人民行动党和在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的一贯指示？或是他们是各行其是，跟你们完全没有联系？

陈平：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么远的地方进行控制。那得靠在现场

---

5 李绍祖，于1959年大选吸收入人民行动党，是其中一位于1961年7月分裂退党者，他继而协助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出任主席。

# 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宣言

—— 为粉碎“馬來亞”，实现馬來亞的真正独立而斗争

同胞们，朋友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帝国主义不顾我国人民的独立要求，悍然在我国恢复其殖民统治。

1948年6月20日，英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发动殖民战争，企图利用殖民战争的血腥手段来消灭我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广大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和民族解放军的英勇抵抗粉碎了敌人的妄想。在战争中，敌人的殖民统治根本动摇了，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57年8月31日，英帝国主义在非常孤立和困难中被迫宣布馬來亞联合邦“独立”，采用间接和间接的新殖民统治方式代替露骨和直接的旧殖民统治方式。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被迫后退的同时，利用阿都拉曼集团欺骗所谓实现“独立”的假象，企图麻痹人民的反帝斗争。

但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这个阴谋并没有实现。这几年来，在馬來亞民族解放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鼓舞下，我国人民争取真正独立、民主、和平以及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里彻底统一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高涨起来，并已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东南亚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力量日益壮大，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处境日益困难。因此，在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联合国的支持下，英帝国主义利用阿都拉曼集团、李光前集团和沙撈越、沙巴的反动势力拼凑了“馬來亞”，作为它加强镇压我国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爱国斗争、威胁印度尼西亞人民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和平安全的新殖民主义工具。

1963年9月16日新殖民主义的“馬來亞”成立以来，阿都拉曼集团在日益严重的内外困难中，它依恃着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加强对人民的暴力镇压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它宣佈我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成批地逮捕和不断地驱逐爱国人士，摧残爱国政党、工会、学生组织和群众组织。它疯狂扩军备战，强抽壮丁，为英帝国主义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提供炮灰。它为了弥补由于扩军备战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不顾人民生活的困难，提高了商品收购的税率并增加了新税项，加强对人民特别是工农业下层群众的榨取。

在亚非国家中，阿都拉曼集团非常孤立。印度尼西亞人民对阿都拉曼集团所实行的对抗政策，显示了新兴力量对馬來亞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站在阿都拉曼集团一边的只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共派。

英帝国主义赚了几乎是它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到我国和北加里曼丹来，企图吓阻和镇压我国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威胁和进攻印度尼西亞人民。英帝国主义也一再对我国、北加里曼丹和印度尼西亞人民施加武力，并竭力以对阿都拉曼集团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企图进一步将我国和北加里曼丹，拖入英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泥潭，加剧了东南亚的紧张局势。

不管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共派如何疯狂挣扎，它们的结局是失败的。

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于1965年发表之宣言。

陈剑 资料

的人。他们之间互相讨论，同时互相协调活动，不受中央的控制。以新加坡的左派来说吧，我不认为他们曾用过共产党人的名称。他们之间彼此当成是左派分子，然后他们本身进行讨论，协调政策，然后作出决定。

安东尼·李德：你们一直有发出纲领之类的。他们对于馬來亞共产主义应走的策略必然有一些了解的，或者你认为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呢？

陈平：是的。我们的总看法是地下的，合法斗争得配合武装斗争。主要原则是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其他的扮演配合协调的作用。

加米尔·麦克基：我所获得的印象是，再一次回到布勒兀特（Bloodworth）的书，当李光耀在1961年初——当他还不知道东姑会给他打开马来西亚这个缺口前——跟‘全权代表’进行秘密会议时，全权代表对他本身的下属采取很强烈的态度，要他们不得动摇李光耀的地位。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说要除掉他。而他却说，不行，不行，我们得保持跟人民行动党的广泛公开统战，因为他是唯一的東西，可以阻止林〔利昂·康伯尔：林有福〕，林有福，这个人被视为非常强硬。<sup>6</sup> 如果他回来，英国人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关回监牢去。那将是一项重大的挫折。因此，我的印象是：全权代表是在说，冷静，大伙儿冷静，我们必须保持跟人民行动党合作，越长越好。而他们继续维持到1961年5月的会面之后，当全权代表确定了李光耀已经出卖了他。因为李光耀说，在好久的时间内，我不期望能加入马来西亚，而东姑却在两个星期后浮现了这个想法。这一点看来，似乎意味着全权代表和马共的权威还是挺强的。那个决定不会是纯由在新加坡现场的作业者作出的，指示是来自柔佛。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不理解，全权代表是从听什么人的指示。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老大，他是新加坡的老大。<sup>7</sup>

---

6 林有福继马绍尔之后，代表劳工阵线于1956-9年出任首席部长。他在1959年5月的大选领导新加坡进步联盟，对左派组织确实很强硬。可是，在1959年，他的政党已经玷上接受外国（美国）资助的污点，在大选中遭受羞辱性的唾弃。从那时候起，较大的威胁是来自英国人、或来自内部安全理事会（由3名英国代表，3名新加坡代表和一名马来亚代表组成）的直接干预，后者在1959-63年的自治政府时期，有权力在内部安全理由下发出行动指示。

7 全权代表方壮璧似乎是向余柱业（较资深的党员及短命马来亚民主同盟的领袖之一）负责。余柱业在紧急状态颁布前离开新加坡去印尼的一个岛屿，他在1989年回新加坡。



安东尼·李德：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吗？这或许有帮助。

加米尔·麦克基：他大概有八个名字。其中一个方壮璧。<sup>8</sup>

陈平：全权代表是李光耀叫的。我想他一定读过查伯曼的 *The Jungle is Neutral*。〔笑声〕。英国人在等待‘全权代表’来会见他们。

利昂·康伯尔：你知道全权代表在会见李光耀吗？我是指在那个时候。

陈平：不知道。我才刚到中国。只有在过后我才知道。我想那是在1959, 1960年, 我不太确定。因为直到1956年, 所有的报告都经过杨果。杨果牺牲后, 我没接到任何报告。〔谢文庆：他在那一年牺牲?〕1956年。我想在杨果死后, 他们有两个联系渠道。一个是联系南马局。另一个是联系在印尼躲避的市工委。南马局在经过一

---

8 方壮璧, 又名李育杭, 李光耀指他为‘全权代表’, 本书编辑时期还在泰南。参阅哈克在14章的文章以了解他新近出版的书, 以及他的诗集回忆录。据德莱斯列尔 (Drysdale), 他出生于中国, 六岁来到新加坡, 在华侨中学受教育 (因战争中断学业), 念 St Andrews 中学一年, 到了1950年 (时24岁) 任职于南侨日报以及后来的地下自由报。他擢升为新加坡马共市工委的第三号人物, 从1958年3月开始会见李光耀, 向李证明他可控制马共在其他组织中的同情者。1963年9月, 李光耀通知他会在两个星期内揭露他的名字时, 逃到廖内群岛。参阅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1998), 第281-3, 288-9页; 及 John Drysdale,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1984), 第340-1页, *pasim*。他的儿子在1990年回到新加坡, 但他本身却不能接受回国的条件,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第138-41页。

些变化后，最后何浪接手领导，那或许是在 1955 或 1956 年，<sup>9</sup> 我忘了。何浪之前，是阿谷，在 1953 或 1954 年。他在彭亨被他的警卫员谋害。<sup>10</sup> 何浪在 1958 年投降。所以，过后，新加坡地下党的唯一联系渠道是经过印尼，通过那儿的同志。

为什么全权代表去会见李光耀呢？或许第一次会面是比 1961 年还早。那期间，出现了一些误会，李光耀以为我们企图推翻他，事实并不是。〔加米尔·麦克基：第一次会面是在 1959 年〕当林有福还当权时，加入人民行动党的基层对李光耀不满，而当时他们跟上级脱节。他们自己采取主动，你们可以说是在人民行动党的中委会选举中发动政变，使李光耀一派成了少数。<sup>11</sup> 以 T.T. 拉惹 (T.T. Rajah) 为首的激进左派，成为中委会中的多数派。李光耀过后说：如果你们取得多数，我们要辞职。但我忘了辞职是否真的有实行。过后不久，林有福救了李光耀，把整批激进左派全抓起来。然后李光耀就接过领导权。过后，为了保位，李光耀修改人民行动党党

- 
- 9 李廷辉记载何浪早在 1954 年即指示新加坡的黄茂忠 (Wong Mau Choong) 如何反对国民服役。1956 年初，他指示新加坡党员减少超越宪法的手法，维持渗透合法政党及进行公开活动。他在杨果死后接任南马局书记之职。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第 60, 135, 175 页。受困于柔北昔加末一带，他的支持者渐被歼灭，至 1958 年 4 月他投降。显然相信其事业不再能通过暴力达成，他接受大赦条件，同时协助，直接或间接，多个单位 (约 160 人) 走出森林，获得 247,000 元的报酬。何浪宣称他在 1956-8 年，完全接不到中央的指示。Richard C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4 edition), 第 198, 252-5 页。
- 10 阿谷，中委，于 1953 年 4 月 30 日在彭亨文德甲附近被其警卫员杀害。那时候他身上携带的文件让人以为马共对新加坡的计划乃由中央指示，不像之前那样，由南马局发出。PRO: CO1022/249, Singapore to Colonial Office, 26 August 1953。
- 11 此事件发生在 1957 年 8 月，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届大会上。前此一年，左翼得 12 个中委席中的 4 个，林清祥得票最高。

章，或是普通党员不准投票，或是得成为负责任党员之类，我忘了。

**加米尔·麦克基：**布勒兀特告诉我们李光耀所选择的模式是根据教皇的选举法。他指出：主教们选出教皇，然后教皇派任主教。这个方法两千年了都有效，对于人民行动党到今天也是一样。<sup>12</sup> [笑声]

**陈平：**于是，所谓的全权代表会见李光耀，跟他解释那不是党的决定，不是上头的决定。那是基层所作出的冲动性反应。他们之中很多不是党员，是前抗英同盟分子。

**安东尼·李德：**那么，你是说马共的政策，一直到 1961 年为止是支持李光耀的。 [陈平：是。] 那是不是一项错误呢？再回头看的话？

**陈平：**我们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有分歧 [笑声]，所以我无法给你任何答案。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安东尼·李德：**是否可以告诉我们理由，为什么你们认为支持李光耀是项好策略？

**陈平：**那是他最激进的时候，被视成左派。如果你读他的回忆录就可以看出。他竭尽所能。开始他从伦敦回来时，他加入右派政党，进步党。经过选举后，他看到进步党毫无出息，没前途。这是我的话。过后，我想他尝试向左转。他尝试接近和协助我们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激进组织，和工会——成为他们的律师，争取到我们的信心。过后，他找我们——据我所知是他找我们，他采取主

---

12 这个故事，是指李光耀本身在 1958 年初在罗马时，对教皇选举的实例留下深刻的印象。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第 285 页。



动——说：你们要成立新党吗？他叫我们派出干部去协助他。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派了一些人，一些我们的党员，一些跟我们党很密切的人去帮他：沙末·依斯迈和印度人蒂凡那。〔诸人：普都遮里（Puthuchery）〕<sup>13</sup> 普都遮里在那个时候是独立的。我不太确定。普都遮里和一些其他人有冲突。过后那些人认为他有点摇摆或是右派。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一边派他去，或是李光耀主动召集他的，我不确定。

利昂·康伯尔：那么，李光耀是怎样跟马共接触以寻求党派出干部协助他成立人民行动党呢？

陈平：我不涉及那件事。当中学联成立时，他是法律顾问。随即〔在1954年〕学生派代表去见他，是两、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还活着，现在很老了。根据她说，李光耀问她们是否可以联络上党。李光耀应该是怀疑她们跟党有某些关系，或可能就是党员。她们当然问他为什么要接触党。他要成立一个新党，左翼政党，他缺乏人手。党是否可以帮他，提供一些人手。那时候，他不只是缺乏人手，更重要的是，他缺乏诚信。他企图要跟左派合并，他得改变自己的面孔，从右到左，他需要这一类的掩护。〔加米尔·麦克基：他那时候替左派人士辩护〕。他为此做了很大努力。

---

13 蒂凡那，C. V. Devan Nair，是印籍工运领袖（教师联合会秘书长），马共党员，及人民行动党创党人，被扣留期间（1951-3，1956-9年）他最终放弃共产主义。他是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唯一中选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他创立民主行动党，起初为人民行动党在大马之版本，于1961年成立全国职工会联合理事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uncil, NTUC），并在1981-5年成为新加坡总统。普都遮里，Puthuchery，参加印度国民军，创立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后转活跃于工运，并在1951-3和1956-9被扣留。1961年退出人民行动党，参加社阵，1963年2月再度被扣留，后被新加坡驱逐出境。

加米尔·麦克基：早期他也是非常反殖的。非常反英。

陈平：我不认为。他加入进步党，怎么可能还会强烈反殖呢？从他的回忆录看，他在伦敦的学生时代，他做过了什么呢？

彼德·爱德华兹：那是那一年？我是指那个还生存的妇女〔讲那事的时候〕。

陈平：1954年。1954年底，他们成立了那个党。

彼德·爱德华兹：T.T. 拉惹什么时候接手？左派在什么时候接手？

陈平：1957年。

陈剑：你是否有听过他们跟劳工党，人民党等，扩大或是建立左翼统一阵线？

陈平：我想我们支持人民党，但人民党无法在新加坡发展。

彼德·爱德华兹：1957年，有一项努力把左派政党拉拢在一起。那涉及檳城的人，劳工党，人民党和T.T. 拉惹这批人。章程其实已经起草好了，就在他们要再进一步前进的前夕，他们全都被捕了。T.T. 拉惹被捕。那是个很重要的时刻，他们为左派的结盟作出了这额外的推动。

陈平：有那样的尝试吗？我不记得。

彼德·爱德华兹：我只是兴趣知道这些人跟党之间的距离。他们不是党员。我很肯定T.T. 拉惹不是党员。或许他们有尝试跟，因为在马来亚，劳工党和人民党已经成立了某种结盟。他们称作社会主

义阵线。

**安东尼·索尔德：**关于印尼共产党，这儿有一点，我不知道陈平知道吗，虽然他那时候不在那儿：应该是当位于合艾的党基地已经跟北京有定时联系的时候。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的 Djatikusomo 将军去泰南找马共。你有没有听过他作出接触？他被跟踪，在靠近合艾的某个地方失踪好几天。你是否知道他有没有成功作出联系？

**陈平：**我没接过这样的报告。我想没有吧。或许他有去那儿，尝试联系，但失败了。或者他是去接触泰南的民族运动组织。

**加米尔·麦克基：**那时大约是 1963 年吧。马共是否有任何人曾经跟艾迪有直接联系？艾迪是否对马共有兴趣？他是不是直接跟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

**陈平：**我想他跟每一个共产党的人都打交道。他当然同时跟莫斯科和北京打交道。那个时期，对马共来说，每一个共产党都维持比较好的联系，大多数时候是我们采取主动。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抵达北京不久，就要求中共安排我作一次拜访。我有见到艾迪。

**加米尔·麦克基：**那时候，中苏纠纷开始爆发，艾迪起初把自己放在中间。他拒绝偏向一边。过后，他越来越靠向北京那一边。那对你们的态度有造成什么冲击吗？

**陈平：**1961 年，我想他还是采取〔加米尔·麦克基：正确的路线？〕。我不能说那是否正确，但是中立路线。过后，就如你刚才所说的，有点转偏向北京。

**加米尔·麦克基：**到了 1965 年，苏联很气恼印尼共，完全把印尼共除名了。



安东尼·李德：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你们跑得比印尼共快，不是吗？

陈平：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中共这一方。人们说我们偏着北京，其实不然。事实上，在那时候，我的联系切断了。早至在第20届党代表大会之前，当赫鲁晓夫试图排挤马林可夫时，我们就注意到他指责马林可夫违反马列主义。因为有一度马林可夫在他的报告中，说：如果出现使用氢气弹的新世界大战，将会导致文明和人类的终结。那是违反列宁的教导的。同一点，马林可夫太过强调轻工业。这也是有违列宁的学说。他就是用这个来拉倒马林可夫的。他掌权后不久，就在党内外鼓起一系列的理论之争，辩论苏联经济发展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陈平：我们密切关注。然后来到1956年第20届党代表大会批判史大林。那时，赫鲁晓夫没提出史大林的名字，只是讲个人崇拜。我们理解那是在指史大林。通过收听莫斯科电台，我们每天跟踪。他们说：这个第20届党代表大会是列宁逝世之后最具历史意义的。我们对此有争议。其他的党代表大会呢？列宁逝世之后，有一届的大会，我忘了是那一届，决定进行工业化，苏联迅速进行工业化，我们认为至少那一届也应该属于最具历史性的。没有那一届大会的决议，苏联怎么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并在较后时打败希特勒呢？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对他没有信心。不久后发生了匈牙利起义，当然，我们责怪赫鲁晓夫的政策。再过后，在波兰，苏联武装部队和波兰警察差点打了起来。我们对此有所疑问。再下来，他去会见艾森豪威尔，我想那是在1959年，回程时，他在北京停留，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在国宴上，他公开不点名攻击中国的政策。他说‘有人行为如斗公鸡，尝试一些冒险行为去考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那就是说他在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的。假使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先跟中共讨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对此感到相当的疑惑。

于是，纷争在 1960 年公开化，中共的杂志刊登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文章在不点名苏联和赫鲁晓夫情况下批判苏联的政策。我们认为它很有说服力。〔1956 年 10-11 月〕匈牙利起义后，赫鲁晓夫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必须派军队去镇压。只有中国刊登了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后，中国发表另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我们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的论述令人信服。<sup>14</sup> 在心底里，我可说我们决定要偏向一方，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哈罗德·克洛切：**就算是在此之前，马共跟苏联也没有联系，所以那也不是很大的牺牲，不是吗？

**陈平：**从 1954 年开始，我们派人到中国，然后访问苏联。那是正式的联系。

**加米尔·麦克基：**可是，一般看法是你们把苏联当作是正式指导思想的来源。

**陈平：**当然，我们认同是苏联在领导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中共。只有在后来，我们认为苏联或赫鲁晓夫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共产主义运动了。

**哈罗德·克洛切：**苏联当时在辩论着应该侧重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的问题。这种东西跟你们所关心的简直是不相干。

**陈平：**对，我们关心的是策略，总体的策略。

---

14 这关系到罢工和暴动，发展至工人在 1956 年 6 月被杀。

安东尼·索尔德：我只是要问你关于马来亚共产党的‘马来亚’。对于‘马来亚’的强调是相当强的。你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包括新加坡被排除在外。我的理解是你们总是坚持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分，而你们所争取的马来亚是包括新加坡的。这个立场到今天还是不是一贯的呢？或是在某个时候已经改变了？

陈平：我想我已经正式把它改了。那是在〔1989年12月〕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仪式的记者会上，当我会见新加坡报界的时候。

谢文庆：那时候你承认了新加坡。

陈平：是，我接受马来西亚，同时我那时告诉新加坡报界说‘现在我承认你们〔新加坡〕’。新加坡派了两名内部安全局主任，其中一个我还记得，名字叫张育民（Tjong Yit Meng）。从名字的拼音，我看出他是来自印尼，因为他的姓拼为 Tjong。新闻会结束后，在那天的晚上由查瓦力（Chaovalit）将军宴请的茶会上，<sup>15</sup>我对他的助手说我们已经告诉报界说我们承认新加坡了。我还说：你们可以绝对打保单，我们不再对新加坡造成威胁。谁能够威胁新加坡，你们自然应该知道〔笑声〕。他说过后他要见我，但却没有现身。

安东尼·索尔德：我想向陈平讨教，一点澄清。你是不是说过，关于苏联侵略匈牙利，你对中国所作出的辩护深有同感？我不记得当时中国是持什么立场。你们接受中国合理化苏联侵略的立场吗？还是反对苏联侵略？

---

15 查瓦力，Chaovalit Yongchaiyudh，将军，当时任泰国陆军总司令。他在1989年10月亲自会见陈平，以摆平协议的剩余细节。该和议容许剩余的马共成员回马，或者留在泰国，获分配土地及暂时的生活津贴。



陈平：一直以来我们都偏向中国。我接受他们的辩护。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事情我必须重新思考。确实是很痛苦的重思。

安东尼·索尔德：因为那是合理化侵略的辩护，那显然是史大林路线，不是吗？

陈平：直到现在，我还怀疑是否有所谓的史大林路线，但我继续看着好些书，还有一些关于史大林的书。

安东尼·索尔德：当时肯定存在着一种强硬路线，而中国当时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把苏联路线强加于所有共产党的作法。其实，我只是在尝试辨别，到底你是共产主义中可以接受的人物，还是一个真正的史大林主义者〔笑声〕。

陈平：我可得再想过。〔笑声〕我没有准备好的答案。1964年，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作了很重要的声明。我们相当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其次，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因此，我们是偏向中国，但却不意味着我们同意中国的一切政策或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有本身的判断能力。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做的对，就站在他们那边。当我们认为他们不对时，或是我们有所怀疑时，就会采取中立。

有人插话：你对万隆会议的反应是什么？

陈平：当然，我们同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存政策。

暂停

## 第十场对话

# 从马来西亚独立，到 1970 年代 ‘第二次紧急状态’到 1989 年 停火期间的马共策略

原不二夫：我们一直到这个阶段所提出的论题，已有好多历史家作了很完善的分析和探索。但是，我所要提出的课题其实还没有很好的探讨。

这是我针对马共路线所要提的问题。

第一，武装斗争路线。据称那是在 1968 年开始的。但党中央是在更早的时候采纳这条路线的。1961 年初，党中央采纳新方针以纠正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争论的‘右派投降主义’路线。但是，却只有到了 1968 年 6 月 1 日，马共才正式宣布将重新发动武装斗争。战斗的第一阶段在那个月的 17 日实行。总共用了七年的时间来推行新方针。为什么是在 1968 年中开始呢？

第二，马共党中央在建党 40 周年纪念的声明中，指五十年代中期采纳的温和路线为一项错误，把错误归咎于赫鲁晓夫集团和刘少奇集团。我想知道马共是不是还坚持这个观点？

第三个问题：泰国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也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展武装斗争。这跟 1948 年所发生的相似。东南亚诸国暴发的第一轮武装斗争已经有很好的分析，但第二轮武装斗争的起因却还没有。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仅是巧合，或是有人试图协调这些策略呢？或是

他们本身在这个时期尝试协调各共产党的策略呢？不单是在泰国和菲律宾，还有砂劳越。北加里曼丹人民起义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组织的。我不知道那是否跟1962年12月爆发的婆罗洲人民党〔汶莱人民党〕的革命有关连。假如我没弄错的话，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是在1970年3月组织起来的。这个砂劳越左翼组织几乎在同时期展开武装斗争。因此，我想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互相牵引、协调。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主席文铭权。我想他从1962年起是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并被驱逐出境，回中国去。我要知道陈平有没有在北京见过他。或你和其他的共产党是否有跟他定期讨论斗争问题。

第五个问题跟所谓的群众组织有关。马共有很多这类的组织。也有秘密组织，不像人民党或社阵那样的。这些属于非法政党或非法组织，至少分三类。

第一类是统一阵线。第二类是马来政党〔1981年5月成立之马来亚国民革命党〕。第三类是农民协会。

我要知道为什么三类中〔统一阵线，马来政党和农民协会〕，每一类都有两或三个组织。我不知道这些组织是大是小，但为什么需要有第二或第三个呢？例如，典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68年，就在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之后。为什么这成为需要呢？这个组织跟成立于1949年2月1日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有什么不同？如果先成立的组织很有影响力的话，何必成立后一个呢？两者之间政策、策略和成员差别何在？还有，有两个马来政党。第一个成立于1965年，第二个于1981年。两者之间差异如何？这是第五个问题。

陈剑：或许，你应该在此打住，够多问题了〔笑声〕。让陈平回应吧。

陈平：1970年，马共的声明中，我们谴责赫鲁晓夫集团和刘少奇



集团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或修正主义政策。1954年，我们确有派代表去莫斯科会见他们的领袖。带领那一批理论家的主要人物是苏斯洛夫（Suslov）。过后，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他们给我们书面建议，或你们可以说是忠告，建议我们结束武装斗争，藏起武器，把游击队员从森林转移到城市或乡村去，进行地下工作。

我们在1954年致给帝国共产党大会的声明是依据他们所建议的路线。当然，我们同意他们的建议。我们得负起主要的责任，我们没怪他们。可是，当我们后来提出要和谈时，他们说根本不可能跟政府谈和。他们说不能，因为情况跟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可是，在1955年，我们看到了和谈的可能性，我们采取主动，寄信给政府。那信只是试探性质的触角，要看政府会怎么样反应。后来联盟当政，他们同意跟我们谈。

争取和平，那是普遍的看法，不是中共的决定。普遍看法是参与和谈，尝试结束战斗，采取合法和宪制的斗争。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被视为是修正主义，是错误的。于是，在党内，当然，是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有一些人质疑1955年的和谈是否正确。我们得在中委会里作自我检讨。当然，党内，包括领导层，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最后我们达致结论。是的，我们同意那是一项错误。在我们作出结论前，我们要知道中共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份文件不单只是以苏共的名义，也用中共的名义。那时候的文革小组，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在四人帮的控制下。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根据他们印发的文件，那组人是中委会选出来的。他们回答说是刘少奇的责任。他未知会中委会，甚至毛主席的情况下批准那份文件。我们相信了。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有点怀疑。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刘少奇的责任，他们回答说：不是。不是刘少奇。其实是中委会批准的。当然不是全体中委的会议，我怀疑是中央书记处。我们再问毛泽东是否知情。他们不太确定毛泽东是否知道有那份文件。

现在，我可以说那是压力。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既然已经平

反了刘少奇，我们就只能责怪赫鲁晓夫集团了。

事后回头想，如果我们得检讨这份文件的话，我们得说我们是在赫鲁晓夫集团的压力下，因为已经删掉刘少奇集团，以及得删去中共，因为没有具体证据。他们不承认。直到我们能拿到毛泽东有涉及的证据，才能怪中共。如果毛泽东不涉及，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他不知情情况下，中央书记处会批准向另一个兄弟党发出这样的文件呢？

存在着压力，不是实体或财务或任何其他压力，那是因为他们以大党，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扮演领导作用的名义发出文件，而造成的压力。

后来，我们觉得他们对我们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过后，应该是我们在1980年的文件里，我们已经说华玲会谈是正确的。尽管这样，他们建议我们结束战斗，藏起武器和把成员转移去城乡搞地下，我们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我们盲从，就不会有华玲会谈。

以两个大党的名义，提呈一项正式建议，就算只是用建议的名目，那对我们已经等于是很重的政治压力。

**原不二夫：**两个党，他们在同一张纸上签署，同一张纸？

**陈平：**没有签名。现在我们没有正本和译本。正本用俄文写的。如果有兴趣，我建议你们到莫斯科档案局去找〔笑声〕。这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不要批评或公开评论。如果有人反驳，叫我们拿出证据，我们就有困难了。

**陈剑：**在这个时刻，我要补充一些看法。我想在华玲会谈后，马共在犹豫要怎样走下去，以及当然是在寻求第二次和谈的机会。当然，你们在想或许东姑会进行更多的和谈。1957年，在独立前不久，马共发下一份指示。过后，那并没有发生，马来亚就独立了。武装斗争看来已经没了劲，马共得决定下来该怎么办的路线。马共



于是采纳了‘偃旗息鼓’的政策，那就是停止一切活动，实际削减队伍人数，让那些要离党者离去。我想在那个时候，军人数目减至约 300 至 500 人。下来，就是党的高层领导和干部到中国去，像你本身在 1961 年那样。但是，那之后不久，或者是仅仅一年吧，马共就恢复了武装斗争的路线，颁布了‘新方针’政策，重新恢复武装斗争，并从勿洞和泰南地区招募新员。部队人数过后渐渐增加到 2,000 人。下来，就是你们派狙击队南下马来西亚，引发第二次紧急状态。

佐摩：你是在讲马印对抗的那段时期？因为那是第二紧急状态。

陈剑：不是。你说得对，第二次紧急状态是那时候开始宣布的，但却一直继续下去，后来发生 1969 年 5 月 13 日事件。再过后，第二紧急状态主要用来对付马共的突击队——五突和六突——分别在吡叻和彭亨活动着的，由南一和张佐，即张天带领导。<sup>1</sup> 张佐很早期就担任州委，是陈平的老同僚。因此，事实上并不是文革的影响。文革要在 1965 年才开始。因此，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共恢复武装斗争的议程呢？

陈平：我要对刚才的问题作更多的补充。华玲会谈失败后，我们当然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我们在期待东姑恢复谈判。伦敦会议过后，我们写信给他，建议恢复谈判，以寻求合理和公平的解决方案。他回应：他只有在我们接受投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才会恢复谈判。当然，我们很清楚表明，我们绝不会接受。因此，就没有会

---

1 译者注：张天带，化名张佐，抗英时期第五支副队长。70 年代带突击队南下，为‘六突’领导人，80 年代后期进入吉隆坡活动被捕，过后‘六突’成员先后被俘。有关‘六突’被瓦解真相，各有说词，马共中央的立场是：‘真相有待查明’。参阅单汝洪著《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南岛出版社，第 188 页；张佐著《我的半世纪》——张佐回忆录，张元出版，2005 年，第 399-441 页。



谈。我们过后还是没死心。或许是因为在独立以前，东姑不要触怒英国人吧。因此，我们就等待独立后的另一个时间。独立后，我们写信给他，建议恢复谈判，他再一次回应说他不会，除非我们接受投降的原则。于是，没有进一步的谈判。

接着，我们坚持继续武装斗争一段时日。也许，希望他们会跟我们有另一轮的谈判。〔原不二夫：那是在1961年吗？〕不，那是1956年，伦敦会谈过后，以及1957年8月31日独立之后。可是，那之后，虽然我们尽力坚持武装斗争，我们的组织却纷纷瓦解。首先是在吡叻，出现所谓的大规模投降。其实不是大规模投降，只是一或两个人投降。区委投降了，他带政治部人员打扮成游击队，假扮成他带领一批新游击队经过营地，只是停下来歇脚。但他们却是去把我们的人抓起来，一次抓一批。那时候，我们为环境所逼，粮食短缺。我们分成小队，最多一队只有30人。于是，他们成功地抓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抓完每一队人之后，就包围州委，强迫他投降。他不投降，反抗。他和他的警卫员一起牺牲。然后，南吡叻的组织瓦解。那是在1957年底或是1958年初，我不太确定。

下来是北吡叻，我想是在1958或1959年，他们展开了两项行动，其中一项叫北吡叻‘生姜行动’（Operation Ginger）。在北吡叻的行动无法成功，因为没有主要负责党员投降。于是，他们发动了高度集中的猛烈攻击，甚至还动员了其他州的乡村警卫团。他们沿着森林边沿公路的两边设路障，一道又一道，好几英里都是。如果我们出来找食物，就只是找食物，警卫团就会开枪。接着，驻扎在附近的军队就马上来攻击我们。因为这些路障，我们被迫分成更小队，只是两、三个人一组。他们继续这样的行动，为期好几个月。最后，他们消灭了我们所有的人。其中一些不能再坚持，投降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饥饿。最后，他们之中只有三位成功突破封锁，在没有任何响导情况下，移向北部和越过边境，进入泰境，与主力部队重新联系。

**约翰·李尔利：**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派小马去阻止情况继续恶化的吗？

陈平：是。在‘生姜行动’开始时。在行动进行中期，我不太确定，小马被警卫员出卖，中了埋伏。再过后，他们采用这个伎俩，用在柔佛。在柔佛，南马局头领何浪走出来投降。他的作战基地是在比拉湖一带。他走出来，在马口这个市镇或靠近森美兰的某地投降。这个森林地点很接近比拉湖地区。政府利用他带领一批人，一些或者是投降人员，一些政治部警察，华人的，和看起来像华人的。他们进入一个后又一个，一批后又是一批，相当大的一批人。何浪以中委会的名义，召集一大组人在一起，告诉他们中委会给他发了指示。他发出假造的所谓中央指示，说是时候结束战斗了，因为马来亚已经独立了：大家都得停止战斗。过后，投降敌员和政治部警察包围他们，强迫他们投降。一些组投降了，另一些组却没有。在那时候，当他们到来时，是在晚上游击队员休息的时间，他们就突然地把我们的人一个一个抓起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后，柔北和森南的整批全都被捕了。下来，政府在报章宣布大规模投降。那当然不是大规模投降。

再过后，他们用这类伎俩来进攻柔南的部队，但没有成功。因为柔南的负责同志没有人出来投降。于是，他们采用跟‘生姜行动’大同小异的方法。他们叫那项行动为‘老虎行动’。在几个月之内，他们歼灭了整批人。州书记和他的妻子被杀害。

那时候，只剩下四、五名成员还活着。他们派出一名警卫员出来找粮食和接洽一些人。这个家伙出来后向政府部队投降。政府献议给他很大的酬劳。你还是拿着自己的枪，但政府把子弹换了。所有的子弹都是毒子弹。你就回去报告说任务失败了，无法联络到任何人，或找不到粮食，及作出报告。

于是，见到州书记夫妇，他报告说任务失败，他平安回来了。突然他拔枪瞄向州书记。但是妻子相当警觉。她已经怀疑有不妥了，因此，在他能够开枪前，书记太太先向他开枪。但因为是匆忙中，子弹打不中他，只是歪一点点，否则就会打死他了。再下来就是这个警卫员开枪杀了州书记和他太太。因为所用的是毒子弹。过后，政府宣布州书记和妻中伏身亡。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真相，他们




是被谋杀的。

还剩下一位，仅仅的一位，是区委，女的，在笨珍一带。政府宣布她中埋伏被捕，死了。但后来，我们得到一些消息，她其实没有死，还在监牢里。但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还得查核。直到现在，我无法说那是真，还是假。消息指她被施酷刑，残废了，以及她是单独监禁在某个秘密地点。

唔使問亞貴

## 馬共匪徒 害得我們真慘!



匪徒要求我幫忙。  
他們要糧食。  
他們要布疋，要鞋子。  
又要金錢。  
他們要藥品。  
他們要用種種的詭計運交這些物品給他們

我何必要幫忙他們呢？

他們在山麓活動了四年有多，並沒  
有任何成就，同時對我們完全沒有利益

### 會有什麼結果呢？

假如我幫助馬共匪徒，會有什麼結果呢？結果就是遲早警察就會查出這件事把我捉去拘留起來，或者甚至押送出境回國。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為着逃避警察逮捕而逃入山麓加入馬共的話，那麼遲早我就會被馬共利用來當炮灰！

就算在很少有的情況之下，警察沒有查出我曾經協助共匪，如果當地有一二名共匪在運糧或收捐時被保安隊伍擊斃時，其他的共匪就會懷疑是我出賣他們洩漏秘密而通水，於是這些共匪就會把我們打死了！

所以任何和共匪發生關係的行動的結果都是飲有死路一條。

### 我要怎樣做呢？

我要把我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全孤注一擲嗎？  
譬如匪徒強迫我去協助他們，這又怎辦？

我已經立下決心：我決不自動去協助匪徒。——如果我在脅迫下去協助他們，過後我必將經過情形報告政府，因為政府曾經明白的宣佈過，政府將不會懲罰我的，事實上，如果我將經過情形報告政府之後，他們且將我的姓名保守秘密，此外，我亦可會獲得賞金哩。

唔使問亞貴

No. 1534

英国人宣传海报 1534 号。

Liddell Hart Military Archives, King's College London, Stockwell Papers.





通行证，五十年代。

Liddell Hart Military Archives, King's College London, Stockwell Papers.

这一切都完了之后，我检讨局势。我想那是 1958 年，不是 1957 年，是 1958 年底，或是 1959 年初。我们检讨后，看来根本没有可能跟政府再有什么谈判了，因为我们在半岛的部队几乎完了。于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想苏共的建议成立，我们没有意义再继续斗争下去。没有希望跟政府有另一次谈判。因此，我们决定实行那项建议。

那时候，我们在沿着边境的地区还有约 500 至 800 人，我忘了准确数目，一些在马来亚，大多数是在泰国。我们发出指示叫槟城的游击队解散。那时在槟城有约 30 人。他们把武器藏在槟岛。因为人数少，他们分成几批偷渡出境。一些用渔船去印尼。一些分散到半



1950年代的安全通行证，任何提供援助的平民可获500元赏金。  
Liddell Hart Military archives, King's College London, Stockwell Papers.



## 致馬共人員們： 這是你們出來的安全保障！

爲着保障你們脫離山林出來時的安全起見，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將把五百元賞金，送給協助你向當局投誠的公眾人士。

所以把這張傳單小心藏在身上，當你出來的時候，把它交給群眾看，那麼他就會把你安全的帶到最近的軍警官員去。

如果幫助你的群眾不祇一個人，那麼他們就可以把這筆款項領去自己分派。

Kapada sekalian Ahli Ahli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Ini lah sekeping Surat Akuan Keselamatan yang di-beri kapada Awak.

Supaya membri akuan atas keselamatan awak waktu awak hendak keluar dari hutan, Kerj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sedia akan membri hadiah wang tunai sebanyak \$500/-, kapada siapa siapa Ahli orang Ramai yang membri pertolongan kapada awak menyerah dari kapada yang berkuasa.

Maka mahu-lah awak simpan surat akuan ini dengan seberapa chermat-nya, dan apabila awak keluar boleh-lah tunjok-kan kapada siapa-siapa juga orang Ramai.

Merika-itu akan bawa awak dengan selamat-nya kapada mana mana Pegawai Tendra atau Pegawai Police yang ber-ketempatan hampir sekali.

Jika lebih daripada s'orang menolong awak merika-itu boleh berbagi bagi wang itu di-antara-nya.

TO ALL MCP PERSONNEL: THIS IS YOUR GUARANTEE OF SAFE CONDUCT!

In order to guarantee your safety while you are leaving the jungle to come out,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will pay a reward of \$500 to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ssists you to surrender to the authorities.

So hide this leaflet carefully with you, and when you are coming out show this to the masses. Then they will lead you safely to the nearest Military or Police Officer.

If more than one person is assisting you, they can divide this sum of money among themselves.

1950 年代的安全通行证，任何提供援助的平民可获 500 元赏金（华、巫、英文本）。

Liddell Hart Military Archives, King's College London, Stockwell Papers.



如果你餵那些馬共惡狗，牠是會反咬你的！



英人针对新村居民制作的宣传海报。

Liddell Hart Military Archives, King's College London, Stockwell Papers.

岛内陆，到其他地方，有些甚至去了新加坡。一切都按照指示，进行相当顺利。可是在边境地区却有 500 多人。如何把他们转移去泰国的城镇和乡村？我们对当地不熟悉。

马来人比较容易。那时我们有约 200 至 300 位穆斯林党员，把他们分散到乡村比较容易。可是，华人就困难了。他们大多数是马来亚华人，不懂得讲泰语，于是我们决定慢慢地遣散他们。但我们掩饰我们的目的。我们没说要停止武装斗争。我们对他们说：既然情况到了这地步，我们得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因为你老了，你的健康很差，你还是离开森林好。我们安排他们一些住在城市，一些住在乡村。其中一些如果有联系的话，甚至可以慢慢到中国去。我们的指

示是停止公开活动和公开行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三个人一组渐渐定居下来。当我们达到某个程度，譬如说把数目减半，或减超过一半，人数剩下约 200 时，我们才会继续。那时，我们将向所有的人宣布我们将会停止武装斗争，以及会尝试把他们送去中国或在泰国定居，或送或偷渡他们回马来西亚去搞地下活动。因为所剩下的两、三百人，我们当他们是非常可靠的。

当我们达到目标，约剩两、三百人时，中委会慢慢一个一个慢慢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本人第一个出来。因为如果我不出来，所有的警卫和后勤会被绑死，我们不能解散这些人。我们唯先解散中央机关，然后州机关，慢慢的，一步步。于是，我第一个出来。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如果我迟一点出来的话，由于我已经出来公开亮相，到处都有我的照片，如果敌人侦察到的话，他们就很容易侦察我的行动。所以，陈田和我出来。

当我到了中国，局势变了。我调查他们对东南亚最近未来局势的评估。他们预料东南亚的局势会起剧变，但却不太确定时间要多久。当然，那肯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剧变。就是说，印度支那的革命最终将达成目标。我们预期它会发生。一些人暗示在五年之内。我不相信，我说最少十年。如果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武装斗争，就得准备至少再打多另一个十年，可能要更长。于是，我们中委之间，讨论了又讨论，最后我们达致结论：我们得继续下去。于是，我们就停止调人的计划。那时候，我们的势力已减到 300，有人说只有 250。然后，我们定下新的政策，我们叫它作‘新方针’，新的方向。于是我们恢复武装斗争。

原不二夫：那是不是刚好你在 1961 年抵达北京的时候？

陈平：我想我们开始时是在 1962 年。

原不二夫：那为什么只有到了 1968 年武装斗争才重新展开？

陈平：不。我们首先得稳住泰国的基地。好多我们放弃的村庄，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了。以前，他们在五十年代在那儿活动。因为他们骚扰村民，我们把他们赶了出去。过后，他们跑去泰北的山野，叫金三角的地区，就留在那儿。他们的年青一代接受训练，以准备他们的回归。于是，当我们部队很弱，我们影响力削弱时，他们回来了。

谢文庆：是不是战时那批也获得 136 部队支援的国民党派？

陈剑：不。那是另外一批。这一批是从云南来的。

陈平：这些是国民党七十三军或七十四军。〔陈剑：是七十三师〕对，七十三师。起初，他们是在缅甸，然后被缅甸军赶走，要不然，中国军队会进来打他们。所以缅甸军得把他们赶到边境地区去。〔此时，主持陈剑指出讲座还剩约半天，却要概括四十个年头，而过去的一天半只讲完了二十个年头。他指出对话必须加速。为加速讨论，陈剑请杨进发下一个发言。〕

杨进发：我很想问两个问题。从 1961 年到 1989 年这段期间，陈平是在中国，从来没有回访或身在泰南的主力部队所在地。瞧，如果你要进行一场革命，以党员的身份去干，我问你，与其从北京发号施令，为什么你不回来跟你的本身的军队在一块，领导他们，以及比较靠近吉隆坡这个中心？那是其中一个问题。第二，我感到不解，在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从 1947 年以来就担任党领袖，那么的久。难道说没有人有能力说：‘瞧，现在有选举了，我们有新人起来了吗？’或是说，是没有能者愿担任这个职位？我的意思是我对这点很有兴趣。

陈平：我离开去北京时，并不是我的决定，是中委会的决定。中委会决定委任代总书记在泰国接管我的职务。我们决定了之后，我们



达致结论要继续武装斗争，我立即呈上我的决定，要回来，回到边区，但中委会不赞同。他们说：既然很难得去外国，你就该利用这些时间，最少三、五年去学习有关经验，然后才回来。过后，我想我还是辞掉我的职位，以便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回去，其他人可以接手。那也不被中委会接受。我充分了解到我的地位很微妙，但没有中委会的决定或违反有关决定，我都动弹不得。应该是再过三年吧，我再次呈上建议，是我回来的时候了。

**杨进发：**他们以什么理由拒绝呢？我是说你应该说服他们。你有要回去的强有力理由。他们是持什么理由反建议你不可以回去呢？你太重要了？或是为了保安原因？

**陈平：**他们没说。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用无线电通讯，有规定信息不可太长，否则很容易被破解。他们就只是说不行，而我就说我要辞职，他们还是说不行，我再重复。为什么呢？我可以猜到原因。他们的最主要考虑是我的安全。他们没说出来，但我知道。为什么呢？在我离开森林几个月后，政府方面知道了。因为首相突然间发表了一项声明：如陈平被捕，我不会处死他，我会送他出马来西亚，去另一个他所选择的国家。从另一个情报来源——当然，我们有人在他们的侦查系统里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报。他们获知我要离开了。消息在我起程前传来。政府现在密切监视从泰南到曼谷的所有事物。〔安东尼·保罗：是不是驻在宋卡的马来西亚政治部，在那儿严密监视你的联络官员？〕他们是否知道我要离开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或许那可能是误传。我们有经验，有消息只是放出来误导我们的。后来当东姑发表他的声明时，我们非常肯定他们是知道的了，甚至可能连我的计划都知道了。我的第一项计划是住在曼谷，以监督我们人员的调遣。突然中委会发出指示，叫我即刻离开那儿。我于是得离开。

**利昂·康伯尔：**你什么时候受指示离开？是那一年？

陈平：1960年底。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到情报，政府在监视。就因为这样。我们跟泰国方面进行安排，泰共协助我们。他们说最安全的时间是1月1日新年那天，因为新年这一天他们都喝醉了，比较容易过关。〔笑声〕于是，在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我离开营地。第二天是新年。他们认为最危险的地区在春蓬（Chumphon）一带，靠近克拉地峡。

利昂·康伯尔：是不是靠近缅甸边界的地带？

陈平：现在是不需要经过缅甸的边界了。现在从合艾有一条战略公路直穿向北。在那个时候，我们得迂回绕行。

12月31日我出来，我坐脚车出来，是乘客。黄昏时分，我们行向大路，绕过合艾。我们不敢进入合艾，先转西，然后转向北。那个晚上留宿在博达伦（Phatthalung），在宋卡湖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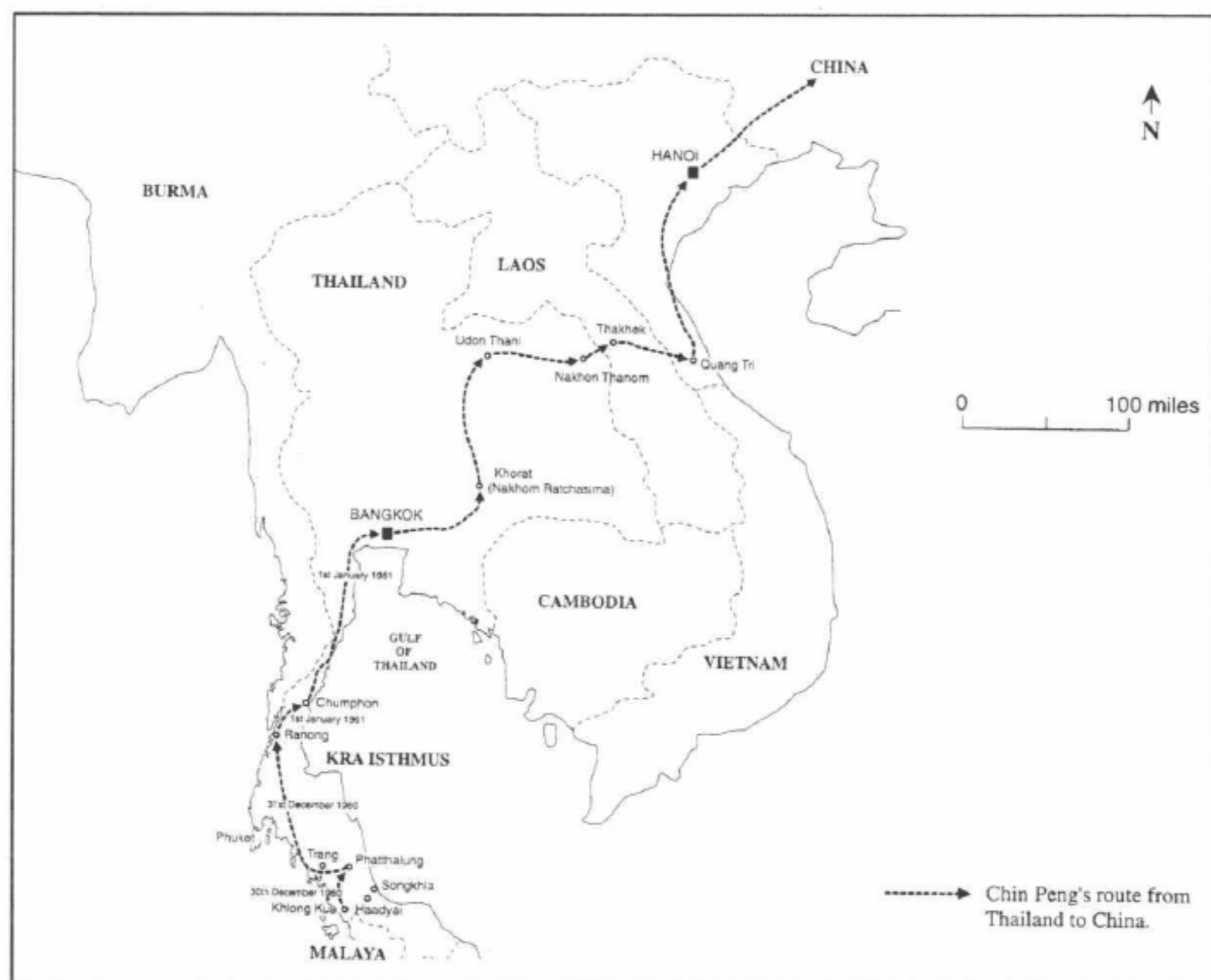
第二天是新年。...。不，不，更正，第一天我想是12月30日，我在博达伦留宿一晚。第二天12月31日，我们向北移。要向北移得先走向西，经过董里（Trang），然后沿着西海岸，靠近普吉一带。但我没去普吉。那时候，普吉还未商业化〔笑声〕，直往维多利亚角对面的拉农（Ranong）。我在拉农留宿一晚。于是，我得转向西，再转北，到达缅甸边界，泰缅边界。然后在第二天，新年那一天的早上，我们向东走，去春蓬。<sup>2</sup>

---

2 陈平的出走也在1998年6月15日的《亚洲周刊》描述，为丘启枫特写文章的一片段。两者所述只在细节上有不同。《亚洲周刊》描述陈平从泰国的 Khlung Kua 步行出发，然后骑电单到博达伦（Phatthalung）。文章还说陈平途中停在柯叻（Korat），因为吐血和失去知觉十分钟，被人力车送去乌隆府（Udon Thani）（他就住在这儿的酒店）的医院。数天过后，陈田等人跟他会合，然后在夜晚从那空柏依（Nakhon Thanom）渡湄公河到寮国的他曲（Thakhek）。当他们于次日跟寮共在西岸时，被政府部队发现。他们潜逃，因为

利昂·康伯尔：你一直是骑脚车吗？

陈平：不。从博达伦开始，泰共给我们弄来了一辆爬山车。〔佐摩：有一辆电单车〕。对，起初，我们驾一辆电单车，然后用爬山车。他们这样子安排：爬山车有两排座位，前排是司机，我坐中间，另一边是一位泰国女士，扮成我的妻子的样子。第二排是该女士的丈夫，和另外两个人，加上司机总共六个人。万一有任何检



陈平在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从泰国到中国的千里行程。

卡尔·哈克 (Karl Hack)

严重缺水，他们得从水牛弄浊的水坑取水喝，甚至喝本身的尿。逃脱之后，他们向东步行，然后进入解放区内的第 13 号公路。他们到达寮、越边境，然后乘直升机前往广治 (Quang Tri)。



查，我只是假装睡觉。坐在我旁边的女士会应付他们，因为她是泰国人，泰语很流利。

加米尔·麦克基：她是华人吗？

陈平：我想是吧。在那五个人之中，可能有些是混血儿。于是我们来到并经过了检查关卡。其实他们全都醉了。〔笑声〕他们甚至不看我们一眼。我们只是停下来，然后穿过检查站。他们没查我的文件。我有伪造文件。那一天晚上，我们抵达曼谷。过后在半途停留。在我们抵 Chumphon 后，就吃早餐，然后从 Chumphon 直到曼谷。我们采取措施，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可能知道一些东西。现在，我尽所能去查核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到底政府确实知道一些什么东西。<sup>3</sup>

利昂·康伯尔：我相信，然后你去到了河内。

陈平：对，我在那儿留了一段日子〔利昂·康伯尔：过后，河内的中国军机把你载走〕。不是，其实是苏联军机〔利昂·康伯尔：直飞北京吗？〕。不对，对不起，是从寮、越边境，靠近 17 纬度的分界线。在直升机上是苏联机师，我们飞到最南部省份的首府。我想我们是在 Ko Ha Tinh 省。<sup>4</sup>

我到那儿后，在那儿住一晚。第二天越南派来他们本身的苏制军机来载我去河内。我在那儿等一段时日，花一些时间跟他们讨论，因为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要访问一些地方。我去了奠边府。那儿

---

3 看来，问题是在于春蓬是个驻军市镇，设有检查哨站。

4 原注：陈平，Ian Ward 及 Norma Miraflor 合著的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第 148 页，说明该地点为省会洞海 (Dong Hoi)。译者附注：查北越最南省份实为广平 (Quang Binh)，省会为洞海。Ko Ha Tinh 则无从考，疑有误。

发生了两次著名的战役。其中一次是结束关键性战斗的奠边府之役。另一次是由法国名将指挥的和平（Hoa Binh）战役，他们吹捧取得胜利。我到了那儿，参观那儿的展览馆和博物院，他们向我讲述战事的整个过程。<sup>5</sup> 最后，法军被赶出去。开始他们成功攻占，过后被赶出去，不是法军取得胜利。我想那是由拉特·塔新尼（De Lattre de Tassigny）所控制。<sup>6</sup>

**陈平：**这一章的内容，我希望暂时先不要发表，我想为期三个月应该足够。万一有什么事在我的控制之外，我请你们扣住六个月。因为我在写一些东西，再加上这涉及其他的党。所以，请暂勿公开，至到今年（1999年）底。因为它涉及我们跟苏共的关系，还有跟中国，还有……

**杨进发：**马来西亚，新加坡。

**安东尼·李德：**这就给我们有借口可以拖后了。〔笑声〕

**陈平：**我作这样的考虑，因为我还没有得到中委会的批准来写这些，因为有人跳出来就这段时期攻击我们。我也得写一些东西。

**安东尼·李德：**那么，你的北行之旅没问题。但有关苏联和中国，苏共和中共的关系是问题，对吗？

**陈平：**对，我想得包括关于我们改变政策的讨论部分。你们可以发现，当我抵北京时，当然是在中共的影响下。我寻求他们的忠告，

---

5 和平（Hoa Binh），越南北部省份及省会名。法国企图将河内周围的防御工事扩大至包括和平周围地区，可是在1952年2月，在越盟的伏击和进攻下，计划失败。

6 据《亚洲周刊》，陈平在河内约一个半月后乘飞机去北京。

也寻求越南共党的忠告。

安东尼·保罗：可以借问一个问题吗？你所写的书，需要中委会的批准吗？

陈平：当然，关于一些要点。

约翰·李尔利：我给 40% 的版权费，替你写传〔笑声〕。可是我不必取得中委会的批准。

佐摩：让我们澄清一下暂不发表内容的期限，你要暂时禁止发表的是 1957 年过后，或是 1960 年过后？

陈剑：我想陈平所指的是除了他前往北京的旅程外，其他今天下午所讨论的暂时禁止发表，为期六个月。

陈平：对。关于赫鲁晓夫和刘少奇，因为我已决定要写些东西，我要作出回应。关于北行旅程，你们可以参考《星洲日报》。

陈剑：你们也可以参考中文《亚洲周刊》，它有行程的详尽描述。

下午场继续，没有暂停。



## 第十一场对话

### 结束评语： 陈平与马来亚民族主义斗争

下午场继续

最后一场，王赓武教授受邀评介为期两天的会议，以及会议对他具有什么意义。



王赓武在澳洲国立大学主最后一场对话会。左至右：约翰·李尔利，杨进发，陈剑，陈平及王赓武。

王赓武：对于在过去两天留在这里，并有机会会见陈平的我们，这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荣幸。整场讨论，以及陈平对诸多向他发出的问题的回答，对大家都特别有吸引力。其中一些问题的细节，谈得简直就是太多了，但是，却还是有很多问题是应该提出而未提出来的。我得承认，我总是想要求谈得多一些和长一些，可却遗憾每一场终究还是得停止。由于必须有一个结束，我将简单地跟大家分享我学到了什么，并且要把我自己局限在一个单一问题内。

让我作几个评语来作为开始。第一、这是一场关于如何阐述历史和现代编史学的课。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回忆和内情，以及对此主题作过研究的学者呈现的知识，的确叫人眼界大开。这一切都自由地分享，而围着这张圆桌的诸君似乎都能以深邃的洞察力把这一切结合起来。

能够得到一个在过去那几十年中都是站在那一切的中间的活生生的主人公跟我们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非等寻常的经验。我想，这是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轻易忘记的经验。

在另一层意义上，它也是现代史的一场课。以往，败者一般上都不能现身来说出他本身的故事。在伟大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里，你，陈平，是不可能像过去两天那样，留着被‘追问’和‘盘问’的〔笑声〕。那是中国写史的传统，但我相信这其中的思想却是举世都一样的。史学家能有机会跟头颅带着悬赏金的叛乱者面谈，那的确是非常罕见。

然而，现代学术的状况却改变了这一切。结果，现在这却成了可能，而我想我们因为有了这场对话，已经是变得更有智慧和更好了。让制造历史的人，尽管他，就说法上而言，刚巧是在‘错误’的一方，亲身参与撰写历史。能够成为这个过程的其中一分子，感觉的确很了不起。



我来出身中国编史传统（如大家所知，我写华人史，像这样的会议，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诸位可以想像到，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难以置信的经验啊。

另一个非凡之处，是关于陈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本身读过许多史学家写的关于紧急状态的著作。因此，虽然他不断地说他记不起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却往往能记得在谁写的书中读到这些事。他真叫我折服，他确确实实是参阅了在这个会议室里多个出席者的著作。他承认是诸位的著作叫他记起那些事，以及有好多激起他对这些生动细节的回忆，因而能够在他们所提供的骨骼添加上皮肉。这个特定领域中，可能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全世界的专才齐集在此，这一个事实，使到这一次的独特经验非常难有第二回。

讨论的细节也引发一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还是这么说吧，你们之中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活过同样的时期，我本身也看到所发生的事，虽然往往是在距离事件本身相当远的地方。一直埋藏在我心中深处的最生动情节，现在才由陈平进一步确定。特别是，有一件事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关于那些印在我心中的事件的三个理解层次：国际，国家和本土。

在国际的层次，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斗争。我佩服陈平，他能够那么细致地记起那些他时不时收到的国际信函的内容；他和他的同志如何读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面对死敌时的国际平台，他讲述这些是如何传达给他们，或是书面文字，或是无线电通讯。了解他和他的同道是怎样密切追踪国际景象，尤其是虽然生活在马来亚森林深处，却能够追上斗争的全球层面，那的确让人眼界大开。

在本土的层面，在党员和他们所要招募的人之间，以及他们实际上



必须打击的军队和警察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我想他所形容的那些环节都是很明显地传达了。至于陈平本身参与，或直接知道，或他从当代的报告中看到的战事细节，都很生动地呈献出来了。

三个层面当中，第一个层面一次又一次地确定了这个运动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国际运动。它要使本身被鉴赏为世界势力的一部分，是能在世界史上创造出不同的。而为了要这么做，陈平和马共在本土的层次需要真正顽固的头脑。他们得跟为他们生死与共的人活在一块，高举事业的火炬，以诸多不同的方式冒着生命的风险。他们得加倍努力，以保持跟他们的密切接触，以保持他们的忠心。

但是，还另外有国家的层面，或许更好视为是国际与本土之间的第二层面。这个层面是我经过两天的讨论后还未感到满意的。或许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会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得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已经问陈平关于他对国家独立，以及他经常讲到的马来亚国家建设过程的承诺的问题。他显然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只是由外来影响造成的国际事业，而是对马共深具意义，因为如果能在任何国家，这个个案是马来亚，取得成功，那是在对国际运动作出贡献。要在那个方面取得成功，你也得双脚站在地面上，跟本土的人民打交道。

在现实中，三个层面组成无缝的网，显然是彼此互相连锁着。但是，就算是我读着你们之中多位所写的书，而现在则一连两天听完跟陈平进行的讨论，我继续感觉到这个夹在两层中间的层面没有跟另外两个层面好好地连锁起来。

环球的部分是绝对清楚的，本土的部分也一样，但我却无法在对那中间的连锁点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好像是遗漏了某些东西。

对于较大的那个故事，它又告诉了我什么呢？对摊开整个故事方式占重要地位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存在着某些根本上的弱点呢？还

是那不过是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或是就连你们大家在本身的著作中也无法解决的东西呢？因为，当讲述缺乏在中间层建立起国家思想的能力和耐力时，我们要不就简单地把它当成是运动失败的理由，要不就说这样的任务对于马共实在是太难了。

就马来亚人口的多元种族结构而言，马共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浓的华族色彩，并无法趁机利用特定的马来民族的不满，甚至是印度劳工阶层的特定不满，这些事实，意味着建立国家的理想简直就是太难了。

这并不是因为马共的领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听到陈平说，他和他的同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当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时，其领袖就知道争取所有民族的支持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但那时就是太难做到。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仅仅就是太难做到呢？还是当时在运动的国际性和为国民团结奠定基础的艰巨任务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呢？当你来到事情的真正本质时，那意味着你得跟讲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不同经济利益的人打交道，而在华人内部本身，甚至是讲不同的方言。所要填补的缺口太多了，对这些得作很多很多的工作，同时需要那么多持续不断的关注，以致要把全部这一切交织在一块儿的确是困难无比。那是真实的难题。那并不是单纯的无法实现愿景，也不是单纯的没有能力掌握民族运动实质。

在我看来，有关问题的理论层面，马共和陈平本身都懂得。但是，到了基层，你要怎样实际完成填补缺口的工作呢？当你同时有一个以大英帝国形式出现的难于对付的强敌时，怎么做才行呢？虽然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帝国斜阳的时期，英国却在马来亚有特别重要的利益。它可以撤离任何地方，唯马来亚却不会那么轻易，那是基于好几个经济和战略原因，因而，也就更加坚决要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



马共是不是单纯的倒运呢？或是说，对于一个致力于解决本土利益，招募本土人员和建立本土基地的真正国际运动，要求它也得去克服和解决建国的任务的确是很困难的，因而也为这项工作增添困难。

那是不是革命理论本身出现问题呢？尽管大家都知道得做些什么，一个国际运动确实要认真看待民族运动，是有一些困难的。那是否存在某些固有的矛盾呢？我并不知道。那仅是我发现到我无法掌握和无法理解透彻的一些东西。

在这里，我提出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像陈平所说那样，视为是自 1989 年之后出现某种的挫折，〔笑声〕是将 1917-1989 年斗争的最后目标延后的暂时挫折，或许是因为共产党总是得面对的三个作业层次上，有存在着固有的互不相容因子。

一方面，共产主义和各国共产党，对国际性，以及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意义和结果，信念非常强。参与其中者都很坚毅，精神和肉体都如此，能勤奋地在基层工作，以争取和扩大群众的支持力量。他们上头和下面都是一样的坚强。由于我所提出的理由，他们却在中间很弱。他们本身无法相当认真地看待民族主义，并因而不准备同情民族主义，因此在声称为民族主义而斗争时，就不能够真正的具有说服力和表现出诚信。那是不是一项缺陷？或许是可以争辩的，但我看到在中间的空白为根本弱点的标志。

资本主义方面，从过去约超过半个世纪所见，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形。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国际层次的弱点。如果大家看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合作或互相对话和谈判的能力，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它须要很大的努力，但却不能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达成的那样牢固，至少在初期阶段是如此。



同时，我想资本主义在本土也很弱。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公民社会已全面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经过长时间的培植势力后，这个情况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肯定的，资本主义在亚洲和第三世界本土赢取劳动阶级的支持，普遍上是很弱的。他们的吸引人之处往往集中在像个人自由和民主等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而对于第三世界人民根本就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关键性的本土利益问题上，这些自由思想罕能吸引到群众运动所需要的激情。

但是，资本主义者能理解民族主义。他们理解民族主义，因为最终每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这一层意义的民族凝集力，是他们本身的主要力量泉源，而且也可轻易回头追踪到，这一切对他们初期的成功何其重要。事实上，那也是亚洲新兴民族精英发现为最具吸引力的力量泉源的模式。要维护本身特权地位的精英集团，探索着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继续保有特权，同时在他们本身人民之间，以及对抗外敌时继续是精英，这就是他们受民族主义所吸引的秘密。

这些精英在英国和法国，及后扩大至全西欧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当中，看到了他们可以轻易掌控的东西。我想这就是资本主义对抗共产运动的国际主义中找到的致胜点。他们在每个地方都专注于特权精英，给他们这个民族主义，并激发他们，为本身的个人利益，也为他们国家的独立的真正关切，去汇集力量以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其实嘛，我们所讲西方强国和帝国，在核心上都是强大的民族国家。就算是在他们失掉了他们的帝国之后，还是保留着民族国家的结构。而这一个模式的灵感让亚洲的民族精英有某些可以响往的东西。可是，这样的希望，共产党却不予考虑，视其为仅是达到国际目的的手法而已，或是本身不受承认为合法的目标，因为那是跟本土劳动阶级的需求，简单地说是大多数的利益互相冲突。

从某种讽刺的意义而言，共产运动的明显民主动力违反了民族精英

的利益，而资本主义者给民族精英提供的东西，更能够轻易地吸引到他们。如果是垂直去看那个时代的历史，如果这里提出的对比能成立的话，那就协助我了解为什么民族主义者利益的中间地带不能够跟下层和上层相连锁。

这是共产运动所发展起来的有系统及内因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对于具有理想和喜爱有关运动所提供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受教育的一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当时存在着下层人们火热的的不满，他们深感被精英集团所剥削和欺骗。共产党知道，这是可以招募的现成和可靠的材料：那一群能够支持直接对他们有意义的理想的男女们。

但是，在我们这两天的讨论中，有个中间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关键，是我们大家需要更好的去理解的。专注于更大国际和本土的问题，陈平都为各个问题作了回答，但它无论如何却叫我留下更多的问题。

在向陈平提出的真正难回答的问题，关于他想他其实做到了些什么，最终结论又是什么等方面，我要提出一句中国治史传统之言跟他共勉：盖棺定论，就是说：在棺材封盖之前，不要下定论〔笑声〕。陈平还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不会有最后的判决。

陈平，非常的感谢你。现在，我请大家进一步提出问题。我自己已经提出一个很笼统的问题。我不知道陈平本身是否要对我提出的见解作出批评，就是在中间的那个空洞，那个夹在国际和本土的中间层，这是不是他也认为是在任何马来亚革命史中所必须了解的东西。

下午场继续，没有休息。

## 第十二场对话

### 终场讨论

工作营最后一场

王赓武：我提出了一个笼统的问题。不知道陈平本身要不要对我提出的，就是关于中间那个空洞是需要加以了解的这一点作出批评。

陈平：我同意你的说法：中间那一层需要进一步作调查研究。我得再想过〔笑声〕。

王赓武：你想那是不是你的党里头缺乏的一样东西？我是说，在你本身的同道之间。我的意思是，我不可以对他们作判决。

陈平：是，但我不能马上给你答案，我得再想过。

安东尼·李德：我看不出那对中国和越南会是个问题，可能正好相反，在我看来陈平的问题更加困难，因为马来亚不是个民族国家，从来不是，而且在马共举事的时候，肯定也不是民族国家，但我要提出你所提出的相同问题，或许那...

王赓武：简直就是太难了。〔笑声〕

安东尼·李德：其实，我的意思是要更简单地来问这个问题，关于



为什么他想他们会打输了，是因为某种根本上的错误，以致整个斗争被错误理解，或只是因为一、两件事，以及它是否是值得的呢？

陈平：首先，我要讲几句。我要感谢东尼·保罗先生和李德教授提供这个机会让我来参加这个工作营。没有他们的协助，或许这将是不可能的，或许得再等一或两年之后。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你们。其次，我想现在，从苏联集团瓦解开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重新和解的新时代，寻求普遍的缓和。就是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

既然冷战已经结束，冷战心理就不应该再保留了。冷战心理，我是指按我的理解的定义：用思想意识来判别人类，如果你相信这个就是好人，相信那个就是坏人。或者，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要嘛就必须同意我，成为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敌人。没有中间立场。九十年代开始以来，我想啊想啊，我是不是犯上了什么错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有错。

直到现在，我可说出这个暂时的结论。我得进一步调查研究。但是，我想至少我致力于追求公平社会，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含意——追求公平合理的社会——我想那是没有错的。至少基本观念是没有错的。其他的当然我们可以争辩、讨论。我不期望你们每一个人，或者是你们中的多数人会赞同我。我只是提出我的观点，让你们考虑。我想人类社会是要向前移进的。可能要花上另一个一千年来全面达成，或是基本上达成，这个理想。我想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我想没有人会争论这一点：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是对的〕。但这当然是意味着我们会有不同的观点。

第二点，关于军事上的失败，在我们对抗英国的战斗中被击败。那是到1960年结束的第一次紧急状态。这得看你如何理解和定义失败。从我的角度，我想我们至少取得一些成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打败了，我们未能实现目标，成立一个由共产党人主导的政府。或用我们的话，一个人民政府。可是，在迫使英国人让马来亚

独立方面，我们并没有失败。没有我们的战斗，我想英国人不会让马来亚独立，或是得等很多年之后。据罗伯特·汤森（Robert Thomson）公爵的说法，在他去世前，他承认我们至少加速了独立的步伐 10 至 15 年。英国广播电台的人告诉我的。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我抵达伦敦时，他已经去世了。甚至在其他那些指我们全面被打败的人的理解中，我想我们从未丢脸出丑。至少我从未投降，同时至少我感到骄傲，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我的运动和对我们的那些支持者。我们能够对一个强国，世界级的军事强国进行长达 12 年的战斗，军事战斗。我想这是项伟大的成就，而这也是 20 世纪里，大英帝国版图中最长和最大规模的游击战。如果你看看这个 20 世纪，在英国统治下的国家，如果他们进行斗争，造反或起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坚持像我们这样长的时间。在希腊，他们条件非常有利，有外援，但却只是维持了几年，并在英国没有给予任何让步下结束。肯雅的毛毛运动只有几年，英国就让他们独立了。或许还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国家，....

**插言：**如果你不把印度定义为战争，...，或许赛普路斯...。

**陈平：**不，印度没有战争。当英国政府发现印度正处于〔行将引起〕大造反或大暴乱边缘时，就即刻作出让步，让印度独立。我还记得在 1946 年，孟买发生雇佣兵叛变，被英国军镇压〔安东尼·索尔德：是印度海军〕。对印度海军。如果英国不作出让步让印度独立，我想就会出现连串的造反起义，英国无法镇压。当他们决定让印度独立时，我想他们了解到印尼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力量。事实上，是英国对他们展开最先的攻击，为法国和荷兰的到来铺好路。我想那是历史的事实。

就算你们说我们失败了，英国这个强国，动员了共和联邦的资源，包括澳洲，纽西兰，菲济，肯雅，尼亚萨兰（Nyasaland，译者注：今为马拉维 Malawi）和尼泊尔率加兵，罗得西亚，用这么大的军力来对付区区 8,000 人的游击部队。他们得用上 12 年的时间来结



束它。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很骄傲。而为了结束这一切，他们得作出让步，允许独立。不然，他们无法收场。如果在那个时刻他们拒绝让步让马来亚独立，马来亚也许要变成另一个越南，如果马来人加进来，当然是包括马来军人和警察。我想他们非常聪明。如果用另外一个字眼，他们非常狡猾〔笑声〕。

另外一点：这是我慢慢才认识到的，在我读到关于战后时期缅甸和马来亚的一些事情之后。在英国的统治集团当中，对于如何处理有关运动，在马来亚和缅甸的独立运动，存有分歧。看来，至少是在蒙巴登和他的顾问，及那些当道势力，那些前殖民地官员，那些大商家，矿主，橡胶业利益集团之间有分歧。但是，就马来亚情况来说，我最近才读到维德·巴素（Victor Purcell）的回忆录，提到关于蒙巴登和英国军政的分歧。

关于缅甸，如果你们有看英广的电视节目《谁杀了昂山？》，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提供了好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铁证，英国总督如何通过杀掉整批人来破坏艾特利和昂山的协议，在独立前夕，把将近整个内阁的阁员全杀掉了。我在想，如果另一个较开明的一派，较中庸的一派，如果他们的政策主导，缅甸或马来亚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印度，庆幸是艾特利的政策主导。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庆幸那政策主导。如果邱吉尔的政策主导，〔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邱吉尔顽固反对给予印度独立。在邱吉尔去世时，艾特利在他的悼词中，他称赞邱吉尔，同时却也批评邱吉尔。那时候，邱吉尔反对他的计划。

那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人死后，你通常是赞美他，你绝不可以用那个场合去批评他。当我读到那悼文时，那时是身在北京，我感到奇怪。因此，在那个时候，如果英国政府不给印度独立，就会有大的动乱。当然，大的动乱会带来大量生命和财物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当庆幸是艾特利的政策取得主导。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从马来亚斗争的角度，如果艾特利的政策失败，将对我们和对东南亚有利，因为英国的军队会被牵制在那



儿。他们就没有军队可用。英国的军队主要是印度兵。<sup>1</sup> 英国人若没有了印度兵，在远东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王赓武：**所以，你的不幸，是因为马来亚在经济上价值很高，印度却不是〔笑声〕。

**陈平：**印度的经济价值也高。

**王赓武：**假使得跟印度打仗就不值了。

**陈平：**他们有丰富的资源，人力和物资。我的主要结论是，我们并不能施用某个公式，死公式——就我的经验——并不是所有的敌人都是反动的。就算是在伦敦，他们之间也有分歧。遗憾的是，在40和50年代，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杨进发：**在民族主义层次，我们未曾真正讨论的是革命的条件。安东尼·索尔德教授昨天有提到，但我们没真正探讨。〔在50年代〕条件看来很不成熟。是些什么人参加共产运动呢？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海南人。而在整体上，经济条件也帮不到什么。整体上，经济在成长，日益繁荣。看看银行业，船运等行业。华人中，70%享受着美好的生活条件。

如果我们看看萧条时期，〔相对上〕萧条时期理应是共产党人最好利用的时期，可那却是最弱的时期。在战后的年代，1946至1948年，条件不是那么好。于是你们有良机去动员劳工。但是，过后是

---

1 举二例，紧急状态爆发时，马来亚总共有相当于13个营的军队（其中10个为正规步兵营），其中7个营为辜加兵。到接近高潮期时，总兵力约20个营，辜加兵占8个营。

1951-53 年的韩战，经济条件再度大大改善。<sup>2</sup> 因此，社会和经济条件都太不成熟。那是一个方面。这没有讨论到，而可能是失败的关键所在。你不可能突破，只可能造成仿害。

现在来到第二点，是英国这一方，它是以相当强的姿态出现的。英国人有 150 年的管理经验，不单单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还有很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首先，如果先看看海南人，他们在一份政治部提呈给总督的报告中说：把共产运动局限于海南人，确保它不牵涉其他〔籍贯的〕人士。<sup>3</sup> 然后，来到 1929-30 年时，马来人加进来时，政治部则确保华人和马来人不参在一起。

当我们来到战后时期，当然是有一点不同。整体而言英国人是实行分而治之。但他们也有采用合作的政策。他们比较喜欢陈祯禄和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在 1949 年获得葛尼的祝福而成立。就是说，英国人选择他们的合作者。

紧接战后，有马来亚联邦的计划。马来亚共产党那时很强，但却从来未被咨询，因此，一开始至终都是马来人主导。<sup>4</sup> 他们坐失时机。于是，英国人找合伙人政策，和分而治之政策，成功了，而加上很不成熟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你们所能做的并不是太多。

还有两项较小的点。

---

2 韩战导致对马来亚出产的物资，如橡胶的战略囤集，使价格飞涨，工资相应提高。

3 杨进发在其著作中更详尽讨论此点。参阅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4 此论自马来人新成立巫统反对 1946-7 年马来亚联邦之后皆属实。原本，马来亚联邦计划是要促成华人更大程度的融合，为建立超越种族‘马来亚民族’铺路。英国人在取消马来亚联邦殖民地计划，推出马来亚联合邦（恢复保障马来主权和权利）后，还继续希望慢慢地说服马来人接受更具‘马来亚化’之观点。参阅 Stockwell, *British Policy and Malay Politics During the Malayan Union Experiment* (Kuala Lumpur: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9)。

我想共产党有做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在促使社会对需要改善社会状况的觉悟，促使工人能够更有力和更有效地合作来面对资方方面的成功。其中的一些条件，如共产党在 1930 年代极力争取的每天工作八小时制，最后是实现了。更不用说独立了，对我来说，那是加速提前了。共产党向英国施加多一些压力，迫使英国人移交给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最后一点，在冷战时代，冷战来到时，有两个阵营。你只不过是环境的受害人。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实在是太小了。在那种冷战局势下，英国人不能容忍共产党人，就算是他们之前曾经是盟友。于是，他们必须消灭马共，完全不给他们任何机会，或任何宪制方面的让步。

**约翰·李尔利：**作为陈平总书记的同代人，以及曾经参与紧急状态一些活动的人士，我要对你说，我是如何激赏你竟然还好好地活着。你比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等革命同道活得更久，就连让人心惊惧怕的波尔博和其他许多跟你在 1942 年非常勇敢地走入森林的同代人，也都是去世了。因为如此，你应该受到钦佩。

从历史的观点，我相信这一点，紧急状态对马来西亚人将永远都是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最后的独立。

但是，从世界史的观点，那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篇章结尾的一个注脚。那是场丑陋而肮脏的小战争。两造都有很多暴行。马共开始一场他们知道在没有外援下不可能胜利战争，而他们在苏联，中国和越南的友人却出卖了他们，因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实际援助。他们都很肯告诉马共要怎么做，但在协助他们实践他们的忠告方面，却从来就没有任何实际的资助。

两造都造成很多平民被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甚至欧洲人，以及那些在我的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阿沙原住民。

英国人在紧急状态的行为令人蒙羞。他们宣布紧急状态，方便把战事局限在内部，在马来亚，因而不会有来自联合国，或任何外国的干预。他们对待俘虏如普通罪犯，经过非常滑稽的所谓审讯，吊死



好几千个人〔安东尼·索尔德：几百，不是几千〕。我出席过几次这类审讯，因为抓到他们的人必须出庭作证，那些审讯的确滑稽。英国人从紧急状态获得的表扬，说他们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共产党击败的帝国。他们从中所得就是这个。最后，他们得撒手离开，交给马来人接手。

最后，我钦佩你在紧急状态的12个年月里担任马共总书记。可是，我要提醒你，爱尔兰人一直在说他们打英国人打了六百年〔笑声〕。

陈平：可是，那不同，不是连续地打〔笑声〕。我忘了讲，在这个世纪〔20世纪〕我想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好几个年头，第二阶段是从1969年到现在。就那个目的而言，英国人并未动员武装部队去镇压爱尔兰人的运动。

约翰·李尔利：其实，他们不需要那么做，因为爱尔兰人替他们做了。

利昂·康伯尔：如果大家能让我也讲几句话，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集会。就如王赓武教授所说，我想这是史上第一遭，在大家的出席下，汇集了敌对双方的代表。据我所知，今天在座的，有四位在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中积极参与剿乱行动。三位在军队里：顾德斯将军，澳洲兵，约翰·李尔利〔安东尼·索尔德：爱尔兰兵〕〔笑声〕，当然，他其实属于马来亚侦察兵，以及索尔德教授，苏格兰兵〔更多笑声〕，其实是随英军在此国民服役。我这个小人物是在邪恶的政治部里头。对于我，今天来这里听陈平你这一方的故事，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视窗。也看到你那么能干地在48小时中应对不断地抛向你的提问。我可以说不，那几乎是跟政治部盘问差不多，但不能说是一样糟〔笑声〕。

陈平：但没有施刑折磨。〔笑声〕

利昂·康伯尔：这一回，只是第一次的会面。〔更多笑声〕

王赓武：你表现得像个好警察。〔笑声〕

利昂·康伯尔：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王教授已经作了总结。约翰和进发和每个人都总结了。对于你的自我克制，以及你那么奇妙地把这一切信息保持在你的脑子里，还愿意在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坦白地说，我要表达非常非常的谢意。我可以想像将会有很多人急切地赶着去写文章，用你提供，到现在为止未面世的珍贵资料。这本身就是很独特的，我想，从历史意义而言。我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再见面。

诸人：代表我们全部人。〔掌声〕

陈平：或许我要加一些说明：为什么我们被迫，被逼展开武装斗争，武装对抗全面的镇压行动。一直以来，我们都视本身是处于守势。在我从香港回来后，我们开中委会议，我们还是考虑要如何加强和平斗争。我们还是在设法如何把我们党的地位从地下走向公开、合法。我们决定慢慢使我们的组织公开，不再保持秘密。我们决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其实，我已经搬去那儿，住在党部〔陈剑：奎因街〕，在奎因街。所有这一切都在进行着，慢慢的一个又一个会过来，然后我会公开我们的中委会。

只有在1948年1月，当我开始检讨我们的政策时，才停止这一切，取消了所有的计划。你可说那是匆忙决定的。我只是要加这一点。因为我读过一份报纸的报道，说我们一路来都保持在地下，地点保密，像是某种搞阴谋的组织。那是他们用的形容词。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向公开，如果我们地位公开，有合法地位，就不可能会有政府的渗透，并在最后夺取我们的最高领导职。这就是为什么莱特能够在党内混这么多年而没被揭发的其中一个原因。

王赓武：我想我们大家真的都累极了，而陈平你看来到了最后还是精神抖擞。我想里昂·康伯尔已经代表我们感谢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切。我得再加上一点，代表我们大家谢谢东尼·李德和澳洲国立大学把全世界十多位本题目的专才集在一起。对于不研究这题目的其他人，这集会让我们有机会学习那么多的东西，而过去的两天真的是很了不起的经验。我自己本身也要这么做，谨代表大家，不只感谢陈平，也感谢东尼·李德和澳洲国立大学使这个集会能够举行〔掌声〕。

第二天下午场结束。工作营结束。



# 引言

这个部分主要收编与陈平会面前，由各学者写来激发讨论的文献，从对一个关键时期提出简单的短短几个问题，到详尽的背景简介。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治学方法都对最后的结果作出贡献，因此也就全部被列进来。但是，也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也同时对马来亚紧急状态最具争论性的问题提供尖锐聚焦的精辟见解：对这场冲突进行研究最杰出的多位学者的见解的精华。

这些文章在会议的数个星期和好些天之前传给陈平和每一个与会者。现在把这些文章，在没有改写成更全面的文章情况下，刊登在这儿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揭示口述历史的整个进行过程——历史思维的底面——附加上集合起来，最后搞成这项对话的所有议程，观点和治史方法。往往，读者都读到的只是表面文章，所埋藏的历史过程比所揭示的还多。

为了不要掩盖口述历史的过程，或是排除任何可能有利于理解跟陈平对话的任何东西，我们收录了所有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基本上以当初呈现的面貌刊登，若有更动，也只限于非常需要的部分，为的是使内容更加明确和准确。我们甚至把原本提问的问题包括在内，因为那在刺激陈平和参加者方面非常重要。

第二部分的文章是会后的研究报告，只有一篇，那（第 3.15 章）是陈剑在对话会中取得新的资料后，陈述他对陈平生平的独特见解。



## 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 至 1942 年概况

杨进发

战前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主要是由于其秘密性质，有一段波折重重，充满阴谋诡计及间谍特务活动的历史。有高潮和低潮，在推动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事业中有喜，也有悲。

马共的战前史可以方便地分两个时期。第一段从 1921 年起，至 1930 年止，相当部分的成员来自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影响。第二段时期从 1930 年至 1942 年，是在取得蓬勃发展和巩固势力之前那一段为生存而坚强不屈地斗争的日子。

在整个战前历史上，英属马来亚的内部状况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外来激素作出积极有利的反应，使激进运动成为可能和可行。其内在因素，包括工人阶级的崛起，民族主义华校系统的成长，华文出版和印刷业的扩充，以及华人社会内部从 1870 年代起不断的政治化过程。

来自中国的外来激素，如 1915-21 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21 年的五四运动，1925-6 年的五卅运动，以及 1927-8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都对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重要的政治冲击，包括传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思潮，以及越来越大批的中共干部逃到英属马来亚境内。



1930年代，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45年）的爆发，在马来亚华人中制造了前所未见的危机，后来体现为抗日的民族主义思潮。马共对此加以利用，组织了多个抗敌后援会，罗致群众支持，同时扩大其群众基础。陈平当时是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活跃分子，他在吡叻的实兆远参加学生抗敌后援会，然后在1940年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

比较上，说战前的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外来激发，哺育和维持的运动并不能说是不对的。

## 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特色

有数项可以看得出的特色可以加以阐释。

### 1. 参与者的社会阶层

马共主要是知识分子及工人阶级的运动，由知识分子和工运领袖控制党领导层，华校生、青年和工人则组成其基层。但是，从1937年起，有华商参与敌后抗援会的领导和运作。

### 2. 政治取向

1930年以前的时期，党领导，党员和党目标等方面都比较倾向中国。证明这一点的一个个案是中国共产党的南洋临委（1928-30年），那是中共的一个海外支部。1930年以后的时期，就比较具有马来亚导向，证据是它采取‘马来亚’作为党名。从1936年起，马共动员马来亚工人争取社会公正，并选举更多在马来亚出世的华文教育知识分子进入党中央，这一切都显示党朝向马来亚化的取向。

### 3. 党的思想和愿景

马共在1930年4月成立后，在英属马来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一直都是该党的长期愿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共似乎是在 1930 至 1935 年期间，思想比较激进和激烈。例如，在 1932 年，其《12 点革命纲领》包含了好些激进的条文，如赶走英国政府、马来统治精英、地主和买办资本家，以及充公西人银行和‘反革命’势力的一切财产。比较上，1938 和 1941 年所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群众路线，马共的思想，也推崇国会民主和人权。

#### 4. 手法与策略

1928 年，马共采取暗杀来访国民党高官的政策，并在一项鞋业工潮中向制鞋厂业主的店投弹。1930 年代，马共同时（在工潮中）采用马克斯的阶级路线和毛泽东的统一阵线群众路线，乘机利用抗日民族主义（敌后抗援会），取得相当的成功。抗援会领导的抗日示威往往导致暴乱和冲突。

#### 5. 种族性

尽管是具有良好的意图要尝试使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多元种族运动，马共却只是取得极有限的突破。马共大体上是个华人的运动，直到 1935 年，马共领导层是由中共干部和海南籍共产党员所支配，过后，才有更多的非海南人和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参加党领导层。除了莱特，来自爪哇前印尼共产党员素丹·日乃因（Sutan Jenain）据说在 1936 年曾担任马共的中委。

#### 6. 英国的镇压

马共及其统战组织很容易被政治部渗透，如莱特的情况那样。为了打击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英国人动用了大量的法律和立法机制，包括善加利用社团、印刷、学校注册、煽动性刊物、外来移民法，驱逐法令和紧急条例等等的法令。此外，执法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庭，华民事务署，政治部和其他各情报收集组织都用来使马来亚共产主义陷入绝境。在殖民地总督中，从金文泰（Clementi）

到珊顿·汤姆斯 (Shenton Thomas)，都坚决地把马共视为‘头号敌人’。只有到了 1941 年 2 月 20 日，马共才正式取得自由活动的正式合法地位。那时候，槟城已经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

## 主要事迹

### 1. 砖头和灰浆

1941 年时，马来亚共产主义已经走过漫长的路，正在大展政治和工运的拳脚，要对马来亚政治作出冲击。它造成严重的威胁，对殖民主义统治造成难以形容的忧患。这时，它已经是个难以对付的政党，估计有 5,000 党员，还没算进 40,000 个敌后抗援会的会员和 50,000 名马来亚总工会的会员，当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总人口才将近五百万。

这就是这个未来运动的第一个，或可能是最重要的事迹，那是一个在数目，思想和组织上都具有强大和稳固基础的运动。在英国人的祝福和援助下，马共很快地把党变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支拥有几千人的军队，有武器和受过游击战的训练。没有这一段事迹，根本就无从想像后来会有 1948-60 马来亚紧急状态这回事。

### 2. 动员群众的经验

第二项事迹是战前马共在发动群众的广泛经验。这些经验和动员技能和手法，使他们在战争甫结束之后处于极有利的地位，他们当时成功组织大型工会和煽动罢工。马共领导的泛马总工联在 1947 年 4 月宣称控制了马来亚境内 80% 的职工会，共有会员 263,000 名，相等于总劳动力的 50% 强。也就难怪当时英国驻东南亚总督马尔康·麦当劳 (Malcolm MacDonald) 要在 1947 年 6 月 26 日举行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共产主义威胁’的特别会议上，把这个对手封为‘头号敌人’，当时是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前一年。



### 3. 1936 年起在马出生党领袖之崛起

在 1936 年，10 位中央委员中，只有蔡白云总书记一人是在新加坡出生。1939 年，党中央的 15 位中委中，至少有 3 名是在马出生或在马受教育。日据时期，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袖都是在马出生的。

### 4. 马共的致命弱点

战前的马共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多元种族运动，导致了意料中的结果。那代价证明是很昂贵的，因为这个遗迹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成了其致命的弱点。



## 马共、莱特和日据时期： 1942-45 年

明石阳至

新加坡在 1942 年 2 月 15 日沦陷后，日本宪兵和驻军在 2 月底和 3 月展开了系列的运动，取名肃清，目的是要歼灭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的抗日份子，大多数指的是华人。<sup>1</sup> 可是，主要的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都逃脱了。

与此同时，由英国 101 训练学校所训练，主要由漳宜监狱释放出来的华人共产党员组成的游击队，已经在新加坡沦陷之前分散到马来亚半岛去了。他们后来组织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中队。到 1945 年 8 月战争结束时，八个独立中队已经成立，分散在全马各州。

日本宪兵继续搜查躲藏在昭南（日本占领后之新加坡）的逃脱共产党人。在 3 月的某个时候，宪兵警官从报告者那儿获得情报说黄绍东躲藏在闹市里，跟他的情妇住在一块。那位警官把他逮捕了。略施小刑，他招认自己是莱特，马共的总书记。为了交换他的性命，他愿意成为日本宪兵的情报员。

---

1 在新加坡，这项行动开始时称为‘检证’，指新加坡男性被检查，过关者获一印证，抗日份子则隔开处决。从 1942 年 2 月 18 日开始，全岛共有 28 处或更多的检证处。



在莱特的串谋下，大西觉宪兵部成功逮捕了昭南岛的马共主要领袖和普通党员，包括林江石，黄耶鲁，<sup>2</sup> 小黑，并使马共活动不能展开。利用莱特提供的情报，日军在 1942 年 9 月 1 日在吉隆坡郊外黑风洞对马共作了最成功的狙击。当时，马共领袖集合在那儿，打算讨论未来的策略。日军杀死和逮捕十多位主要领袖。黑风洞事件是马共——抗日军在战时遭遇的最沉重打击，暂时破坏了马共的最高领导组织。

虽然遭受如此灾难，在几个月内，马共——抗日军重建其组织，并招募更多人员扩大军事力量。其党员估计在战争后期达到整万人。马共——抗日军的战斗力也因马共——抗日军和英国的 136 部队在 1943 年 12 月签署合约而告增强。英国以空投向抗日军提供粮食，武器和弹药，药物及人员。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马共——抗日军部队从森林出来，要求日本军队投降，把武器和弹药交给抗日军。大量的多余武器和弹药因而在违反联军的投降条件下，由日军交给抗日军。

日本投降后，有几百名日本军士和平民，基于各种原因加入抗日军。到今天，没有关于他们命运如何的详情。在 1989 年 12 月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跟马来西亚政府签约结束战事时，在估计的 200 人当中，只有两人还活着，从森林走出来。

在简单讲述马共——抗日军在日据时期的武装斗争之后，我准备了以下的问题，请陈平指教，作出能给马共——抗日军运动投以一些新解的批评。

1. 你在 1939 年年方 15 岁时加入马共，在十多岁的少年时代就成为第五独立队的马共高层领袖；然后，在 1947 年，你年纪 23

---

2 黄耶鲁，又名黄望青。

- 岁时出任马共总书记。按臆测，你在这段时期在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如果不是受到莱特某种程度的眷顾，是不可能的。你跟莱特，这个碰巧在你被接受入党的同一年成为党最高领导的总书记，到底有多亲密？你如何解释你在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呢？你有什么成绩和表现可以解释你的成功史呢？
2. 你是在什么时候成为第六独立队的政委和马共的中央委员呢？
  3. 香港一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前战友出版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书，只字未提你作为主要马共——抗日军领导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提到你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前战友没有给你在战时的贡献记功呢？是不是为了掩饰你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而刻意遗漏掉呢？你的同志之中，据说有人妒忌你常常到其他国家去。
  4. 根据被抄获的马共——抗日军的文件，以及投降或被掳的马共——抗日军军士的说法，有一些由中国八路军派出的指导员有参与提供训练和灌输思想，所使用的手册来自你出任政委的第六独立队。
  5. 尽管马共——抗日军有铁的纪律和受到思想的灌输，可是，普通的战士一旦被掳，却士气奇低，因为缺乏军事纪律，训练，武器，弹药和粮食。他们因此很容易被说服去跟日军合作，出卖本身的同志。
  6. 关于战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一齐战斗的几百名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命运，有关的资料奇缺。你是否可以尽你所知的一切，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什么事，在战后武装斗争的年代后他们又怎么样了？
  7. 你对那位在日据时期被捕，然后替日本人做事的黄耶鲁有什么看法。在战后，他揭露莱特替日本宪兵办事的双重间谍身份（马共领导人不理睬他的揭发），并在后来成为成功的商人和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 1945-48 年合法时期： 马来亚共产党跟马来人、英国人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谢文庆

### 半合法地位

马来亚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48 年展开武装造反为止的这段期间享有半合法的地位。这个地位之取得，主要是因为它在战时与英国当局结成抗日联盟，英国因而决定给予正式之承认。在战前，马共一直是被查禁的组织。这就意味着，马共及其卫星组织是有史以来第一度能够自由的活动。甚至当‘社团法令’在 1946 年重新推出时，马共是豁免注册的组织。

可是，由于其过去的秘密历史，马共非常不信任英国的政策，拒绝在这段期间全面走向公开。在 1946 年 2 月 15 日发生党员跟英军的严重街头冲突之后，1945 年战后重开的州支部很快又关闭了。那项冲突对抗被认为是马共的一项挫折，因为它造成警察向人群开枪，杀死至少一名示威人士，逮捕和扣留党的职员，搜查党所，充公东西，以及接下来的法庭审讯，判决有罪，把党的职员驱逐出境，放逐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进一步被囚禁，施刑或被杀。

过后，马共只保留两个公开支部，一个在新加坡，另一个在吉

隆坡。一些观察家把这个阐释为马共在 1948 年武装叛变之前走回地下的准备措施。

马共在 1945 年 8 月的声明欢迎英国人返回马来亚，呼吁推出自治，政府改革，民权自由和提升人民的生活。这些要求被英军总司令蒙巴登，甚至是伦敦的官员，形容为是温和及合理到不可置信。因此，在马来亚英国军政的时期，英方决定采取开明的态度对待马共。

过后在 1947-8 年，那主要是因为党内激进派决意要赶走莱特的行动，最后导致英国人和马共没有可能再进行合作。事实上，英国政府官员起初是期望马共会欢迎包含在战后马来亚联邦计划中的开放公民权建议，以作为对马共和华人在战时支持联军的战斗的让步和报酬。

## 马来亚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政党；不是宪制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共崛起为强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不是个民族主义运动，它还是太过系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它专注于群众行动和建立群众组织：工会，妇女组织，农会和前战友组织。结果，它让巫统和马来国民党中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所超越。后者崛起为真正的本土民族主义者，主要争取恢复在英国政府的马来亚联邦计划下被剥夺的基本权利。

马来亚联邦计划宣布时，马共和其他非马来人组织没有热烈支持其建议，特别是开放公民权给非马来人。英国人和马来人因此形容这些人为外来移民，对马来亚联邦计划没有兴趣或是毫无反应。在面对强烈的马来人反对下，英国政府后来撤回马来亚联邦的建议。

马共的领导并不是真正的以马来亚为中心焦点，而是以国际为

焦点。正确路线总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或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从来就不是马共本身能够符合马来亚多元种族社会具体国情的路线。谁反对国际路线就是‘修正主义’。任何人提出在马来亚走宪制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激进好战路线也不容许思想的独立。因此，莱特这个最大的警察特务就一直都可以轻易地欺骗在中央的党员，强迫他们追随国际路线。甚至连好战分子也不敢逾越国际路线。在 1947 年伦敦举行的帝国共产党大会上，马共派出巴兰，<sup>1</sup> 伍天旺和拉昔·迈汀<sup>2</sup> 三名代表。大会上多位代表对马共政策的明显批判，是马共只要求自治，而不是独立。印度的代表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已经在要求独立的时候，马共却没有争取独立。

### 统战盟友当中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马来亚化党的尝试经已开始。马共内主要还是华人，没有反映国内的多元种族结构。党的文献越来越华人化。反映多元种族社会问题的超越文化方法尚未出现。最糟的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英文教育者的怀疑，在领导层之间很猖獗。凡是推崇民主和独立者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立身之地不在党内，而是在像马来亚民主同盟之类，可以受到控制的卫星组织。

---

1 巴兰 (R.G. Balan) 于 1942 年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任淡米尔文新闻辑编，很快即加入马共。从伦敦的大会回国后，他中选为马共中委。他组织吡叻胶工联合会，在 1948 年初协助激发连续的罢工浪潮。他在 1948 年 5 月 30 日被捕，至 1960 年才获释。1955 年，在缺席情况下，他中选为马共中委会的副主席。

2 拉昔·迈汀 (Rashid Mydin 或 Rashid Maidin)，为马来国民党党员，后加入马共，于 1955 年受委为中委，陪同陈平在同年的 12 月出席跟政府谈判的华玲会谈。



跟其他政治团体的合作在‘统一阵线’策略下获得允许，马共鼓励其卫星组织和盟友团结在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和人民力量中心（AMCJA-PUTERA）这个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机构结盟的组织下，去反对马来亚联合邦条约。那是英国政府和马来统治者之间所达致的协议，旨在取代马来亚联邦计划。但是，马共本身却是远离这些参与‘宪制斗争’团体的活动。马共正忙着开拓走向革命的道路。

许多的学者都围绕着叛乱的原因进行争论。当然，其中有对莱特及其朋党的整肃，以及党的领导权由以后来出任党总书记的陈平为首的好战派接手。

好战派急着要采取武装斗争。有一种说法声称，在加尔各答举行两项会议上：1948年2月19至25日的东南亚青年大会，以及稍后的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苏联的代表向马共和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发出指示：同时拿起武器举事。

马共派李送去加尔各答青年大会。<sup>3</sup> 这项大会的要员是澳洲共产党的主席沙克基（Lawrence Sharkey），他后来在回途中在新加坡过境时，停留在那儿跟马共领袖解释细节。然而，已故迈克尔·斯滕逊（Michael Stenson）却声称尽管存在着诸如苏联路线的外因，导致把马共驱向武装斗争的主要是当地的情况，特别是英国对马共的工会活动的镇压行动，以及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建议宪制斗争的失败。

最后，是英国政府间接地把马共推向提早展开造反。英国在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推出逮捕和扣留及压制民权和自由的

---

3 李送的党职不超过州委。他被选中，是因为能讲流利英语，他于1948年3月22日回到新加坡。他在1942年涉嫌为叛党分子的一员。他出任文化导师，在柔佛参与战斗，于1954年被保安部队打死。

恶法，逼使马共领袖和党员走入地下，他们反过来采取武装叛乱的手段。

## 问题

3. 为什么马共忽略民族主义和为什么在 1945 年 8 月 27 日的宣言中，它只是要求自治，不是独立？
4. 既然在 8 月 27 日推崇自治政府，为什么却对宪制斗争只是敷衍，一点都不认真？
5. 是不是可能这么说：如果马共采取合作态度的话，英国应该会欢迎一个宪制的共产党，马共可从中获益？
6. 在什么程度上马共的失败是本身的内部不足，如缺乏真正马来亚导向之纲领，无法成功马来亚化其党员、领导层、出版物和各种政策所造成？马共一直等到 1955 年华玲会谈时，才委任 Musa Ahmad 为主席和巴兰为副主席，以反映其‘民族主义’形象。
7. 为什么在马共的领导层和组织中缺乏知识分子？
8. 是杨果，还是陈平最先就莱特为秘密敌特一事展开调查呢？
9. 战时 136 部队的记载，指陈平是莱特的‘小哥儿’，而莱特栽培他升任为第二号人物，这一切，有没有让陈平感觉到压力，必须在莱特作为敌特的活动被揭发前跟他划清界线呢？
10. 已故杜志超（政府心理作战专家）指苏联对马共发出拿起武器的指示是在 1947 年 2 月在伦敦的帝国共产党大会上发出的，不是较后在 1948 年 2 月的加尔各答会议。这是真的吗？
11. 巴兰宣称，在紧急状态宣布后几天，马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森

林里开会，议决马共必须拿起武器，只是，这个决定是英国强加的，而起义的时间并不是按照计划制定的。这是真的吗？



## 马来西亚共产党的 革命纲领及其作用

陈剑

从 1930 年至 1963 年的马来亚时期、从 1963 年至 1989 年的马来西亚时期，马来西亚共产党，在这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为着党的生存的需要，还是为掌握住不断变化的政治情势并为之做出指示，曾颁布许多革命或政治纲领和指示。

不知何故，在许多有关马共的著述或论文中，鲜少见到有关对这些革命或政治纲领的研究和分析。事实上，这些纲领是马共设定短期或长期目标的重要文件。它们被当作是党对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和其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下或公开统一战线组织的规章性指示。

这些纲领通过组织的各个单位或重要党员秘密地转送下达。各组织单位及负责人必须仔细阅读并深入研讨其内容。在不同的斗争阶段，这些革命或政治纲领为革命进程指引方向和做出决策。马共在早年的生存及其后的武装斗争中，曾经颁布了成百上千的政治陈述、主张、声明、宣言、纲领和特别指示，其中超过三十个以上被认为具关键性而显得特别重要。

尽管这些革命或政治纲领被认为是马共至为重要的文件，却极少被当作专注性探讨的对象。因而有必要对它们作一特别介绍。这些纲领反映出马共在不同的斗争阶段，其理论框架、政策、策略和

战略以及斗争技巧的转变。它们也显示出马共在政治情势应变上因之设定的短期或长期的斗争目标的转移。有时，因此而做出更大幅度的组织上的重新建构。举个例说，1933年制订的十二条革命纲领，开章第一条，便指明要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这应是马共建国意旨的显现，这也应是马来亚最早民族主义的表征。在纲领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祖国认同和效忠的论争。那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亚的认同。面对日本的南侵，马共于1938年4月便颁布了十大斗争纲领，成立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为建立民主、保卫和平和共同反对日、德、意法西斯的联合压迫。有意思的是，十大斗争纲领放弃了1933年颁布的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激进纲领，而代之以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胪列以下，便是各时期被认为较为重要的马共革命或政治纲领和指示：

### 1. 1933年《马来亚现阶段十二条纲领》

(1933年马来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这是有文字记录的马共的最早的革命纲领。前此有否颁布过类似纲领则无从查考。从纲领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这应是马共于1930年4月30日建党后的奠基宣言。在所有马共的革命纲领中，它完全依据共产主义理想拟制，而因此最具共产主义革命性和雄心。但它显然忽略了作为英帝国殖民地的马来亚的特殊社会情势和种族构成以及民族之间政治觉悟程度的差距。纲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驱逐英帝国主义出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推翻帝国主义的傀儡——拉茄、苏丹、地主和买办资本家的统治”；

(二) “没收一切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

产”；

(三) “夺取并没收帝国主义、拉茄、苏丹、地主、官僚及寺院的土地庄园，分给农民、园地的工人和参加革命的士兵”；

(四) “反对一切反动宗教”；

(五) “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马来亚民族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六) “争取马来亚民族和社会解放，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

## 2. 1938年《马来亚共产党十大斗争纲领》

(1938年4月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常委会通过，1939年马来亚共产党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修订)

这纲领的意义在于其政治思想的灵活转变与意识形态方向的调整。党经过了八、九年的斗争，面对日益加紧的英帝殖民政府的严酷镇压，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认识到必须扩大斗争的基础，加强组织的力量。尤有进者，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深，东南亚亦面对日本南侵的威胁，有必要团结各族人民，争取他们强力的支持以一同抗日，这个纲领因此着重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其主要内容有：

(一) “马来亚各民族人民不分种族、党派、阶层、信仰、宗教，一致团结起来，建立马来亚人民联合战线，争取民主制度，保卫和平，共同制裁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团”；

(二) “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制度”。

纲领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包括在政治上，以普选的方式“建立真正代表马来亚各族人民的议院”、在行政上吸收各民族优秀之士参加政治机构，提高政府人员的生活条件并在甘榜（笔者按：马来农村）以选举方式选举甘榜路（笔者按：应为榜古鲁，意



为村长)；在司法与财务上各分别提出七至八条具体建议。它向英殖民政府提出建立民主普选制度、设立议院和地方议会，要求自治。

由于国际局势的急转直下，国内抗日运动进入关键性的转变，而英帝殖民政权却加深对马共的镇压，马共因应做出组织上与策略上的改变。1939年4月6日，马共颁布了新党章，整顿和扩大组织，加强各条战线的斗争。1940年1月发表了长篇的国际与马来亚当前局势的分析和指示。在第六次中央二次扩大会议上修改了这十大斗争纲领，反映斗争形势有所提升，纲领第一条注入了明确的建国内容，特别强调“驱逐英帝国主义出马来亚，争取民族独立，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为了从策略上贯彻并做好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马共提出纲领性的指示，并以阶级斗争观点阐明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指明工人运动的方向。

1940年6月，为加强和巩固党员的纪律性，党中央颁布了“铁的纪律”，规定党员应绝对服从的组织行动、思想与生活的各项纪律，具体而明确。从1941年7月至12月，濒临战争边缘，亚太地区政治局势急转直下，马共加剧各条战线的活动，不断发出新的形势分析与工作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7月28日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的议决案《新形势与新任务》确切地声明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方向并发出著名的“抗日卫马”的伟大号召和提出“三大任务、六大主张”的具体工作方针。

### 3. 1941年《马来亚共产党抗日卫马十大纲领》

(1941年12月17日马来亚共产党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

在日军即将登陆吉兰丹的前夕，英帝殖民政府全面释放前此被

捕的所有共产党人，并与马共达成协议，在英军 101 军事特训学校培训马共党员，进行军械使用、爆破技术和基本游击战术的训练。这个纲领呼吁全马人民团结一致，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 4. 1943 年《马来亚共产党抗日九大纲领》

(1943 年 2 月 20 日马来亚共产党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

这是马共最为著名并广为人知的抗日纲领，是前此颁布的十大纲领的修正。英军败退投降后，马共成了唯一的抵抗力量并祈争取独立自主。抗日一年多以来，马共及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获得马来亚人民更大的支持，马共于是更明确展示斗争的最终目标。其主要条文为：

- (一)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 (二) 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实现民主权利……；
- (三)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
- (四)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 (五)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和各邦友好条约和商务关系……。

#### 5. 1945 年《马来亚共产党八大主张》

(1945 年 8 月 13 日马来亚共产党中马地、司级干部联席会议议决)

1943 年 12 月 31 日，马共以莱特与陈平为代表和由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s) 与林谋盛为代表的联军 136 部队在布兰丹抗日军营地签署了“美罗协议”。马共应允与联军合作并接受其指挥，直到联军重返马来亚并取得和平与社会秩序稳定为止。其时，马共中

央事实上仅剩莱特及一位远在彭亨的阿仲两人，党的一切，全由莱特一人操纵。1945年8月13日莱特在中马地、司级干部联席会议上提出这《八大主张》以代替《抗日九大纲领》。其最令人瞩目的是，它悄然放弃了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建国主张，仅仅要求自治的权利。

## 6. 1945年《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意见》

(1945年8月25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虽然马共曾预测日本即将战败，但并不曾意料它竟会在瞬间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马共颁布了《八大主张》后，中央委员会又立即依此突变的形势发出一长篇声明，分析当前局势并做出具体行政指示。其主要内容为：

(一) 设立人民委员会以维护日降后及英军登陆前的社会秩序，建立工务部、设立相应机构以恢复粮食等物资供应、贸易、交通和卫生的运作。

(二) 为保护党的安全，党组织分成公开与秘密两组。公开组在全马各城镇开设公开代表处和党支部，而秘密组则为党委及党团组织，进行地下监督及指挥公开组织的运作。

(三) 所有宣传依据《八大主张》的精神进行。

## 7. 1945年《马来亚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1945年11月7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1945年9月5日英军登陆，英帝殖民政权重返马来亚，设立英军政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简称 BMA) 对马来亚人民施行军管。它下令解散并替代了马共成立的人民委员会，接管政权。11月7日马共发表了按《八大主张》的精神草拟的《马来亚共产



党对时局宣言》，向英帝殖民政府提出政制六项建议。这宣言被认为是一份温和的文件。六项建议其实是马共针对英军政下令解散人民委员会的政治反应，它同时也显示马共对英帝殖民政府的政治诉求。主要建议为：

（一）承认马来亚民族自决权，允许马来亚各族人民和各党派以普选方法建立自治政府；

（二）给予马来亚人民自由并建立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马共临时中央各成员接受了莱特对时局的分析，普遍认为当时整个革命斗争形势最大弱点是人民普遍厌战和民族的团结问题，日降前后，严重的种族冲突在全马持续不断，因而认定革命时机不成熟。也因此，在英军政建立后，便同意解散了人民抗日军。

## 8. 1946年《马来亚共产党民主纲领》

（1946年2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

这是自《马共抗日九大纲领》以来，一个正式的纲领性文件。它是马共在和平时期基于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向英殖民政府争取自治的政治纲领。其最重要的主张为：

（一）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

（二）建立全马国会，并制定民主宪法，建立各州人民议会。

## 9. 1946年《推进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方法》

（1946年2月28日马来亚共产党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

这是马共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的议决案，是专为马

共当时全力以赴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工作纲领，目的在于扩大群众基础，广泛团结各民族民主力量，争取民族自决的权利，建立自治政府。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为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华族。特别呼吁全面支持在1945年12月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以及马共所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个纲领性文件具体显示马共在和平时期全面开展宪制斗争的决心和努力。

### 10. 1946年《党的马来亚化和民族运动》

(1946年7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五次  
会议通过)

马共在这个文件中承认对争取马来族参与斗争的持续困难，并认为没有马来人的支持，政治运动将不可能成功。强调只有“马来族认为马共这个党也是马来族的党”才有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因而，建议党组织进行马来亚化，并树立正确的工作方针以确保这政治斗争成为马来亚全民族的政治运动，以争取到马来族的全面支持。其时，马共党员中许多党员都是本地出生者，但却普遍存在着国家认同的问题。一方面基于国际主义，在马来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权而斗争；一方面还脱离不了中国为祖国的观念，还以中国人自居。马来亚化运动正是要在国家认同上纠正部分党员的错误认识，同时以马来亚人的身份向英帝殖民政府争取独立自主的权利。

### 11. 1947年《党的当前具体纲领》

(1947年12月马来亚共产党第九次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  
通过)

1947年3月马共总书记莱特捲款潜逃无踪，之后，陈平当选为总书记。党中央各委员对前此党的路线和斗争纲领展开了一系列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自《抗日九大纲领》以来的路线犯了极其严重

的右倾投降主义。到 1947 年 12 月，马共中央基本达致结论而提出一个新的 12 点斗争纲领：《党的当前具体纲领》。

面对英帝殖民政府越来越严酷的镇压，马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更为蓬勃，罢工行动逐步升级并提出社会改革的各种要求。12 点纲领替代了 1946 年提出的《民主纲领》。但此新纲领并未提出革命的诉求，要求仍然温和。其主要内容为：

（一）建立一个星马统一的、各民族联合的马来亚自治政府，参加英帝国联邦，成为英帝国联邦自治领之一，……苏丹成为全马人民的立宪君主；

（二）在马来亚出生的各民族人民，成为马来亚的当然公民，非出生于马来亚而居住在并效忠于马来亚的各族人民，归化的条件一律平等；

（三）尊重马来族的特殊利益以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

（四）拥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个纲领是马共八中全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全文的一个行动纲领。这个决议对当前形势作了分析性的评估并据此发出具体工作方针和指示。总结了党的斗争成果并为作为一个公开的党的宪制斗争途径作了说明，特别强调党的统一战线，在团结所有反帝反殖力量的策略和作用。马共成功地发起并组织了“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an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PMCJA 及后改称为 All-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并推动了 1947 年反“马来亚联合邦计划”（Malayan Federation Proposal）的宪政运动。最初在联合行动中的两个左翼马来政治团体，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简称 MNP）及马来觉醒青年团（Angkatan Pemuda Insaf，简称 API）退出联合行动，接着组织了拥有上百马来团体的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简称 Putera），再与联合



行动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和强大的公开阵线 PUTERA-AMCJA。其时马共认为其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可能强化和深化，从而取得宪政斗争的胜利。但马共并未考虑到与英帝殖民政府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马共在这 12 点纲领中并没有鲜明地要求独立而仅仅要求自治。尽管如此，英帝殖民政府仍然一意孤行片面地与苏丹及封建集团达成协议，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宪法。

## 12. 1948 年《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sup>1</sup>

(1948 年 3 月 17-21 日马来亚共产党第九次中央扩大会议第四次通过)

1948 以来，英帝殖民政权加紧对马共的严酷镇压。马共则组织更多的罢工行动。从 2 月起，英殖民政府颁布新的社团法令严厉限制职工会的活动，特别严厉禁止个人或注册工会向马共控制非注册的泛马总工会缴付会费。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和所掌控的工会感觉着英帝殖民政府的严重威胁与步步进逼，最终将进行禁绝这些左翼工会及其他公开组织，包括马来亚共产党。这个文件清楚指出英帝殖民政府的阴谋并宣称英国工党政府在英国国内，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and 工具，而在国际上，是美国的同路人。并指出，国际情势因为两大阵营的区分而产生了基本的变化，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之间产生不可妥协的斗争。

---

1 有关此文件的英文摘要及 1948 年 5 月的决定，请查看查尔斯·麦克莱恩 (Charles B. McLane) 著《苏维埃在东南亚的策略——列宁与斯大林时期东方政策的探研》，美国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 年。 (*Soviet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ploration of Eastern Polic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 385-7 页。在大英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 有更详细的摘要以及 1947-9 年时期的多个文件，请查阅档案 FO371/69695 号。

在3月的中委会上，马共研讨了当前局势，假如局势继续恶化，将何去何从？一致认定唯有重新挖取日降时埋藏的武器，开展武装斗争才是出路，并发表了这份文件批判了前此对宪制斗争的幻想和前此的政治路线是投降主义路线，严厉谴责了前此的纲领放弃了党的阶级立场。对1945至1947年政治纲领仅仅提出自治而不是独立的要求是不可宽恕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公开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批判党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立场而跟着小资产阶级领导随波逐流，严重忽略了工农群众。

这3月新的指示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鼓励加强工农群众争取福利的罢工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目的是争取独立而认为武装斗争与人民战争不可避免。

接着，于4月间，马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两份重要的文件。其一是以马共职工部名义颁发的《坚决引导工人前进》，另一则是以“民声报”社论出现的《认识形势、掌握方向》。前者为加剧的罢工行动提出理论指导和鼓励，后者则是谴责英帝殖民政权及工党政府。文章认为应放弃对英国工党所谓同情左翼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幻想，严厉谴责英工党政府对马来亚的镇压政策并暗示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上述文件登载在5月马共的公开喉舌《民声报》上，后者以郑杰的化名发表。

### 13. 1948年《马来亚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48年12月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1948年3月马共中央面对英帝殖民政权逐渐升级的镇压，估计英帝殖民政府最终将在九月前后采取全面镇压，已在讨论部署对英帝进行武装斗争。在5月的中委会上进一步落实了这个决定，但对即将展开的游击战争并未对其战略与策略问题进行讨论。猝不及防，英帝殖民政府在6月18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展开全马大逮

捕，致使马共仓促上山，开展游击战争。为说明武装斗争的意义、性质与目的，同时也为教育并提高党员、游击武装人员、支持与同情的群众的士气，马共颁布了这份文件，把这次的武装起义定性为“民族抗英革命战争”，仿照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理论建立马来亚革命战争的理论框架，为当前在马来亚开展的游击战制定策略、做出理论指导和包括建立临时根据地直到可能设立较永久根据地在内的等等具体指示。

#### 14. 1949年《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

(1949年1月25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这是马共于1948年6月20日揭竿起义一年半之后正式提出的建国蓝图。其基本奋斗目标为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的要点是：

(一) 重申抗日九大纲领提出的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意旨，说明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是各民族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驱逐英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二)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文化；

(三) 建立马来亚国防军。

#### 15. 1949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

(1949年2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联合声明)

1949年1月的纲领显示马共的政治目标，要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宣言则展示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为实现这目标的手段。这不仅在于提高党军人员以及支持群众的意志和士气，更



在于取得国际支持并对英军造成心理上的威胁。它也显示马共军力已从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为民族解放与达到马来亚的独立而对英帝开战。

## 16. 1949年《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1949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这是1949年6月马共向全党全军颁发的一份纪念起义一周年的声明。这份文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总结了一年来的党军战斗的成绩和经验。对敌我形势、战略战术、斗争环境及政治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对主观力量作了检讨，从而规定当前的工作目标与战斗任务，为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示。这份文件提出几个具体任务：

(一) 有计划有步骤集结主力，开展建立游击兵团和创立根据地；

(二) 积极不间断地展开对敌生产部门、交通运输的骚扰和破坏活动；

(三) 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巩固党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统一，整肃队伍，提高战斗力；

(四) 继续开展与巩固工农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在物资和粮食供应上支持解放军。

文件亦着重于对革命成功与否及敌我军力优劣对比作析疑以增强党军人员的信心和维持战斗的坚韧和积极进取。

## 17. 1949年《马来亚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补充意见》

(1949年12月10日马共中央政治局颁布)

《马来亚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于1948年12月发表后，关于这

场战争的性质与相关策略，在党军各层面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主要的争论在于对战争的程度、从乡村及森林边缘（芭边）撤离所造成的损失、尝试建立根据地失败后各游击队再回到芭边等问题。为统一思想和修正某些观点与策略，马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这份文件，作为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补充说明。这文件另一重要内容则是指示解放军各单位加强伏击以夺取武器为目的而不仅仅在于消灭敌人。

### 18. 1951年《为争取战争更大胜利而斗争 / 关于执行“党的迫切任务”的工作指示》 (1951年10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颁布)

这是马共中央1951年的十月决议，或称“十一指示”。其主要作用在于对自起义以来的军事破坏行动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做出调整和改正。此文件提出了具体的说明和指示，下令停止各游击区解放军所展开的各类不得体的军事或非军事行动，例如砍胶树、没收撕毁居民证、烧毁民族资本家的巴士等等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和行动遭受严重影响的破坏举措，包括党军人员粗暴对待那些因某些困难或害怕英帝殖民政权的镇压等原因而不敢支持与合作的胶工和平民。“十一指示”全面地检讨有关情况并要求党军人员在工作策略上调整行动，开创其他途径以改善军民关系及党军安全的处理、鼓励在山林深处进行耕作自行解决粮食问题等具体指示。“十一指示”因其详细的指令而显得特别重要。它实际上也暴露了马共与解放军所面对的处境。

### 19. 1952年《关于马印工作的政策问题的决议》 (1952年5月15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有鉴于党军在马来与印度两族的民族工作上的缺失，马共中央

特就此问题颁布了这份冗长的文件，指令成立民族工作组以开展及争取马印两族对党军的支持，同时亦积极努力争取和发展马印族人加入党军、或参加地下工作、或加入公开阵线等外围组织。

## 20. 1954年《马来亚人民为自由而斗争》

(1954年4月21日马来亚共产党致英帝国范围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是马共向有关大会提呈的一份报告。它除对数年来的武装斗争做出总结性的说明外，对当前局势和政治气候做出分析。马共于此报告中释放愿意谈判的信息。报告的要旨在于：

(一) 结束英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解散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机构和军队，结束英国的反人民的侵略战争；取消紧急法令及其他反人民措施；

(二) 重申马来亚解放军关于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关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越南和马来亚战争的决议，争取与马来亚爱国党派和团体诚恳合作，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愿望。

这是七点建议中的两项谈判条件，目的是显示马共较为软化的立场以期达致谈判，以“结束英殖民统治”而不以“反对”或“毁灭”等激烈字眼在报告中释放谈判的善意。

## 21. 1955年《马来亚共产党宣言——为实现马来亚独立、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1955年12月22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布)

这是为“华玲会谈”而颁布的马共宣言。提出八大纲领作为马共对谈判提出的条件以及为实现马来亚独立、民族和平的目标。最



主要的便是停止战争、废除紧急条例，实现马来亚和平，并愿意与英国及马来亚自治政府通过谈判取得独立。

## 22. 1957年《马来亚共产党宣言——五项基本主张》

(1957年9月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布)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马共宣言于次日颁布。除有庆祝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意味外，它重申为达致马来亚的持久和平，马共愿意坚持以谈判方式停止武装斗争并向马来亚效忠，敦促和平谈判继续进行。

## 23. 1958年《关于退伍政策》

(1958年马共中央委员会颁布)

1955年12月华玲会谈失败，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马共已确定和平谈判之门经已关闭。马共党军人员均感元气大伤、意志严重受挫。马来亚联合邦于8月31日独立，马共争取独立的目标顿然消失，一时不知何去何从。经马共中央与政治局反复讨论，决定采取偃旗息鼓、精简部队、等待时机的政策。于是于1958年起，对于那些丧失革命信心与斗志以及那些老弱病残的党军人员，一律以退伍政策处理，给以安家费让他们在泰南解甲归田。

## 24. 1960年《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六零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及《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

## 案”的意见》

(1960年11月24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这是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在二十六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于莫斯科举行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及其后对有关声明草案的意见。这是马共对中苏意识形态论争第一次正式表态。其措词谨慎但明显地支持中共。尤其特别赞同中共关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路线、关于个人崇拜、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 25. 1962年《关于新方针》

(1962年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颁布)

经过三年沉寂的低潮时期，自1961年中起，国际上，马共受到中印半岛革命形势以及印尼苏卡诺与印尼共产党政治合作的鼓舞，在国内，也因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创意建立马来西亚而有了新的斗争目标与动力，在中共与毛主席的大力鼓励与支持下，马共终于拟就新方针政策，重振旗鼓、整顿军纪、提升士气、招收新兵、积极整训，为开展新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准备南下培训突击队。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退伍后仅剩三百人左右，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发展到二千人。

## 26. 1963年《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声明》

(1963年9月20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发)

这是马共中央强烈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抗议声明，文中积极支持苏卡诺的对抗政策与行动。

## 27. 1965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

(1965年1月3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发)

这是马共中央在中苏分裂问题上对中共公开支持的声明。它强烈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

## 28. 1965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宣言——为粉碎“马来西亚”实现马来亚的真正独立而斗争》

(1965年3月15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颁发)

作为马共的公开外围政治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于此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在印尼首都椰加达设立支部。这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的成立宣言，清楚显示“解盟”的政治目标与任务。它类似马共于二战后在马来亚成立的“抗英同盟”，作为一个半公开的政治组织，从事开展在马来西亚的地下活动与支持左翼的宪制斗争。

## 29. 1970年《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1970年4月25日马来亚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声明)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屠杀事件，造成数以千计人命的死伤。这是巫统在之前的大选中丧失众多议席并几乎失去雪兰莪及吡叻二州州议会的执政权之后，藉着反对党选后胜利游行、巫统组织反游行引发的暴乱。其时，马来亚劳工党亦因屡遭当局严酷镇压而对宪制斗争失去信心从而进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信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教导。5·13事件发生后，许多左翼转入地下，纷纷成立地下组织并逐步与马共建立了联系，而马共也开始推展南下政策，派遣突击队南下马境开展游击战争。藉此



马共建党四十周年，发表这《4·25 声明》并提出九点《新民主主义纲领》，重申马共以“乡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的政策与决心并做出对地下斗争的肯定与指示。

### 30. 1975 年《土地纲领草案》

(1975 年 12 月 20 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这是自马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就马来亚的农民与土地问题草拟的土地纲领。从众多的马共文件去翻查，偶尔或有提到农民问题，但大都在宏观经济与垄断剥削的层面上讨论，鲜少单独触及或就农民（特别是马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与所面对的问题深入探讨和提出策略与方案。这个纲领也是在 1974 年彭亨州汉都亚领导的农民反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土地收购政策与强迫逼迁事件发生后才颁布。事实上，马共于 1947 年便成立了“马来农民阵线”，但一直以来，都不曾发挥其作用，在这次事件中，亦未曾参与。为掌握住这个农民运动的形势，马共颁布了这十七点《土地纲领草案》。纲领的主要内容有：

(一) 没收英国垄断资本、现政府官僚机构、大官僚资本家、民族叛徒及恶霸地主的已开垦土地包括各类园坵收归国有，荒地、未开垦森林地及稻田则无偿分配给缺地农民；

(二) 承认农民以自己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拥有权；

(三) 反对现政府的野蛮迫害与逼迁、取消“新村”与“移植区”，保障农民在原租地耕作、居住、行动与工作的自由权利；

(四) 取消土地税、门牌税及一切税收，废除高利贷等。

### 31. 1978年《沿着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奋勇前进》

(1978年6月15日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三十周年声明)

自从1970年马共发表党庆四十周年声明以来，不曾再发表类似的强烈声明。从1968年起，马共便筹组了第一个南下的突击队，即从属于第十二支队的第十二突击队（实际上应称为武工队，另称为第十四突击队，1970年五月间扩大后进入第八支队的地盘，又改称为第八突击队），这是往后南下突击队的先遣部队。真正开始派遣突击队南下始于1970年，计有活动于檳、吉、玻及威省南部的第八突击队；活动于吡叻中北部的第五突击队；活动于吉兰丹与吡叻交界处的第七突击队（又称联合队）；活动于吉兰丹、吡叻与彭亨交界的第十六突击队；活动于吉兰丹北，后来挺进到吉兰丹南部直到彭亨、吡叻交界的第十四突击队（这是由第十支队组建的以马来战士为主体的突击队，有别于前此提到改称为第八突击队的第十四突击队）；以及最重要、人数最多由张佐领导、活动于彭亨并坚持战斗至1988年的第六突击队。到了1981年，除了第六突击队继续在彭亨战斗外，其它队伍基本上大都已退回边区。

1978年，各突击队活动频繁，但国际共运已经出现崩溃状态，东欧共产政权纷纷瓦解，中国自四人帮倒台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实行改革开放路线。面对党内可能产生的思想困惑，这则声明在于激励和鼓舞党军以及地下组织人员的士气，文章从党军历史及实战经验中一再肯定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的作用，以及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教导与“乡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对在恶劣的战斗中可能丧失斗志的党军人员以及地下工作者进行再教育和精神武装。

### 32. 1980年《马来亚共产党万岁!》及《当前具体纲领》 (1980年4月28日马来亚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声明)

除了1975年颁布的土地纲领之外，十年来马共不曾颁布过任何革命纲领。十年来，国际及国内经济与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变化，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与重大发展。这构成马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不利条件。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在国际关系决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切断了对马共的财务、物资与道义上的支持。此外，自1968年以来因内部肃反所造成的分裂，依然持续，原中央第八支队及第十二支队二区分别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及“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形成了一党三分对立与竞争的局面。党军的力量显然弱化，“南下”突击队在马境的武装战斗也不曾取得预期的成效。面对着国际、国内以及党内这种严峻的形势，马共中央于1980年4月10日至30日，在其第十二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过去五十年的斗争历程以及当前斗争形势做出新的评估和决策。通过了《马来亚共产党新章程》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声明主要回顾并分析了党的五十年的斗争历程。基本总结了不同时期的斗争经验和成就，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当前具体纲领》作为斗争的目标与方向。这显然为着提高和激励严重受挫的党军士气、调整斗争策略与方向。纲领的内容除对国内垄断经济、贪污腐败进行抨击以及要求废除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外，主要有：

(一) “反对国民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建立由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代表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

(二) “同霸权主义的侵略颠覆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 “反对外国垄断资本……反对发展官僚资本的新经济政策……”；



(四) 在宗教与语文政策方面, 提出: “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提倡和鼓励使用马来语, 使之成为各民族人民的通用语。承认英语的应有地位”。

马共重新估计革命斗争的形势, 强调现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因而在战略与策略上做出重大调整, 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激进的政策, 而以较务实的姿态以期赢得各民族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首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新经济政策以及在语文问题上, 采取妥协的态度, 除原有鼓励马来语的应用外, “承认英语的应有地位”显得突兀。

### 33. 1985年《为实现当前的具体纲领而斗争》

(1985年4月29日马来亚共产党建党五十五周年声明)

这是马共于1989年12月2日与泰马政府达致和平协议销毁武器下山之前所发出的最后一个建党声明和政治纲领。这个声明简略地总结了党在五十五年的斗争历程与作用, 并就当前的经政形势做出分析与建议。这个温和的声明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它修订了1980年颁布的《当前具体纲领》, 特别突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主张, 呼吁“一切爱国民主党派、民间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 成立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协商机构, 通过真正民主公平的选举, 产生一个包括各方面代表的、维护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的民主联合政府”。声明重申“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拥护君主立宪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 尊重最高元首和各州苏丹的尊严、地位和权力”。马共“民主联合政府”的这一建议, 在1980年的基础上, 进一步改变过去强硬的革命姿态, 愿意以协商的精神对当前政制进行商谈, 对执政当局释放善意, 明显暗示有意进行和平谈判。纲领中亦建议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应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重归统一。

我想请教总书记并期获得答案的有关问题如下：

1. 马共的革命或政治纲领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是否有效？
2. 在马共早期，共产国际有否并以何种方式影响马共的革命或政治纲领？
3. 马共的革命或政治纲领是否仿效中共？中共的革命或政治纲领如何影响马共革命或政治纲领的构建与撰写？
4. 在马共不同时期的斗争中，领导层的变更对革命或政治纲领的实施有何冲击？
5. 革命或政治纲领如何向马共各层与公开组织层层下达并执行？





## 马来西亚共产党 于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

彼德·爱德华兹

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在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的政策，导致后来的紧急状态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有争论。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可以简称为‘加尔各答大会论’。这个说法在当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至今天，在英国当权者及其支持者间很流行。这个说法把着重点放国际范畴上。它指出，1947 年和 1948 年是冷战在欧洲形成的年头，对立的双方竞相采用日益强硬的路线。这两年中，世界见证杜鲁门教条，马歇尔计划的宣布；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齐达诺夫教条（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帝国主义和人民民主），柏林危机和空运，以及导致在 1949 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在这期间内开始。

1948 年，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都出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据照‘加尔各答大会论’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在 1947 年末或 1948 年初似乎已经确定跟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碰到杜鲁门和贝文（Bevin）发出要坚决反抗的第一个讯号之后，苏联的扩张主义领袖在亚洲鼓动起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开展新的战线。据说这条新路线是在 1948 年 2 月至 3 月在加尔各答的两项大会上传达给亚洲的共产党。澳洲共产党的领袖罗伦斯·沙克基从加尔各答回国途中，停留在马来亚传达共产党情报局关于新

路线的指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看到政治鼓动的暴力猛增，导致马来亚当局在 1948 年 6 月宣布紧急状态，就不是什么巧合的事了。

近年来，大多数史学家普遍上都较少侧重国际范畴和‘加尔各答大会论’，而是更着重于马来亚当时的具体因素，主要可以简单归纳为三大题目：宪制；工业；和马共内部操作机制。

1946 年，英国推出称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法，它大大削减马来苏丹的地位，提供开明的条件让华人和印度人成为合格公民。这份宪法激起相当多马来人的反对。巫统宣告成立，以便吸引广泛的基层支持。在英国的退休官员，传统上同情马来人比华人多一些，给予马来人支持。英国被迫撤消马来亚联邦，于 1948 年 2 月 1 日以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而代之。马来亚联合邦大幅度恢复马来苏丹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对非马来人申请为公民设更严峻条件。随着战争结束时期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之后，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让相当大部分的华人和一小部分激进的马来人和印度人非常的不满。

同一段时期内，出现几乎未曾间断的工业纠纷，特点是暴力水平不断增升。支配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工会的马共，为政治和共产目标而鼓动罢工。促成工业激进好战的空间很大。在好多的工业中，情况跟在战前萧条年代施行的大同小异。许多工人，包括在城镇和乡区的，在当时的迅速通膨、战后缺粮和对劳动力需求大增的时代，忍受着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好多的雇主、英文报、欧籍和马来社群的领袖对由主要是华人工会领袖发动的鼓动行为不显示多少同情。有一段时间，向伦敦英国工党政府负责的英国当局，抗拒对马共控制工会采取强硬行动的呼吁，但是从 1947 年开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所有工会都要注册，而容纳超过一个行业的联合会不准注册。1948 年，工会领袖得在相关的行业具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因威迫、勒索或同类犯罪而

被法庭判有罪者禁止担任工会职位。这些措施大大挫折了马共的工业和政治的力量。

马共本身陷于内乱。其被尊为光辉和正直典范的领袖莱特，在 1947 年初卷逃大量的党基金。马共被迫承认多年来莱特一直是跟英国和日本人合作的三面人，必须对多位同志被出卖和牺牲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马共得转向年青和没有经验的领导层——陈平在 1947 年方二十出头，出任新的总书记——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倾向战斗的。莱特的温和政策（当然，那是符合他的双面交易的）现在不再被奉行了。

在这些压力声中，陈平在 1948 年 3 月 17-21 日召开马共中央会议。从加尔各答回澳洲的沙克基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讲话，但是，史塔布斯的结论却是：沙克基只不过是激励马共的领袖去跟随他们本身就倾向于要采取的行动。<sup>1</sup> 会议议决独立斗争将是以人民革命战争的形式，要准备群众去进行不可妥协的斗争，‘不管合法性的考虑’。5 月 10 日的中委会议议决‘坚决的行动，一致的斗争和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是需要的。

虽然这些会议明确组成为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但两次都没有列出明确的政治军事方案。看来是有一些单位自行做主张，在 5 月和 6 月采取谋杀及其他的暴力行动，直到 6 月 16 日，在吡叻的两项分开的攻击中杀死了三个种植人。政府当天宣布吡叻和柔佛的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在 17 日扩大至两州的所有地区，18 日则包括全马来亚。史塔布斯，在他的《游击战争中的民心动向》（*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一书中总结说：马共游击战在未准备好情况下，仓促行事。同样的，看来政府方面对这场后来发展为 12 年冲突的战事的准备也很差劲。

---

1 史塔布斯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 60-1 页。



## 问题

关于在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我提出以下或能引起大家兴趣的问题：

1. 决定采纳武装斗争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在跟政府展开武装对抗方面，为什么思想准备是跑在政治和军事计划的前头？
3. 有关议决作为推翻莱特政策的反应的成分有多少？
4. 有关议决作为对政府用更强硬行动对付马共在职工联合会影响力的一种反应的成分有多少？
5. 若说沙克基说共产党情报局已经采取‘两个阵营’的政策，主张对帝国主义展开积极的对抗的谈话有对马共中委会产生影响的话，影响程度如何？
6. 除了思想上的激励外，沙克基（或任何其他入）有保证或暗示会提供外来援助吗？

#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之注释 和关于马来西亚半岛 第一次紧急状态之问题

利昂·康伯尔

## 有关在 1948 年采取武装斗争的注释

日本在 1945 年 8 月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解散，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实际的效用是训练后备军，在出现需要时拿起武器。抗日军解除武装时，并没有把全部武器和弹药交给英国的殖民地政府，所保留的武器和弹药埋藏在森林里的秘密地点。

马来亚共产党的目的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的马来亚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其实在战前已经在布署着的，虽然抗日军在日据时期跟英国领导的秘密 136 部队在森林里合作。

可是，由约翰·戴维斯（前马来亚警官）和李察·布隆姆（前马来亚公务员及华民政务司官员）领导，从锡兰用潜水艇潜入马来亚跟抗日军建立联系的 136 部队的英国官员，一般上都被排除在抗日军的内部议事以外，没有参与他们对战后马来亚的政治规划。也许当时也存在着语言的障碍。虽然戴维斯和布隆姆都会讲广东话，跟抗日军打交道是用华语和广东话，但他们却不熟悉抗日军比较喜欢

用来进行政治讨论的语言：华语。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马共内部就已经有‘鹰派’和‘鸽派’之分，即前者是倾向武装起义的一派，而后者则是鼓吹较温和路线的一派。日本投降以后，当时的马共总书记莱特（他还使用多个别名）——顺便提一下，这个人在战前已经是新加坡警察部队政治部的一个秘密特务，并且在英国人回返马来亚后，已经跟警察的情报局恢复联系——把党的斗争方向引向宪制去。他认为有可能让马来亚共产党继续保留作为合法政党的地位。这个合法地位，是马共于1930年成立，长期徘徊于政治荒野后，英殖民政府在二战前夕同意的。英国的情报称，他的观点获得中共代表胡愈之和马共中委杨果的支持。<sup>1</sup>

此时，马共决定追随莱特的宪制斗争政策，首先，他们倾全力去控制马来亚各地的劳工运动。当时的局势正好适合搞这类活动。日本占领使马来亚的秩序崩解，陷入一片混乱。在战前主要依赖橡胶和锡的经济，现在已经宣告崩溃，市面上严重缺乏各种必需品，包括白米。日据时代政府所发行的钞票，经英国军政宣布，变为一文不值。金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出现飞升的通货膨胀。黑市则欣欣向荣，贪污猖獗。事实上，英国军政的缩写BMA广泛被讽为

---

1 译者注：胡愈之（1896-1986），早期受鲁迅影响，后积极投入反国民党和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后被中共吸收为特别党员，是中共在知识界的重要代表。1940年底，他来到新加坡，据称是受到周恩来指示，到南洋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帮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他还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日据期间，与郁达夫等逃往印尼。战争结束后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1948年8月回到华北。逝世时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可参阅费孝通，夏衍等著的《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1989年，北京。



Black Market Administration (黑市政府)。

马来亚的警察部队，士气达零点，因为他们在战时被可怕的日本宪兵利用来镇压平民，尤其向华人施暴。法治和社会秩序在国内的好多地区已经荡然无存。

后来成为殖民政府心理作战署的要角杜智超，在英人回马后密切跟英国情报局合作，在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之间担任英国军政和马共之间的某种非正式联络员。在他所写的其中一份报告中，他指马共已经以工会的形式成立了几百个共产党的统战组织，为新加坡的大型泛马总工会打好基础。

政府非常关注好战的激进工团主义，并全面扩充以应付有关局势。泛马职工总会充当马共对抗政府攻势的前锋，其势力只有到了1948年6月2日职工会修正法令生效时才真正被挫败，该法令削减共产党人在职工运动中提任执委的机会。

1947年3月，明石阳至教授和杨进发博士对他作了相当详尽叙述的马共总书记莱特，是个在越南出生的华人，相当神秘的人物，卷逃了党的基金，据称是约130,000元的现金和金饰。我们今天的客人，当时的党副书记陈平对他的叛变作了全面的调查。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莱特不仅在日据时期是日本宪兵的间谍，他还在战前替马来亚的政治部工作。例如，莱特干过的其中一个勾当，就是在日据初期给日本人提供有关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黑风洞开会情报，造成马共的高层成员牺牲或被捕。

莱特失踪后，陈平继任马共的总书记。

根据政治部的情报，陈平在1947年7月至11月到曼谷和香港去，接触当地中共的高层干部和代表，寻求他们协助追捕莱特。我不太确定那些中共代表是谁，但一直以来都接受其中一个方将军的说法。假使这是的话，我要感激陈平能给我确定一下，那位将军是不是《红旗》报的前主编和闽粤赣边区的长官，于1952年

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sup>2</sup>

另外，也是根据政治部的报告，在他访曼谷时，参加了由泰国共产党主催的泰、中、马共党的高层会议，会见了在中共拥有的曼谷《全民报》里工作来掩饰身份的中共代表。安东尼·索尔德则在他所著的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马来亚之共产党起义》）一书中告诉我们说，陈平从香港回来时，也带来一封周恩来的信，信的大意是：虽然在东南亚各西方殖民地展开武装斗争的普遍条件已经成熟，但由于他对马来亚当地的情况不熟悉，所以无法说马共展开武装起义对抗英国统治的时机是否恰当。

根据另外一份政治部的报告，陈平在 1948 年 2 月再度去曼谷，去会见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以及其他东南亚共产党的代表，陈平可否针对这个情报作一些评语？

我现在要触及高度受到争议的加尔各答 1948 年 2 月的大会，即是 2 月 19 至 24 日的‘东南亚争取自由独立青年学生大会’和 2 月 28 日到 3 月 6 日的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一直都常常有人指加尔各答的大会在 1948 年有用某种方式对东南亚的共产党发出‘指示’。那就是所谓的开展武装起义，而当时参加会议的澳洲共产党领袖罗伦斯·沙克基回国时带着这个指示，途中停留在新加坡跟马共的中委会开会。沙克基于 1948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在新加坡。

我不是研究沙克基的专家，但我在墨尔本大学图书馆的档案中看到他写的书和文章，还有澳洲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大会的会议记录，看来，沙克基根本未曾在任何时候证实过这个情报。事实上，当他从新加坡抵达墨尔本，接受报界访问时，他否认自己有被任命去向马共传达这样的议决。

---

2 闽粤赣，即福建，广东和江西。



1949年6月18日，他在自己主编的澳洲共产党的报纸 *The Tribune*（《论坛报》）中写了一篇关于他出席加尔各答会议的文章，他说：我当然有告诉他们〔马共领袖〕，争取民族独立，防止旧的殖民主义奴役再度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是正义的，是合理的，将会获得所有进步人群的支持。像他们该在什么时候开展武装起义，或是他们是否应该这么做之类的问题，是马来亚人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比我更有经验，因为他们在对付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斗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对我来说，这些听起来才像真正的沙克基的声音。

路特·麦维伊（Ruth McVey）在她写的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加尔各答大会与东南亚之起义》）一书中，提到一点说：虽然大会（印度共产党第二届大会）没有公开促请出席代表提升造反的水平，总的气氛却是对殖民政权充满敌意。我倾向同意她的说法，而这看来也是沙克基所说的。

再一次，我会很感激陈平的评语和明确的答案，关于沙克基是否有从加尔各答的会议带回任何要马共开展武装起事的信息？

看来拿起武器的决定是在1948年3月21日马共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中做出的，虽然它也可能是在5月举行的中央第五次全党大会决定的。不管哪一个日期是正确的，看来，一切已是定局，马共已经决定要放弃宪制斗争，开展游击战。

可以明显看出，马共激发的暴力行动从1948年5月17日至6月7日在增加。这段期间内，12位园坵经理和承包商被杀（11名亚裔和1名欧裔）。

6月初，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MSS），即新加坡和马来亚警察政治部的前身，收到报告，指在吡叻怡保及和丰地区，前抗日军受指示前往森林中事先安排好的营地集合，全马各地的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都宣告关闭。



1948年6月12日，三名国民党领导在柔佛中部被枪杀。马来亚保安局报告马共正准备武装斗争，在周围山区进行着军事训练。

1948年6月16日，在吡叻和丰打死三名英国园坵经理：在爱菲尔园坵的阿瑟·瓦克尔，宾逊（Phin Soon）园坵的约翰·阿里逊和刚抵步不久的伊文·克里斯帝森。

同一天，最高专员爱德华·壬特爵士（Sir Edward Gent）宣布柔佛和吡叻的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后来扩大至全国。虽然在马来亚的总指挥官鲍彻尔（Boucher）将军在6月中发表一份新闻声明，说：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克服过的问题中最容易的项目。虽然情况骇人听闻，敌人在战术和勇气上都比希腊人或印度的‘红色分子’弱得多。这句成了他著名的遗言。紧急状态持续了12个年头，夺去数千计平民，警察，军人和马共成员的生命。

政治部估计，在1948年6月紧急状态初期，马共的武装人员达4,000至5,000人，有约50,000名后来称为‘民运’的支持者给他们供应粮食，基金，衣服，药物和情报。但这些都是大略的近似数，因为马共从来没有披露它的确实力量。那时，对付马共的正规警察和军队总共有9,000名正规警察和10个步兵营。

## 关于马来西亚半岛第一次紧急状态的问题

1. 为什么马共没有在1948年以前更早的时候，例如，在1946年当回马的英国人还未能站稳脚步去巩固地位时，采取武装斗争？是不是因为马共没有能力和资源去重组和管理这个国家，因此准备将它留给英国人，而自己则利用此良机去加强本身的地位？莱特在这一切中扮演什么角色？
2. 陈平对莱特的坦率印象是什么？毕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他的助手。

3. 约翰·戴维斯这位 136 部队的名人是否知道马来亚共产党在战争结束后的最终政治议程呢？譬如说，当陈平在森林中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这个议程？
4. 关于莱特在泰国被泰国共产党和中共代表抓到及弄死的‘真实’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难接受陈平不久前接受《亚洲周刊》和华文报章访问时所讲述的那样，说他是意外被扼死的。
5. 关于有报道说在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时，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中可以看到‘外国人’，例如：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据说曾出席在彭亨举行的第二次马共会议；有马来亚的巡警于 1952 年在打巴看到解放军中有‘白人’；以及有原住民报告在 1953 年在小嘉来（Jalai Kecil）地区的解放军营地有‘白人’在操作无线电机。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如何？
6.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争执，对马共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7. 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需要什么资格呢？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和民运干部之中，成为马共党员的人数，在百分比上是占了多少？
8. 1947 年，选出陈平取代卷逃的莱特为总书记的马共中委会议是不是在新加坡举行？如果是，在什么地方？
9. 马共的通讯联络，依靠的是可信赖的交通员和‘固定信箱’。为什么在紧急状态时没有采用无线电通讯呢？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毕竟，在那个时候，无线电发射器在市场上可以轻易买到，而在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人员中，有人受过无线电操作的训练。
10. 当罗伦斯·沙克基在 1948 年初参加加尔各答会议后，回国时在

新加坡住了约两个星期，陈平在这段期间有见过他吗？陈平是否可以在这里一举解决这个问题：沙克基有没有从加尔各答带来任何信息给马共，要后者展开战争呢？

11. 是谁出席 1947 年的布拉格会议？是格拉德·狄·古鲁兹吗？
12. 陈平是否可以讲述关于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情况，以及他和他的同僚住在北京中联部<sup>3</sup>的情况？他跟中国方面的主要联系是谁？臭名昭著的康生那时候还是主持中联部吗？陈平有见过邓小平和毛泽东吗？
13. 陈平代表马来亚共产党出席过哪一些的海外会议？
14. 陈平怎么解释，他的同志之中，竟然有那么多人不只是准备投降，但还要倒回来引保安部队回到他们的营地，以致在很多的情况下，使他们之前的战友同志被杀害？

---

3 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 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斗争的问题

约翰·顾斯德 中将

对于 1948 年 6 月，我一直都在设想一个公平的对称度，就是就任何对称意义而言，双方都不准备要冲突的。可是，很显然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在潜能上，拥有较多可以供使用的资源。

**问题：**马来西亚共产党究竟是把希望放在什么东西上呢？人民的广泛支持吗？还是把政府打垮？马共可曾设想过真正的援助会来自何处，是马来和印度社群，还是来自国外？后勤的问题是否在正反两面都强烈影响最后的决定？为什么在 1948 年 6 月就只有 3 名种植人被杀，为什么不是几百人？

1949 初再教育和再训练的议决（据我所了解，是在 2 月宣言中传达的）似乎把整个过程带到太远去了，于是就出现 6 月议决，要求党更加放手挑衅。

**问题：**在 1949 年 2 月所设想的再教育和再训练如何进行，由谁搞的呢？既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到底是谁传授的呢？是不是有中共的指导员，或纯是党内人士？从党的观点，结果的成效如何？

从李察·史塔布斯的最后一道问题推论，我认为‘赢取民心’是好政府的一部分，而布里兹和更强悍的邓普勒把这些带进了他们

的规划和行动中去。他们推行的措施，增加了可以理解的苦难，却是合情理的做法。<sup>1</sup>

**问题：**就你所看到的事件演进过程，那是不是能够成立的评语呢？即是，严峻或甚至是武断的统治，对于它导致情况的改善是不是要给予尊重呢？特别的个案是丹绒马林。在邓普勒将军的著名灾难下，是不是更难去渗透呢？

**问题：**以下诸项作为对手，其造成的惧怕程度如何？

- \* 1948 年的搜索部队
- \* 较后的特别空军服务
- \* 仙奴伊土著警卫团 (Senoi Pra'aq)
- \* 炮轰及轰炸
- \* 空投传单和播音飞机

**问题：**最后，从马共的观点，事件之高潮是什么？

---

1 参阅第 3.10 章。

## 问关于 马来西亚共产党斗争的目标

安东尼·索尔德

马来西亚发生紧急状态的原因何在？那是不是一场有计划的险招？为什么新推出的职工会立法被视为是不可忍受的挑衅呢？是否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呢？陈平是否可以核实，无论发生什么事，马来西亚共产党已经计划在9月起事？

目标是什么呢？以上问题的答案为准，在什么时候这些目标已经是无法达致了呢？假使能够在吡叻，柔佛，雪兰莪和彭亨部分地区取得华人的支持，那是不是足以抵消马来人的效忠呢？现在回头想，他是不是认为本来可以对印度割胶工人多做一些工作呢？他如何评价他们的革命潜能呢？特别是在巴兰被捕之后，他被形容为高明的共产工会组织能手，搞到政府官员疲于奔命。党是不是缺乏有效率的印籍组织工作者呢？

在战略方面：为什么没有一贯性的，像机关枪党那样手法的城市恐怖活动？为什么没有，或有也很少欧籍政府人员成为目标？欧籍种植人和矿家不是更容易受到攻击，死伤不是应该比他们的伤亡数据来得高的吗？彭亨的第六支队是否有中共八路军的老战士？

对于‘解放区’有没有严肃认真的计划？陈平想像应该如何去维持它？据他估计，他们是否差一点就达成呢？差多少？



是否有任何关键性的失败，如通讯之类的？

为什么马共在 1951 年改变方针？陈平对蓝瑞的看法如何？还有，特别是对小刘的看法。土地的重新分配是不是一项课题呢？基本的想法是不是旨在打破联系呢？

对于发号司令和控制权的困难之处，他有何见解？

他对现有的文献评语如何？有什么错误和误解吗？

大约在 1953 年之后，在北京是否有影子中央委员会——或是咨询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刘一帆和其他人有没有在里边？他们对马共的决策和行动是否有贡献意见？

马共是不是特别依赖某个方言群或族群？

回顾过去，回到 1945 年，或是直到 1960 年间的任何时候，他会有什么不同的作法？

他对武装部队各个方面的评价如何？

他是否可能在马来亚华族资产阶级中有更大的吸引力？如何做呢？跟英文教育华人建立联系的问题是什么呢？

马共如何宣称本身是代表马来亚人民呢？

## 1948-57 年： 马共政策及所获支持

卡尔·哈克

1950-4 年期间对马共政策的纲要是众所周知的。1950 年 6 月，大规模迁徙和重新安置的行动开始。作为对跟其约 500,000 名支持者日益隔离的对策，马来亚共产党在 1950 年 8 月号召强烈的抗争，导致战事在 1950-1 年达到最高峰。经济、重置区和军事目标受到更多的攻击。过后在 1951 年 10 月，马共作出重大的政策改变，发表七点‘十月决议’。<sup>1</sup>

---

1 参阅 Public Record Office: CO1022/187。有关马共决议的英文版文件有六十余页，包含 7 个或更多文献：

1. 《党的成绩与错误》总结说：为了物资供应、支持和党的政治因素，必须把‘民运’列为‘七项当前要务’之首。这项改变有三个方面：第一，减少恐怖主义以争取‘群众’；第二，加强政治工作，包括跟‘中产民族资产阶级’和渗透工团和学校；及第三，加强对马来人，印度人和原住民的工作。武装斗争从第一‘急务’降至第二位。有人提出要更好了解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实践——跟对马来亚的具体情况更充分的了解相结合。
2. 《为战事取得更大胜利而斗争》把战事列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份，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出路。
3. 《中央政治局对履行党务工作之指示》列明执行‘七大要务’的指示。
4. 《清野与种殖》；

这些决议标志着战略的改变：(1) 对经济目标及影响平民的攻击减少，甚至连对付走狗也必须在做足宣传情况下才执行（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不再有泼镪水和杀害怀孕妇女。）；(2) 增加参与政治组织和进行颠覆，包括争取‘中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最后(3) 通过‘民运’组织的集中力量，全力加强支援物资供应和争取支持、增加粮食贮藏量、争取原住民的支持，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调动人员到武装队，甚至挥锄参与耕种。因此，决议涉及目标，政治和供应工作上的改变。

结果及以上措施的部分导因，在 1952 至 1954 年间，紧急状态的战事减少（其实单在 1952 年就已经减少），而颠覆活动（尤其是在新加坡）却告增加。数支解放军‘长征’到马、泰边境（勿洞）和泰南，留下武工团，暗杀队，民运和人数大大缩减的民族解放军在马来亚内陆地区打低强度的战争。民族解放军逐渐缩减，以保持民运的势力。此外，有人呼吁（不是首次，也非最后一次）增加非华人的支持力量。为了促进这个方面，在结构上作了改变。到了 1955 年，最显著的马共活动似乎是日益增加的渗透学生和工运组织，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么，在这段期间和这些发展下，所产生的显著问题是什么呢？

### 关于反对迁徙重置运动的问题：1950-1 年

1950 年 8 月，马共向其部队发出指示：对于迁徙重置计划，必须强迫村民反抗到底。<sup>2</sup>

- 
5. 《物资供应与保健》；
  6. 《巫、印民族工作》；及
  7. 《民运人员之安全》。

2 参阅 John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1993 年，昆士兰大学未出版博士论文)，第 167ff 页，以了解关于 1950 年 8 月政治局之‘反迫迁运动指南’。



在初期宣传指重置迁移仅仅是增加了对马共的支持的情况下，马共用了多少时间去了解到布利兹计划的全面重要性呢？

马共在 1950 年 8 月之后的反重置政策涉及些什么呢？对于防止、毁灭或只是渗透和颠覆新重置区，马共期望做到什么程度呢？

重置对于物供，情报和士气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和战后期间把华人驱逐出境的作法有何影响呢？

什么时候和在怎样的情况下马共认识到经济破坏政策未能起得效应——即，无法消除英国人的决心——反而使支持下降？

### 关于 1951 年决议的问题：其源起和影响

““土匪”了解政府不能移走所有的村民，也知道总会有供应的来源...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强迫村民服从他们的命令’（雪兰莪情治人员，1949 年 10 月）。<sup>3</sup>

‘在敌人的迫迁政策下，广大的群众基础已缩小成为孤立的小块块儿。这项新因素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1952 年 1 月雪兰莪州书记处文件）。<sup>4</sup>

有三组关于马共十月决议的问题尚未得到圆满的答复。那是关于其源起，内容和影响。

---

3 Liew Thian Choy, 4.10.49 (雪兰莪情治人员), Rhodes House, Oxford, Walker Taylor Papers.

4 PRO: CO1022/187, *Extract from Weekly Intelligence Summary 110* (no date).

## 关于 1951 年 10 月决议之源起问题

是什么相对重要的军事供应，政治和国际课题，促使马共对战事发出超过六十页的新指示呢？

有关决议是否是作为对布里兹计划的反应，达到什么程度？

其作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走向起变化，如从印尼共产党革命到 1949 年 10 月令人振奋的日子中，韩战的相持不下昭示着共产党的挺进步伐比想像中缓慢的反映的程度如何？

其作为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历史的结果的程度如何？那是说向其他人学习，如学习 1929 年古田会议和 1934 年长征的例子，而不是跟随任何人的指示。

1951 年 10 月决议源自党内政治辩论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

(a) 认识到 1947-8 年‘由下’（群众，劳动阶级和农民）赢取统一阵线的政策现在必须辅以同时赢取‘由上’（中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及；

(b) 认识到现有的军事和破坏策略疏远民众的支持，因此难以持续；及

(c) 来自日益激烈的内部异见和宣称党正遭遇来自蓝瑞，小刘等人的左倾偏向。

## 关于 1951 年 10 月决议内容的问题

1951 年 10 月决议对群众组织有何重要性？决议呼吁改善供应措施，赢取更多原住民，造更多米粮贮藏处，停止反对重置区，反过来选择从内部颠覆重置区。

十月决议是不是标示从1951年起采取比较自觉的尝试，在城市，尤其是新加坡建立颠覆网，或甚至是在牺牲森林和解放军的情况下转移资源和人员往这个方面呢？例如，决议强调必须赢取中产阶级。对于学校，马华公会和其他组织的颠覆也会增加。这些措施有多重要呢？在整体的计划里，占什么分量和扮演什么角色呢？

1951年10月减少活动的措施，是否也表示因为‘左倾’而出现支持率的流失？其程度有多大？‘左倾’在这儿是理解为对决议称为群众的‘既有’或‘具体利益’施行过度暴力。决议列入多项旨在增加支持的措施：如停止扫射巴士，可能的话不杀怀孕‘走狗’，不撕毁身份证或向重置新村区开枪。

陈平如何看待决议的内容——其均衡性或中心内容——整体上来说？

## 关于1951年10月决议影响的问题

到了1952年底，每月发生的紧急状态事件已经减至高峰期的四分之一以下。在陈平看来，这是什么造成的结果？决议本身，重置计划，还是邓普勒的政策？

对于‘走狗’疑犯，决议指示宁‘意外放走’不‘意外杀死’。这样的措施如何破坏决议中也要求加强的马共反奸行动呢？那时候和过后，公开采取了什么措施去加强反奸行动，及加强本身对情报的收集呢？例如，招募政策是什么时候和在怎样的情况下修改，以对付政治部的渗透呢？政治部的渗透什么时候开始取得成效，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其实嘛，陈平本身在1955年声称他无法控制所有的新加坡马共成员，因为其中很多是政治部的特务。

决议成功鼓动起政治和颠覆活动达到何种程度？



决议对马共和解放军如何造成混淆和打击他们的士气？毕竟，1952年10月，马共的指示是再度增加军事行动。

有关决议的结果，马共有在1951至1954年之间在新加坡加紧活动吗？程度如何？用什么方式？新加坡有在任何方面增加其重要性吗？<sup>5</sup>

### 关于陈平于1952-4年从彭亨转移到勿洞的问题

1952年，部分的马共成员开始可被称为中共长征的本地版本。1952年，英国的记录显示陈平（从彭亨开始）进行转移，首先从彭亨（或许在开始时被视为是潜能的‘主要根据地’吧？）的文德甲地区到金马仑。然后从1953年中，跟（当时在吡叻的）12支队转移到马——泰边境的勿洞地区。<sup>6</sup> 当时任心理作战员的杜志超宣称，在1951-2年间，Edgar Snow著的《西行漫记》中‘长征’章节的抽印本大量分派给解放军。<sup>7</sup> 这留下好几个引起注目的问题。转移到勿洞的决定是在什么时候做出，是1952还是1953年呢？在金马仑高原的逗留是北行的暂息，还是要建立新总部和主要

---

5 PRO: CO1022/249, (新加坡) 总督致殖民署, 1953年8月26日, 报告马共中委阿谷在1953年4月30日被其警卫员在彭亨的文德甲杀死, 后从其身上搜出文件, 显示马共中央委员会——不是南马局——控制新加坡。

6 勿洞边区成为主要的马共基地, 直到1989年的协议终止对抗为止。马共中央首先是在1952-3年经过金马仑高原区。Leon Comber, "The weather ... has been horrible": Malayan Chines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Emergency", *Asian Studies Review* 19, 2 (1995), 第49页, 注释6。第十支和第八支在1954年移入勿洞。

7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第172-4页, Coe称: ‘杜志超认为马共, 在他们的内部宣传中, 视长征为“高度符合他们在1951年在马来亚的地位”’。

根据地的尝试已经失败呢？是什么因素最影响这次的转移呢？党内政策吗？还是中国的例子比较重要？这个转移是如何跟 1952-4 年间的马共政策相配合呢？勿洞是不是马来亚版的延安吗？它是唯一的主要基地，或是多个基地中的一个呢？或者那是在面对保安部队成功发动压力的情况下的一个尝试，以取得一个总部，并经此指挥已经是要转向日益增加专注的颠覆活动呢？

### 关于名词术语的问题

陈平是否要评论一下华文和共产党的术语？例如，‘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应该是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或是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或是都没有关系？

### 关于‘葛尼回魂’的问题

有谓鬼故事乃现代新加坡最流行的文学流派，而看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可以对这类激情争取版权。1952 年，有一出戏剧演出‘葛尼回魂’（他因为太过残酷，心脏被挖掉）来警告邓普勒在还有时间前赶紧回家。相对上，马共对葛尼，布里兹和邓普勒有什么看法？

### 关于回忆和 60,000 元人的问题

口述历史往往在经历方面比年表记录强。好些最具有启发性的资料是共产党人的日记，它记录着解放军战士对着明月沉思，杀走狗的激情，或庆祝农历新年的心情。政府方面的宣传品，则喜欢讲述当外界家家户户在欢庆诸如农历新年的佳节时，森林生活是如何被掠夺掉欢乐。陈平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深刻的回忆呢？在 1951 年，导致陈平被捕的情报悬赏 60,000 元（等于州委或市委的两倍。作

为比较，普通党员是 2,000 元。) <sup>8</sup> 据称，有一位解放军一直使用穿‘女苦力’的衣服，手抓着手提袋中的手榴弹，以躲避被捕，其他利用猪寮的掩护，阻碍马来警察来搜查他们。<sup>9</sup> 那一回是保安部队跑到最靠近陈平，差点发现他呢？

---

8 参阅 Mohamed Zarougi,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Guerrilla and Counter-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92), 第 248 页。

9 胶工李亚凤审问档案 Interrogation 23.9.49, reel 5'6" *Lee Ah Fong, rubber tapper*, Rhodes House, Walker-Taylor papers.



## **1950年代及1960年代 游击策略和英国的戡乱策略： 为何输了这场战事？**

李察·史塔布斯

英国在开始阶段的对抗游击队策略可以最好形容为‘高压和厉行’，目的在于恐吓及胁迫人民放弃对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任何支持，同时利用武装部队扫穿森林，去搜剿出游击队。这个策略似乎产生反效果，造成许多无辜人民被杀，受伤，被捕或被害，结果使到许多马来亚人民，尤其是马来亚华人反对政府。

### **关于早期紧急状态的问题**

英国的策略是否反而协助马共招募到更多新兵？马共领导对英国初期采取的策略的总评估是什么呢？

1950年爆发的韩战，使橡胶和锡米两项马来亚的主要产品价格飞涨，造成的繁荣浪潮，横扫过马来亚全境。这个繁荣现象，跟战后前数年内样样短缺的情景成了强烈对照，让政府能舒缓喘气。它也使政府的税收翻了一番。

## 关于韩战造成的繁荣对马来亚的影响的问题

韩战造成的经济繁荣如何影响马共招募支持者的能力呢？它有没有在任何方式上破坏马共的吸引力？这项繁荣有没有造成更容易筹获基金来进行游击战呢？

从 1950 年中开始，政府实施居民重新安置政策。在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12 月之间，近 400,000 人被重新安置。这段期间内，大多数的重置中心并不像筹划者所答应的模式，反而是更像贫民窟。再加上有报告指游击队可随意进入新安置区内，以至新安置区内充满反政府情绪，因此，把散居各处的居民集在一块，使到马共动员支持力量的工作反而变得更容易了。

## 关于重置区的问题

马共领导开始时是视重置区计划为对他们战事的威胁，还是为争取更大支持的良机？马共对重置区计划初期阶段的成效评价如何？

1951 年末和 1952 年初，系列的事件导致政府改变策略。最高专员亨利·葛尼爵士被杀，数位殖民地政府高官退休，在伦敦是新的政府上台，对政府的反游击队策略进行全面的检讨。伦敦的保守党新政府决定委派格拉德·邓普勒为葛尼的承继人。邓普勒推出他称为‘赢取民心’方法的新策略，强调协调政府各层面的努力，而不仅是军事战斗，通过尽量解决广大民众的不满，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尽可能使民众置于政府行政的控制以内。

他的论据是：在赢得民众支持，或至少使到他们中立之后，马共游击队就会被孤立，因而也就变成是更容易被保安部队追捕的目标。此外，政府也可从珍惜政府所提供的保安，繁荣和服务的民众那儿取得更准确的情报。新的策略从韩战的繁荣生成的剩余取得资

金，实行对‘新村’（之前称为‘重置中心’）提供服务和设施，如学校，卫生设备，公共医疗，民众会堂，祭祀场所，长期地契，乡村警卫团等等。此外，警察，保安部队和乡村警卫获得更好的训练，制止他们对普通民众滥权。宣传和心理作战活动也告强。

逐渐地，这项策略证明有实效，虽然是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作为经济的基础。马来亚华人的情境尤其困难，而政府看来对此似乎是一筹莫展。当邓普勒在1954年离开马来亚时，情况被政府正式形容为‘相持不下的僵局’。

## 关于1952-4年邓普勒时代的问题

马共领导有没有料想到政府会有策略上的改变呢？有数位分析家把扭转局势的大功加给邓普勒。陈平如何评估邓普勒对政府进行反游击战造成的影响呢？新策略的那一个方面使马共领袖在争取民众支持和展开游击战方面造成特别的困难？

正当马共修订的策略在1952年开始有成效时，政府方面也开始开放政治进程。开始是举行市级选举，后有州级选举，然后在1955年7月举行联邦选举。政党纷纷成立，并批评英国的殖民政府。英国受到压力，受促把独立日推前。事实上，马来亚在1957年获准独立。有一个论点这么说：当政党间的竞争开始热起来时，马共对于在马来亚的普通群众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了。反对英国的声音可以通过政党，在不会受到对付情况下发出，不必通过非法的马共了。

## 关于日益加强自治的冲击

选举的推行对马共造成什么后果？像马华公会和泛马劳工党等政党的发展，使普通人民对马共的支持有造成影响吗？1955年联



邦选举和马来亚准予独立，对马共领导评估他们的策略有何影响？独立后，马共是如何利用合法政党呢？

对于游击战进行过程的转捩点，在紧急状态分析家之间有争议。一些认为 1952 年下半年暴力事件的减少是转捩点。另一些视邓普勒的影响为很重要，转捩点是在 1953 年，他出任最高专员的第二年，当时他的改革已经开始见到成效。至于把紧急状态视为政治战斗者，那是 1955 年的联邦选举。这些较后的日期倾向反映这样的论点：如果政府的改革没有成效的话，那马共将有能力建立起展开行动的政治基地，民间暴乱的长期延续的可能性可能会大大增加。关于马共是否输了和政府是否赢了也有争论。马共决定投入期望取得快速胜利的军事战斗，有没有使它失掉太多的潜能支持者呢？政府的‘赢取民心’策略是否制造了取胜的条件，或是这些条件其实是本区域和国际事件的后果，根本在双造的控制之外？就是韩战促成的繁荣，整个 1950 年代橡胶之高价，以及马共未获得任何外援等条件。

### 关于紧急状态转捩点的问题

事后回想，从马共的观点，紧急状态的转捩点是什么呢？马共有没有打输了游击战？或者说，政府有没有打赢呢？

## 1955-60 年：从华玲到独立

卡尔·哈克

我们这一代人  
是心灵相通的。  
这是苦难的一代，  
奉献的一代。  
但也是开拓的一代，  
胜利的一代。

——方壮璧《向我的老师和同学问候》，1997年。<sup>1</sup>

以上摘录方壮璧的诗，表达一股投入战斗的信念，驱使着不愿屈服的人走向直视饥饿和死亡，同时也视死如归，宁可面对胁迫。<sup>2</sup>它让我们能够看一看某位报人所形容的‘充满着爱和恨’。但它也反映出一种满怀希望的所求，要属于‘胜利的一代’。这个说法回响着共产党人搞革命协助加速‘去殖民化’和击败英国殖民主义的故事，虽然依据共产主义路线重塑马来亚和新加坡遭受失败。<sup>3</sup>

- 
- 1 引自方壮璧著《我们这一代丛书：(3) 李兵的诗——一片生疏的天地》，雪兰莪大汉山出版社，2000年。
  - 2 方壮璧从1958年起，在一段时间内在新加坡担任马共和李光耀的接洽人。在未知他的真名以前，李光耀称方壮璧为‘全权代表’。
  - 3 参阅丘启枫在1998年5月15-21期《亚洲周刊》的评论和专访。丘形容陈平的历史任务为：‘马共的历史是历史滔滔长河的一部份 ...’

在这里引述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陈平早在 1955 年 12 月就提出这样的说法，作为合理化他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寻求在不损尊严下谈和的部分理由。根据这条思路，共产党人成功协助迫使英国人在 1955 年 7 月允准联邦大选，打开步向独立之路。现在，他们辩称，他们本来可以和应该放下武器及重新加入政治的进程的。这个道理，至少在间接上，在联盟政府拒绝使马共成为合法政党，及不准备在没有严格筛选下重新吸收解放战士时被否决了。陈平得等到 1989 年，在当年 12 月达成最后的和平协议的谈判中，在马来西亚的谈判人士面前重提这个说法。

本文对 1955 年 12 月 28 及 29 日的华玲会谈提供背景资料 and 提出问题。陈平在那次会谈中，首次尝试提出民族解放军协助加速非殖民化的论点，也是首次寻求通过谈判来结束马来亚的紧急状态，但他提出的条件却被马来亚联盟的代表和新加坡当时的首席部长马绍尔断然拒绝了。或许，引出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的最容易方法，是用呈现会谈前后及会谈时的大事年表。

华玲会谈之前重要事件年表

日期	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	国际
1951 年 10 月	马共十月决议指示增加颠覆学校及中产民族资产阶级，导致通过合法组织搞公开’统战‘活动的努力告增。	共产党支配的‘世界和平’执行理事会第二次大会于 11 月 1-7 日举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于 11 月 20 日发表声明支持，引述大会的议决：在民族自决和外国军队撤出的原则下，应该用

陈平的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组成了他的历史角色的一部分。在汹涌的波涛中，他或许无法达成他的理想和梦。’



## 华玲会谈之前重要事件年表，续

日期	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	国际
1951 年 10 月		和平谈判的方法来解决印支，缅甸，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战争问题。 <sup>4</sup>
1953 年	<p>《马来亚箴言报》（6 月）刊登《马来亚人民为什么而战》，<sup>5</sup> 所提出者包括：</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独立自主的‘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包括新加坡，民选政府至乡村层次，唯‘选举管理机构必须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li> <li>2. 新民主经济，免费土地予农民。</li> <li>3. 民生</li> <li>4. 促进人民文化</li> <li>5. 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li> </ol>	中——苏强调外交政策实行‘和平共存’。
1954 年 4-6 月	<p>日内瓦会议：随着韩战在 1953 年结束后，1954 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在获得中国的支持下（虽然越盟不悦）将越南一分为二。印度被委派往国际监督委员会，监督越南，柬埔寨和寮国三邦之停火。</p> <p>伦敦帝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第二届大会。马来亚的林丰美呼吁结束紧急条例，英军及英政府撤走及成立临时人民联合政府。<sup>6</sup></p> <p>五项原则：中——苏谈判中达致的五项原则，例如：不干预他国内政。</p>	
1955 年	马共发函（5 月 1 日）表明愿意谈判停火（于 6 月收到）。联盟大选宣言建议谈判结束紧急状态。	4 月 18-24 日：万隆亚非会议。苏卡诺呼吁与会者组织‘和平国家之道德暴力’。

4 参阅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3), 第 174-5 页。

5 摘录自 Public Record Office: CO1022/187。

6 参阅 John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第 175 页。

## 华玲会谈之前重要事件年表，续

日期	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	国际
7月 9月8日 10月27日 11月18日 12月22日 12月28-29日	<p>联盟在联邦选举中胜利。</p> <p>大赦献议。造反相关的违法事件将不受对付。</p> <p>《海峡时报》报道：东姑阿东拉曼称：我将不跟陈平谈判并可能得让他回去跟波恩(Bourne)将军谈判。</p> <p>马共——联盟谈判之前的第二次准备会议，陈田提早到场并发表新闻稿。马共因此受到警告。</p> <p>马共中央扩大会议同意八点宣言，为‘实现独立自主，民主及和平的马来亚而斗争’。</p> <p>华玲会谈：陈平似乎有讲说如果马来亚能取得对国内安全的控制，马共将放下武器，陈田也提到‘国家防务’。</p>	<p>马共12月宣言： ‘当前的实际情况’促使‘独立自主，民主及和平’成了追求的目标，但长期目标是‘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八点包括：和平，独立，改变政局，民主权利，国际和平，壮大各族群。马共也接受马来语为国语。</p>
1956年 2月22日 3月5日	<p>东姑（在马来亚电台）呼吁陈平遵循他在华玲的保证：如今已经取得独立，并从英国人手中取得国内安全的控制权，马共应放下武器。</p> <p>油印‘马共声明’指责英国用过分无理要求破坏会谈。声明建议：</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撤消紧急条例</li> <li>(2) 保证民主权利及个人自由，及</li> <li>(3) 对放下武器的马共和解放军，不得进行政治或个人之侮辱。</li> </ol>	
1957-60年	<p>在全部支队撤进泰南后，1958年实行‘偃旗息鼓’政策，1959至1960年作有限的遣散复员。</p>	

## 事件简述

1955 年 5 月，联盟建议对共产党人给予大赦，以迅速结束紧急状态，清理走向独立之路的障碍。马共也在 5 月献议谈判，其依据是它已协助取得对自治的让步——包括行将举行的联邦选举——因而要参与因此而促成的政治进程。政府在 6 月拒绝此项献议。英国官员害怕马来亚的政客可能，在任何的谈判中，对和平付出太高的代价。英国是绝对不希望看到马共被承认，或其党员在未经过审查下恢复平民生活的，同时要剥夺马共的一切宣传。

在 1955 年 7 月选举后东姑受委出任首席部长，他在 8 月说他会利用任何会议来寻求共产党的投降，及阐明大赦的条件：不是谈判。唯他坚持他应该可以不受限制发言及聆听陈平的说法。英国官员理解到他们绝不能有失掉马来人合作的风险。但是，亚兰·连诺斯·波特（Alan Lennox Boyd）（后为默尔登 (Merton) 之波特大公，当时为伦敦殖民地的国务大臣）在 10 月 25 日告诉英国内阁，如果东姑作出太多让步，英国将拒绝所达致的任何协议，甚至是东姑辞职也在所不惜。<sup>7</sup> 此外，马来亚的最高专员在 11 月 30 日告诉其立法议会说：紧急状态以当前的水平持续，将不会阻碍进一步走向自治政府。

最后的那项宣布企图要消除掉使东姑作出让步的诱饵。简单地说，马共在 1955 年的操纵空间非常的小。英国不容许承认马共，或更加慷慨的条件或对接受者不进行审查的大赦。东姑简直无法要求巫统去承认主要由华人组成及长期参与暴力的马共。所谈判的都不外是共产党如何交出武器，恢复平民生活，以及结果如果出现新

---

7 参阅 PRO: Cab128/CM(55)36, 1955 年 10 月 20 日会议，会议记录 4，因为殖民地官员担心这意味着责任政府制之终结。亦可参阅 A. J. Stockwell, *Malaya*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95), vol. iii, 第 118ff 页。Stockwell 卷内有数份相关文件。



政党，要如何监督。因此，马共的目标该是很符合实际的：要求尊严获得尊重的形式和参加其他政党的自由，作为争取宣传的优势，或迫使东姑作出英国人会拒绝的让步，以挑起英——巫纠纷。

华玲会议正式在 1955 年 12 月 28-29 日举行。马绍尔以新加坡首席部长身份，和代表马来亚的东姑和陈祯禄，跟马共的陈平，陈田和阿都·拉昔·迈汀（Abdul Rashid Mydin）面对面坐着。<sup>8</sup> 东姑拒绝承认马共为一政党。他也拒绝马共党员在未事先集中在一个地方以方便调查的情况下回到社会。他设法叫陈平提出若马来亚政府取得国内保安和国防（阐释为包括马来军团和警察）的控制权，解放军将放下武器。伦敦会议订在 1956 年初举行。陈平在一个时候提出说，唯有在联盟能够控制全马的军警时，他们才好放下武器。但他也同意马绍尔的用词，就是只提到‘国内保安’。最后，东姑说共产主义和民主思想不相兼容，因此，马共的行动必须要做到相等于‘投降’和摒弃共产活动。相反的，陈平这一方要的是不经过投降及‘保持人的自尊’的和平。会谈于是宣告失败。

英国官员原有的恐惧，因为东姑的反共立场而被欣喜所取代。在 1956 年 1 月至 2 月于伦敦举行的宪制会议，东姑要求立即控制国内保安，以及在 1957 年 8 月全面独立。两样他都得到了。<sup>9</sup> 连诺斯·波特告诉他在伦敦的内阁同僚说，国内保安的要求不再能作

---

8 陈田当时为马共宣传首脑。他在 1955 年 10 月 17 日在上吡叻的仁丹跟韦利（I.C. Wylie）（副警察总监，代总监职）和朱运兴（副部长）举行第一次的联络会议。拉昔·迈汀，Rashid Mydin，为前马来国民党领袖，在 1955 年 12 月华玲会谈前，受委为中委。马共另一名马来国民党成员为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是陈平的亲密同志，唯当时由拉昔出席华玲会谈。

9 参阅 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London, 1975), 第 460-9 页。关于华玲会谈记录，也可参阅 PRO: CO1030/29-31。

为走向自治政府的障碍，因为比起正在准备撤出的殖民地政府，一个有决心的马来亚政府现在可以更有效地跟共产党打交道。<sup>10</sup> 因此，华玲会谈加强了联盟的臂力。陈平在谈判中的尝试，结果就是加速独立。但是，它是不是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呢？

## 问关于华玲会谈的起源

为什么要谈判？国际及本土政治和军事理由扮演何种角色，相对重要性如何？

## 华玲会谈的国际起源

马共领导穆沙·阿末 (Musa Ahmad) 曾经说，‘在陈平去见东姑·阿都·拉曼时，我们是听取中国共产党的忠告’。<sup>11</sup> 据他说，那是通过无线电联系和传信员。我们不提是谁叫马共去谈判，我们要问马共对当时的国际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的分析是什么。在 1952-6 年共产主义和西方朝向‘和平共存’的趋势如何增加会谈或许会成功的希望呢？它们有没有改变武装斗争的前景？马共是否是跟随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叛徒’或‘右派’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呢？受害程度如何？<sup>12</sup>

---

10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memorandum by Lennox-boyd, 7 January 1956, PRO: Defe11/187, (83), CA(56)3.

11 华玲会谈前不久，马共宣布马来人 Musa bin Ahmad 为中委会主席，前胶工联合会领袖，印人巴兰为副主席。参阅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mous Weeds*, 第 275 页。

12 毛泽东搞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于 1959 年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继任党书记，跟刘少奇的务实政策之冲突，导致文化大革命。

## 会谈的国内政治起源

陈平在华玲宣称，‘我们的武装部队称为民族解放军。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马共希望从华玲会谈取得多少东西呢？是否有获得承认的希望，或是‘把蛆虫放回面包堆’的机会，可从其他政党内部来改造他人呢？<sup>13</sup> 马共解决问题的立场，是不是不单单有最高，但也有最低要求呢？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有至少可取得宣传的目的呢？或许对提醒大家有所帮助，马共在 1955 年 11 月要列入会议议程的项目（政府方面最后拒绝要有任何议程）如下：

- \* 新村
- \* 行动限制
- \* 释放政治犯
- \* 安全措施
- \* 较开明特赦条件
- \* 承认所有在紧急条例下被禁政党
- \* 废除煽动，放逐和社团注册之法律条文
- \* 若愿意，被放逐者可以回返
- \* 设立国际和平委员会，由外国人组成，‘以执行双方达致的和平条件’
- \* 会议时间。在 10 月 17 日第一次筹备会议上，马共想像会议甚至可能长达数周。可是，政府在韦利（Wylie）（副警察总监）暗示可达到 72 个小时时，却认为他急躁。

## 会谈的军事起源

罗柏德·史各特（Robert H. Scott）爵士（当时东南亚区英国的

---

13 使用这个形容词乃 Guy Madoc，1950 年代政治部头目及后来的情报总监。



最高专员) 在 1955 年 10 月 23 日写道, ‘他们没有机会取得军事胜利’。1955 年的平均游击队军力少过 2,800 人, 在缩减着 (1951 年是 7,292 人), 以及在 1957 年 8 月是 1,830 人 (民族解放军 300 人, 其余在指挥层和民运的支援部队)。在国内外主导局势下,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军事上有没有任何一贯的职务, 或长期的军事目标?

### 关于筹备华玲会谈的问题

杜志超以负责紧急状态情报和宣传官员的身份, 替政府方面作准备, 他扮演陈平, 一位英国官员扮演东姑, 演译华玲会谈。<sup>14</sup> 有关的结果和潜在的陷阱的报告送到东姑那儿去。除了收集剪报以外, 马共采用些什么谋略进行筹备呢? 马共是否了解到, 在 10 月和 11 月的筹备会议及新闻稿之后, 华玲会谈是在多么短促的时间内召开?

### 关于华玲会谈本身和三大课题的问题

东姑·阿都·拉曼在华玲说: ‘因此, 如果你们不出来投降, 我们宁可不接受你们在我们的社会里。’

陈平则在华玲说: ‘如果马共受承认, 如果马共成员不被扣留和调查, 他们可以即刻丢下武器... [但是] 如果我们出来, 要被扣

---

14 杜志超为 1956-83 年心理作战部主任, 封丹斯里。在对话工作营过后, 出现了两本跟他相关的著作: Lim Cheng Leng, *The Story of a Psy-Warrior, Tan Sri Dr C. C. Too* (Malaysia, 2000); Kumar Ramakrishna, *The Making of a Malayan Propagandist: The Communists and C. C. Too*,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XXIII, 1 (June 2000), 第 67-90 页。

留。那是不实际的。当然，我们不准备向这个政府投降。在森林里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

这两项谈话反映华玲会谈成败的三大中心课题：受承认；走出森林的马共必须受调查及他们必须投降；以及解除武装。

## 受承认

在华玲，陈平宣称之前曾提出一项让步，据他说，东姑曾经说，如果马共停止战斗，‘我们的党就可以享有平等地位，以便我们可以用宪制手段去争取独立’。这是马共的‘顶线’立场。最高立场无法达成，但那不等于会谈一开始就胎死腹中，对吗？为了知道是否有达致协议的可能性，我们也需要知道马共的‘底线立场’，以便我们可以分析出政府是否可能在怀着自信下答应足够的东西去满足陈平。

陈平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呢？承认马共吗？成立新党的权利吗？陈平有提出让马共成立新党。他拒绝东姑要共产党人停止共产党活动，只容许他们在显示效忠马来亚之后，加入其他政党的建议。<sup>15</sup>他坦白地争辩，若他们加入其他政党，将被视为是‘颠覆’。他也向东姑保证马共不会恢复 1946-48 年的手段，即是渗透其他组织和采取半暴力手法。但是，就算他是诚恳的话，他能做到吗？

经典的马列主义理论要求两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为首，共产主义革命次之。那么，马共的政治策略是什么呢？是不是

---

15 政府定义效忠为包括：‘没有共产主义活动，因为那属于外来；放弃阶级斗争；放弃颠覆和政治暴力，接受马来君主地位；负起公民义务；接受宪法；促进种族和谐；表示对政府效忠；摒弃效忠外国势力；及支持人民的个人权利。’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第 264 页。

要放弃通过暴力来实现共产主义呢？是不是回到确立资产阶级及民族革命的阶段，以便为以后成功实现共产主义（就算是用民主的手段）而铺路呢？如果是，要用上多久的时间？最后，华玲会谈的成功变得不可能是不是因为支节（不受承认，不能成立新党）上的差异，或是意识形态和语气的不同（东姑说‘共产活动’是外来，与马来亚的要求不相容）所造成。

### 调查与‘投降’

陈平一再重复说不得有‘投降’的出现。他强调有需要照顾‘尊严’，还说在那一年献议的特赦条件发出之前（规定必须‘调查’）的‘投降’条件相差不远。所得到的回答是，在新的 1955 年 9 月的特赦下，任何跟紧急状态有关的罪行将不被判刑。华玲会议的逐字记录显示陈平甚至说如果这课题获得解决，马共会作出更多的让步。他问：如果许多马共成员回中国去，如何？剩下来的是否可以回家去，不被逮捕或不需报告，只是受到观察？答案是政治部警察不够，除非是有很大批回去（中国）。这些问题是不是可能找到一个方案呢？或是说那最后一项建议只是试探一下，或是要看看政府方面可以表现得多么无理？

### 解除武装

在北爱尔兰，像 1999 年那样，解除武装还是维持和平的障碍，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臂膀（新芬党）已经获得承认。这样的问题在 1955 年会妨碍和平吗？这里再引述穆沙·阿末的话，据他说：当陈平去见东姑时，我们从中国共产党获取忠告。他们的忠告是‘至少你们不可以交出武器’。<sup>16</sup> 陈平在华玲清楚说如果当地的

---

16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第 275 页。



联盟政府掌控国内保安和当地军队，马共不只投降，而是‘丢下’武器。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能解决呢？

## 关于个人因素的问题

在会谈前和会谈中，陈平的感觉和期望是什么？约翰·戴维斯过后形容跟你再次会面为‘兴奋激动’。你跟他会面，心情和感觉如何呢？你和他在会前和会后讨论和交流了些什么呢？

## 关于华玲会谈反响问题

华玲会谈对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以下方面的反响如何？士气；支持；政治策略；军事前景；以及相对于政治目标的冲突作用。

## 致谢

我要谢谢李良海（Lee Liang Hye）先生和我的同僚王贞平在中文资料方面给予协助，以及许忆妹（Kho Ee Moi）女士使我避免好些谬误。我以悲哀的心情作出最后的致谢短语，那是向已故余定敦（Seah Tin Toon），前 136 部队组员，他慷慨提供方壮璧先生的诗的英文翻译。

## **1961-63 年马来西亚成立及 1963-66 年马印对抗马来亚 共产党及其他左派势力的角色**

加米尔·麦克基

我在写 1960 年代马印对抗，以及促成成立马来西亚的背后政治动力的故事时，马来亚共产党的角色，看来似乎对马印对抗是无关重要，而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的作用相对上是很小的。<sup>1</sup>

相对上，为什么是那么得小，有相当可以理解的因由。在新加坡，马来亚，砂劳越，沙巴和汶莱的左翼势力，全都有战略和策略上的理由去怀疑马来西亚计划。1961-3 年一一展现的事件的政治逻辑，造成思想极化的过程。但是，印尼的卷入，对马来西亚展开这么样的敌意，跟马共的政策毫无关连，那主要是源自印尼的内部。甚至印尼共产党也似乎跟马共没有联系，开始时也对对抗毫无热诚。

对于这个故事的两个部份，许多左派的解释有着一个共同的原素，就是指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狡猾的英国人在让马来西亚独立的幌子后面，策谋它来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及在东南亚的

---

1 马印对抗不能称为战争，比较像是小小的外交纠纷，因为它涉及砂劳越——加里曼丹边境低层次的武装战斗。

海军和军事基地。首先，假使我们把它视为是马来西亚为什么会成立的理由的话，这个指控基本上是似是而非，虽然关于它的其他方面有似乎可能的因素。英国官员，尤其是来自婆罗洲者，其实在这个计划首先浮现时表现冷淡，甚至是加以反对。但是，若要对为什么印尼会介入马来西亚进行任何的解释，必然会涉及其他许多混杂的因素，其中，新殖民主义的指控肯定是个重要原素。

## 问陈平

你是否同意以上的评估，和以下的评估，或者是你要对它们加以修改和润饰？

## 马来西亚的成立

马来西亚在 1963 年 9 月通过新加坡，砂劳越和沙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而告成立，其导因主要是扎根于新加坡在 1961-3 年间岛内的政治动态。英国人在 1957 年让马来亚独立时，保留了她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只给予自治，但保留对内部保安、国防和外交继续由英国人控制。宪法也有条文允许在 1963 年作出修订。这个时刻，在东姑领导下的马来亚政府强烈反对任何要把绝大多数人口为华人的新加坡包括在联邦内的建议，以免种族比例失衡，对马来人不利。

1959 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扫荡性胜利，李光耀出任自治，但未独立，政府的首席部长。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包括了‘通过跟马来亚合并以取得独立’的意图，新政府起初作出很大的努力以强调新加坡社会，文化和甚至语言的‘马来亚’特质，其目的在于减少马来亚对合并的反对，无论如何，一直到 1961 年中，成效并不大。过后，当人民行动党内部，在主要讲华语的左派基层和讲英语、受英文教育的领导之间的分裂在 5 至 6 月到达严重关头。这



迫使李光耀催促东姑提出至少有最终合并的可能性。不然，出现亲共‘华人古巴’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可能前景将会对马来西亚造成紧迫的危险。1961年5月29日，东姑浮现用词相当模糊的包括三个英属婆罗洲领土和新加坡的扩大马来西亚的构想。这个概念迅速取得生命和本身的冲力，很快的就无法阻止了。

人民行动党的分裂，根源在于该党其实是带着强烈反殖的议程，它在1954年成立，成员包括了马共或非常亲近马共的分子。李光耀技巧地用招数来争取反英的那一派和右派政党的支持，唯不让左派控制人民行动党这个属于（当时和现在都是）古典列宁风格的干部政党。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上台后，他就立即下令释放被扣留的行动党左翼领袖，即‘工会六君子’，并委他们任政府职位。可是到了1961年初，行动党领导层和左派的分裂已经扩大至危险的程度，使前者备受攻击为对殖民主义的课题不够强烈，尤其是对由马来西亚和英国官员所控制的内部安全理事会。<sup>2</sup>

1961年4月，行动党候选人在新加坡议会的芳林补选中被鼓吹强烈反英路线的持异见前行动党人击败，李光耀面对危险：除非他能够赢回主动，否则行动党控制权可能很快就要滑向左派手中。于是，他急切吁请东姑采取朝向合并的步骤。这挑起行动党的公开分裂，左派退出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使李光耀在议会中只有极微的多数，因而被迫必需在1963年之前并入马来西亚。

1961年中至1962年12月之间，争取支持马来西亚概念的运动在新加坡，砂劳越（华人反对势力很强大），沙巴，汶莱和马来亚持续不断地展开。整个过程的细节对这里的讨论不太重要，只是注意主要的概略。

---

2 内部安全理事会有权下令新加坡政府就内部保安事务采取行动。理事会有新加坡和英国人各三名，另外的一位是马来亚联合邦的代表。

在马来亚，在这个时候已经几乎是马共的公开统战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在 1961 年 11 月公开出面反对马来西亚，在印尼，该国的共产党则跟着提出相当温和的反对，以随后提出来的新殖民主义为论据。那是出自马共的指示吗？还是北京的指示？

在 1962 年 9 月进行，毫无人情地受到操纵的新加坡全民公投过后，让李光耀取得合并的民意支持，这被他用来在政治上孤立社阵，同时摧毁新加坡境内任何反对马来西亚的潜在反对力量。

1962 年 12 月 8 日汶莱造反带出了印尼支持阿扎哈利（Azahari）领导的汶莱叛军，而阿扎哈利是反对合并的。<sup>3</sup> 马来亚和印尼起冲突的风险升涨，而李光耀就乘机在（1963 年 2 月的）冷藏行动中逮捕社阵领袖，给这些反马来西亚的政敌扣上亲印尼的帽子。当时新加坡的华人对印尼反华措施的残暴性非常反感，感受强烈。李光耀的这一招对他的政敌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社阵的残余分子继续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们自此之后总是处于被动，而李光耀和行动党则能在 1963 年 9 月的选举中把这项课题转化成为对其本身有利。

从 1963 年 9 月起，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至 1965 年 8 月，行动党跟吉隆坡联盟政府的磨擦达到了东姑认为无所选择的余地，因而必须下令马、新分家。因此，矛盾的是，李光耀争得那么激烈，并在 1961 年播下跟行动党左派分裂的‘通过跟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被证明在实践上维持不了两年。新加坡在分家之后，取得行动党在 1960-1 年因政治和经济理由而视为不可能的独立，并以卓越的表现生存了下来。

---

3 汶莱及其苏丹最终拒绝加入马来西亚。阿扎哈利，Azahari，是汶莱人民党的领袖。



## 马印对抗与印共

虽然经常有人指责是印尼共产党把印尼拖入跟马来亚的对抗，以此迫使苏卡诺政府跟美国和英国冲突，进而削弱印尼的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解释经不起严密的审查。但是，印共在后来的阶段利用每一个出现的机会去挑衅这项冲突却是事实。马印对抗的源起复杂，相互交识和含糊不清，难以归纳为任何单一因素的解释。

一直到 1962 年 12 月汶莱爆发叛变，印尼政府对马来西亚这个概念未提出任何反对，明知那将使苏卡诺和纳苏顿将军都不信任的英国在新加坡的基地延续下去。事实上，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在多个场合作出对其表赞同的谈话。甚至连印共也很少提到它。<sup>4</sup> 但是，由于 1945-9 年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有一些财务和后勤支援秘密提供给阿扎哈利，以便跟他的人民党维持联系。他那初成立的军队，在 1962 年起义的过程中，接受来自东加里曼丹军部的一些训练和武器。

汶莱造反发生后，就有说服力去强调在汶莱普遍人民的反对下，马来西亚计划依然强行，而东姑则指责印尼涉及汶莱叛乱。过后，苏卡诺和东姑之间爆发舌战，互相辱骂，造成两国的关系大大变坏。1963 年 1 月末，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宣布，如果马来西亚继续口头攻击，印尼将‘对抗’马来西亚。虽然有关谈话的意义根本上就是很模糊，砂劳越可能发生另一场起义和接受更多军事和政治支援的风险却足以造成美国和澳洲政府通过 1963 年在马尼拉举行的挽回颜面（让苏卡诺摆脱危境）的外交谈判，尝试去改善局势。苏卡诺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目的很模糊，但使这个问题国际化，使它被带进联合国，以要求联合国进行某种形式调查人民对马

---

4 参阅 J.A.C. Mackie, *Konfrontasi: 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1966*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第 104-5 页。



来西亚的支持，因而使马来西亚的计划脱轨也许正合他的心意。对砂劳越的低层次侦查性袭击从4月开始发生。更为根本的是，这个课题符合他在1962-3年开发的更激进新外交政策，那就是NEFOS（新兴势力）跟NEKOLIM（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间的根本冲突，在一方是在印尼等国家领导下的新兴国家和不结盟集团，另一方则为既存的‘旧势力’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跑腿，如东姑。因此，这项纷争完美地配合他的用意。有关他在朝向公开冲突方面准备走多远的问题，则在阐释上分别很大，那时候和很久之后都一样。

1963年9月，这项课题在马来西亚于16日宣告成立，及联合国调查砂劳越和沙巴民众支持马来西亚计划程度的委员会发表一份赞同的报告时，问题才到了严重的关头。印尼政府对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强烈而理由薄弱的反对。下来的数天里，耶加达的马来西亚和英国大使馆被暴民攻击，印尼断绝跟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耶加达下令终止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切商业关系。

马印对抗在四个层面加剧：外交，宣传，经济和军事。<sup>5</sup> 冲突中的军事方面令人迷惑不解，因为虽然对砂劳越的袭击的次数和军力有一点增加，但其规模和目标却非常有限。总而言之，印尼在纷争中的真正目的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在1963年9月和1964年9月之间，印尼通过混合的威胁继续对马施压：在曼谷和东京举行外交谈判，以及慢慢增加边境的袭击，迫使英国在婆罗洲维持庞大的军队。后来出现可能点燃战火的事件：发生两次印尼军队尝试在马来亚西海岸登陆和在新加坡掀起种族冲突。假使得逞的话会对马来西亚和英国制造非常危险的局势。但，这也差一点挑起对设备奇差的印尼军方造成大灾难的英军

---

5 宣传战包括宣称马来西亚实际上已经破坏马尼拉条约中对纷争寻求解决方案，及必须接受事实，‘回到马尼拉协议’去。

海、空突击。从那个时候起，印尼军方把其行动限制在很小型的侵犯和试探性袭击上。

在下来的另十二个月，对马来亚的军事行动让路，以在亚非诸国中孤立马来西亚取而代之，唯取得极小效果。马印对抗主要变成了象征性和口水战的大戏。印尼在 1965 年 1 月马来西亚成为安理会成员时退出联合国。印尼国内，通货膨胀失控飞升，政局日趋紧张，印共则施压得更紧，以求孤立其敌人，尤其是军人领袖。这导致在 8 月至 9 月间苏卡诺患不明病症时刻，紧张局势升级，到高潮时爆发印共在 10 月 1 日企图发动‘930’政变。这触发一场反共暴行的反扑，导致苏卡诺倒台和苏哈多在 1966 年 3 月上台，开始他长达 32 年的‘新秩序’。

马印对抗没有即刻结束，而是逐渐地削减其规模，直到它在违反苏卡诺的命令下，在 1966 年 8 月结束。它的结束，跟它的开始一样：充满神秘，含含糊糊，充满着模棱两可的疑难。





## 1960年代至1980年代 马来亚共产党历史的 关键课题和问题

原不二夫

1. 1970年4月，马来亚共产党在其纪念立党四十周年的声明中，把在1950年代后五年中采取温和路线的错误归咎于来自赫鲁晓夫集团和刘少奇集团的压力。你可以解释多一些关于这个‘压力’吗？马共现在还保持这个观点吗？
2. 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策略：马共在1961年初的一份正式文件说党中央采取纠正1950年代初盛行的右派投降主义路线的新政策。但是，只有到了1968年6月1日，马共才正式公布要再度发动武装斗争，而第一个游击攻击行动发生在该月份的17日。为什么要用7年去实行新的政策呢？是不是单纯因为身体锻炼作准备而需要展延呢？为什么它是在1968年中开始呢？
3. 泰国和菲律宾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也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展开，即分别在1965年8月和1967年中。在砂劳越，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1965年10月组织。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那么接近，是不是单纯是巧合？还是各党在尝试对基本的策略上互相配合？

4.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在 1960 年代初或中期住在中国。你在中国有常见到他吗？两党是否有就对抗马来西亚政府的共同斗争的问题，定时举行讨论呢？
5. 下面列出的三个类别似乎有重复性的组织。为什么须要成立第二个呢？尤其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各个组织间相关政策和策略分别有什么不同？

于 1949 年 2 月 1 日成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和 1968 年 11 月 26 日成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

爱国阵线（成立日期未详）和 1965 年 11 月 11 日成立的马来亚伊斯兰兄弟党

1947 年 7 月 7 日成立的农民阵线和农民协会（成立时间未详）

6. 1960 年代末，两个分出来的派别脱离马共。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们之间在政策，策略和党籍的不同分别是什么？
7. 1981 年，马共倡议成立‘反霸权统一战线’，包括马来西亚的全部爱国势力（只有加沙利·沙菲依集团例外）。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共已准备跟政府展开谈判呢？
8. 每一次马共改变政策或策略，它都批评和否定之前所行的。但是对于 1960 年代初采纳的武装斗争呢？当党在 1980 年代初决定回到和平谈判的路线时，它有被谴责吗？
9. 总书记离开马来亚后，留在中国的领袖和留在马来亚，或，1963 年起为马来西亚的领袖之间，是如何对重要课题进行商讨呢？特别是，当马共决定要跟泰国政府和马来亚政府展开和谈时，并最终完成 1989 年和平协议时，最后的一致意见在一部分留马，而其他是在中国的中委之间是如何达致的呢？
10.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 1981 年 1 月的广播指在 1967 和 1968

年，当时的马共主席 Musa Ahmad 采取极左的立场，诬蔑党没有积极发动马来农民起事。那时候，他的论点根据何在？

11. 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在 1979 年 11 月说它有一度广播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指南。你可否再解释多一些？你是否不介意提出几项具体事例？
12. 是谁代表马共出席 1956 年在莫斯科及后来在 1960 年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呢？多经常你指示他们在大会上表达马共的立场？你参加苏联和朝鲜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大会有多少回？贵党在这些大会上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呢？
13. 是否可能在你的回忆录附上中委成员的名单及其个人简历？
14. 作为史学家，我们很重视由马共相关的组织出版的两份报纸，即在英国出版的《马来亚箴言报》和在北京出版的《马来亚公报》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是否能参阅呢？





## 马来西亚共产党与阿沙（原住民）

约翰·李尔利

跟马来西亚共产党——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在紧急状态时期的组织不太一样，阿沙<sup>1</sup>保卫团似乎在其存在时没有全面的掌控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我访问多位该组织的原住民老战士，然后在1994年在泰南访问华人解放军老战士，其中一些以前是阿沙组织工作者，我无法立论有任何人掌控那个他们所谓的阿沙。跟前警察部队原住民署和其他保安部队和殖民地官员的访谈和通信，没有得到更好的成果。

到英国公共档案局和吉隆坡的国家档案局寻找相关资料文件也一样一筹莫展。

人类学家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吡叻原住民保护官芭特·龙妮(H. D. 'Pat' Noone)，在日军后线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她提供给抗日军组织有关如何对待原住民的咨询和情报。R. O. D. Noone在他所写的 *The Rape of the Dream People* (London: Hutchinson, 1972) 书中的第154页，提到在森林里跟着抗日军担任翻译的老马是阿沙保卫团的司令和创办人。我无法确定有关 R. O. D. Noone 就是芭特·龙妮的兄弟和从1952年出任联邦原住民保护官的说法。

---

1 阿沙，原马来文为 Asal，指马来西亚半岛森林中的原住民部落。

吡叻政治部高官给我的主要司令的名字是阿苏仔。他的真名是何潮思 (How Chu Su), 又名何思潮 (Ho See Chai), 或阿思仔 (Soo Choi), 阿力 (Ah Lik) Tata Alik, 或 Aluk。<sup>2</sup> 当我在 1994 年在勿洞见到他时, 他否认他在抗日军或阿沙部队中有任何职位。他告诉我他在吡叻——吉兰丹边境查拜 (Chabai) 警站的周围地区进行阿沙工作, 是在女组织工作者阿珠的控制下, 是属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十二支队的第三小队。

对于这个主题, 要问总书记的问题有:

1. 1951 年末的改变政策指示中, 有一项关于解放军战斗部队



森林争夺战 I。马来亚侦察部队 (SAS 支队) 于 1951 年设在 Le Gap 的训练营地。四位穿军装最左那个肩悬挂枪者为约翰·李尔利。

(约翰·李尔利 提供)

---

2 为来自马拉坡 (Merapoh) 地区 (在彭亨北部, 靠近吉兰丹边界) 的小商人, 1949 年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为附近地区最出色的马共阿沙组织工作者。真名为何潮思 (How Chu Su)。





森林争夺战 II。原住民乡村警卫团。1952 年前，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撤向森林更深处，政府设立森林警站，保安部队和原住民的关系获得加强。  
(约翰·李尔利 提供)



森林争夺战 III。SAS 队员和原住民朋友合影。  
(约翰·李尔利 提供)

退入偏远森林里进行重组和再训练，建立本身的园地，在原住民的协助下辅助粮食供应。当时花费很大的努力去招募原住民加入阿沙保卫团。那些决定，是否是受到芭特·龙妮在战时对抗日军关于如何对待和利用原住民作为后勤支援的忠告的影响？

2. 如果有人掌控阿沙保卫团，他是谁？

3. 马共中央难道没有想过保安部队绝不让他们在森林里有安身之所，必会改变策略去追击？1949年时，解放军能够相当安全地在森林里重新会合，从1952年起有了载军直升机和空降部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森林不再安全了。警察站让敌军在原住民的家乡能长久驻扎。

在紧急状态初期，原住民遭受到保安部队的暴行和滥炸，与此同时，也明显出现一些解放军单位滥杀原住民。其中一次类似的大规模屠杀是在1949年7月，在金马仑 Boh Tea 茶园的附近，小日莱 (Jelai Kecil) 的色迈 (Semai) 部落的35个大人和妇孺当中，34个在没有任何明确理由下被屠杀。我在1990年7月，在打巴采访这一场屠杀的唯一生还者。

在另一些原住民村落也有另外的杀戮。1950年，吡叻美罗地区甘榜宝 (Kampong Poh) 不远处，为数不明的色迈人因被指跟武装部队勾结而被解放军施刑和杀害。还有其他的个案，但作为举例，这些已经足够了。

在早期，马共对待原住民的政策，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这类事件，或者，地方上的指挥员是否被容许使用他们个人的判断，自行处理？

---

编者按：关于原住民数目的估计有差距。1957年作战司令的报告提出有五至六万人。1950年代中，保安部队建立森林警察站

(1957年已超过10个), 尝试打破马共与原住民的联系。有关的详情写在约翰·李尔利的 *Violence and the Dream people: The Orang Asli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关于时至今日的情况, 则可参阅 Robert Knox Denton et al., *Malayisa and the Original Peopl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





## 陈平 —— 寻找革命之路\*

陈剑

### (一) 前言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谁在云端里冒了头而又能继续腾云驾雾数十年而不坠，都不是“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这老生常谈能简单地涵盖的。这中间的主客观因素和条件时而理所当然、时而阴差阳错地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并交织着产生诡谲的且持续变幻的政治图像。图像中自然闪现许多或叱咤风云、或载浮载沉的风云人物。如毛泽东诗所形容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充满政治契机的时代里，能在大潮怒涛上随意翻波腾泳者皆可名之为英雄、枭雄或豪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sup>1</sup> 毕竟经得起暴风骤雨的考验和洗礼而幸存下来的也就寥寥无几。政治无情却是人类发展的心理动力。包括廿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在内，他也未能预测和最后主宰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行方向。尽管他曾企图“揠苗助长”地要“大跃进”和“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信心地以“人定胜天”和“愚公移山”的意志去提前实现他的伟大

---

\* 本文部份资料源自笔者与陈平在 1998 年 12 月及 1999 年 2 月之口述记录。

1 毛泽东词：“四海翻腾云水怒”出自“调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 年 1 月 9 日。及“数风人物，还看今朝”出自“调寄沁园春——雪”，1936 年 2 月。

政治理想，而最终仍然违背了他熟知的“唯物史观”。今天的中国仍然得回到“新民主主义”时代去完成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时至今日，“新民主主义”一词已不实用而需巧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词眼以代之。毛泽东这位英雄人物落得个“三七开”的盖棺定论。

从世界大局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毕竟是大山边一角，似乎左右不了什么大局。但毕竟它们还是大山的一块，地动山摇之际，不免受到强烈的震撼或冲击。二战前后这个时段，这两国仍是英国殖民地，统称为马来亚。以它的地理位置的适中、以它丰富的矿物和原产品等资源，再再都构成为英帝国眼中的远东政局中，策略和战略方面起足轻重的物资重要供应基地和远东防卫的桥头堡。因而，大山一角的动静也处处影响着局势的变化和发展。

也在这个时段，世界意识形态的斗争越趋剧烈，世界各帝国主义者也因资源的抢掠和世界霸权的争夺惨烈恶化而导致全球性的战争灾难。马来亚于是难逃一劫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马来亚人民成了受殃及的池鱼而被迫面对政治上的抉择。马来亚人口组成的复杂因素加上上述历史的和政治发展条件，构成了马来亚人民政治抉择的复杂性。从而产生了如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和因抗日发展形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及在战后抗英起义而建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而也形成了大部分仍居农村的马来人的政治观望态度。只有少数马来激进民族主义者参加到运动中来。

时势造就了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马共在抗日时期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唯一有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最大政党。于日降前夕，党员人数超过六千人，党军人员超过一万五千多人，连同同情者和支持者计，则达数十万人。如从建党开始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放下武器时这六十年计，为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相关的左翼运动前赴后继的人数，恐怕超过百万人。作为马来亚第一大政党，并有武装力量的后盾和光荣的抗日历史，文联



军亦与之合作，影响自非同小可。那做为这个政党的领袖，其魅力和影响在马共极盛时则更为非凡。时势因而也造就了马共的领导者。日降前，有些领导人掌政时间为时甚短，或为党深有建树或仅琼花一现未足轻重。有些则长时位居要津，把握着党发展的重要时机，却是隐藏党中的敌奸，英日帝国主义的大特务，<sup>2</sup> 造成党的无可弥补的契机的错失和组织的深重的伤害。和平时期，当马共秘书长莱特被暴露而卷款潜逃后，在马共当时十分年青（皆二十刚出头）的领导人中间，冒起了马共战后最重要并主撑党政共五十多年的领袖。这位从学生时代起便终生投身于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就是本简传的主人公——陈平。

## （二）陈平——神秘的代号

陈平，凡五十岁以上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包括曾在马来

---

2 马共秘书长莱特是越南籍华人。曾是越共区委干部。遭法国逮捕后被收买为法国情报局所用。三十年代初转给英国军情局，在香港受训一段时间后派往新加坡，混入码头工人群众中，通过工会逐渐连系上马共地下组织，以第三国际代表骗入马共领导层。1936年当上马共副秘书长。1939年取代蔡白云当上秘书长。新加坡沦陷后，他于1942年3月遭日本警备司逮捕，旋即与日军政警备司合作，前后共出卖了数十名马共中委和高层干部。1942年9月1日他召集党军联席会议于吉隆坡附近黑风洞石山脚，通报日军围剿，共杀害了18名以上马共中委、党军高层干部及警卫员，称为“黑风洞事件”或“九一事件”或“石山脚事件”。1947年3月他被发现卷款潜逃。可参阅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97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第145, 175, 180-181, 184-185页。明石阳至著：《莱特——1939-1947马来亚共产党秘书长》，南洋学报第四十九卷，1994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9, 1994), 第57-103页。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第137-138页。

亚服务、服役的英、澳、纽军政人员，大多熟悉或知晓这位与马共相连的名字。据说，这名字在紧急法令期间，对爱夜哭的小殖民者还有禁哭的功效。

陈平给予马来亚从政者以及一般民众一种敬畏和神秘感。特别在紧急状态的十二年间，<sup>3</sup> 对英殖民政府官兵、以及后来的马来联邦政府、马来西亚政府的官兵和他们的政治随从者，这名字代表着反叛、暴乱、恐怖与政治和生命的威胁。但对崇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者、左翼人士、反殖民主义积极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者，这名字则代表着神圣的斗争、叛逆和革命的精神与行动、伟大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前者处心积虑，开动一切统治和镇压机器企图灭之而后快。后者则以之为精神支柱和激励动力，千方百计以予物质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名字的不断出现呈显着战争的惨烈性和各条战线的斗争持续性。

在抗日时期，他是马共联军 136 部队的联系人，是英军的朋友，战后并论功行赏，给与至尊的 OBE 勋章。可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却视之为眼中钉，并在差两个月便达三年的连续打击镇压不奏效后，颁布紧急法令，变相对马共发动战争。此时，他被定性为叛乱分子，向世界宣布陈平为英帝国的头号敌人，收回授予的 OBE 勋章（陈平未曾领取过），并为其人头和生命订下昂贵的价钱，悬赏数目从 1950 年的 2 万 5 千磅至 1952 年升至 25 万马币，<sup>4</sup> 相当于当时福利彩票的头奖。然而他始终未曾遭部属出卖，平安无事。紧急法令初期，他在枪林弹雨中出没，数度险遭不测，始终吉人天

---

3 英殖民地政府首先于 1948 年 6 月 17 日宣布吡叻州进入紧急状态，次日，伸展至柔佛州。于 6 月 20 日展延至全马。紧急法令实施至 1960 年始全面解除。

4 艾伦·霍与埃立克·莫里斯合著：《再从军特种飞行部队》，伦敦：里奥·库帕尔出版社，1994 (Alan Hoe & Eric Morris, *Re-enter the SAS.*, London: Leo Cooper, 1994), 第 83 页。

相，逃过劫数。1955年，华玲谈判时，他的神秘面罩才首次揭开，让世人见到他温文尔雅的堂堂外貌，平和中略显威严。谈判失败后，退隐山林时，英殖民地政府曾密谋劫杀这位二战时的盟友。<sup>5</sup> 由于他的防患措施，英军不曾得逞，可想当时英殖民政府恨得牙根发痒，怒发冲冠。

这名字与马共这个党名共存达五十多年。虽马共已于1989年12月2日与泰马两地政府达致三边和平协议，销毁武器，放弃武装斗争，和平下山，这名字至今仍与党的存在维系一起。

### （三）陈平——官方与其他记录

陈平为何许人？向外除官方负面宣传外，有关其生平讳莫如深。以下是1948年4月英政府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有关他的机密档案：<sup>6</sup> —

陈平（代号7115-1627），又名王文华（代号3769-2429-5498），约于1922出世。父母为兴化人士。妻李坤华，父王声彪，妻舅李业水，妻姨李坤玉。隶属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及新民主青年同盟。高五尺四寸，左眼有显著标记。1946年12月担任全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会长。1946年9月为“泛马新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代表。

他是实兆远万丰隆脚车店店主王声彪之子，于南华中学就读。他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领导成员并对136部队

---

5 英国军事情报局 MI5 准备于谈判失败后，派人跟踪陈平入森林企图暗杀他，未曾得逞。1998年6月8日香港南华早报第20版头条，报导一英军情局特务于马绍尔死前18月相告此事。

6 殖民地档案：CO0537/3751/55400/5 Pt.1 Who's Who, 1-4-1948.



诸多协助，英政府授予 OBE 勋章。1945 年 11 月，发现他是新民主青年同盟的执委之一。1946 年 4 月根据报告，他是积极的共产党撰写人员。1946 年 12 月，他被选为全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副会长。

1947 年 7 月，发现他与《战友报》有联系。1947 年 8 月，据报告他受委为马共中央军委，负责军备事务。9 月，据报他替代刘尧被选为马共中央军委主席。

1947 年 12 月 15 至 17 日他在以槟城为总部的新民主青年同盟于槟城召开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全马代表大会上为主要发言者。

从一秘密线索中得知，他曾在一范博士的邀请下，于 1948 年 2 月下旬到曼谷去会面（相信这范博士便是在曼谷替胡志明办事的范文同博士）。另一秘密线索则报说他是做为马共代表被选派去曼谷参加东南亚共产国际秘密会议。

他多费时往返于全马各州并常在吡叻。

这是目前可从大英档案馆寻得的陈平较完整的简历档案。此外，并未发现其他对此简历作补充或更正错误的记录。此后，有关陈平的说明都散见于各马共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而似乎未再设专案。是否其专案设于英第五军事情报局 (MI5) 中则未可知。此情况与莱特档案类同。大英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莱特的个人专案记录，虽三十年期限已过，但英军第五情报局有关档案至今仍未予公开。

显然的，情报员的资料未必准确，上述资料有相当错误。

此外，有关陈平的简历在一些研究马来亚紧急法令的专书中以凤毛麟角的片段出现。M.C. 维廉斯 (Michael C Williains) 《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做如下评述：一

陈平 (1922-1980?)：陈平于 1922 年生于马来亚吡叻

州的实兆远。在吡叻上中学。他于1930年代末参加马来共产党并于20岁时成为吡叻州党的高层干部。二战时，他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重要成员并与英军共同抗日。1945年他曾代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到伦敦参加胜利游行并接受英国授予OBE勋章。1948年他被委为马共机关报《民主报》的出版人，1947年期间，他在前党书记，那个被肯定为英国受薪特务的莱特失踪后，被选为马共政治局主席。暴露莱特一般都认为是陈平的努力。

陈平接收过来的党和领导层几乎清一色为工人阶级成员，这在亚洲的共产党都十分雷同。他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把党领导层团结起来。1948年3月在一次中央执委会上，陈平被正式肯定为党的总书记并同时颁布了发动群众反英帝的革命纲领。随着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马共被迫发动武装斗争，并在郊野及森林中战斗。总体来说，马共这战斗策略是出于需要但却缺乏充分准备。

1955年12月，陈平率领一个马共代表团与马来亚政府谈判结束紧急法令。谈判失败而游击战斗持续到1960。陈平与约500名游击队员退却到泰国南部。1982年有确切的消息说陈平于两年前去世。

此简历取材自G.Z.哈拉罕（Gene. Z. Harahan）所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斗争》及安东尼·索特所著《1948-1960 马来亚共产党起义》二书。传略中亦存在明显的错误，特别是讹传陈平于1980年间逝世，十分荒唐。

#### （四）陈平这名字

陈平，英译为Chin Peng。英军早年设立的马来亚情报局

(Malayan Secret Service) 则译为 Chan Ping。显然前者按客家发音译成，而后者则以广东话译之。据陈平透露，在抗日期间，因与 136 部队的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s) 打交道多用广东话。戴维斯曾驻香港多年，谙广东话。当时陈平以陈金声 (Tan Kim Seng) 这带有海峡华人色彩的名字与他会面。戴维斯便常称呼他为“Chan”代表。实则当时陈平在党内以“王平”或“阿平”相称，并非陈平。日本投降前夕，戴维斯因公到吉隆坡，其时莱特及杨果等均在隆开会。日降时，戴维斯立即找到莱特，要他提供马共总部领导名单，莱特临时应付，便填上他自己的化名张红及阿平，并加上刘尧的名字，之后戴维斯要求阿平的全名，才知所谓阿平即是他经常联络的陈代表，于是阿平便冠以陈姓而为陈平。陈平在党内为便于行动和保密，常易其名。但在英殖民政府及其后的马来联邦和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政府，皆以陈平一名称之。可知陈平一名在党外远比党内知名。至于何以广东音译的 Chan Ping 后来又变了客家音译的 Chin Peng 则未能考据。这可能是英殖民政府情报部误认为陈平为客家人，或是英政府通缉他时，译其名者为客家人。不过据不完整统计，马共成员半数以上为客籍人士，此或因马共成员中多矿工和胶工，而他们多数为客家人。马共内部，党军成员亦多以客家话交谈，因此以为陈平为客家人不足为奇。当陈平在中国时，叶剑英便曾以客家话询问陈平是否为客家人。

陈平曾用化名或不及莱特 (已知莱特有超过 26 个化名)，但亦不胜例举。陈平本身亦多已不记得。其中较著知者有陈金声、王平、阿平，倘有到中国后改用的洪涛及往苏联参加苏共 22 次代表大会时用的马奇德 (Majid)。此名后来亦用与东欧兄弟党打交道。此名其实并非借马来名作掩护，纯粹出于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方便而取。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尚有党主席穆沙阿默 (Musa Ahmad)，他取了洋气十足的名字艾温 (Edwin)，于是陈平便取了马奇德 (Majid) 一名。此外，英文书信亦用阿里 (Ali) 一名。



## (五) 陈平的家世

陈平，原名王文华，于1924年10月下旬出生于马来亚吡叻州南部一个靠海的小镇，叫实兆远（Sitiawan）。这是一个宁静的吡叻南部原产品的集散地，周遭有红土坎港口和许多马来小渔村。父亲在镇上开设了一间脚车及汽车零部件专卖店。实兆远是一个福清、莆田和兴化人的市集。陈平出生时，家庭环境甚佳，已是镇上一个中产阶级，父亲既从商，亦为当地侨领，担任福清会馆会长和当地小学董事长等职。

父亲王声彪，生于福清县莆田海边一个小村落。小时即丧母，成了孤儿，由其祖父拉扯大。13岁时便过番到新加坡投靠同宗族亲王姓堂叔。堂叔待之如同己出，在其所设脚车及零件商行“万丰隆”号让他充当学徒。他亦发奋图强，学习中英文，后并善书信及账务。18岁时，由堂叔介绍与当地出生的兴化女，16岁的关南洋结婚。女家原拉人力车起家，后发展为人力车行东主。其时，英人鼓励种植橡胶，堂叔后到吡叻南部一带种植橡胶，亦在安顺开店。并将其父带往安顺协助打理店务兼管橡胶园，后发展到实兆远并在镇上开设脚车店分行。亦号“万丰隆”，所有货品皆由新加坡万丰隆以期账供应。不久，这位陈平呼为三叔公的便把店转让其父去经营。其父为人善交际，人缘极佳。其母善持家并善经营店务。从陈平追述中，可知其对母亲十分敬重，母亲既疼爱他，却不疏于教诲，管教亦严。

陈平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大姐于1920年在安顺出世，不幸旋即夭折，母亲伤痛不已。1922年，大哥文荣生于实兆远。大哥读书不多，为人善良，一直与母亲共管店务，惟不善追债，让人拖账极多。于此，陈平出世后，算排行老二。陈平之下，有两个妹妹。大妹仍健在，二妹早年遇车祸不幸逝世。之后有三弟文富，中学肄业，善经营，后于北海从商，四弟文贵为南华国民型中学英语教师后调往木歪冈伽国民型小学当校长，退休前为爱大华卫理国民

型小学校长，现已退休。五弟文全（后改文泉），受过正式师资训练，于峇都牙也（Batu Gajah）中学任教，现亦已退休。六弟文钦则在职业学校毕业，进入商行机械部门工作，后经商发迹，五一三事件后，<sup>7</sup> 生意收盘，移民新西兰。最小弟弟文忠，亦职业学校毕业，于公务局工作，但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五弟文全之后原有一妹，但其时家境十分困难，旋即送人。两年后图索回不果，后知亦已早逝，陈平言下不胜伤痛，最小妹妹出世时，亦为陈平离家从事革命之时，旋即其父中彩票三等奖（约三万多元），似乎是此妹妹带来之好运。

陈平夫人李坤华，为槟城海南人。于槟城益群学校读小学时便已参加左翼学生活动。益群校长却倾向国民党，痛恨学生左倾，藉故将李坤华等开除出校。李坤华于是转入英校，1941年在校搞抗援活动时结识左翼文艺工作者杨励。同年槟城因迎接武汉合唱团发生二二镇压事件，杨励走避新加坡并主持一份刊物，他将刊物寄交李坤华，导致坤华被捕并上法庭。因辩护得力，法庭虽未定罪却仍须侨领担保，始得获释，校方亦藉此开除其学籍。之后，李坤华前往吡叻寻找其姐坤玉。其时已是日侵前夕，原想再回槟城，可槟城

---

7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华巫之间种族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宪法规定的马来人特权问题一直争议不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竞选口号引发巫统的不满，众多的分歧最终造成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被逐出马来西亚而独立。1969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种族特权问题争议更烈。大选结果，执政党联盟（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获票率只得48%，在104议席中只获得66席，并且几乎失去雪兰莪及吡叻州议会的执政权。反对党方面，特别是华人为主的政党民主行动党及民政党获得意外的胜利，民政党并获得槟城的执政权。两党胜利游行，特别在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州务大臣住宅附近都认为有挑衅的意味。巫统亦于5月13日下午举行胜利游行，接着，便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大屠杀事件，成百上千的无辜华印市民遭殃，是为“五一三事件”。



已遭轰炸，渡轮亦断，归家不得。同路者有吡叻锡矿主之子许惠民，转回怡保居其家中并找到了党的关系。在朱毛时李坤华便已认识陈平。不久，陈平调任吡南，从事民运工作，李坤华随即亦调来共事，此时她已是区委身份。与陈平共事期间，相知相爱。直到日本投降始举行婚礼，一切从简，因女家坚持始摆一席酒宴请女家亲属。婚后往吉隆坡，由杨果觅得侨领房产为住所。1947年女儿丽丽出世，满月后，女儿交由槟城岳母照顾。丽丽高中毕业后勤习会计，后于吉隆坡某电子厂当会计师，现已退休。1948年儿武国出世。其时陈平夫妇离家上山，其母坚持留下孙儿，不让带走。武国便由祖母带大，后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法律系，现于吉隆坡执业。

## （六）陈平的早年教育

陈平于六岁时入华侨小学就读，他比其他同学早一年上学。上小二时，学校扩建并改名中正小学，旋又增设中学部。当时实兆远帮派竞争剧烈，小小城镇在短短数年里共建了四间小学及附中。他的学习一般顺利，没太多记忆。历年成绩也都在前数名，属优等生，并获老师疼爱。但在三年级时，却因班主任换了脾气甚坏的校长夫人，特别讨厌男生并常施体罚。陈平亦未能幸免而遭打掌心等惩罚以致鞭痕累累。他不明受罚的原因而感觉颓丧，终于逃学。母亲往时家教甚严亦时施体罚，此次却一反常态细声细气并流泪劝解，说现只有大哥与他两兄弟有书读，不读书将来没出路，只能当胶工或去打粗工。母亲的眼泪攻势奏效。母亲为使他安心，便派人护送他到校长处说明孩子不上学的原因，校长深明大义，从此校长夫人不再施于体罚。他记得母亲第二次流泪是在他要离家上山时发生，母亲要他留下来，但此次的泪水没有留住他。

1936年陈平12岁，此时实兆远各附中经已合并为南华中学。陈平顺理成章就读初中一，南华接着亦办高中并设有简易师范供初中毕业生就读。陈平于15岁初中毕业后，便进入高中并兼读简易



师范。此时，南华经济拮据，财务不济，接着便停办。陈平于是考虑到新加坡去继续学业，其时新加坡正兴建中正中学。新加坡亦有许多母家亲属，母亲势必同意此行。但此时，他已是抗援的积极分子并担任学抗的推动工作，组织上劝阻他前往。于是他便转往报读由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英华补习学校去读英文。读了半年，他便因英殖民政府对他注意而退学，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平英文造诣甚佳，这得力于实兆远当时施教者的远见。从小学开始便已有相当节数的英文课。陈平是党内少数掌握英文的领导。

当年的华文课本皆由中国输入，课程内容灌输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儒家教育，课文以《满江红》、《正气歌》、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林觉民的《诀别书》等充满着磅礴正气、精忠爱国、抗敌御侮的思想和教导，发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以国家社稷为已任的献身精神。历史课则侧重清朝时丧权辱国的教训。当时南逃的文人教师很多，南洋一带师资不缺。这些教师多为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和逃过劫数的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翼。他们上课时传授给学生的便不仅仅是课本的知识，而是抗战的情势和社会理想。陈平自不免接受着这种难得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熏陶，关心起时事和祖国抗日的动态。尤有进者，校方尚常以中国发生的大事在校内举行相应的活动。如西安事变，<sup>8</sup> 蒋介石获释后，学校亦庆祝一番。国民党抗日出师不利，天津战役中国国民党少将佟麟格副军长及师长赵登禹等人不幸牺牲，学校停课举行追悼会师生于会上痛哭。这种种都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引导着他们思想的方向，使他们常义愤填膺，满腔热血，期待着献身理想，抗日报国的机会。早年他亦读过不少的

---

8 1936年全中国因东北三省遭日本侵占而纷纷要求抗日，蒋介石却仍然重兵攻打共产党而非重兵抗日，引起各界深为不满。驻守西安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抗令剿共，连同杨虎城将军力主联共抗日。蒋介石于是飞来西安却遇兵变而于12月12至25日遭软禁，最终蒋介石被迫同意与共产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是为“西安事变”。

演义，受到侠义精神的影响。这些早期的朦胧的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意识也深深地培育在心中。

当陈平自 1937 年起参加抗援的活动后，接触了比较进步的马共积极分子，从他们那里，不但建立了较有理论的认识，更阅读了许多左翼书籍。1937 年七七抗战发生后，许多左翼书籍流入马来亚，老师们鼓励同学们组织读书会。一位参加过北伐<sup>9</sup>逃亡的刘姓老师便设计并协助他们组织了“时轮”读书会，并由陈平负责。

这老师更着意介绍了许多当时中国知名的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冰心、巴金、丁玲、矛盾等人的作品。刘老师更着重引读了丁玲、鲁迅的某些篇章。陈平其实在初中三组织读书会之前，他已从抗援的同志那里借得许多左翼书籍和抗战书刊。杜龙山、伍天旺等人藏书不少并有来源，陈平常借得后往其父在红土坎的分店去阅读。那里没有母亲的干涉，店务亦不忙，给予他充分细细啃读的时间。他当时开始对哲学十分感兴趣，印象中较深刻的有翻译苏联米丁所写的《哲学大纲》和作者不详的《辩证唯物主义》等砖块式马列经典。虽热衷于学习却似懂非懂。在许多抗日的书刊中，他涉略了国民党人，包括蒋百里等人所写的关于抗战和战争研究的书籍，但发现越读越不清，觉得他们所论均不能解决某些问题，一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豁然贯通，解答了他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疑问，于是膺服于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及其雄才大略。除此，他亦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钢铁是怎样炼

---

9 1926 至 28 年，中国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连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发向北进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基本打垮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统治而在南京设立国民政府，史称“北伐战争”。但由于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批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翼南逃到新马，北伐战争中途夭折。



成的》<sup>10</sup>等促进共产主义认识的书籍。《钢铁》一书据说初看时印象不深，直到1948或1949年，在森林中二次阅读时才深悟其内涵。

### (七) 陈平思想的转变

陈平上初中一时，新马抗日运动已经逐渐活跃起来。1937年七七事变新马抗日运动如火上加油，在全马以及整个东南亚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马共立即成立了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上初中二的陈平此时也被发动参加了抗援的工作，他是校学生会的总务，校学抗总务和读书会的负责人。但他这时还仍然是三民主义的信仰者，读了不少当时国民党关于抗战的宣传资料 and 文章，从报章上了解祖国抗战的情况。西安事变在新马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当蒋介石获得释放后，消息传到实兆远，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燃放爆竹庆祝，他也受到感动，参加燃放爆竹庆祝。1938年上半年，一罗姓国民党人到来进行招兵活动，激昂的演说鼓动了不少中学生愿意参军，热血填膺的陈平此时也报名参加到中国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去受训，为祖国效劳。但母亲强烈反对，再加当时一位同学参军回国，上船时让家长给逮了回来。参军不成反落得这个丢脸的下场，间接地影响了陈平的决定。1939年间又受到了左倾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亦想偷溜回国，到延安去参加抗日。这事亦因1939年底打算到新加坡中正中学深造而暂搁。后来，新加坡就学之行亦为抗援领导人劝阻。一位热血青年在当时略呈混乱的形势中，多元的选择，多少造成他精神上的困扰，方向略为模糊，纯粹受着热情的鼓舞并为抗日作出贡

---

1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 1904-1936）的成名小说。他只小学肄业，于1919年加入红军，但在次年因伤退役。之后，调职铁路建设当工人。1927年，因病瘫痪并接着失明。1932年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完成了这部自传体的小说，1934年才正式出版。他成了共产党人的楷模。



献。但有一点似乎越趋清晰的便是由于加入了抗援的队伍，接触了马共一些领导干部并接受了他们的熏陶，阅读了马共有关抗日抗英的宣传资料 and 文件，阅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亲身参与抗援以及马共的组织生活。杜龙山等人清楚地指示着他身在马来亚，应为马来亚这块土地和人民贡献出一份力量。政治意识此时逐渐明朗起来。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逐步加深，感召于这个人人平等、自由、没有剥削和压迫、以机械化、电气化完成和丰富物质文明发展的伟大政治和社会理想，形成为他的主要信仰，并愿为这个理想和信仰付出和牺牲个人舒适生活的代价。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这个转变是剧烈的、深刻的。他义无反顾，全心栽入了这水深火热的革命运动之中。另一方面，马来亚这个土地意识也逐渐代替了“祖国”的观念。虽然，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在“祖国”政治认同上还是很模糊，极为困扰。但由于运动的深化，在抗日的同时，因为遭受到英帝的镇压也逐渐地认识到英殖民统治的本质而形成较为明确的抗英意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也逐次明朗过来。当时抗援较常与他接触的是杜龙山，他是后期马共中委应敏清的前夫，党名赖莱福。1939年底，有两个党员要调往他处，其任务内定由陈平接任。于是党决定发展陈平为党员，并由工抗负责人陈路处理此事。陈路于是约见陈平，然而陈平却爽约。第二天华南的老师陈景云以及在马来村庄做小生意的杜龙山都询问他何以未赴约。其时，他并不知道党要发展他并认为陈路负责工抗事务，与学抗店抗并非一个系统，所以不去。奇怪的是为何当时不由杜龙山他们来发展，或许出于对他们身份的保护所致。1940年底，杜龙山才正式告诉他党的决定并说明陈平上回错失了一个机会，于是他这时才真正入党成为候补党员并立即调任“区抗”的工作。转读英校便是掩护身份之举。

到南宁或延安未能成行，到星洲亦未能实现。1940年初便接受组织的安排，报名就读于由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英华补习学校。这是一间专收容超龄和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的英校。陈平在校

成绩一向甚佳，每每是班上前数名的高材生，又是适龄生，就读此校，真是委曲了他，因而精神上有抗拒感。但这是组织的命令，好处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十分松懈，他因此常常为了抗援的活动而旷课，老师们都不加理会，这包括现马华总会长林良实<sup>11</sup>的叔叔，虽知道他的活动亦不加管束。当时校内亦有国民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学抗是一个“死对头”的组织，时有冲突。当地暗探对抗援活动监视紧密。他们从三青团成员方面了解学抗的活动情况，知道陈平是学抗的领导人，自然对他特别注意。最终当地政府打算对他采取行动。当时，他向吡叻地委老叶报告了其处境。老叶当机立断，给了他十块钱，授命他到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与在其地主持亲戚开办的巴士线的党员蔡有安联系，蔡的巴士站办事处很小，夜间把桌面收拾后便是两人的睡床。

## （八）陈平——走上革命和抗日的道路

就这样，陈平开始走上了革命和抗日的道路。毫不犹疑，没有二话，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从1940年7月离家的那一刻起，他或许不知道自己已经肩负起历史的任命，而这任命将越来越沉重并须要他誓死如归地去完成。

在瓜拉江沙等了一个多月，他被安排到怡保接受新的任务，开始担任吡州各界抗援常委兼党团成员，领导怡保和丰地区四家华校中学的学校组织，为日渐深化的抗日运动加强组织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年底，他才成为正式党员。

接着，全马各地抗援组织受压解散，陈平转任党怡保区委委员，领导怡保三家华文中学及店员、洋工、砖窑和理发业的党组织。正式搞起党务，执行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工作。

---

11 林良实，1980年至2003年5月任马华公会总会长。



1941年6月又兼任吡州地委宣传部委员，负责《人道报》出版的刻钢板工作。之后，卸去区委的工作，专任地委宣传部委员。紧接着，党召开第七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陈平当选为地执委。

在短短不及一年的时间，才18岁的陈平颇受考验。党组织以及宣传工作都有良好的表现而获得上层领导的赏识，他的组织才能受到器重，从普通党员和普通干部直线上升提拔为地委一级干部，并从负责党外围工作转任党组织的重要任命。

1942年正月，吡叻州已全境沦陷，日本大军除留守部队外，继续挥师南下。吡叻州地委此时与由莱特主持的党中央断了联系，决定检拾英军遗留战场的武器，自行在各区成立游击队，分别命名为吡叻人民抗日军第一、二、三、四中队。陈平受命为驻扎吡叻南区的第四中队党代表，兼负责与活跃于丹绒马林的英军敌后破坏小组联络。

同年5月，陈平调离部队，担任地常委（或称地委）。5月底地委在朱毛召开会议，任命陈平转赴吡叻北区工作。数月后，任地委秘书处委员，再调回南区搞组织工作。

1943年3月吡叻地委书记白衣及另一秘书处成员被捕，中央委派小平（林旺生）接任地委书记。刚上任便拟赴星洲向中央（莱特）汇报工作，途经雪州被捕。吡叻州数位领导在短短二个月间连接被捕，形成领导真空状态。

1943年5月24日，联军136部队乘潜艇从印度过来在邦咯岛附近天定区海岸登陆，辗转与抗日军取得联系。由于地委及其代理均先后被捕，陈平便代管其职。他直接将联军登陆及联系情况汇报中央。时中央众多领导不是因1942年“九一事件”牺牲现场，<sup>12</sup>

---

12 见注1。



便陆续因故被捕。除远在彭亨东部唯一幸存的中委阿仲之外，中央仅存莱特一人。莱特吩咐陈平前往雪兰莪间津附近面谈，并委陈平为抗日军及抗日同盟总部代表与联军 136 部队接触。陈平选择了陈金声这个具有海峡华人色彩的名字与善粤语的 136 部队联络官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s) 会面商谈，为 136 部队提供掩护及后勤服务，以便 136 部队顺利展开先遣部队的情报工作。两个月后，莱特正式书面委任陈平为吡叻州地委书记，领导吡叻州党、军抗日斗争以及主理与联军合作的具体事务。

刚满 19 岁的陈平，骤然跃身于马共高层领导。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陈平事实上已是马共要员而不自知。从联军接触始至日本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止，陈平始终在吡叻州南北奔驰，勤于党军的组织工作和指挥抗日战斗以及保持与联军在马人员的联络和提供对他们的保护和协助。做为刚升迁的马共要员，备受莱特的重视。他曾参与同联军的谈判。此谈判达成的协议，对日降后马共的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1943 年 11 月 2 日，联军 136 部队头目林谋盛等亦乘潜艇前来，由陈平派人接应顺利登陆。1943 年 12 月 30 日，莱特化名张红与陈平一道同联军代表林谋盛、戴维斯 (John Davis)、布伦米 (R.N. Broome)、查普曼 (Spencer Chapman) 等于美罗山区布兰丹 (Blantan) 抗日军营地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此后称为“美罗协议”的合作协定。<sup>13</sup> 谈判由莱特一手操纵，年青和刚上任为吡叻州地委书记的陈平仅仅作为随同出席此项谈判，虽则他代表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而莱特代表党，陈平未能对谈判的决策和协议内容起关键的作用和实质性的影响。协议的最大纰漏在于同意“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和秩序为止”。

---

13 陈松沾〈日治时期新马华人的处境〉，《南洋学报》52 期（1998 年 8 月），第 182-183 页。

如遵照协议执行则莱特已经偷偷地改变了马共抗日九大纲领的第一条，即要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从现在看来，日降时，莱特提出“八大主张”等符合和体现了“美罗协议”的承诺，放弃了在马来亚建立政权的主张，违背了马共建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建国意旨。党内外有人因此诟病参与谈判的陈平，未能为党捍卫斗争纲领和建国宗旨。也有人认为陈平当时毕竟过于稚嫩，政治水平不高。莱特其时威信很高，有“马来亚列宁”之称，他亦自称“阿列”，年龄大于陈平十多岁，即是最高领导，又是第三国际代表，“德高望重”。陈平初出茅庐，暂露头角，认识与警觉性不高，又臣服于莱特的威望，因而无从识别个中乾坤和阴谋，更没有胆量去冲撞党秘书长。

### （九）少年得志，位居党魁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掷下原子弹，造成市毁人亡的悲惨局面，使日本骤然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空降到马来亚的四百多名联军136部队人员未曾发挥预期的作用。马共与抗日军亦猝未及防而不曾做任何准备。虽则党纲和斗争纲领一再地重申要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sup>14</sup>但似乎除了宗旨外，并没有研讨具体落实这个宗旨的方案和依此做出任何准备。莱特依据“美罗协议”精神，提出了“八大主张”，以及后来同意解散人民抗日军，<sup>15</sup>完全瓦解了马共艰辛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和全党上下建国的精神意志。在槟城、吉打和玻璃市活动的第八独立队因通讯未能及时传达而遵循九大纲领，升起了“吉打人民解放军”的旗号，最终被令解散。<sup>16</sup>明显的，仅剩莱特一人的党中央任由他主宰党的去向。

14 同上，第161，178-180页。

15 同上，第182-183页。

16 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第372页。



日本宣布投降时，莱特其时正在吉隆坡附近，通知陈平、杨果等前去开会。然而于1945年8月18日陈平抵隆时，莱特已南下星洲。由雪州地委书记杨果代为转达，任命陈平与刘尧为中央军委，代表马共与抗日军同联军打交道。同年九月初，莱特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委任杨果（雪州地委书记）、陈勇（柔州地委书记）<sup>17</sup>、陈平（吡叻州地委书记）、阿仲（彭亨州地委书记）等共十多人为中央委员。此时，陈平年方21岁，正式晋身为马共中央委员，备受器重。

1945年10月，在日治时期被捕的前马共宣传部委员黄耶鲁<sup>18</sup>获释后，写了一篇揭露莱特的文章，发表在槟城的现代日报上。题目是《马共中央总书记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盟军干部》，副题是《给一切爱护马共愿意主持公道的人们》。此事在党中造成极大的困扰。首先，黄耶鲁被捕后，不仅没有被杀害，日本人尚起用他为法庭审讯翻译员，为日军政服务。莱特亦曾以中央名义正式宣布黄耶鲁为叛徒。因此，对黄耶鲁的揭发不敢置信。其次，莱特长期以来积极发展出极致的个人崇拜，党中央各中委年龄都比他小十余岁，又都没有国际联系，完全臣服于莱特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莱特又技巧地指责英帝制造内部分裂，企图陷害于他以便瓦解马共的组织力量。因此，党中央开会的结果，反而发起了“拥莱运动”，

---

17 陈勇，又名嘉雷，柔佛州地委书记并兼任新加坡市委书记。抗日时期，马共曾设立“抗日大学”，任陈勇为校长，日降后任中央委员，一度遭受莱特器重，为最可能继承莱特的人选。1946年底，他脱离中央从商。1948年6月20日，他亦遭逮捕后服务于柔佛州政治部，于60年代末退休，移居澳洲，不知所踪。

18 黄耶鲁，原名黄望青。新马沦陷前，为马共抗援重要干部兼马共宣传部委员。喜文章，通日文，被捕后，日军政起用他为法庭审讯翻译，马共时皆认为他已投敌成为汉奸。他写文章揭发莱特之后，莱特曾派人图暗杀他，不果。新加坡独立后，他一度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后寓居香港，于2003年6月12日逝世，时年91岁。



令全党上下写慰问信向莱特表态，并以献金显示支持和效忠。尽管当时中委中陈勇、杨果及陈平本人都对莱特略有怀疑，但却无证据支持自己的怀疑而一致通过并执行“拥莱运动”。

1946年底，越南共产党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前来吉隆坡《战友报》<sup>19</sup>社与马共联系。要求马共为他们的抗法革命以武器和兵员的支援。陈平安排他们前往新加坡越南人居住区会见莱特。代表团抵星后，住上一段时间见不到莱特，却了解到莱特的私生活十分奢侈和腐败。此事引起陈平等极度的疑虑。此时，杨果亦因前些时经雪州危机事件<sup>20</sup>遭受莱特的批判而退居槟城，不断对马共近期的策略和行动，包括对总书记的言行等做反思和检讨，加深了对莱特的怀疑，这正与陈平不谋而合，两人不约而同提出对莱特的看法，于是共商暗中调查大计。

正值此时，陈平等从报章上看到了于1947年1月4及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分析国际形势的一篇重要文章。<sup>21</sup>这篇文章的观点与莱特于1946年底在党中央会议

---

19 《战友报》为马共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所主办的16开版报章，战后于吉隆坡出版。时马共吉隆坡办事处公开党代表刘一帆任社长。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实施前夕遭封禁，刘一帆被捕入狱，于50年代初被遣送到中国。

20 “雪州危机”事实上是马共战后所面临的共同情况。党员忙于生活的奔波，组织与纪律十分散漫。莱特针对雪州，责成中委兼州委书记杨果须承担责任。一般皆认为因杨果屡屡于中委会上质询莱特，莱特感觉杨果对他怀疑，而借此修整他。

21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强调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同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亦发表演说，提出“铁幕”一词，与美国同时鼓吹“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来对抗共产主义。此两篇演说被视为东西方冷战的宣言。国际局势变得紧张。中国人其时担心中苏开战，美国及苏联则担心中国内战引发中苏大战，形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面临这个国际局势，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提出他的看

上所做《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大相庭迳。这引起了各中委对莱特观点的质疑，从而陈平及杨果更进一步怀疑莱特的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

接着在党中委会上，部分中委提询关于国际形势分析的差异问题并对莱特的家长制的领导作风提出意见，要求体现党内民主协商精神。鉴于形势的突然转变，莱特表示接受建议将自我批评和检讨，至于国际形势分析，他自辩并无差异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略有不同。借口要会见国际要人而建议下回会议讨论中委们的质疑和意见。

党中央于1947年3月间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等候莱特不至。后从其妻处莱特留字中猜测其或遭英殖民政府逮捕，陈平等立即从多方面，包括从星洲四排坡监狱查证，结果并无其事，始发觉他可能金蝉脱壳，潜逃无踪。党中央立即成立以陈平为首的三人追查小组，寻找莱特的下落。陈平迳往新加坡加冷区（俗称火城）越南人群居处调查，莱特的私生活以及有多名妻妾的情况全面暴露，并证实党各州上缴党费，捐款和金块等约35万新币悉数卷走无余。<sup>22</sup>

---

法。认为国际战争虽必须尽量克服但国内情势不能因之做过分的妥协。当时中国国内形势逆转，对中共十分有利。斯大林暗示中共向蒋介石妥协以求取和平。毛泽东授意陆定一就整个国际局势和他的观点写一篇全面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作为国内外关于斗争形势的指导性文件。这篇文章题为《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于1947年1月4及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战后力量的对比，对战后各殖民地解放运动给予肯定。请参阅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40-347页；正文见《陆定一文集》（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第378-392页。

22 殖民地档案 CO 537/3735, op cit,《莱特文件》(The Wright Document), 第44页。

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C



党中央于同年五月间随即举行第九次中央扩大会议，正式推举陈平为总书记，杨果为副书记。才23岁的陈平，自此当上了马共的魁首。是年七月，陈平首次出国，前往曼谷会见泰共负责人李启新<sup>23</sup>并续程前往香港拜会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新华社的负责人连贯。除告知莱特叛逃之事外，并建立马共与兄弟党之间的新联系。此为陈平首次以马共总书记身份与中共建立联系之始。莱特亦在中共派员与泰共联手，于曼谷全民报社<sup>24</sup>拟逮捕他，因他挣扎喊叫，特务失手把他掐死。时约1947年9月下旬。陈平于1948年4月始发出《莱特事件文告》<sup>25</sup>向党内外公布莱特叛逃之事。

## (十) 逼上梁山 武装起义

战后初期，物质匮乏，生活困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员与抗日军更遭逢生活的压力，党即不能照顾众多党员和任何军人的生活，各人逼得各自谋生。党的组织和纪律涣散，于1946年末起，相当一批党员和退伍军人因生活问题而对党的斗争前途失却信心而纷纷离党。

日降后，做为盟军，英军政赋予马共公开合法的地位并允许其在主要城市建立党代表处。但英军政的宽容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便开

---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第193页。

- 23 李启新，又名闵德才，为马共创建人之一，曾任马共第一届中央委员。1934年被捕，1938年被驱逐至中国。1940年中共派他前去曼谷组织泰共。1947年回到中国，50年代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负责东南亚共党联络与支持的工作。
- 24 曼谷《全民报》为泰共公开报章，由李启新所创办。属中共南方局在香港所办华商报系统。
- 25 殖民地档案 CO 537/3735, op cit 见《莱特文件》(The Wright Document)。



始它的正常运作。对马共领导的工农和社会运动采取逐步升级的严酷镇压行动。动辄逮捕马共党人并驱逐出境。马共祈望通过宪制斗争达致自治并进一步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但无从实现，且由于抗日军解散，武器上缴，马共失却武装力量做为后盾。许多党员干部原就对解散兵员和缴械有很大的意见，党的威信受挫，党员脱党情况一再发生。党内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干部都对马共战后以来所执行的政治斗争路线深感失望而质疑党中央的领导。

陈平与杨果分别担任总书记与副书记之后，在追查莱特叛逃、揭露其特务身份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思想和政策的检讨。对所有莱特于战后提出的包括“八大主张”在内的一连串路线，主张和斗争纲领进行全面的批判，并对党政各方面进行整顿。1947年5月通过了新党章，并发表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和群众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章，以加强组织、提高纪律，并积极发动和参与泛马政治行动委员会<sup>26</sup>与马来人联合阵线反对英帝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白皮书和“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宪制蓝皮书的斗争并颁布了《马来亚新宪法草案》或称《人民宪章草案》，积极争取走向自治。

1948年3月，陈平召开了马共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和发表了《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指导性文件，全面检讨了八扩所发表的政治斗争纲领。这个文件把战后党的政治路线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正提出清算右倾投降主义、肃清右倾思想，并确定和贯彻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展开对英帝的不妥协的斗争。

实际上，此时马共党中央对英帝的步步进逼已感到进退两难。

---

26 “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十一个民主政党和工商及群众团体于新加坡成立，主要为反对“马来亚联邦”宪制白皮书及“马来亚联合邦”宪制蓝皮书，向英帝提呈马来亚宪制意见。

社团修正法令的颁布将严重限制马共和所有马共控制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并有随时被封禁和解散的危机。在新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指导下，陈平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考虑万一英帝采取封党的断然行动时，应将如何应付。陈平在分析时局的发展时得出结论，认为英帝最迟在是年九月将采取行动对付马共，因此已着手准备应变措施。届时将通令高层干部和党员挖出日降时埋藏的武器，再度上山打游击。

是年4月马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民声报》<sup>27</sup>颁布了以郑杰为名的《认识形势，掌握方向》的政策声明。暗示了斗争形势的剧烈转变。同时以马共职工部的名义发表了《坚决引导工人前进》，指引工人阶级斗争的方针性指导文件。接着，于5月又颁布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并雷励执行清党任务。开除了所有在日治时期及其后曾经被逮捕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对俱散漫和自由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干部和党员则采取整肃纪律、端正思想，留党察看的措施。陈平亲自主持了清党的整体工作并前往新加坡开除了当时新加坡市委罗须磨和公开党代表张明今等人。明显的，整党的目的为杜绝敌人的可能的渗透，为再度上山打游击做好组织的准备。

从1948年5月开始，各地方政治斗争升级。特别在柔佛州、森美兰和吡叻州发生多起袭击英籍胶园及矿场经理的事件。于6月18日，英殖民政府在马共未及防范下，断然采取严酷的镇压，封禁所有左翼社团和工会等组织，并于20日清晨实行全马大逮捕，几乎所有公开的马共党政人物、左翼人士、工农运动者以及左翼马来人等数千人于一夜间尽遭逮捕入狱，是为6·20事件。同日在全马施行了紧急法令。

---

27 《民声报》为马共于战后所创办马共喉舌报，于1948年6月20日与马来亚抗日退伍同志会所办《战友报》同时遭封禁。



陈平此时因事前往金宝矿场，逃过劫运，幸免被捕。于慌乱中，陈平被逼上梁山，检出埋藏的枪枝，再次上山打游击。从事态看来，马共仍疏于警惕性而事前准备不足。因遭遇大逮捕而损兵折将。原计划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欠妥。虽然事出仓促，武装斗争还是正式掀开序幕。

英帝把紧急法令的施行归咎于马共的武装斗争，把战争的责任推落在马共的肩上。英帝并狡猾地把此实质上的战争宣布为紧急状态，以此保住其物业保险的经济利益。<sup>28</sup>

二战结束时，英帝论功行赏，陈平做为联军与抗日军的首席联络官，获颁英女皇 OBE 勋章。陈平未曾如谣言所传者，前往伦敦参加胜利游行，因而一直未曾真正授与。紧急法令颁布后，陈平从盟友的身份转变为头号敌人。英帝不仅登报收回这项勋赐，且于 1949 年悬赏 6 万马币取其人头。这数目后来逐步遽增至 25 万元，恰等于当时之福利彩票头奖。

匆促上山时，陈平带领的各地游击队人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英军初期以残暴恶行以及把所有胶园、矿场和农村工人和农民都一律当成为马共嫌疑分子，使马共因而获得了众多的同情和支持。通过民运积极宣传和发动，许多年青胶工、矿工、店员、学生和农民纷纷上山参与游击队。经过数月的调整，陈平在党军的组织上发挥了他的领导能力。1949 年 1 月 25 日，陈平颁布《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1949 年 2 月 1 日，马来亚解放军正式成立。并沿用抗日时期的编制，各地以“独立队”的名称运作。解放军成立后，与政府军的接触频繁并屡建奇功，士气大增，更获民众支持。于 1951 年的顶盛时期，解放军总人数多达 8 千多人。英军人数则多达二十万人，另加精良武器、战车、飞机和大炮无数，虽然力量和武装对比

---

28 布赖恩·拉平 (Brian Lapping) 著，钱乘旦，计秋枫，陈仲丹译《帝国斜阳》（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 202 页。



完全不成比例，但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仍然使英军疲于奔命。

1949年6月，马共中央决策仿效中国红军建立根据地，下令各地游击队整装集体出发作“小长征”。马来亚中南区的游击队伍向彭亨南部贝拉湖区（Tasek Bera）方向进军，而北部的队伍则迈向吉兰丹中南部的蒲莱村（俗称牙叻顶）。<sup>29</sup>“小长征”的决策或许是造成武装斗争倒退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当时，党内有人反对建立根据地而认为应保持游移分散和打小规模游击战，主张化整为零的战略战术。然而大队行军，一来容易暴露行藏，二来耗粮甚巨。结果沿途屡遭英军重军袭击，险象环生，在大山森林中，粮食和物资供应脱节，粮弹尽耗。经辗转数月，不得不再化整为零，分散回归原属地段。“小长征”以失败告终。造成无可弥补的两大损失。其一是鱼脱离了水。解放军从“芭边”（靠近胶园与矿场的森林边缘）撤离，脱离了由民运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粮食与物资供应和情报来源的群众联系。其二是在深山野林里受饥挨打，损兵折将，严重挫伤了兵员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此时，英军开始实施“布里兹新村计划”（Brigg Plan）。<sup>30</sup>把“芭边”的胶工、农民和矿工强迫迁移到形如集中营受严厉管制的新村，断绝马共与群众的联系，切断马共的粮食物资供应线和情报网。解放军再回到“芭边”时，原由民运建立的群众联系已遭瓦解。小长征的战略错误十分

---

29 蒲莱村为一数百居民的纯华族（主要为客家人）约有200多年历史的淘金山村，抗日时期成为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的大本营。蒲莱村村民多同情与支持马共，参与马共部队的蒲莱村民颇众。紧急法令时期为马共第十二支队的活动地区，遭英军逼迁并将全村付之一炬。

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第85-94页。

30 安东尼·肖特著：《追踪山老鼠——马来亚共产党起义》，新加坡：文莲出版社，2000（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 -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第231-253页。

明显，造成的错误亦无法弥补。

自 1951 年英帝派邓普勒将军 (General Gerald Tampler)<sup>31</sup> 出任行动总长兼行政首长，统筹所有剿共行动部门以来，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抄剿战斗和几乎是坚壁清野的隔绝行动。对嫌疑较重的新村断然采取 24 小时戒严，甚至将村落付诸一炬。对涉嫌接济马共的村民采取残暴的扼打、逮捕和禁锢以及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此外又在新村设立所谓新村议会，实行所谓民主的政策。邓普勒的政策对马共武装斗争具有实质性镇压作用，其绥靖政策在马来亚推动议会民主也产生相当的效果。

由于上述主观的失误以及客观的不利因素，诸如朝鲜战争使胶价猛涨，为英帝带来丰厚的经济来源以支付庞大的军费；英军经两年多的热带森林战，逐步积累了经验，改进了战略战术等，马共于 1952 以后开始严重受挫，被逼采取守势。虽然如此，抗英革命信念紧紧维系着党军干部和兵员，使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战斗和高昂的士气。1952 年之前，解放军的出击率高且常重创英军，使英帝一时认为马共的革命武装斗争可能成功。

在漫长的战斗中陈平本人亦带领部队辗转于雪兰莪、吡叻与彭亨西部一带。转移中数次遭遇出生入死之险。最危险的一次在 1953 年中，陈平决定北迁至泰南边区，连同以马来同志为主的第十支队领导，队伍取道吡叻及吉兰丹交界的山路向北转移。抵达和丰附近山区，遭到英军机猛烈轰炸，万幸炸弹掉落咫尺对山山坡上，未曾命中。另一次则在沼泽地农家召开会议，遭到英军突击，而陈平闪躲于灌木丛中而逃过劫运。

---

31 约翰·顾德斯著：《镇压暴乱——1948-1954 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分析》，英国：韦斯特维尔斯出版社，1992 (John Coates, *Suppressing Insurgency -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United Kingdoms, Westview Press, 1992), 第 111-118 页。



1953年底，陈平已经在泰南建立了根据地，从那儿指挥马境的战斗。此时，留在马境尚有柔佛州中北部以何浪为首的3百人的部队，吡叻南部由陈洪领导约2百人之部队，以及零零散散分布在全马各州各地的游击队以及活跃于吉打玻璃市的第八支队等，总人数约在六百人左右。

### (十一) 主动促进和平——华玲谈判

1953年7月，中美韩朝达致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印支问题达至“日内瓦协议”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于朝鲜战争后展开全球外交，与亚非拉美许多新兴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尼的万隆，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当时时局和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亚非会议。<sup>32</sup>一时间，和平之声四起。马来亚也积极部署民选立法议会，为独立铺路。以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组成的三大民族联合政党“联盟”以强大的阵容参与即将于七月举行的大选。不论是来自国际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影响或是来自国内的形势转变，马共都面对一个全新的严峻局面。明显的，武装斗争面临失败的噩运。马共赴汤蹈火，南征北战与英帝作战的目的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马来亚共和国，而英帝扬言给与马来亚独立的承诺一旦落实在“联盟”身上，马共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国内各政党，左翼工团和民间组织也都殷切希望见到和平在马来亚实现，结束“紧急法令”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和痛苦，并摆脱殖民政权的统治。印支半岛通过谈判达致和解分享政权的做法，特别是柬埔寨让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的解决方案值得借鉴。因此，不论是站在马共对政治利益的考虑还是站在马来亚人

32 夏仲成《亚非雄风——团结合作的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4，12，157页。



民企望和平的立场，陈平都必须着实考虑整体局势的发展而向民选政府伸出橄榄枝，通过和谈达到某种程度的和平。显然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希望通过和平外交解除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疑虑，同时借此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反华围剿。对于有渊源关系的马来亚共产党在和谈的问题上自然采取较积极和鼓励的态度，希望看到马来亚和平解决即将变成内战的武装斗争局势。1955年1月，东姑代表“联盟”建议大赦马共成员以尽快结束紧急状态。此举明显地看出东姑急切希望解决战争以换取独立。

陈平衡量当时以东姑为首的“联盟”和以拿督翁领导的独立党<sup>33</sup>两党之间的政纲和实力，他们个人的背景以及与英帝的关系，认为东姑提出的“两年自治，两年独立”的政治议程较具进步意义。<sup>34</sup>同时，他也觉察到英帝偏袒拿督翁，因此决心与“联盟”和谈取得共识，积极地支持东姑向英帝争取独立。

1955年，大选前一个多月，陈平以解放军司令部代表“吴兴”的名义向“联盟”发出谈判声明。英殖民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7月间，“联盟”以压倒性胜利上台。为履行其结束紧急状态的诺言，回应了马共和平谈判的诚意，积极安排和谈的进行，并定华玲为谈判地点。

自参与革命以来，华玲会谈是陈平真正曝光的一次，过去知道谁是马共总书记的人甚少，即使在党内和军中，除了中委和他身边的仕卫之外，其他干部和兵员，甚至许多不接触的州委级干部大多

---

33 约翰·顾德斯著：《镇压暴乱——1948-1954 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分析》，英国：韦斯特维尔斯出版社，1992 (John Coates, *Suppressing Insurgency -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United Kingdom, Westview Press, 1992), 第 110 页。

34 星洲日报《马共总书记陈平独家专访》系列五《华玲会谈》（吉隆坡，1998年6月23日），副刊第一版。

不知道陈平就是党总书记。<sup>35</sup>这也是由于马共做为一个秘密组织，须保护领导核心以免落入敌手。

华玲会谈，终于使新马人民和马共党军干部知道了谁是马共的总书记并从报章看到了他的真人容貌。时陈平 32 岁，身体健壮，有玉树临风之姿，有儒者之风范。马共的行动素来神出鬼没，他的现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让新马关心时局，不论同情还是痛恨马共的人们都通过报章能一睹他的风采。陈平之名从此不迳而走，家喻户晓了。会谈中，他言简意赅常常以提问的方式回应东姑阿都拉曼和马绍尔。对马绍尔的律师作风挑衅式谈话，能冷静地对待并不失礼貌地反击。突显了稳实的谈判风度。惟独谈判一开始，东姑与马绍尔咄咄逼人的长篇声明和问题，陈平一再沉默，似乎令人感到他处于下风。一直到第二场谈判的下半段，陈平才以提问的方式开始逐步表态，但他不做长篇大论的陈词而仅仅围绕着几个关键问题，一再重申马共的立场和态度。他坚持马共绝不接受大赦的条件，不投降，不接受即使是短期的拘留和审问。对解散马共并不坚持但强调人身、言论和参与政治甚至组党的自由必须得到保证。如果东姑和马绍尔能够从英国手中接过政权并享有完全的独立和内政权力，则马共可以立即放下武器。陈平在谈判中亦说明出山的条件已经放到最低。事实上，谈判一开始便被引入大赦的课题中，东姑与马绍尔亦一再在这点上纠缠。明显的，谈判不会达致任何结果。东姑后来怪罪马绍尔的言词过于挑衅和具损害性和藐视性，因而造成谈判失败。而真正原因则是双方都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所致。特别是东姑在这方面似乎胸有成竹，即使是最起码的让步都做不到，虽然在态度上言词上谨慎得体但明显地有一种居高临下和胜利者的姿态。从现在看来，他并不企望谈判会取得成功而充分利用了谈判做为他与英国政府谈判的筹码。陈平伸出的橄榄枝得不到应有的回

---

35 笔者与许多在广州及泰南数个村落居住的前马共和现仍为马共的一些高层干部进行口述时，大多声称在下山之前未见过陈平。



报，反而造成一种被动的局面。

参与此次谈判还有联盟伙伴之一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他与陈平的会面正代表着马来亚华人两股政治思潮面对面交锋。陈祯禄在东姑亚都拉曼于1955年正月宣布对马共大赦时，他便公开在报章热烈反应并声称他愿意亲自进入到森林中去和马共会谈。然而，在谈判桌上，陈祯禄发言极少，仅仅在东姑邀请下，做为代表华人的政治领袖发言。表面上似乎在劝说陈平放弃战争，而事实上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在向英政府及东姑表明其反共立场。惟一可取的一句话，是陈祯禄根据马共的宣言（即于1955年12月22日为和谈发表的《马来亚共产党宣言——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说：“马共与人民之间并没有纷争，继续紧急状态是浪费的”。陈平完全没有回应陈祯禄的谈话。可以理解陈平认定谈判的主要对象是东姑。从陈祯禄的谈话中明显看得到他在这谈判中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次是回应陈祯禄带有反共色彩以及简接向联盟和英政府表态的谈话将会使谈判偏离谈判的主题（争取党人自由，党受承认），更不幸的是必然陷入意识形态的论争，而导至谈判的破裂。

从整体的事件看，陈平的和平意愿是真诚的，而且把条件放到最低的程度。这似乎受到某些方面的影响而不完全出自马共或陈平自身的决定，是一种形势和国际间势态造成。虽然历史没有假如，但华玲谈判如可能时光倒流，马共或许态度会强硬得多，因而谈判的形势可能有变。

华玲谈判的失败严重地打击了马共的士气和民众祈求和平的愿望。1956年中旬陈平再度发信给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信由陈田签署）建议重开谈判之门，但遭东姑一口拒绝。但陈平仍然继续发信重申谈判之目的，东姑于是首肯重新谈判并申言会提出更能使马共接受的一些条件以利谈判和解除紧急状态。1956年9月间陈平向中共发出正式文件要求通过国际仲裁达致马来亚的和平。与此同



时，国内政党和工团等民间团体如劳工党、马来亚全国职工总会等亦发表声明，呼吁东姑与陈平会面继续和谈。于1957年10月陈平再次建议和谈并取得东姑同意，选在泰马边境的歌乐镇举行。然而，这次和谈的安排并未实现。马共祈望通过这种谈判达致和平之良好意愿终于落空。

## （十二）偃旗息鼓 等待时机

马来亚独立了，虽则在马共的认识中这独立仍然是一个疑问。显然的，国防和内政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然而，执政的是民选政府，联盟取得大多数选票当选，形势是明朗的。瞬间，马共为马来亚独立而战，建立马来亚民主国家的理想已经相对地实现，斗争的目标顿失。这对马共党军的斗争意旨和方向造成重大的困扰。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终于得退守他国，马境内的残存力量也在逐步瓦解之中。更严重的打击来自1958年8、9月间，吡叻南部由陈洪领导的120名解放军与柔北由何浪领导的160名解放军先后向政府军缴械投降，马共元气大伤。陈平与党中央在研究具体情势后，提出了“偃旗息鼓、等待时机”的退伍政策。首先是老弱病残者以及自愿解甲归田者都得到安排，在泰南乡村隐居过平民的生活。

陈平此时的心境应十分低沉和悲痛。从1951年的8千兵员的高峰，十年后的今天落得不足千人的队伍，残喘于边境。泰南是鱼米之乡，村民亦十分同情及拥护和支持，有所谓“掉落米缸”之说，银、粮再不缺乏。与前数年在饥饿中战斗的情景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由于泰南四省分离主义分子与马来亚政府的某种关系，<sup>36</sup> 泰国军政对马共在此避难采取宽容的态度。然而，师出需有名，马共只得暂时等待时机的到来。

---

36 泰南四省主要居民为泰籍马来族，长期以来，一直争取独立，泰军曾不止一次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庇护泰南分离主义分子。

1960年国际形势略有转变，陈平决定前往中国学习并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于60年12月30日从泰南合艾以南面的康月基地出发，徒步到昔罗，然后乘摩多车北上高廊头，休息一夜。次日再乘车往西到普吉岛附近续程北上到泰缅边境的拉朗，漏夜兼程赶往春蓬，再经巴蜀抵曼谷。在曼谷由泰共接应住了个把月，才北上经柯叻到泰寮边境的乌蓬。在此，陈平一路颠簸，疲累过度而病倒，住院后发现为急性肠炎加胃出血。经八天治疗痊愈后，再续程东行到那空柏农，夜渡湄公河到寮境边镇他曲的河岸边，由寮共游击队接应露宿于灌木丛中。次日清晨，遭遇政府军袭击，经一整天逃生，越过他曲以东十三号公路才进入到寮共控制区而得于稍事整装休息。次日，始乘苏制直升机抵达南北越交界的广治府，续乘苏制伊留申小飞机抵河内。在河内，会见胡志明及其他领导人，备受招待。于半个月后，始乘中国专机飞北京，此行沿途冒多次被逮捕或被杀的危险，然终于如愿抵达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接待并安顿于中联部所管辖的宾馆。长驻北京的中委阿陈<sup>37</sup>、阿苏<sup>38</sup>等人及马共驻北京代表团成员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抵北京后，陈平召开了中委会并扩充和调整了马共国外政治局。除继续担任马共总书记一职外，并取代章凌云兼任国外局书

---

37 阿陈，又名阿海，原名单汝洪，为资深马共中委。1950年代因患肺病往中国医治，成马共驻北京代表团主要成员。1962年回到泰南地区，主持新方针解放军招兵整训工作。现居泰南勿洞附近和平二村（现改名朱拉蓬公主第十村）。近著有《森美兰抗日游击队战争回忆录》，《回忆往事》等书。

38 阿苏，又名小章、林文、章凌云，原名章传庆。1955年起在第十次扩大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1953年到中国，负责与中共及苏共商讨马来亚革命问题，为马共驻北京代表团团长兼国外政治局书记。曾多次代表马共参加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1964年回到泰南边区，主持边区中央工作兼北马局第一书记。1968年主持肃反。1987年他抱病主持与泰马政府的三方和平谈判。于1988年逝世。



记。国外局除兼负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之事务之外，主要的任务是为重新建立和加强新马两地的地下活动和加强各统一战线的工作。

此时，中印半岛局面情势大张，越南战争中，越共节节胜利；柬寮两国亲王皆左倾，成立了红色政权；印尼共产党亦受到苏加诺的支持而声势浩大，正所谓形势一片大好。陈平会见了各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得到激励和鼓舞。陈平并争取到中共给予优厚的财力支援和其他方面的协助。过去中联部对马共的支援不力，中共中央另调他人掌管与马共联系和提供支援的具体事务。

国际共运方面，中苏自 1950 年以来的分歧在此时暴发为公开的论争。<sup>39</sup> 中苏两国为争取国际兄弟党的支持各出奇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正符合建立中共在国际的影响。

国际共运和中印半岛以及东南亚局势的转变，促使马共重新审度马来亚的斗争。提出重振旗鼓的“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重新在泰南招收新兵上队。举办马克思主义学校，培训党军成员和地下活动分子。在中国，陈平重新登记被驱逐到中国的马共党军人员，选拔了数百人分批送到南京等中共军事学院进行政治和军事之培训。另一方面则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做为马共国际统战的政治组织，开展国际联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共运的事务。陈平以

---

39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于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印发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此秘密报告后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引起全世界轰动。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有保留，是为中苏论争之起点。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不点名批驳苏共。同年 12 月 29 日，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度批判苏共。之后，中苏文字过节甚多。1962 年 12 月起，赫鲁晓夫在苏共 22 大公开指名攻击中共，引发了中苏公开大论战，就苏共的《公开信》后，中共连续发出九次评论（简称“九评”）公开批判苏共修正主义。



马奇德的化名亲自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等会议。陈平在中苏论争中采取积极支持中共的立场，反苏批修。<sup>40</sup>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驻北京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亦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批斗，马共驻北京办事处亦不能幸免而牵涉其中。马共与日共驻京人员发生冲突，陈平亦遭受冲击。1969年，陈平获得中共的支持，于湖南长沙附近岳家桥四方山建立了强有力的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并于1969年11月15日正式广播。陈平亲自主持电台的运作和审阅广播稿件。此时刚从边区前来的中委北马局委员阿焰<sup>41</sup>亦参与主持电台的工作。电台以马、华、英、淡米尔四种语言广播一至四个小时不等。电台参与的中、马人员共多达八十多名。1962年逃离新加坡的社阵议员，前李光耀的政务次长陈新嵘和其他新加坡共产党人亦参与工作。

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与马来西亚总理敦拉萨签署了中马建交联合公报。中马建交使马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马共在历史上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至此仍受中共精神和物质的支援。马共成员又以华人为主，这势必成为中马政府关系发展的障碍。马方建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要求中共断绝与马共的联系。1975年4月30

---

40 马共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以马共代表团名誉发言，隐约地支持中共的立场并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的建议。于1965年1月31日，马共正式发表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正式反苏批修。

41 阿焰，又名李凡、陈再润，Karayani，原名伍瑞霭。1923年生。1940入党，41年被选为吡叻州党执委会委员。抗日时期，任区委书记。日降后任槟城市委委员，市委书记。1955年入选为中委。1960年任政治局委员。1961年任北马局委员，1964年至1968年任北马局书记。1968年怀疑党内有敌奸执行肃反。于同年底到中国，与陈平一道主持“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工作，1987年回边区与阿苏共同负责与泰马政府谈判，任马共代表团顾问。2000年3月病逝于泰南合艾市。

日，马共发表成立45周年的声明，中共发电祝贺，登于人民日报上，引起风波，招致马来西亚一系列的外交抗议和交涉。要求中共对贺词中“武装斗争”与“支持”两词含意予以澄清。此后，中共在考量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进程和长远的地缘政治关系后决定抽离对马共的各种支持，于七十年代末起逐步落实与马共脱离关系的政策。马共人员及其子女如选择成为中国公民则需脱离马共，马共人员及其子女如选择继续为马来亚人则需移居泰南。如个人有医药和亲属探访的需要，中共仍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位于湖南的电台于1981年正式结束，搬迁至泰南继续广播。陈平面对这种种局面，处境十分艰难，但仍需小心应付。1987年初泰方与马共第十支队开始接触，终促成于普吉岛进行多次深入谈判，陈平在北京指挥马共代表谈判的进程。终于在1989年12月2日达致和平协议，放下并销毁武器，停止长达四十一年武装斗争。<sup>42</sup>

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所能幸免。马共于1968年起因怀疑敌奸渗透而开始以“逼供信”这源自斯大林的内部审讯传统处置受嫌疑的党军人员。渗透的敌人或许有，但不幸的，追查敌奸“肃反”活动扩大化，导致上百人遭处决，进而形成党军的分裂。首先是以黄一江为首的八支逃离而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接着是以张忠民为首的十二支二区脱离中央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时为1970年。革命派与马列派曾由黄一江及张忠民前往中国北京拟会见陈平商讨“肃反”事件。陈平化名“梁进”接见并听取陈诉，但对事件不予置评，仅言“交由历史去评判”。黄一江与张忠民不得要领，回泰南后两派于1983年正式

---

42 拿督吉提·喇塔纳差呀将军著：《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为马来亚共产党结束武装斗争的休战谈判》，曼谷：端皋武出版社，1996 (General Dato' Kitti Ratanachay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laysia and Thailand -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angkok, Duangkaew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45-249页。



合并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与马共中央分庭抗礼，实乃马共历史之大不幸。

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后，许多家属开始寻访在队上的亲属，始得悉在肃反中遭处决而纠众要求平反。在几经周折的情况下，陈平虽在事件发生时人在北京，边区的事皆由边区党委负责，仍不免得负起总书记之职而力争平反。并给于家属合理的抚恤金以示安抚。

### (十三) 历史长河 悠悠我心

四十一年度的战争中，英帝消耗了14亿7千多万英镑的军费，动员了整20万兵员，出动了2万5千航次英澳战机的袭击，发射了不少过十万枚火箭炮和投下了3万3千多吨的炸弹，这尚未包括数目无以计算的经济损失在内，<sup>43</sup> 仅仅为追杀数千名马共游击队。以双方战力的对比，无论人数、装备、武器和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都太不成比例，而英帝始终未能如愿实现歼灭马共的企图。表面上英帝似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从上述数字看来，英帝实在颜面尴尬，很不光彩。从1954到1989年，偏安于泰南的马共仍然活跃，在政治上，马共的地下活动和政治影响都威胁着新马独立后的政权。陈平作为这场战争马共总指挥，其坚韧的意志、强悍的形象和不懈的战斗，创造了一段英国人永远也忘不了的历史。在新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历史上也永远留下鲜明而深刻的烙印。以陈平为首的马共党人谱写了这一段悲壮的历史，任谁也不能随意抹去。

陈平领导马共至今为止已长达59年，<sup>44</sup> 他是共产党史上任期

---

43 东南亚文档集团：《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South East Asia Documentation Gro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 Selected Document*），第66页。

44 自1947年5月当选总书记起至今（2006年）。



最久的总书记，领导了战争史上坚持最久的游击战争。在诸多不利的主客观因素下，陈平长期能维系住党军人员舍命相陪、任劳任怨、受尽苦难、作战到底，而至今许多人仍追随左右，除共产主义信仰的凝聚力和革命的情谊相互扶持外，也足证，作为最高领导的陈平，个人的智慧、魅力、组织与领导能力有非凡之处。他掌政数十年，难免在过程中遭遇各种能免或不能免的状况。自1948年6月武装起义后，数十年来不曾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或许是环境不许可所至）；马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也基本上维持不变，领导层无新陈代谢的更新过程；此外，陈平自1961年起，便长住中国，脱离边区战斗，直到1989年12月始回归边区签署和平协议。这些都为党内外人士所诟病。武装斗争虽已结束，但党仍然未曾解散。陈平肩负总书记的重任，其现时主要任务恐多为党员及党做善后工作。除返回马境的三百多名党军人员外，在泰境生活的马共党人仍有数百人。他们分别住在以和平和友谊命名的八个村子（现已改名为朱拉蓬公主村）里，过着农耕和割胶的生活。大部已安居乐业，许多人也已申请入泰籍，打算落地生根。<sup>45</sup>

在长达四十多年党的发展和解放军的战斗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政治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误，有待检讨和总结。连同马共同情与支持者和左翼运动人士等在内，超过百万人都引颈期待从事斗争的马共党人给历史一个说明，一个交待，并填上新马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空白。陈平已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或许他能满足人民这个要求和好奇心。<sup>46</sup>

---

45 截至2005年12月，泰国政府已批准申请入籍的马共人员共四百多名在2006年1月至6月期间分别获得泰国公民证，正式入籍泰国。

46 陈平于2003年9月出版了其自传《我方的历史》英文版，由前英国邮报记者伊恩·沃德（Ian Ward）及其妻诺尔玛·米拉弗洛尔（Norma Mirafior）代笔，并由其传媒能手出版社（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其中文版于2004年10月出版。

陈平在位数十年，自然在党内外也树立了为数不少的敌人和怨怼者。有些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有些则是特殊的处境因素造成。有些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可解决的内部问题，却始终因着某种因素而不得解决。来自党内不同派系的指责和批判更为尖锐。<sup>47</sup> 1968年起，肃反事件的不幸和因之所引发的党军分裂是一个棘手的内部问题，个中原因或甚复杂。如果你死我活残酷相斗的敌人，放下武器后都能握手言欢，对于党内的是非纷争，是否也可既往不咎，携手共济？作为有气度的领袖或需细细思量，以免把裂痕永远带进历史。

作为马来亚的政党，流亡泰国有怎样的前途？党将何去何从？解散乎？改弦更张乎？身为总书记，在所难免，势必为些问题所困扰并需作出历史的交待。

2001年8月15日初稿

2006年1月15日修订

---

47 已故前马共驻吉隆坡公开党代表和《民声报》社长刘一帆曾于1979年12月发表《讨陈平檄》直指陈平为莱特第二。此外，尚有晴朗撰写的《伪装必须剥去》及全仲仁撰写的《马共内部风暴》等书提出对陈平尖锐的指责和批判。

##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 武装起义的回顾

### ——马来亚共产党是否有起义的计划\*

陈剑

#### 二战后国际冷战与马来亚的局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的威慑下宣布投降，在东南亚的日本驻军最终于9月间签署投降书时向联军缴械。但部分投向当地抗日武装与之合作，共同抵御回潮的殖民主义者。在马来亚的日军也主动寻求与马来亚共产党合作，愿意与马共一同抵抗英军重临马来亚，争取独立自主。但马共基于多重原因，没有完全接受日军当时的善意。<sup>1</sup> 当时马共由于武装抗日而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战线机制，抗日同盟会等外围组织获得各族群众的热烈支持，而建立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形成为当时在东南亚的有1万5

---

\* 本文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所编《冷战国际史研究》学术专刊第八期，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北京。原题为：《马共解密档案——冷战与东南亚共运的兴衰：马共革命沉浮录》。

1 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年，第108-109页。



千兵员武装的最大政党。马共的抗日武装共有八个独立队，<sup>2</sup>分布在全马各州，日本一投降，马共基本上立即从日军手中接管政权，并在各州成立人民委员会，履行政府职责，直到英军于9月5日以胜利者姿态登陆后一段时间，才在英殖民政府设立的临时军管机构“英军政”<sup>3</sup>的授令下，逐个解散。<sup>4</sup>

当时马共掌控在敌奸莱特<sup>5</sup>的手中，他以人民厌倦战争为由，宣称必须履行与联军签署的《美罗协议》<sup>6</sup>所作的承诺，而促使马

---

2 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年，第37-41页。

3 “英军政”，英国军事管理机构（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的简称。

4 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第63页。

5 莱特在1920年代是越南共产党西贡地区的区委，被法国殖民政权逮捕后叛变，成了法殖民政权的线人，身份暴露后，法殖民政权将之转送英国，成为英国特务，在广州及香港培训后，遣往新加坡，通过码头工人组织，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混入马共领导层，于1937年正式成为马共总书记。1942年3月14日新加坡沦陷后不到一个月，遭到驻新日本军政监的宪兵部逮捕，立即叛变，转为日本特务。日降前后，重投英军怀抱。1947年3月，被全面识破前，卷款潜逃无踪。从其渗透马共到卷款潜逃这十多年间，先后出卖马共高层领导无数，最严重一次，是在1942年9月1日，授意日军围剿在吉隆坡石山脚农村参加党军联席会议的高层领导，造成18位马共中央委员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队司令及护卫壮烈牺牲，史称“九·一事件”。

6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马来亚北部吉兰丹州海岸登陆，长驱直入，英军节节败退。英殖民政权鉴于日军势如破竹，于是释放200多名被拘留的马共领导与干部，要求马共联手抗日，并立即成立101军训所，培训马共派来的167人，并将之组成敌后游击队，这便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由来。之后，由联军派潜水艇载送联军代表在马来亚西岸天定地区登陆，由马共接应。之后，在美罗附近山区，由莱特、陈平代表马共与联军代表戴维斯及林谋盛等人谈判，签订了《美罗协定》。见新马桥友会编：《马来

共解除武装，向英军呈交武器及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抛出《八大主张》<sup>7</sup>代替《抗日九大纲领》，<sup>8</sup>放弃了马共《抗日九大纲领》所订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立国纲领，忠实地执行《美罗协定》的条款：马共“将接受和遵守联军统帅在马来亚作战的有关命令”，及其附带条款：“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与秩序的时候为止”，向英军政妥协，出卖了马共以及马来亚人民的利益，完完全全放弃了抵御英军重返，像东南亚其他地区，如越南、印尼、缅甸等殖民地的人民一样，立即发动民族民主独立解放武装斗争，建立独立自主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错失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好时机。基于马共在二战期间是联军的盟友，在获得英殖民政府授予功勋的奖掖外，党得以公开活动，从事所谓和平民主宪制斗争。<sup>9</sup>

从1945年8月15日至1948年6月20日这一时期，在马共史上称为和平宪制斗争时期。在为时两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47年3月以前，马共无论领导层还是基层，都处于思想混乱、党纪涣散、政策摇摆、政治方向不明的状态。<sup>10</sup>这严重影响了

---

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年，第111-113页；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第59页；陈平：《我方的历史》，第9-25页。

7 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第62页。

8 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第51页。

9 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33-137页。

10 英军政从马共的“人民委员会”手中取过政权后，立即宣布日本发行的“香蕉票”纸币作废，致使全民即时破产，马共党军人员下山后，公开队员可获得350元马币作为生活津贴，秘密队员则只能自力更生。退伍后，立即面临生活困境，致使众多党军人员脱离组织生活，纪律散漫，也由于许多人员原本文化水平有限，加上对党放弃了武装，心生不满，也看不到革命前途，因而思想呈现混乱状态，引发后来所谓的“柔北危机”与“雪州危机”。参见阿成（单洪汝）：《从“八扩”到抗英战争》，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23-31页。



马共对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领导作用，回复到战前那种仅仅胶着于工运、领导工人争取基本权益和罢工的斗争中，在政治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这一时期，最有成效的行动似乎仅在于提出和推动“马来亚民主纲领”，<sup>11</sup> 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与派出资深党员参与并协助组织公开政党，如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国民党（另译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等左翼政党，推动合法的宪制斗争，为向英帝殖民政府争取马来亚的自由、民主、自治与独立而奋斗。

### 关于 1948 年马共武装起义的论争

对于 1948 年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纷纷拿起枪杆，从事武装起义，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主而与殖民地政权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是缅甸人民在 3 月揭竿而起，与英殖民主义者殊死对抗，接着是 6 月马来亚共产党被逼武装起义，在下来 9 月印尼共产党在茉莉芬同样被逼开展武装对抗。这些都在在响应着中印半岛和越南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开展的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政权及其殖民地代理人和一些西方学者，以冷战思维看待东南亚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一直认定这是苏联在其扩张政策的主导下，于全球策动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暴力夺权的一个环节，是苏联在 1948 年 2 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与国际学生联盟大会上，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代表秘密发出武装起义的指令所致。<sup>12</sup>

---

11 1946 年 2 月 1 日马共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这是在莱特主导下推出的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的政治纲领。参见阿成（单洪汝）：《从“八扩”到抗英战争》，第 11-12 页。

12 R.T.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nterim Reports Serie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1958, pp.1-2.



近年来，许多学者，包括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质疑这个论调。<sup>13</sup> 他们从会议的性质，其作为包容非共青年和学生组织的一个公开大会的角度，认为苏联不可能在这样的场合指令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组织去执行这样一个带有高度机密的任务。况且，出席这个大会的还不是各国各地区共产党一级领导。在这样的场合来颁布这样的指令，显得草率和令人疑惑。同时，从苏联解密档案中也找不到任何文件可以佐证有这么一个指令的存在。现在看来，这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冷战思维中，为其寻找机会对各地区共产党进行镇压而杜撰出来的一个最佳理由。目前，其成为学者论证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以马来亚的情况而言，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马共及左翼积极诉求独立自主，采取了一系列罢工罢市等行动；英殖民政府意图摧毁马共和当地左翼的统一战线和蓬勃开展的工农运动，为此采取了严酷镇压的措施，这种激烈的政治互动，才是最终导致武装起义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上，确曾讨论过日丹诺夫在1947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于9月成立时发表的著名演讲所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这个理论也确实对东南亚各殖民地所在的共产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马共当时也认同了这一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论断，认为与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誓不两立，惟有采取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民族解放。这个认识也是基于当时马来亚情势的发展而建立的，是在面对强大的英殖民政权逐步升级为对工农运动的镇压时而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自1946年以来的节节胜利，给予马共精神上最大的激励，认定

---

13 R.T.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pp.19-20; 另见 M. R. Stenson, "Repression and Revolt: *The Origins of the 1948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Athens, Ohio, 1969; 及 T. 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9, pp. 94-148; Phillip Deery: "Malaya, 1948: Britain's 'Asian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9:1 (Winter 2007), 29-54; Doi:10.1162/jcws.2007.9.1.29. <http://dx.doi.org/10.1162/jcws.2007.9.1.29>.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才是殖民地人民寻求独立自主的硬道理。

马共是在中共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政党，它早年便是中共海外支部的延伸，是从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南洋临委）<sup>14</sup>蜕变而来。他的活动，特别是在工运的组织 and 营运，一直是受驻守广东的中共职工会的指挥和管辖，南洋临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也都是由中共指派。如傅大庆、符荣鼎等一干人都是带着任务来到马来亚，从事工运和宣传共产主义，做最基础的群众工作。在1920年代末，中共时值在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遇重大挫折。这同时也引起共产国际的疑虑，认为李立三的过左路线将不利于海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接手对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鼓励成立马来亚共产党，由共产国际指导与管辖，赋予其独立运作的权利。<sup>15</sup>于是，马来亚共产党便在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遣来的胡志明的监督下成立，时为1930年4月间。马来亚共产党于是自此独立于中共，成为中共的兄弟党。

虽然如此，马来亚共产党由于其领导成员及其干部和党员，几乎都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在地缘血缘关系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维持着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受着中共的指导和影响。除了刚成立的短暂时期，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外，马共事实上一直自力更生。因为派驻新加坡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法国人，在短期内被捕，<sup>16</sup>造成胡志明在香港接

---

14 C.F.Yong, *The Origin of Malayan Communism*,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15 Sophie Quinn-Judge, *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Horizon Books, Singapore, 2003, pp. 168.

16 共产国际于1931年派法籍的约瑟·都克鲁斯前来新加坡协助并指导马共中央。约瑟是法国一个葡萄园工人之子。他读书勤奋，获得奖学金，在英国布莱斯托攻读商科并掌握了英语。回法后在巴黎的汤玛士·库克代理商行服务。193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调往马



着被捕，瓦解了共产国际对马共的监督和指导。中共则因辗转于长征及接着组织军事抗日而自顾不暇，无从给予马共任何协助。可马共通过个别人士的接触和联系，从中共方面借鉴与汲取斗争的经验，亦步亦趋，特别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从事马来亚的反帝反殖斗争与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这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与马共没有党与党的直接联系。与苏共则是更没有任何瓜葛。自建党以来，马共未曾有过任何记录，显示其与苏共有任何联系，或接受过苏共的任何指导。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苏共似乎把与马共的联系视作中共的职责。除了短暂的不到两年的共产国际掌控时期，苏共始终没有主动保持与马共的任何联系，而马共更没有主动去与苏共建立联系。这种情况除共产国际主观方面的因素外，也可能是地理原因使然。马共与中共建立真正的联系是在马共总书记莱特出走之后的1947年6、7月间，由新任马共总书记陈平亲自前往香港，会见中共南方局在港负责人连贯，才建立起新的关系。据知，陈平在会见连贯期间，曾就马来亚的恶劣政治情势，马共是否适宜开展武装斗争一事，征询中共的意见。后来得到的答复竟是来自周恩来的亲笔指示，告知马共，必须根据自己对马来亚情势的判断，决定应否发动武装斗争。<sup>17</sup> 马来亚共产党虽然曾派遣新民主青年团

---

赛为共产国际工作。他之后调往远东局，曾先后到过西贡、香港、马尼拉等处，于1931年4月27日，以诺帕特·勒法郎克的化名，伪装为法国一家伐木器材公司代表抵达新加坡。1931年6月1日，在马共中委傅大庆、黄默涵来访时一同被捕。见 Laurent Metzger, "Joseph Ducroux, a French Agent of the Comintern in Singapore (1931-1932)",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9, Part 1, 1996, pp.1-20。

- 17 陈平于1947年6月前往曼谷，会见暹罗共产党书记李启新，之后续程到香港会见中共南方局在港负责人连贯，汇报莱特出走及马共最新发展情况，并正式建立联系。陈平向连贯提出有关马共打算重新考虑发起武装斗争一事，求教于中共。连贯将此要求呈交南方局书记方方。嗣后，接获来自周恩来的亲笔指示，马共应按马来亚的具体情势自己做出决定。见战后马共首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山的回忆



团长李送参加加尔各答会议，但李送并没有得到有关苏共授令起义的通知。从这种种情况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所谓苏共在加尔各答的武装起义的指令，对马共而言，纯属子虚乌有。马共的武装起义完全是马共在英殖民政府对其革命斗争、左翼统一战线和工农运动进行严酷镇压，和平宪制斗争之路被断截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行动。

当然，1948年的东南亚情势，是二战后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如火如荼地开展反帝反殖斗争、从事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一个环节。马来亚周边国家和地区蓬勃开展的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局面，势必深刻影响着马共有关武装起义的决定。特别是3月的缅甸抗英武装起义，由于与马共一样，面对着的是同一个英帝国殖民政权，因此自然也就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1948年马共于6月20日发动的起义显得仓促和缺乏准备，由此而引发了后来的论争，即当时是否有武装起义的必要。1960年代末发生在马共驻中国代表团之中的这一论争，尤其激烈。以马共中委刘一帆为首的马共驻京高层干部对总书记陈平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在当时，马共中央实行了过左的政策，马共事实上在当时并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而且，如果在政策上实行调整，一改过左的行动，或许宪制斗争的途径仍然敞开，而不必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也就不至于造成后来的严重损失与不利局面，以至于战斗失败，最终必须偏安泰马边境，以躲避英军的追剿。这个论争以刘一帆被开除党籍，<sup>18</sup> 贬送广西林场放逐为止。除党内的论争以外，党外与左翼人士亦对这个课题持有不同的见解。

事实上，马共中央于1947年3月莱特出逃之后，进行了一系

---

录，另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第141-142页。

18 笔者与马共驻北京人员的历史对话。

列的检讨和反思，于5月中央改选，陈平正式担任总书记、杨果任副书记之后，马共便立即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行动，重新审视过去的各种政治和斗争纲领、政策与策略，特别对莱特所提出的各项纲领与措施，甚至包括其于抗战期间所提出的《抗日九大纲领》，以及日降时抛出的《八大主张》等，进行深刻的检讨。结论是前此的各项纲领与策略都是错误的，或是具误导性质的，全然属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党内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整顿党纪、党风，重新树立无产阶级为主导的阶级斗争路线。

就对英帝殖民政权的审视而言，在已解密的英美机密档案中，我们发现，英帝国殖民政权刻意在马来亚制造冷战的局面，伙同美帝与澳纽政府，把冷战延伸到东南亚，开辟一个新的冷战战场，<sup>19</sup>但却是以热战的形式来进行。他们根据的就是1947年9月日丹诺夫发表的两个阵营的理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西方正统的冷战思维，并以此看待一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相关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同时顺便把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牵涉其中，以利于对其独立自主诉求进行镇压。在国际政治与军事运作上，英美帝国主义连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伙同，形成为西方冷战集团，一致来对付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这样就把马来亚的民主正义、独立自主的诉求置放于冷战的格局中，把一个纯属民族主义范畴的民族民主

---

19 澳洲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A1838 TS382/8/2/1 PART 2, UK Defence Planning and Interests in SEA (South East Asia) 1946 - 1947; 102 A11536 1 Top Secret - In - CFCs (Cable File Copies) - London, 11 Aug., 1948 - 30 Dec., 1950; 103 A11536 2 Top Secret - In - CFCs - All Posts - 1951/1952 (Excluding Washington and London, Chronological within Post); 97 A6537 Seats 6 South East Asian Section, Pacific Division, Philippines, Top secret documents; 88 A5954 1492285 Defence of South East Asia - Intelligence Conferences, File No 3; Seventh Quinpartite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ingapore 6th-9th July 1954; Report by the Head of the Australian Delegation。



独立运动，描绘成为一个苏联指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利于它的镇压，以军事优势保持其殖民宗主国的地位，持续其一贯的剥削与掠夺马来亚天然资源的政策，解救其二战以来的经济困境，并维持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大国的体面。马共在 1945 年 9 月以来的政治运作，纯然是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的政治行动，走的是英帝国殖民政权所规范的合法宪制斗争的途径，提出的是鲜明的马来亚民主纲领，要求的是建立过渡性的多元民族的自治权利，当时独立的最终目标也不过是建立一个马来民主共和国，连社会主义这个字眼都不提。马共当时的方针，完全是为了照顾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以及马来亚民族多元化、阶级成分复杂的局面。由此，马共成功地组织起全民的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成就了由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及人民力量中心<sup>20</sup>共同草拟的《人民宪章》，向英帝殖民政府正式提出马来亚人民的正义要求。英帝殖民政府完全无视这个全民的诉求，一意孤行地单独与苏丹及代表封建地主集团的政党巫统（马来人团结统一机构的简称）谈判，拟就《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并违背马来亚全民意旨执行这个宪法。这也是 1948 年 3 月马共认定马来亚的宪制斗争途径已经断截，必须采取武装路线的根据。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事实上应负起后来马来亚动乱的全部责任，是因为它以冷战的思维与行动造成了马来亚的政局混乱，不顾由此所带来的长达 12 年的战争灾难与生灵涂炭。尽管第一枪可能是马共打响，可这个战争责任应该由英帝殖民政府来负。马共的第一枪，无疑是光荣的第一枪、勇敢的第一枪、正义的第一枪。

## 马共是否有武装起义的计划

面对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工人运动与统一战线的严酷镇压，马

---

20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缩写 AMCJA；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缩写 PUTRA。



共预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情势。据了解，英殖民政府迟早会采取取缔马共的行动，有可能于当年9月间封禁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和一些较活跃的工农团体。由此，以期坐以待毙，马共中央的激进派建议采取主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sup>21</sup>从1947年3月以来，一系列的检讨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始，到1948年3月，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做了好充分的动员工作，可以开展武装斗争的前期部署。同年4月间，马共中央在柔佛沙令村庄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决议正式开展武装起义，动员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退伍军人重新归队，挖取在日降期间藏起的5,000多支枪支和弹药，准备再次上山打游击。此前，原退伍军人达万人，一半作公开退伍，向英军政呈交武器，每人获得350元退伍津贴；另一半则为较精干的秘密队，仅私下解散，不向英军政知会。当马共重新号召这些人归队抗英时，全马各地报名的只有3,000人左右。

紧绷的局势促使双方都积极做好置对方于死地的准备。英方基于冷战思维，决心取缔马共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漫延与得势，马共则因宪制途径被断截而不得不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方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马共于4月开始动员，宣布成立马来人民抗英军。最积极的是柔佛州与吡叻州，当地党军人员立即挖取埋藏的武器，成立民运组织，开始募捐、筹集资金等一系列准备工作。部分人员的行动有过激之嫌，他们开始袭击英资橡胶园坵，<sup>22</sup>原为勒取银钱作为武装活动经费，但却开始射杀英籍园坵经理和被认为有“走狗”嫌疑的华籍员工。此事分别发生在柔佛州及吡叻州。吡叻州和丰地区园坵经理被杀后，

---

21 在1947年3月的马共中委会会议上，由陈平、杨果、李安东、小章（章凌云）等人把武装斗争提到议程上讨论，并通过武装起义的决定。见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83页。

22 马共候补中委张佐与笔者的历史对话，回顾当年和丰地区民运人员袭击英籍胶园经理事件。另见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88-191页。

英殖民政府立即于次日，即 1948 年 6 月 17 日颁布紧急法令，18 日延展到柔佛州，至 20 日，宣布全马进入紧急状态，立即实行军管，并在这 3 日内在全马各地进行系统性大逮捕，那些来不及转移及躲藏的，包括马共工农干部、其外围组织人员及左翼人士上千人，均遭逮捕。就英殖民政府的系统运作及其效率而言，表明其早已处心积虑地周详部署了这次行动，没有有备而来的长期计划，是难于有效地完成此行动的。从马共与左翼的被动情况来看，马共与左翼则相对麻痹大意、疏于防范。马共一直以 9 月作为英殖民政府采取行动的时间，殊不知英殖民政府竟提前 3 个月先发制人，以雷霆万钧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置无备的马共于困境之中。其时，马共中央诸要员正分散各地部署工作，马共总书记陈平本人则身在吡叻州某矿场，打算回收投资于锡矿开采的资本，在英殖政府的围捕行动中差一点就被逮个正着，所幸及时越墙而逃，随后辗转躲避，于茅草芭前有追兵、后有火患的情况下，与英军警擦身而过，幸免于难。<sup>23</sup> 事发当时，各地纯然独自行动，失却总体指挥。马共中央无法聚集开会，商讨应对之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状态下，马共开始了武装起义。如此种种，马共有无武装起义的计划，答案是肯定的，有，只是缺乏警惕性，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笔者下面简要介绍此阶段马共一些文件和文章发表的具体时间及其内容，从中审视马共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

1947 年 12 月，马共中央第九次扩大会议（九扩）第二次会议通过《马共中央对马来亚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讨论总结》。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分为 7 个小节，讨论和分析马来亚革命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第一节，马来亚的社会性质：对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与阶级、文化、教育及宗教各方面的现状进行剖析。第二节：分析马来亚的民族问题及其症结所在。第三节：阐明马来亚革命的对

---

23 陈平：《我方的历史》，第 185-187，191 页。



象。第四节：确立马来亚革命的任务。第五节：阐释马来亚革命的动力来源。第六节：明确马来亚革命的性质。文件所示，马来亚革命的对象再清楚不过，就是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马来亚当前的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这份文件没有说明革命将如何进行。它与此前马共文件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始至终不再提宪制斗争。

同时，在九扩二次全会上通过的文件还有《马来亚共产党的当前政策》。该文件也很冗长，为上述文件的政策性阐述。共分为：第一节：阐明当前马来亚革命的主客观形势，国际革命环境以及国内力量对比。第二节：明确当前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中心口号。第三节：阐释当前党的具体纲领，批判前此提出的《民主纲领》的缺点。第四节：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详细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原则、纲领、组织成分、组织形式、运动方针等运作形式与方法。第五节：关于外侨爱国运动，讨论外侨的国家认同转化与其双重性，特别针对华人华侨问题、印尼、印度侨民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爱国运动与马来亚革命的关联性问题。第六节：阐释当前的斗争策略。特别阐释如何面对英殖民政府的两面政策、策略的原则性问题、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与对待封建贵族的态度等策略问题。

1948年3月，是月是马共在二战后的第一个转折点。马共审视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进而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检讨，确定对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批判。马共中央于3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后，一改过去的姿态与声调，以显著的转向，调整党的政策与策略。3月21日，九扩四中全会通过决议：《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依据日丹诺夫两个阵营的理论分析，以及马来亚当时反殖斗争的形势，重新强调马共在针对英殖民统治进行的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批判前此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明确地承认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错误，强调人民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宣称人民武装革命及人民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文件昭示马共已经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政策与策略。



1948年4月7日,《工人报》发表社论:《坚决引导工人前进》。这是马共职工部继上述决议通过后发表的社论。《工人报》是马共工运的内部刊物。此文还在5月9日刊登于马共喉舌,公开的《民声报》<sup>24</sup>上。社论针对过去工运的策略与错误进行批判,根据1948年3月17日通过的马共的方针与指示,调整罢工的策略,目的在于掀起新的工运斗争高潮,鼓动工人情绪,以较激进的姿态从事罢工运动,并以暗杀行动对付工贼,<sup>25</sup>以暴力对付暴力。

1948年4月20日,马共机关报《民声报》发表社论:《认识形势,掌握方向》。九扩四中全会通过《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决议后,经4月马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授意,此内部决议被改写成一篇社论,以《认识形势,掌握方向》为题,用“郑杰”的化名在《民声报》上发表。其主要内容为,颁布党的新政治路线和方针。这是一篇重要的告示性社论,暗示了武装斗争的即将展开。

1948年4月底,马共中央开除了马共新加坡公开党代表张明今、中委罗须磨、阿山,以及全马妇女委员会主席蒋理等十多位党中央委员与重要干部。理由是,这些委员与干部曾经先后遭日军或英殖民政府逮捕过。这是根据莱特事件的教训,为杜绝可能潜伏在

---

24 《民声报》,马共机关报,公开发行。该报起初由外围人士任社长,于1946年6月1日由马共宣传部正式接管,具体负责人为梁明(杨金保),对外公开的社长为吉隆坡马共公开党代表刘一帆,他在1948年6月9日被捕。6月15日,警方再次突击民声报社,再逮捕20名职员。至此,《民声报》正式被封禁。

25 由于资方屡次利用私会党和一些工痞或称工贼恐吓工友和破坏罢工,马共以澳洲共产党的经验,以暴力对付暴力,从1948年3月始,便开始警告阻碍工运人士,以武力对付工贼。见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82页;另见有关记录:Memorandum on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24 November 1948, Commission-General's office to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Ref 648/71/924, PRO: FO371/69695 Annex 8。

党内的敌奸而采取的整党措施。此后，5月，马共九扩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sup>26</sup>。这是马共中央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施行整党举措而设的党内肃清运动的指示性文件。

1948年5月26日，《民声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农民斗争》。这是继对工运斗争升级的激励文告后，马共为发动农民参与斗争而推出的重要文章。

从上述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半年中所发布、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看，马共确实积极地、系统地在为准备武装起义做舆论上、思想上的动员工作。马共的这些文件明确地阐释了马来亚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在理论和思想上阐明了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马共组织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则通过党内外的报刊与面向大众的党的机关报《民声报》，发动工农大众与广大人民为参与武装斗争做准备。

## 从马共文件：

###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 了解马共起义的背景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来审视1948年3月的马共文件《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依此了解马共为何非掀起武装斗争不可。

#### 1、对英工党及其殖民地政策的批判与马共宪制斗争途径受阻截

日丹诺夫的两个阵营理论对马共的确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共因之认为，英帝与马来亚人民之间不可能存在妥协的关系，英帝势必要保有其殖民利益，享有继续掠夺马来亚天然资源的特权，为此将

---

26 根据笔者访问当事人确定被开除时间在1948年4月底，但整党的相关文件在5月才颁布。



继续剥削马来亚人民，始终与马来亚人民为敌；对于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也必然要采取严酷的武力镇压的手段，最终必然要诉诸战争。根据日丹诺夫的两个阵营的理论，《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指出，当前世界“最紧迫、最尖锐、最主要的矛盾是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就是两大阵营的矛盾”，因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退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该文件还指出，帝国主义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实行军事干预，武装进攻以图摧毁年轻的共和国或人民解放运动；推行“联邦制度”（意指马来亚联合邦宪法）或建立假“独立国”，意图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与分裂人民的团结，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实行“分而治之”政策，进一步制造民族分裂；扶植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建立傀儡政权，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

马共认为新上台的英国工党艾特利政府背叛了工人阶级，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忠实的走狗，是压迫人民的统治工具，因此它与保守党没有两样，在马来亚实行的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他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替英国金融资本家对马来亚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告诫人民，对英国国会和工党提出的所谓改良手段抱有幻想是绝对错误的。英工党政府无视马来亚人民建议的“人民宪章”而施行“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就彻底暴露了它顽固执行帝国主义压迫政策的决心。

1947年，英殖民政府抛出“马来亚联邦”宪制白皮书，作为马来亚自治的宪法，其最严重的条款是把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划出去，单独成为英国直属皇家殖民地，把新马分割开来，这遭到全马各民族的强烈反对。在马共的积极推动下，当时11个政党与华团联合组织起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而马来人也由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另译马来亚马来民族党）和上百个马来团体共同组成了人民力量



中心，草拟了《人民宪章》，向英殖民政府正式提出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意愿，强调各族平等和新马统一不容分割，强烈反对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卑劣意图。在英殖民政府全然不理睬人民的意愿，一意孤行单独与马来封建地主集团密谋策划《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的情况下，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和人民力量中心于1947年10月20日发动全马罢工、罢市。<sup>27</sup> 英殖民政府背弃与践踏其一贯主张的民主原则，强行将《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付诸实施。这即俨然断绝了马共对宪制斗争的信念和途径，马共由此明确认识到，英帝殖民政权根本无视马来亚人民的合理诉求。英殖民政府对马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镇压不断升级，甚而动用军警，荷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自1947年以来越来越频繁的罢工，不仅争取不到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反而遇到越来越多的挫折，经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种种现实状况令马共认识到，所谓的民主非暴力斗争，实际就意味着退缩与妥协，并由此清楚地估计到英殖民政权最终必然要对马共采取行动。就在此时，英殖民政府颁布了修订的社团法令，严厉限制工农组织的成员和财务构成与管理，以图阻断马共对职工会的控制，严禁马共干部担任职工会的领导。英殖民政府对工农组织的钳制，旨在消弭马共的影响，断绝其经济来源，<sup>28</sup> 意图制马共

27 全马总罢工罢市，由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及人民力量中心联合组织，马共幕后支持与推动。1947年10月20日当天，从北起檳城南至柔佛州新山，全马各地热烈响应，所有经济活动骤然停顿。总罢市获得百分之百成功。这个活动主要向英殖民政府展示人民全力支持其所草拟和提呈的《人民宪章》。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第124-125页；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75-176页。

28 1947年末起，英殖民政府与雇主加强对职工会的镇压，如利用阻止闯入的法律（私闯法），阻止工人领袖进入园坵，以及利用警察对付罢工。另外，英殖民政府与雇主亦企图以协商方式来削弱马共的影响。社团（职工会）法令于1948年5月31日修订，勒令除同行业工会外，禁止其他形式的联合会的成立，并限制惟有相关行业工人才能出任相关工会的执委。

于死地。英帝殖民政府的这一系举措，实际迫使马共最终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 2、对莱特政治路线的深刻检讨与批判

鉴于莱特卷款出逃以及上述严峻情况，马共开始全面地对二战期间与日降后的马共的一系列纲领、政策和路线进行深刻的审视、检讨和批判，认定战后的政治路线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这份文件，批判了党的所谓“后卫策略”与“忍耐策略”等策略思想，指出其最大的错误是使“党抛弃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

文件认为，这个思想在抗日期间已经存在，《抗日九大纲领》便具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其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抗日九大纲领》缺乏民族独立的经济内容，诸如没收帝国主义一切财产等；其二，仅仅从事打游击，组织群众，忽略组织抗日人民建立地方政权；其三，错误的军事方针，部队仅仅驻扎在森林中意图打不流血的仗。文件认为这是党在其时失去了阶级立场，模糊了阶级观点所致。《抗日九大纲领》以及其后的《八大主张》，“都没有充分估计战后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和脆弱性”。此前提出的“民主”与“自治”的要求，实质上是错误的认识，因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与自治，因此只有以“民族独立”的口号才能明确地领导反帝反殖的斗争。

文件认为此前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具体表现在8个方面：（1）解散部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解除了党的武装，取消军事斗争。（2）对英帝的进攻，一味退让、防守，而无反击、进攻。（3）限制斗争形式于和平集会、罢工、抗议、而不敢采取强硬手段。（4）“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甚至压制群众斗争”。（5）不敢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实行幕后指挥，把群众交由其他政党领导。（6）不参加与各政党建立的联合机构并发挥作用，却跟在小



资产阶级政党后面走，放弃党的立场与主张。(7)对统一战线的斗争，错误地只走上层路线，只照顾上层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忽略了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的统一，忽略了工农群众的斗争。(8)对反动政党如国民党的各方面的进攻，只一味退让而不反击，损害了党的威信。

另外，造成政治路线错误的次要原因在于：(1)低估了英帝的反动性，对英国工党抱有幻想。(2)高估和平合法斗争的形式和作用，把和平斗争与暴力斗争机械地分开。(3)对“群众”的看法模糊，混淆了“社会人士”与“工农大众”的区别，低估了群众的力量。(4)没有明确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其作用。

马共于日降后的1946年1月下旬，在吉隆坡召开了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各州代表原本18人参加会议，但吉兰丹暨丁加奴州代表老萧（林斯辉）受阻于洪水，不克出席。会议主席团由莱特、陈平及杨果担任。会上，莱特在其《八大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自治纲领：《马来亚共产党民主纲领》和三大任务。自治纲领第一条便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sup>29</sup>

马共中央于是便在莱特的误导下，采取宪制斗争策略，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来争取工农生活的改善与人民的政治权益。以《马来亚共产党民主纲领》和《三大任务》作为马共在和平时期的工作重点，与左翼民主人士催生建立的民主政党马来民主同盟和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另译马来亚马来民族党）一起，积极进行争取自治的斗争。<sup>30</sup>由于马共在战后于组织领导上欠缺明确的领导民主宪制斗争的意识，故一直以处于幕后的形式来运作。在面对与合作单位的

29 阿成（单洪汝）：《从“八扩”到抗英战争》，第9-14页。

30 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第105-113、123-131页；《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上），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72-73页。



矛盾时，采取的是退缩与妥协，例如，积极参与马来亚民主同盟活动的马共资深干部郭鹤龄和伍天旺，在遭遇马盟内部非共势力非议时，便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宣布退出马盟以维持统一战线的运作。这就是文件中所指责的“把领导权交给小资产阶级政党”、“不敢公开领导群众”的背景。

### 3、文件的结论与人民革命战争问题的提出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这一文件认为，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莱特走狗路线的影响，而马共中央在莱特出走之后仍然沿袭这条路线是十分错误的。这是由党中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所致。党中央应负起对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清算的职责，肃清其流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路线和方针。而新的路线和方针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力量为基础”，根据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反帝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击败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这两个基本原则是，在一切斗争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各类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参加的阶级。

文件也指出：“不应以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应只顾领导权而忽视了团结一切可能参加革命的阶级，不应该超越现阶段革命的原则，而提出过高的口号和采取过激的行动来严重地损害了其他阶级的利益，妨碍他们参加共同的反帝斗争。”。文件认为这两个倾向都是错误的，并指出：“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党要注意各政党上层间的联合，也要注意各种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下层工农群众的联合，……必须首先注意保障工农利益”，而且，“党必须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文件的结论是：“要争取民族独立，武装斗争（人民革命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将是最主要的和最高的斗争形式，当前形势已经提示了这种斗争形式的重要意义”。

##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

(1948年3月21日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扩四中全会通过)

### 一、目前的国际形势

战后的国际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由于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力量在战后国际舞台上占了优势，这就是由于法西斯国家集团的军事失败，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战争中大大的削弱了，使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结束就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质急剧地走下斜坡；这就是由于战争使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独占资本主义者力图保持他们在战时那种高度水平的利润，在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帝国主义凭着自己在战时经济上及军事的增强，企图实行霸占全世界的扩张主义的政策，而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决意追随这种政策，公开地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由此使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建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代已经结束，战后世界的政治力量已经重新划分，形成了两个显著的对立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及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

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的主要领导力量是美国，在这个阵营里包括着英法等西欧殖民帝国主义者，中东南美各国及中国等政治上经济上投靠美国的国家，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支柱是苏联。在这个阵



营里包括着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东方的解放区及新诞生的共和国，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工人阶级人民民主运动，各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两个对立的阵营，在战争的后期就酝酿着，在战争结束后就形成了，而“杜鲁门主义”及“马歇尔计划”的颁布，就更加明朗的划分了，由于美帝国主义有着极大的野心，实行其侵略全世界的政策，这种政策又因为遭受到世界人民巨大的反抗而到处碰壁，因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就带着日益增强的疯狂的侵略的乃至备战的性质，在这当中，世界人民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击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反战反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主权完整，保卫民主自由。

两个阵营政策的严重对立，造成世界强国间的妥协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而来的则是普遍地展开了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及局部军事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趋尖锐化，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历次的国际会议上，同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各国的具体事件上，表现在帝国主义实行攻击与新民主政权及各国人民实行坚决反攻的行动上。

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斗争形势，有人会问：世界规模的战争会不会爆发呢？诚然，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努力是比过去更加积极了，但世界人民阻止侵略战争的力量却也比过去更加强大了，因此，应该严格区别帝国主义企图发动战争的主观努力主观愿望和实际组织起这种战争的客观可能性，因为想不想打是一回事，能不能打却又是另一回事，这当中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但这不是说，战争就自然而然不会到来了，应该承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險也就存在一天，还可能如狗急跳墙，作孤注一掷，因此，听到战争就惊慌恐惧，从而丧失了自信心是不必要的，但对帝国主义的备战采取高枕无忧的态度，从而松懈了警惕性也是不应该的，应该知道，帝国主义的政策愈失败，它就愈想从战争中找出路，但和平民主力量



也愈强大了，这又使到战争愈不容易打起来，目前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是因为人民的力量强大所阻止，当人民力量继续强大起来的时候，将一定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

战争使美帝国主义发了大财，但却使美帝国主义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大破产了，这样，战争结束后，一个美国本身生产过剩的危机和一个美国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不足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美国经过一个短期间的繁荣，由于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及资本主义各国缺乏美元，国内市场及国外市场很快地就缩小了，这就马上影响到生产低落，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战后无法恢复生产，生产水平无法提高，输入增加无法可补，造成物价高涨，货币贬值，股票失价。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必然会到来的，而且是更加迫近了，这个危机一爆发，不可避免又要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这是必然的，同样的理由，英美存在着不可解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正在增加着，但是，由于执政的英国工党，已经决意背叛和出卖工人的利益，并决心跟着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走，它实质上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以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挽救和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替资产阶级服务，变成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变成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对内跟保守党勾结和联合起来，进行反共，实行替资产阶级制造利润的工党式的“国营”政策，对外卖力当华尔街的推销员，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唆使及领导欧洲社会党右派分裂工人团结，坚持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这就造成英国在今天世界阵营已经分明的情况下，不是站在中立的地位，而是决心跟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做美国的走卒，做美国的附庸，跟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苏联，攻击新民主国家，奴役人民，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因此，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不应该只看到英美矛盾的一面，

而忽略了英美联合的一面，不应该主流地夸大英美矛盾，而忽略英美正在联合一致来进攻人民，不应该强调利用英美矛盾，而松懈了本身的努力。

应该指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最紧迫，最尖锐，最主要的矛盾，是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就是两大阵营的矛盾，不能以美苏的矛盾代替了两大阵营的矛盾，美苏矛盾是包括这个矛盾，但也不是紧切的直接矛盾，英美也存在着矛盾，而且继续在发展中，但这种矛盾不是互相争夺独占世界霸权的矛盾，而是在美国控制下讨价还价的矛盾，因此在英美关系中，矛盾是次要的一面，而联合则是主要的一面。

今天重要的是坚决打退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

世界人民有没有力量打退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

回答是肯定的。

先看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有的是金元和原子弹，但是金元正面临着危机，原子弹早已跌价了，金元扶不起反动势力，原子弹吓不倒世界人民；英法帝国主义已经衰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各种危机正在迫其日趋于崩溃灭亡；南美西欧及中东的反动政府，日益遭受人民的反抗而陷于孤立动摇的境地，东方及西方法西斯政权，遭受人民及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的反攻，正在奄奄一息，帝国主义以统治殖民地的基础，在独立运动的压力下，已经根本动摇，而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更把它带进不可挽救的深陷中。

再看全世界人民的力量，苏联战后新五年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生产力不断提高，国际威信也无限量的提高；东南欧新民主国家实行了工业国营及分配土地的政策，肃清了阴谋份子，使自己的经济迅速复兴，使自己的政权更加巩固了；世界共产党有二千多万党员，共产党在各国的地位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普遍的提高，



世界工人阶级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几千万有组织的工人，在各国都发挥了重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某些让步。

很明显的，战后世界形势中的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疯狂猖獗，并不是表示它的强大，而是表示它的脆弱，帝国主义的狂吠叫嚣，并不是表示它的信心和希望，而是表示它的危机和恐惧。

人们往往看到帝国主义表面上的疯狂性，而忽略了它实际上的脆弱性，往往只看到它某些暂时的优势，而忽略了它根本的劣性，往往只看到它局部的攻势，而忽略了它全部的守势，这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和危险。

因此，今天劳动阶级及人民反帝斗争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应该明确的认识，在今天世界形势中，主导的力量，不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优势不是在帝国主义那边，而是在社会主义那边，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正在危机逼迫下日趋衰落灭亡，社会主义及世界民主力量正在举世无敌与勇往直前。

为着击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迫害，以苏联为主导，全世界人民实行了进攻，实行了反击，在国际上，苏联坚决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及其侵吞欧洲经济，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东南欧，新民主国家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无情地扑灭了一切的阴谋，希腊人民建立起临时的民主政府，以军事力量击退了保皇党政权，在西欧，法意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揭露了马歇尔计划的阴谋及严重的打击了反动的政府，在远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大反攻，打败了蒋介石政权及美帝国主义的援华计划。

这个攻势表示了民主力量的强大，全世界人民为此而高歌鼓



舞，帝国主义为此而惊惶失措，今天人民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右派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着击退这些敌人，以苏联为领导者，以工人阶级力量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反帝国主义民主统一战线，有着决定的意义，在各国，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阵线，是击败帝国主义者的决定因素。

对待帝国主义，今天人民所采取的方法，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两年多来的事实，说明了帝国主义正加紧迫害人民，现在人民是不能再让步，而期待帝国主义以自动退让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因此，互相妥协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来的是实行坚决的反击；在历次的国际会议上，帝国主义始终咬紧狂妄的主张不放，强国之间上层协商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少了，因此，要争取形势的好转，主要的已不是靠上层的协商，而是靠下层的斗争，在过去帝国主义者曾亲手签过和平合作的协约，也曾经宣布过不少的美丽诺言，但它却毫无信义地把它破坏，现在这些协约和诺言已经毫无价值了。因此，不再信赖帝国主义的言词，不应该再希望用谈判抗议的方法来叫帝国主义止步回头，而必须用人民的行动来强迫帝国主义不敢毫无忌惮地为非作恶。

由于殖民地人民是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直接对象，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已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不可缺少的和重要的组成部份，战后帝国主义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实行军事干涉，发动武装进攻，企图借此来摧残年轻的共和国；第二，是建立不独立的“独立国”或实行“联邦制度”，企图借此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及分裂人民的团结；第三，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占领军事和经济基地，企图利用局部来控制全部并制造民族分裂；第四，是扶植起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建立其傀儡政府，来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并互相联合起来进攻人民。

在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致的，甚至实行联合进攻，这是因为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被战争打得焦头烂额，没有力量来独自恢复殖民地的统治，而不得不投靠美国帝国主义，要求美帝国主义的帮助，而美帝国主义也就插脚而入。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说明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基础愈来愈巩固，而是证明在殖民地人民强有力反抗下，帝国主义的基础是愈动摇了。

面对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及本身内部的某些少数上层份子的动摇和叛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遭遇着新的困难，但是战争使殖民地情形起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普遍地觉悟起来，坚决的走向斗争的道路，民族解放的浪潮是在不断的高涨，殖民地人民普遍、不断、坚决的向帝国主义实行还击。

在这新形势下，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不能不采取新方式，这就是建立以下层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抛弃及打击那些少数动摇叛变的上层份子，坚决广泛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来击退帝国主义的政策，争取民族的彻底独立解放，而在多数情况下，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武装斗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帝国主义国内到殖民地，在广大人民斗争中，因为共产党最能代表群众利益，坚决站在斗争前线，获得群众的拥护，因为社会民主党（右派）已经做了工人阶级的叛徒，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已经丧失无余，因为帝国主义到处实行公开的反共政策，所以世界共产党在这时候负起了历史上最光荣的任务，在斗争中起着头等重大的作用。

很显然的，今天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党——共产党才能坚决地来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也肯定能够负起这一种任务，把斗争引上彻底的胜利，而世界人民也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会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共同来争取人民的最后胜利，如果共



产党坚持自己的立场，懂得坚决团结及动员群众，为保卫群众的利益，保卫和平民主、独立与主权而开展斗争，那么，帝国主义任何的阴谋和计划，都要粉碎而不可能实现。

## 二、目前的马来亚形势

工党执政至今将近三年了，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工党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及美帝国主义奴役欧洲人民的工具，变成了反苏反共反人民，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能手，实质上已经跟保守党一样地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工党政府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政府。

战后工党政府实行的殖民地政策，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对殖民地人民实行疯狂的镇压和阴险的分化，企图用这种政策来维持其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统治，虽然它也曾实行某些退让，但这决不是它心甘情愿，而是因为人民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如此，但它却又用别的方法掀起民族冲突来陷害人民。

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所实行的政策，是在政治上用各种方法来坚持和加强其帝国主义统治，以便实行经济上无止境的剥削掠夺原料来换取美元，把马来亚作为美元制造厂，这是十足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实行所谓政治上改良，经济掠夺的“两面政策”。

在这种政策底下，英美在马来亚虽然存在着矛盾，但这仅仅是经济上的，还不可能发展成政治上及军事上的严重冲突，而且由于英帝国主义已经决意投靠美国帝国主义及英美对殖民地政策的一致，这就决定了在目前情况下英美在马来亚的矛盾不会超过它们间的联合，夸大英美在马来亚的矛盾，从而强调利用这种矛盾是不应该的。

由于工党政府在马来亚实行着帝国主义政策，这跟保守党的政



策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便利英国金融资本家在马来亚实行其贪婪无餍的剥削，虽然工党与保守党在马来亚也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基本政策上的不同或对立，而只是执行政策的手段在程度上有某些不同罢了，从而强调利用这个矛盾也是不应该的。

战后英帝在马来亚虽然也实行某些改良，但这决不是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招牌，决不是它的恩赐，而是由于人民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应该认识，英帝所实行的某些改良，并不是它的基本政策，而是它为了压榨人民而实行的一种手段，是在人民力量压迫下不得不实行的某些让步，而且它还企图以退为进，把这种改良作为进攻的步骤和准备，实行迂回的攻势，正如在经济上英帝也进行调整工资，而实际上工资仍旧无法提高一样，在政治上，英帝是逐渐收回改良，实行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

因此，对英国国会，工党政府及其改良手段，寄以任何的希望是错误的，这是对英帝殖民地政策的反动性估计不足的表现。

英帝不会被群众表面的抗议所吓退，它将会愈来愈反动，愈疯狂，但是这样下去，也必然更加暴露其真面目，更加减少人民对它的幻想，这就使它必然愈失去人民的支持，愈来愈孤立。

“联合邦政制”的实施，彻底地暴露了工党政府违反了人民的要求，说明英帝决心顽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在这当中，虽然它的计划实现了，但是决不是表示它的真正胜利，而是表示它的孤立和没落，因为它进一步打消了人民的幻想，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便利人民民主运动的展开。

因此，强调英帝的强大，认为英帝的统治基础是更加巩固了是错误的，这是对英帝本身的脆弱性估计不足的表现。

英帝为了掠夺马来亚的资源，对内无情的打击和侵略民族经济，加紧剥削各民族人民，对外则一致依赖美帝国主义，受美帝国

主义的控制，这就决定了马来亚的经济不但不会繁荣，而且将必然更加恶化，人民生活将必然陷于更加贫穷饥饿的境地。

由于英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的殖民地政策，损害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而且这种政策将厉加实行下去，因而造成英帝与各民族人民的矛盾，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加深，形成更加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我们不应该有意无意地掩盖或过低估计这个斗争，而是要坚决地面对这个斗争，迎接这个斗争。

英帝与人民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上由于英帝的加紧剥削，造成人民生活日趋痛苦，必然要实行反抗，这是最迫切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由于英帝逐渐剥夺人民所仅有的一点民主自由，造成人民普遍的不满，必然要为争取起码做人的权利而斗争。

这两方面矛盾都继续发展，而且是愈来愈尖锐化。

在这斗争形势中，英美力量与人民力量的消长起了变化，这就是英美愈来愈不得不只依靠政权工具来维持其统治，而它的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了，但人民大众对英帝的幻想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已经普遍不满甚至仇视英帝，人民的觉悟程度及斗争情绪更加提高了，人民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增长。

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今天的斗争要求，虽然普遍地与主要地是改善生活，但也并不是完全停留在福利事业的，纯粹为了改善生活的阶段，由于经济情况的日趋恶化，人民生活的日趋痛苦，英美实行疯狂的政策，使群众与过去不同了，他们普遍地要求斗争，不怕英美进攻，群众也知道开会谈判也是没有用的，必须进行联合的斗争，必须实行坚决的行动，并能够在斗争中坚持下去。

因此，认为群众落后是不对的，这是由于误解群众是“广大人群”或“社会人士”而不着重提到工农大众，由于误解群众“进

步”是要了解宪法，了解立法会议之类的政治学，而不是决定于斗争的程度，及由于不了解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由于马来亚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带着浓厚的附庸性，因而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这就是决定了资产阶级在今天参加反帝斗争的可能性不会很大，而群众的斗争力量自然也是以下层工农为基础。

党在马来亚革命中，有着长久的历史，群众知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有着可靠的威信，党能够坚持在斗争中的最前线，而小资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无法领导群众斗争，对英帝没有很大的威胁，因此，英帝便集中力量来打击党及职工会，但也因为同样的缘故，党今天负起了历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今天群众的斗争必须要靠党的领导，而党也一定要坚决地领导群众前进。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群众大斗争的新局面，这就要求党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坚决大胆地领导群众前进，争取斗争的胜利。

### 三、党的政治路线

#### (1) 战后党路线的检讨

战后党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这也是一种失去阶级立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路线就是所谓“后卫策略”和“忍耐策略”。

这条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表现在放弃民族独立的纲领，对英帝实行无原则的退让，对反动政党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无原则的附和，对群众则不敢坚持领导及放手发动群众



展开斗争。

在这当中，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大的错误，是党放弃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纲领）要求低，落在客观形势及群众要求的后面。

和平以后党不提出“独立”而提出“自治”，主要的根据是人民存在幻想，只是进行经济斗争，不要求民族独立，但是事实上对英帝存在幻想的只是商人，下层劳苦大众并不会对英帝存在幻想，他们只是带着侥幸心理，希望队能与英帝合作来维持和平及解决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把希望寄托在党和队的身上，而且从废除日本军用票及按照日本米牌配给米那时起，群众就认识了英帝的真面目，但党看不出这点，群众虽然不懂得“自治”与“独立”的区别，但知道英帝不好，群众的经济要求，不能靠自治来解决，只有独立才能解决群众的要求，同时党也夸大了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过分强调党力量 and 人民武装力量的薄弱，强调了帝国主义力量的强大和联合国的作用。

战后党所提出的“八大主张”及“九大纲领”都没有充份估计战后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及脆弱性，不懂得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是没有“初步民主”，也不可能实现“民族自治”的，这种帝国主义的“民主”和“自治”，实质上就是“奴隶”和“殖民地”；不懂得帝国主义是能够被击败的，只有明朗的“民族独立”的口号才能明确的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群众的要求和斗争决心，不懂得群众对英帝的幻想仅仅是暂时的并且很快就消除了，群众不能满足于含糊不清的所谓“自治”，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决马来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有力地加强群众的信心及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必须认识，民族独立只是党的最低纲领，不提出“独立”就会模糊了党及群众的斗争方向，就无法领导斗争。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还有下列的事实表现（这些都是跟着放弃民族独立的纲领而产生的）：

（一）部队解散及取消军事斗争，解除了党的武装。

我们的部队不是平凡的军队，而是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由它的领导及成份所决定），队的解散，就是等于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放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向帝国主义投降，党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放下自己的武装，就是客观上加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时，队的解散，就影响到各种工作，降低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增加了斗争的困难。

（二）对英帝的进攻，党只是退让，没有反击，只有防守，没有进攻。

事实证明，对英帝是不能用退让来争取它回心转意，实行较好的政策的，是不能用守卫来争取它止步不动，而求得“环境好转”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政策，助长了英帝压榨人民的凶焰，使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步，和失去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

（三）斗争的形式，只限于合法的和平的集会，罢工，抗议，不敢采取强硬手段。

英帝国主义统治马来亚的政策是极端反动的，它决不会在群众合法的，和平的斗争面前退让，两年多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斗争形式是不能收到效果的，是不能击退帝国主义攻势的，同时，也不能使群众所接受，群众已经觉得这种形式是不完全适当的，群众要求对英帝采取强硬手段，而且也只有这种强硬手段，才能打退它的反动政策，单纯合法斗争，便利了英帝加强它的统治，妨碍了群众前进，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甚至压制群众斗争。

当工人因为生活的痛苦而欲展开斗争的时候，党不注意引导群众斗争，当斗争爆发后，党有时不敢大胆动员群众坚持斗争，勇敢地打击帝国主义，有时甚至因为怕群众过“左”，而设法阻止群众的某些非法斗争，或提早结束斗争，这就引起群众不满，使党脱离了群众，降低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便利了英帝的进攻。

(五) 党实行幕后指挥，不敢公开领导群众斗争，甚至要把群众交给别的政党领导。

除了党办事处之外，群众看不到党，英帝故意说职工会是党领导，党却一直否认，刚好上了英帝的当，在群众团体及群众斗争中，群众只看出他们选出的代表，但却看不到党，这就使到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起来，减少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妨碍了党的威信和作用提高，把某些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让给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就是放弃了党的领导资格，使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

(六) 建立了各政党的联合机构，党不参加及起作用，反而一味跟着小资产阶级政党走。

党过去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只注意各政党上层间的联络和合作，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为了害怕斗争会破坏“统一战线”而放弃了党的立场和主张，只是一味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了争取上层的联合，有意无意的放弃了上层群众的斗争，党害怕其他政党的不满而不参加各政党的联合机构，让其他政党在政治上及公开活动上多多发言，自己却没有主张，没有公开领导，跟随着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斗法，使党模糊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及相对地损害了党的威信。

(七) 对统一战线的斗争，只走上层路线，放弃了领导权。

党过去简单地和错误地把各政党上层的联合认为是“统一战线”的全部或主要部份，认为联合机构的建立就是统一战线，由此



产生了在工作上只照顾上层间的妥协和合作，而忽略了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的统一，只靠谈判来争取表面上的合作，而忽略了在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斗争的行动上使大家自然联合，只为了所谓“统一战线”（上层的合作）而忽视了工农的斗争，甚至压制工人斗争来争取资产阶级，同时，在下层群众的斗争及各政党上层的活动中，党没有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自动放弃或丧失了领导权，对其他政党，不进行批评，不纠正错误，不进行斗争，不发展党扩大党的影响，不实施领导，不把握下层，不打击它在群众中散播的坏影响，实行“鸵鸟政策”，被统一战线弄糊涂了。

（八）对反动政党的进攻，实行退让，不给予攻击。

过去反动的国民党，曾经不断向党进攻（舆论上的攻击，行动上的杀害，组织上的蚕食等），党只是退让，不给予必要的还击，党企图用这种和平手段来换取平静的环境，但是，这却助长了它的猖獗，便利了它的发展，妨碍了党的活动，损害了党的威信。

这些事实，证明党过去的政治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条错误路线，并不是战后才产生的，而是日寇时代继续下来的，在日寇时代，党的路线也是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其主要错误表现有下列三点：

1. 抗日九大纲领，缺乏民族独立的经济内容（如不规定没收帝国主义一切财产），不是彻底的新民主革命的纲领，不是完全独立的纲领，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切身要求，不能引导群众前进；

2. 只是打游击，组织抗日群众，不建立地方性的政权，企图当时机成熟时，喊一声“一二三”就建立共和国，这就没有使群众过民主生活，认识人民政权，建立作为过渡阶段的革命根据地；

3. 建军方针错误，队驻扎在山芭里，害怕环境变坏，企图打不流血的仗，以单纯防御来保存实力，造成部队脱离群众，不能锻炼

和团结群众，不能加强队的战斗力，这些都是保守的，退却的，右倾的做法，不是革命的，前进的，战斗的做法。

造成党过去这条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主要的是：党失去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模糊了自己的阶级观点。其次是：

1. 对英帝的反动性估计不足，对英帝存在着幻想，对工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估计不足，以为工党总会比保守党好，希望工党能够实行某些民主自由，也害怕英帝的打击，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

2. 过高估计了和平合法斗争及利用改良的作用，以为可以谈判，用妥协，用退让的方法来争取环境好转，误解了所谓“环境好转”就是平平静静，错误地在今天的形势下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和平斗争与暴力斗争机械分开；

3. 对群众的看法非常模糊，以为群众是所谓“社会人士”（商人及市民），而不着重指出工农大众，对群众进步的看法也非常模糊，以为是要懂得许多政治问题才算“进步”而不强调阶级觉悟及斗争决心，从而就过低估计了群众的力量，以为群众无法从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害怕群众的广泛斗争；

4. 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党的领导作用，错误地认为是在政治上会发言，会多多做“社会活动”，而不着重指出切实领导群众斗争，从而就过低估计了党的领导作用，丧失了自信心，产生自卑思想。

这条错误的路线，指导着党的一切活动，削弱了党的战斗意志，松懈了党的纪律，损害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使干部丧失信心甚至脱离革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妨碍了群众觉悟的提高和决心的加强，损失了某些革命的地盘，助长了英帝统治政策的反动性和疯狂性，便利了反动政党的猖獗活动及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威信的提高，这就可看出这条路线错

误的严重性。

这条路线是莱特制定和遗留下来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党的走狗路线，但中央不能及时的加以清算，反而继承了它，一直到最近才弄清楚，因此，中央也要负责。

今天的事情，是要全党高高举起自我批评的旗帜，站稳阶级立场，全党集中火力，为肃清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因为这是当前决定的一个环节。

## (2) 党的政治路线

肃清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之后，党要确定怎样的政治路线呢？

根据当前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概括地说，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力量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可能参加革命的阶级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动员群众，为击败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保卫群众切身利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现阶段马来亚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这就是决定了革命的动力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但这个革命运动，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实行疯狂进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

因此，党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着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在一切斗争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二是在各种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参加的阶级。

在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时刻都要坚持自己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各政党的上层联合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在下层广大群众的斗争中及组织中的



实际领导作用，而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是决定于对下层群众的领导，因为上层的斗争是下层斗争的反映，没有对下层群众的实际领导，所谓在上层联合中的政治领导是空洞无力的。

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理解为党的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却是常常以无产阶级的代表——党的领导形式表现出来，而党实施自己的领导，首先是依靠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其次是依靠党员团结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无产阶级是依靠自己的政策和力量，在斗争中自然地取得领导权，去使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自然地跟上来，并不是在各党派上层间讨价还价，取得他们表面上的附和。

不应以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应只顾领导权而忽视了团结一切可能参加革命的阶级，不应该超越现阶段革命的原则，而提出过高的口号和采取过激的行动来严重地损害了其他阶级的利益，妨碍他们参加共同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同时坚持建立广泛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没有这条统一战线革命是不能够得到胜利的，而这条统一战线决不是形式的上层联合，也不是用妥协方法来取得大家的欢心，而是在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斗争的行动中，促使阶级群众自然地联合起来。

两个倾向都是错误的，但今天的主要危险，不是“左”的倾向而是右的倾向，因此，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展开反对两个倾向的斗争，而首先最迫切和最重要的是展开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党要注意各政党上层间的联合，也要注意各种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下层工农群众的联合，但是主要的不是靠上层间的妥协，而是靠下层群众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一致行动，首先必须发动工农群众起来进行联合斗争，以下层

群众联合的力量为基础来影响和推动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首先注意保障工农利益，在这个原则下来照顾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实行无原则的“劳资合作”，并不是用“调解”“合作”来争取他们，而是首先保障工农利益，用斗争来实现工农的要求，用斗争（与英帝斗争及与资产阶级斗争）用力量来强迫他们自然地来与工农合作共同反帝。同时应该严格区别照顾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和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党尊重前者而严防后者，对于小资产阶级则是以工农的斗争来争取他们自然参加反帝斗争。

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党必须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大胆地公开的领导群众进行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政治斗争，领导群众（外侨）展开爱国运动，而这里所说的“群众”主要的不是所谓“社会人士”，而是工农劳苦大众。

不应该对工党政府存在任何幻想或寄以任何希望，不应该强调利用英帝的局部改良，不应该过高估计和平合法斗争的意义，相反地，要打消这种幻想，要消除这种观念，要纠正这种看法。

对英帝的斗争，不应该一味退让，不应该单纯防御，必须采取坚决的和积极的，顽强的态度，必须实行抵抗，实行反攻，不断地打击它的政策，必须同时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和暴力的手段，来击退英帝的政策，不应该等待英帝回心转意，不应该吝嗇英帝的恩赐和改良，而必须用群众力量强迫英帝退让把英帝的政策打回去，叫他不敢毫无忌惮地胡作乱为，必须在这个斗争中同时消除群众所残存的对英帝的幻想，消除党及群众的某些合法观念，加强群众的斗争决心和信心。

领导群众展开斗争，在通常的情况下，应该从经济斗争着手，在这当中带着某些政治意义和政治内容，并继续发展到政治斗争，因为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在各种斗争中，时刻都不要

忘记要保卫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根据群众的切身要求来展开斗争，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适当的斗争机会来引导群众前进。

但是，在英帝的统治下，任何的经济利益都是没有保障的，也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因此，党的斗争的基本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具体内容，由纲领规定），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马来亚的经济问题，只有独立，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保障群众的利益，只有独立的口号，才能明朗斗争目标，才能有力的发动群众及领导群众前进。

要争取民族独立，武装斗争（人民革命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将是最主要的和最高的斗争形式，当前形势已经提示了这种斗争形式的重要意义。

### （3）党的紧迫任务

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那么党当前的紧迫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放手发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坚决领导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展开斗争，并在斗争中锻炼群众，打消群众的合法观念，继续展开不妥协的反帝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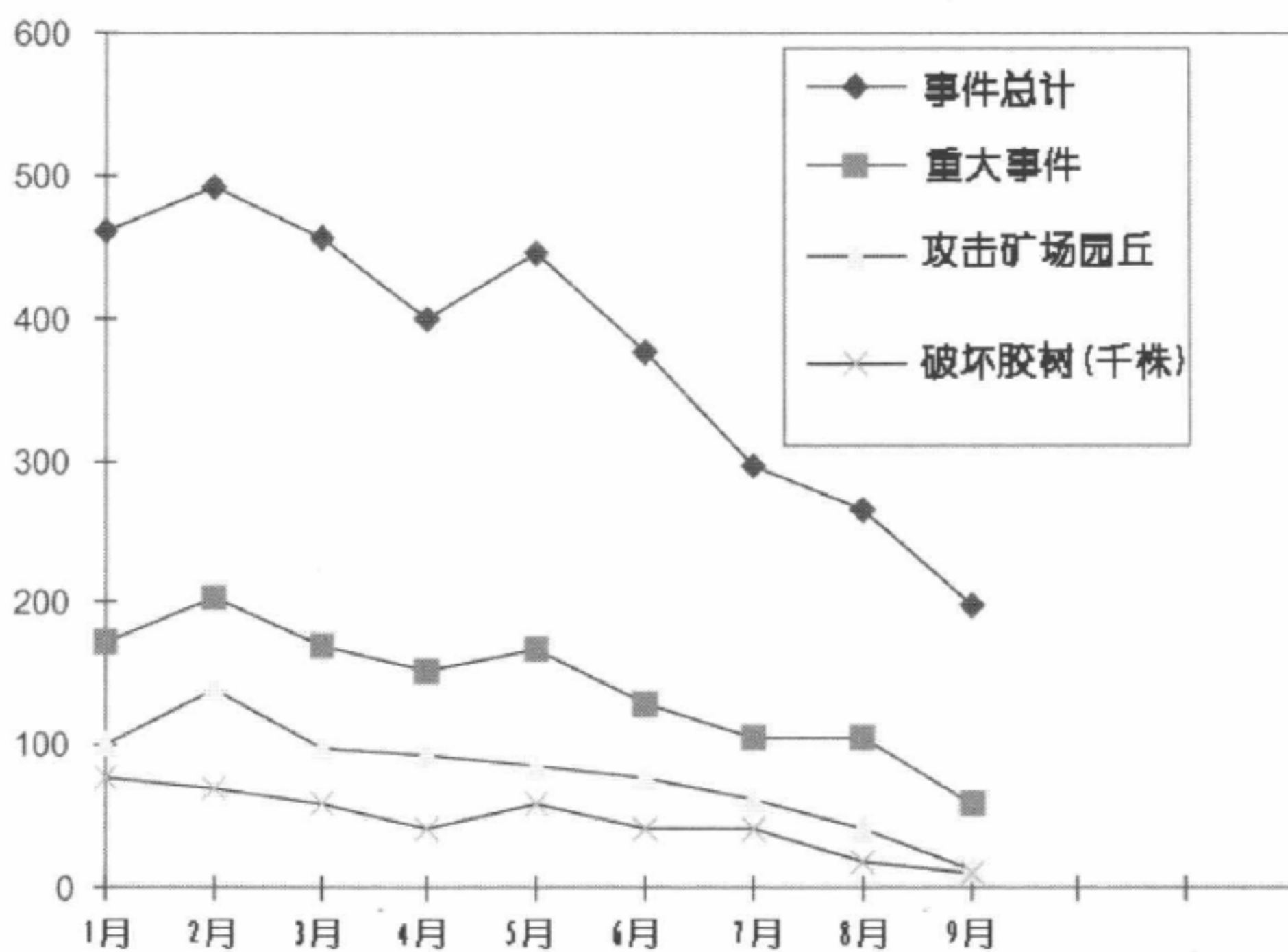
第二、清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肃清右倾思想及莱特思想，确定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健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作风，健全制度，促成党在政治上的一致，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作用。



# 附录

## 附加图表与统计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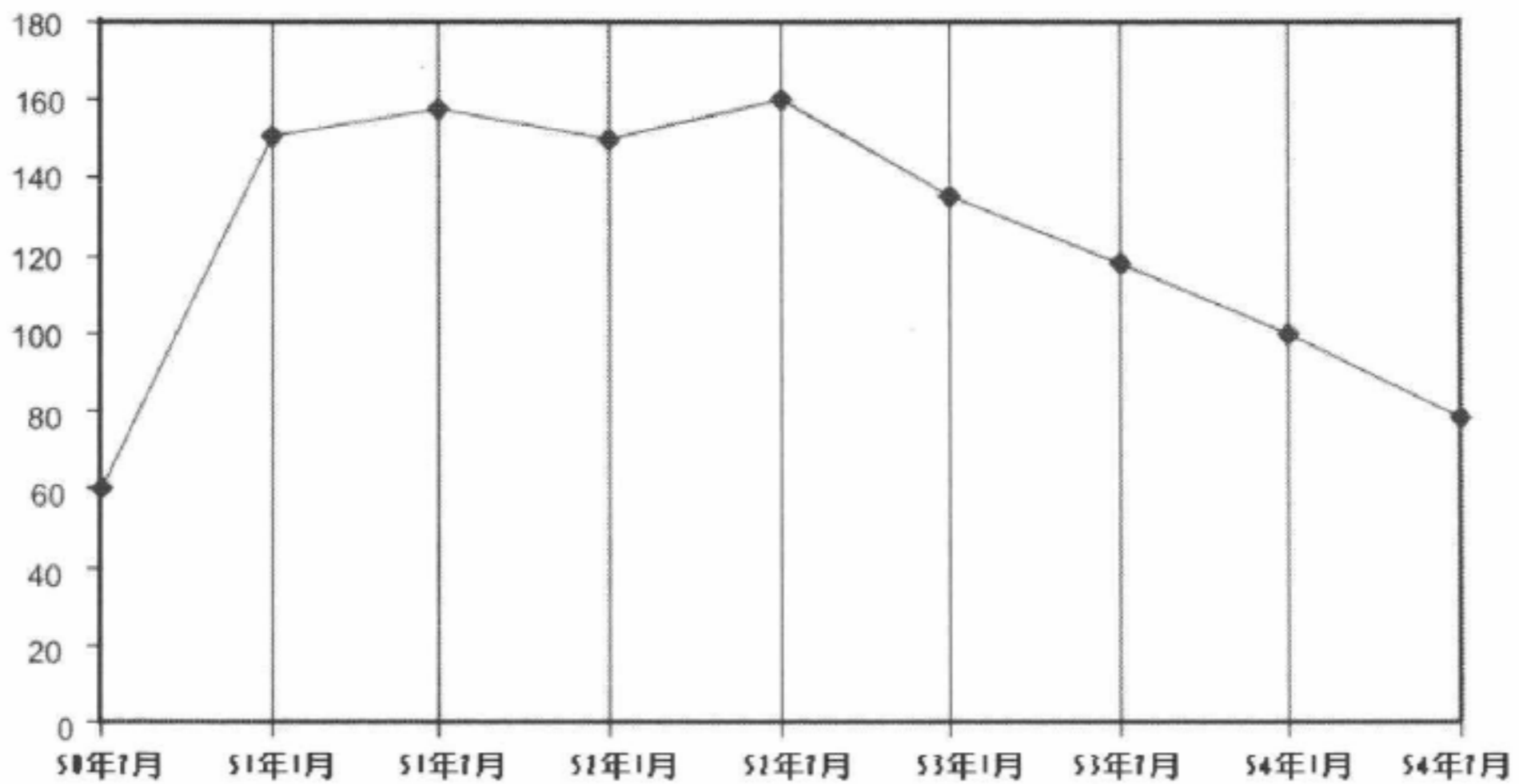
图表 4：1952 年每月紧急状态事件统计



资料来源：牛津罗得斯馆洋格文献，综合（马来亚）情报员 1952 年 10 月份报告，大英帝国马来亚情报局文献：s486/2/3: 附录 A 至 G

图表 5: 1950-4 年间紧急状态时交火次数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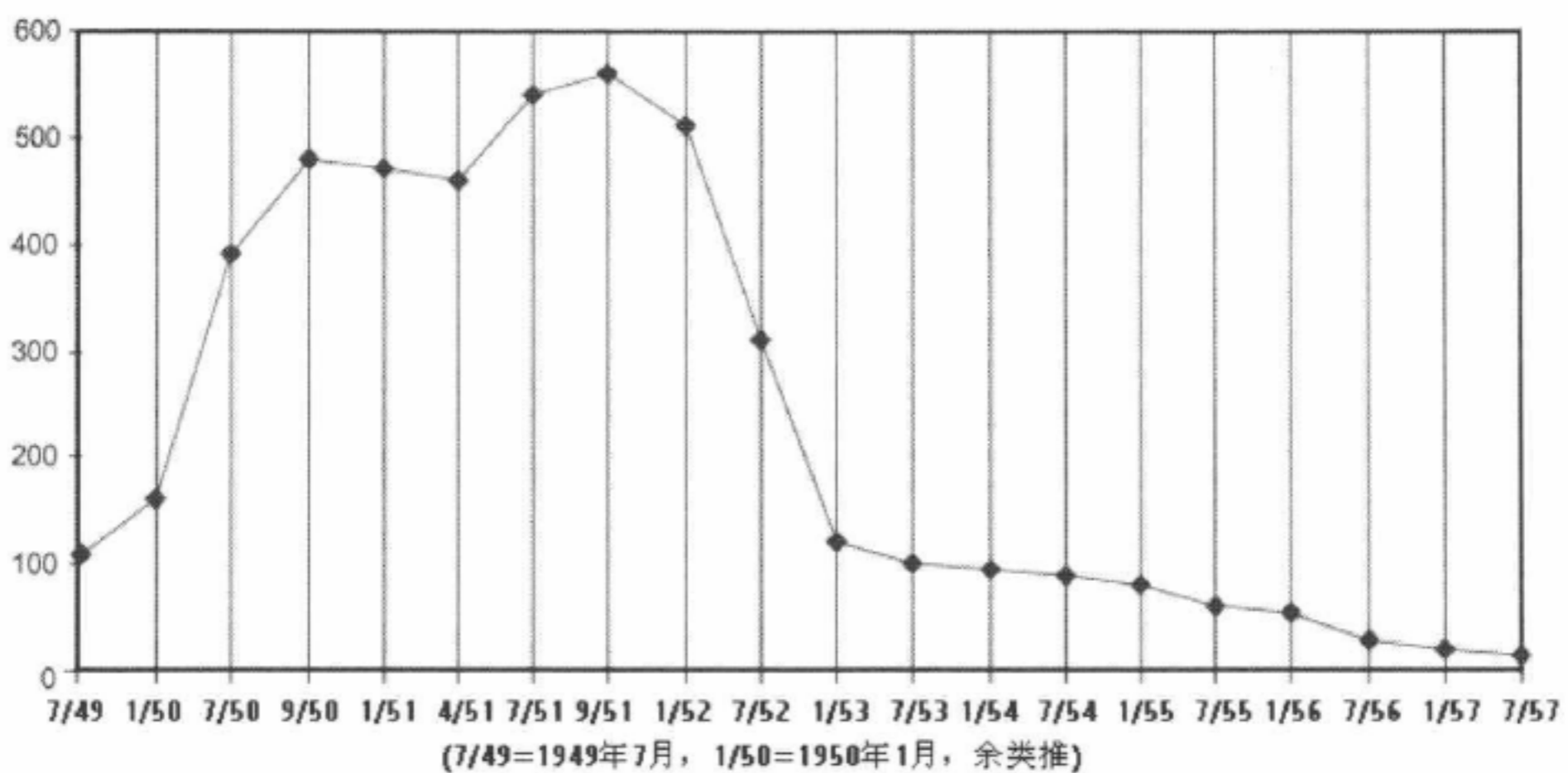
每月交火率以六个月的平均计算, 订位于中间点



资料来源: 作战司令报告, 大英档案局: Air20/10377, 1957, 附录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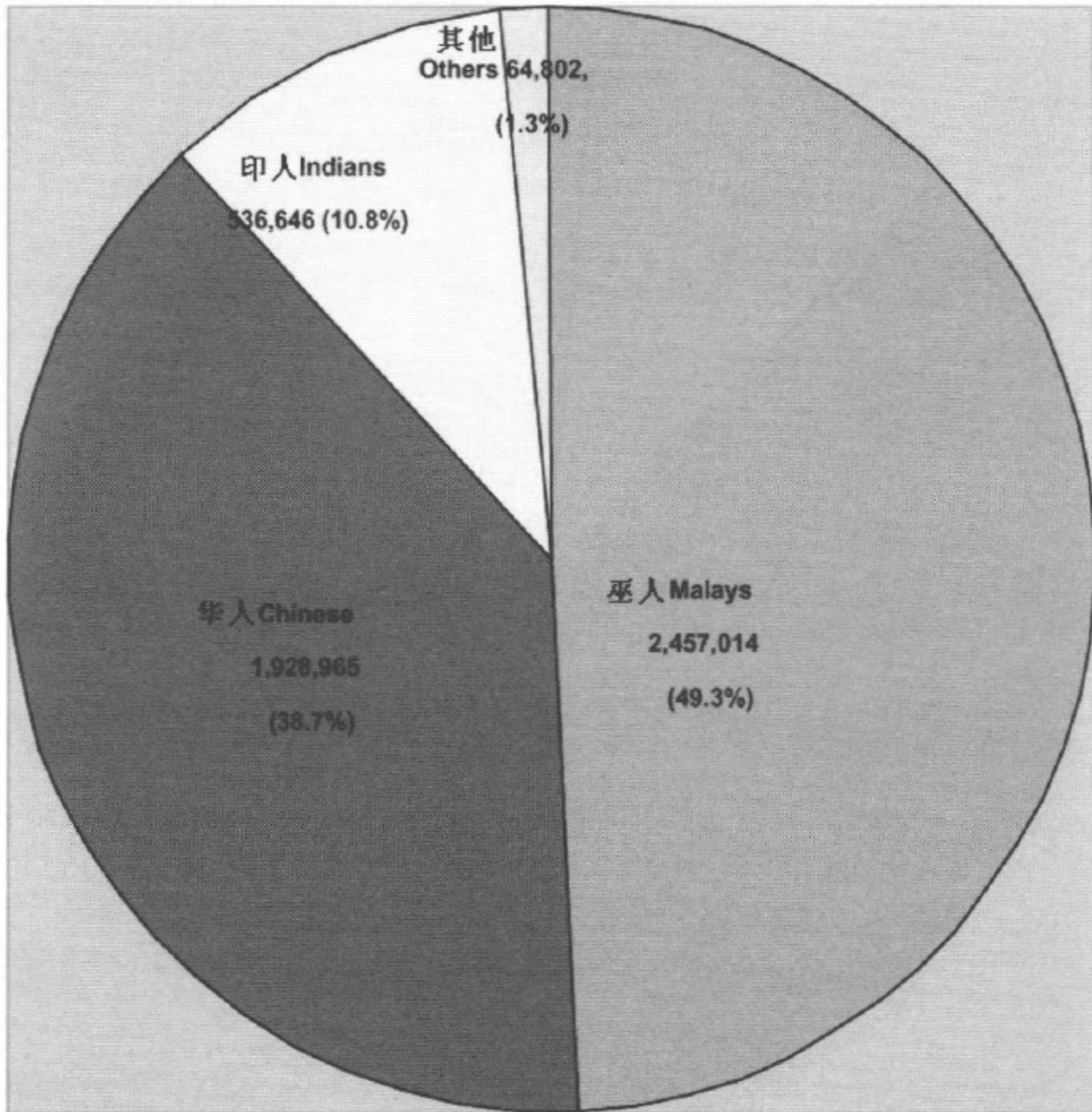
图表 6: 1949-57 年间紧急状态事故统计表

每月率以六个月的平均计算, 订位于中间点



资料来源: 作战司令报告, 大英档案局: Air20/10377, 1957, 附录 A

图表 7: 1948 年马来亚联合邦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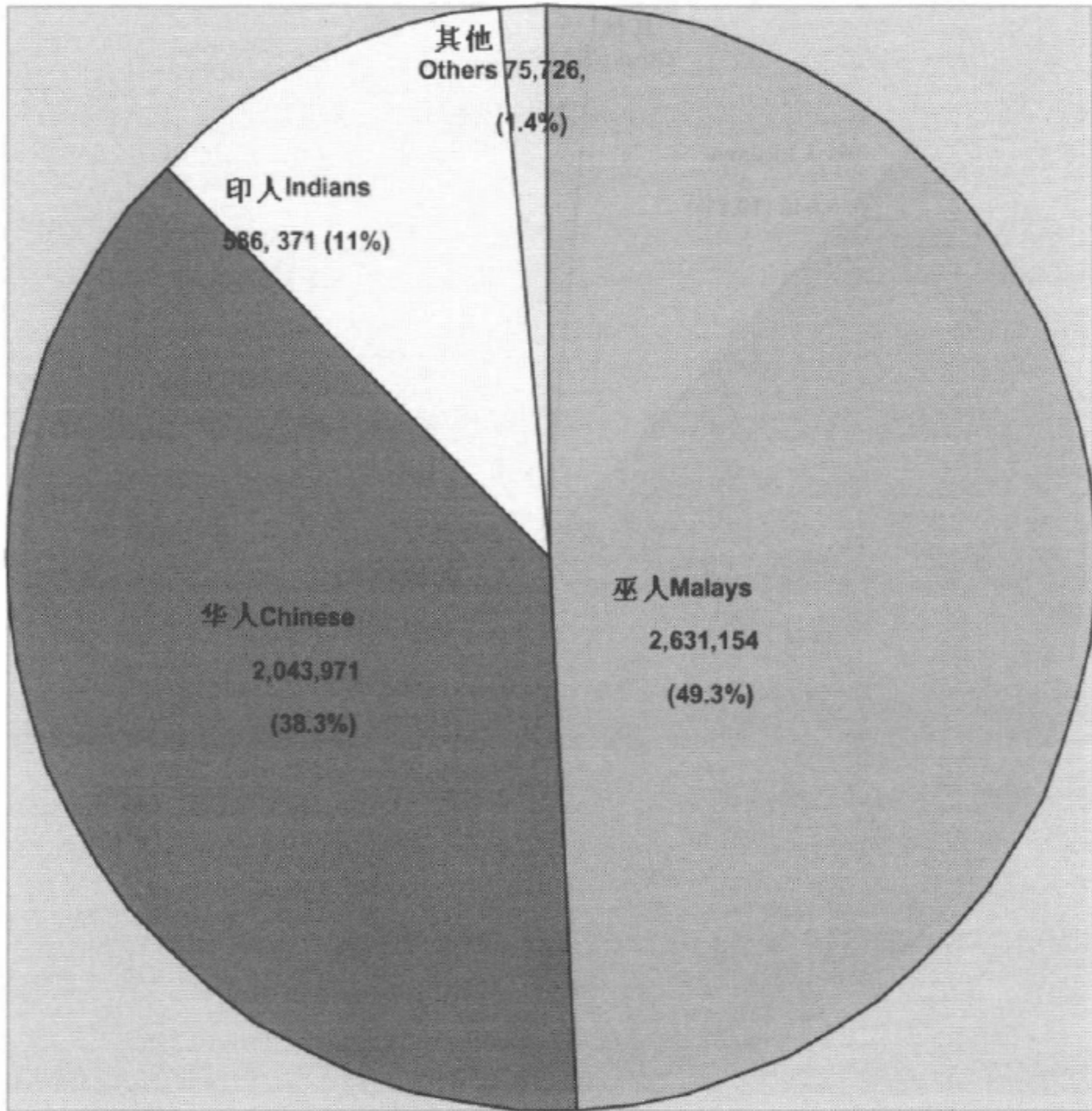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来亚联合邦 1951 年年报》(吉隆坡:政府出版局, 1952 年)

注:巫人包括在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出世,移居来马来亚的讲马来语穆斯林。由于四舍五入关系,总百分比加起来略超过 100%。



图表 7: 1951 年马来亚联合邦人口



资料来源:《马来亚联合邦 1951 年年报》(吉隆坡:政府出版局, 1952 年)

# 参加工作营名单

## 出现在陈平对话会的人士

- 明石阳至 (Akashi, Yoji)  
谢文庆 (Cheah Boon Kheng)  
约翰·顾德斯中将 (Lt. Gen. John Coates)  
陈·安德如 (Andrew Chin)  
陈松沾 (陈剑 C. C. Chin)  
利昂·康伯尔 (Leon Comber)  
卡尔·哈克 (Karl Hack)  
彼德·爱德华兹 (Peter Edwards)  
迈可·郭德利 (Michael Godley)  
原不二夫 (Hara Fujio)  
佐摩 (K. S. Jomo)  
本尼迪德·特拉·克基列德 (Benedict Tra Kerkvleit)  
约翰·李尔利 (John Leary)  
加米尔·麦克基 (Jamie Mackie)  
大卫·马尔 (David Marr)  
王·迈克 (Michael Ong)  
安东尼·保罗 (Anthony Paul)  
安东尼·李德 (Anthony Reid)  
李察·史塔布斯 (Richard Stubbs)  
默尔列·力克勒夫斯 (Merle Ricklefs)  
王赓武 (Wang Gungwu)  
杨进发 (Yong Chin Fatt)

## 学者简介

### 明石阳至 (Akashi, Yoji)

明石阳至为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国际关系荣誉教授，专于东南亚研究。之前，他任职于名古屋爱智淑德大学。他参照日本文和中文的资料文献，写过多篇马来亚日据时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文章，其中包括：*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莱特：1939-1947年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刊登于《南洋学报》第49期（1994年），第57-103页。

### 谢文庆 (Cheah Boon Kheng)

谢文庆为槟城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客卿研究员，之前为理大历史系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4-48*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79) 《蒙面同志：1944-48年马来亚共产党统战研究》（1979年出版）；*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红星照耀马来亚：1941-1946日据时期及战后的抗战与社会冲突》（1983年，新加坡大学出版社出版）；*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马来西亚：一个民族国家之建立》（2002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



**陈剑 (C. C. Chin)**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生于新加坡。他毕业于南洋大学（1965-6年），是一名独立研究员，为澳洲国立大学中国南方华裔研究中心客座学者，兼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现隶属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他从事东南亚华人研究及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曾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理事（1990-2000年），亚洲研究学会顾问，南洋学会理事兼《南洋学报》主编。他写过多篇关于日据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文章，包括：《日治时期马来亚华人的处境》，《南洋学报》第52期（1998年8月），第166-88页；《新马共产主义运动简述》，《人文杂志》第3期，第15-22页；《寻找革命之路——陈平简传》，收录在《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何启良编，2001年12月，第55-92页。

**约翰·顾德斯中将 (Lt. Gen. John Coates)**

约翰·顾德斯中将在澳洲军队服务40年，1992年退休时为参谋长。他曾驻越南，也跟英国和美国军队进行过交换服务。他在紧急状态时期曾服役于澳洲驻马剿共部队，退役后，多次到马来亚作调查研究，并写了三本书，其中包括：*Suppressing Insurgency: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54*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镇压暴乱：1948-54年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分析》，1992年出版。

**利昂·康伯尔 (Leon Comber)**

利昂·康伯尔为澳洲墨尔本莫纳斯大学莫纳斯亚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紧急状态时期，他是会讲华人语言的政治部官员。过后，他出任伦敦海涅曼出版社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区董事经理，再过后出任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东主和董事。移居澳洲之后，他（跟琼·格

兰德)任《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的编辑经理。他写了好些关于亚洲的书和文章,包括两篇分别关于新马警察情报和共产党通讯的文章,分别是: "The Weather ...has been horrible": Malayan Chines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Emergency", *Asian Studies Review* 19, 2 (1995); 《“天气...一直都糟透”: 紧急状态时期马来亚华人之通讯》登在《亚洲研究评论》19, 2 (1995年); "The 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1945-1948)",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9, 3 (2003), pp. 128-53; 《马来亚情报局(1945-1948年)》, 登在《情报与国家安全》, 18, 3 (2003年), 第128-53页。

#### 彼得·爱德华兹 (Peter Edwards)

彼得·爱德华兹是历史顾问,专澳洲防务和外交政策,为澳洲墨尔本狄亚京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是设在坎贝拉澳洲国防学院的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 *Crises and Commitments: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Australia's Involve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nflicts, 1948-1965* (North Sydney, Australia: Allen & Unwin) (with Gregory Pemberton) 《危机与义务: 澳洲介入东南亚冲突的政治与外交, 1948-1956年》, 1992年出版,与格列哥利·本伯登合著; *A Nation at War: Australia Politics, societ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5-75* (North Sydney,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7) 《战乱国家: 1965-75年越战时期澳洲的政治, 社会与外交》, 1997年出版。

他是1948年至1975年澳洲参与南亚冲突的官方史学家。他也写了一篇关于1999年对话会的文章: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Canberra: Australia War Memorial Magazine, Summer 1999) (《第一号公敌》, 刊于坎贝拉澳洲战争纪念杂志, 1999年夏)。此文可在网上寻获 [http://www.awm.gov.au/wartime/8/articles/public\\_enemy.pdf](http://www.awm.gov.au/wartime/8/articles/public_enemy.pdf)

### 原不二夫 (Hara Fujio)

原不二夫为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1999年前在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他专门研究海外华人，东南亚战前抗日活动和马来亚共产党。他著有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2) 《马来亚华人与中国：1945-1957年身份意识之转变》，新加坡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卡尔·哈克 (Karl Hack)

卡尔·哈克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人文组副教授。他替《东南亚研究学报》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和《情报与国家安全》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写关于马来亚紧急状态的文章。他的近作有 *Defence and Decolo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ita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68* (Richard Curzon, 2001) (《东南亚之防卫和去殖民化：1941-1968年之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2001年出版)，以及跟哥文·布拉克本生 (Kevin Blackburn) 合著的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Churchill and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新加坡得沦陷吗？邱吉尔与坚不可摧的堡垒》，2004年出版)。他的下一本著作是跟杜比亚斯·勒地格 (Tobias Rettig) 合编的 *Colonial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东南亚的殖民大军》，将出版)。

### 约翰·李尔利 (John Leary)

约翰·李尔利于1950至1955年在马来亚的侦察队（后在1951年中改名为22特别空勤队），在他的森林活动中，培养起对原住民的兴趣。他已经写了 *Violence and the Dream People: The Orang Asli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Ohio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暴力与梦之民：1948-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原



住民》，1995年出版），及 *The Special Air Service (SAS) Regiment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Journal for the Society of Army Historical Research* (1996)（《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的特别空勤队》，登在《军人历史研究协会学报》，1996年。2003年初，他以 *The Orang Asli and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erience, 1511-1941*（《1511-1941年间原住民与欧人殖民经验》）获得拉·托伯（La Trobe）大学博士学位。

#### 加米尔·麦克基 (Jamie Mackie)

加米尔·麦克基为政治科学学者兼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于1978至1989年带头成立隶属太平洋学研究院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系，并担任主任。1968-78年任莫纳斯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主任。1958-67年为墨尔本大学印尼研究系主任。他在1956-8年在印尼的国家策划局任经济师，自此对该国进行各项研究计划。他的著作包括马印对抗的经典研究，即：*Konfrntasi: 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66*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对抗：1963-66年印尼——马来西亚纷争》，1974年出版）。

#### 安东尼·李德 (Anthony Reid)

直到1999年，安东尼·李德是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与亚洲研究院东南亚历史教授、系主任兼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主任。之后，任美国柏克莱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历史系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主任。他著作甚丰，有 *The Indonesia National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 1974)（《印尼国家革命》）；*The Blood of the People: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人民的血：北苏门答腊革命与传统统治的终结》）等。

### 安东尼·索尔德 (Anthony Short)

安东尼·索尔德是阿伯汀大学国际关系之高级讲师。1948年爆发紧急状态时，他在马来亚服兵役。1960年他回到马来亚，加入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历史系，开始写至今还是这场冲突资料最全面详尽的书，即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1975)（《1948-1960年马来亚共产党起义》，1975年出版）。他有机会参阅当时还未解禁的官方资料，最近，此书再版，取名 *In Pursuit of the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追踪山老鼠：马来亚共产党起义》，2000年出版）。

### 李察·史塔布斯 (Richard Stubbs)

李察·史塔布斯是加拿大麦马斯德大学政治学教授及政治系主任。主要出版有：*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游击战与民心动向：1948-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1989年出版》；以及跟保罗·利兹 (Paul B. Rich) 合编的 *The Counter-Insurgent State: Guerrilla Warfare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剿乱国度：20世纪游击战和建国》，1997年出版）。

### 杨进发 (C.F. Yong 或 Ching-Fatt Yong)

杨进发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暨后获澳洲国立大学博士，是澳洲佛令德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对新马华社领袖深有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与文章甚多，包括著名的《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与《马来亚共产主义之起源》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等。

### 王赓武 (Wang Gungwu)

王赓武，东南亚史与华人史国际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东南亚研究所及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席。194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68年任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及亚洲研究院院长、远东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86年至1995年任香港大学校长。王教授中英著作甚丰，有《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南洋华人简史》、《历史的功能》、《中国与海外华人》、*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yths threats and culture*；*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等。



## 参考书目

### 英文书籍、论文、及官方出版物：

- Akashi, Yoji. *Lai Teck,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9 (1994): 57-103.
- Aldrich, Richard, Gary Rawnsley and Ming-Yeh Rawnsley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London: Frank Cass, 2000.
- Allen, Louis. *Singapore 1941-1942*. London: Frank Cass, 1992 edition.
- Amin, Mohamed and Malcolm Caldwell (eds). *Malaya: The Making of a Neo-Colony*. Nottingham: B. R. Peace Foundation, 1977.
- Andrew, Herbert. *Who Won the Malayan Emergenc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95.
- Ban Kah Choon. *Absent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pecial Branch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15-1942*. Singapore: Raffles, 2001.
- Ban Kah Choon and Yap Hong Kuan, *Rehearsal for War: 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Singapore: Horizon, 2002.
- Barber, Noel. *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 London: Arrow, 1971.
- Blackburn, Kev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Malaysia 73, 2 (December 2000): 71-90.
- Carruthers, Susan.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1944-1960*.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apman, F. Spencer.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 Cheah Boon Kheng. *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4-48*.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9.

- .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 .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dition.
- .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 Chin, Aloysiu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1995.
- Chin, C. C. See Chinese-language sources below.
- Chin Kee Onn. *Malaya Upside Down*.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shers, 1946.
- . *Ma-rai-ee*. London: G. C. Harrap, 1952, also produced as *The Silent Army*.
- . *The Grand Illusion*. London: G. C. Harrap, 1961.
- Chin Peng,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w.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Story*. Singapore: Mediamasters, 2003.
- Clutterbuck, Richard.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4 edition.
- Coates, John. *Suppressing Insurgency-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2.
- Coe, John. *The Rusa Merah: Reflections on a Revolutionary*. The Beagle, The Record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Museum of Arts and Sciences 5, 1 (1988): 163-73.
- . *Friendship Village No. 1, Betong, South Thailand*. *Kajian Malaysia* VI, 2 (December 1988): 86-95.
- . *The 1989 Hat Yai Accords*. The Beagle, Record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Museum of Arts and Sciences 7, 1 (1990): 121-35.
- Comber, Leon. *"The weather...has been horrible": Malayan Chinese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Emergency"*. *Asian Studies Review* 19, 2 (1995).
- . *The 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1945-1948)*.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8, 3 (2003): 128-53.
- Denton, Robert Knox. *et al. Malaysia and the Original Peopl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

- Drysdale, John.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1984.
- Elphick, Peter. *The Far Eastern File: The Intelligence War in the Far East, 1930-1945*.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7.
- Edwards, Peter. *Crises and Commitments: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Australia's Involve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nflicts, 1948-1965*. Sydney: Allen & Unwin, 1992 (with Gregory Pemberton).
- .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Wartime*. Canberr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magazine, Summer 1999.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wm.gov.au/wartime/8/articles/public\\_enemy.pdf](http://www.awm.gov.au/wartime/8/articles/public_enemy.pdf)
- Federation of Malaya Annual Reports, for the years 1948-57*.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58.
- Gaddis, J. Lew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7 (Summer 1982): 171-90.
- Giukon, Asoka. *A People's History of Malaya: the New Emergency*. Oldham: Bersatu, 1980.
- Gough, Richard. *SOE: Singapore 1941-42*. Singapore: Raffles, 2000 reprint.
- Hack, Karl. *Screwing Down the People: The Malayan Emergency, De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in *Imperial Policy and South East Asian Nationalism*, by Hans Antlöv and Stein Tønnesson. Richmond: Curzon, 1995. pp. 83-109.
- . *Defence and Decolonisation: Brita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68*. Richmond: Curzon, 2001.
- . *"Iron Claws on Malaya":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JSEAS* 30, 1 (March 1999): 99-125.
- .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Era of Decolonisation: The Example of Malaya*. *INS* 14, 2 (Summer 1999): 124-55.
- . *Corpses, Prisoners of War and Captured Documents: British and Communist Narrative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INS* 14, 4 (Winter 1999): 211-41.
- Han Suyin. *... and the Rain My Drin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 Hanrahan, Gene Z.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 Hara Fujio.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arper, Tim.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o Thean Fook. *Tainted Glor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0.
- Hoe, Alan and Eric Morris. *Re-enter the SAS*. London: Leo Cooper, 1994.
- Jomo, K. S. and Patricia Todd. *Trade Unions and the Stat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arthigesu, Sybil. *No Dream of Merc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ennedy, Malcolm.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As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7.
- Kitti Ratanachay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sia and Thailand: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angkok: Dungkaew, 1996.
- Kratoska, Paul 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Sydney: Allen & Unwin, 1998.
- Lam Swee. *My Accusat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1951.
- Lapping, Brian.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Granada, 1985.
- Leary, John. *Violence and the Dream People: The Orang Asli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Ohio: Ohi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1998.
- .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Singapore: Times Media, 2000.
-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 Leong Yee Fong. *Labour and Trade Unionism in Colonial Malaya: A Study of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ses of the Malayan Labour Movement 1930-1957*. Pe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1999.
- Lim Cheng Leng. *The Story of a Psy-Warrior: Tan Sri Dr. C. C. Too*. Selangor: Lim Cheng Leng, 2001.
- Lim Pui Huen, Patricia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 McHugh, J. N. *Anatomy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1949.

- Mackie, J. A. C. *Konfrontasi: 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1966*.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ckay, Donald.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The Domino that Stood*. London: Brassey's, 1997.
- McVey, Ruth.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 Miller, Harry. *Menace in Malaya*. London: Harrap, 1954.
- . *Prince and Premier: A Biography of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London: George G. Harrap, 1959.
- Nik Anuar Nik Mahmud. *Tunku Abdul Rahman and His Role in the Baling Talks-A Documentary History*. Kuala Lumpur: Memorial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98.
- Noone, Richard. *Rape of the Dream People*. London: Hutchison, 1972.
- Newsinger, John. 'The Military Memoir in British Imperial Culture: the Case of Malaya.' *Race and Class* 35, 3 (1994): 47-61.
- O'Balance, Edgar.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 Onreat, René Henri de Solminhac. *Singapore-A Police Background*. London: Dorothy Crisp, 1947.
- Purcell, Victor.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54.
- Pye, Lucien.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Raj, J. J.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Kuala Lumpur: Pelanduk, 2000.
- Ramakrishna, Kumar. *Content, Credibility and Context: Propaganda, Government Surrender Policy and the Malayan Communist Terrorist Mass Surrenders of 1958*. *INS* 14, 4 (Winter 1999): 242-66.
- . *The Making of a Malayan Propagandist: The Communists and C. C. Too*. *JMBRAS* LXXIII, 1 (June 2000): 67-90.
- . *"Transmogrifying" Malaya: The Impact of Sir Gerald Templer (1952-54)*. *JSEAS* 32, 2 (2001): 79-92.
- . *Emergency Propaganda: The Winning of Malayan Hearts and Minds, 1948-1958*. Richmond: Curzon, 2002.
- Ramlah Adam. *Ahmad Boestamam: Satu Biografi Politik*. Kuala Lumpur: Percetak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4.

- Sebastian, Leonard. *Ending an Armed Struggle without Surrender: The Demi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1979-89) and the Aftermat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3, 3 (December 1991): 271-97.
- Shennan, Margaret. *Out in the Midday Sun: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60*. London: John Murray, 2000.
- Short, Anthony. *Communism and the Emergency*, in *Malaysia: A Survey*, ed. Wang Gungwu. London: Pall Mall, 1964.
- .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London, 1975.
- . *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
- Singapor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The Jemaah Islamiah Arrest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Singapore, 2003.
- Smith, Simon. *General Templer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Malaya: Hearts and Minds,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S* 16, 3 (Autumn 2001): 60-78.
- Stenson, M. R. *Repression and Revolt: The Origins of the 1948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9.
- Stewart, Brian. *Operation Sharp End: Smash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Newark: Acorn Press, 2003.
- Stockwell, A. J. *British Policy and Malay Politics During the Malayan Union Experiment*. Kuala Lumpur: JMBRAS, 1979.
- . "A Widespread and Long-concocted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in Malaya?" *The Origin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3 (September 1993): 66-88.
- . *Malaya*.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95. Three volumes in the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series, covering 1942-57.
- Stubbs, Richard.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u Fang Ng. Chin Kee Onn's *Ma-rai-ee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Malayan Nationalist Subjec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cific War*.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34, 1 (1999): 85-102.
- Tai Yuen. *Labour Unrest in Malaya, 1934-1941-The Rise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0.



- Townshend, Charles. *Britain's Civil Wars: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 Trenowden, Ian. *Operations Most Secret-SOE: The Malayan Theatre*. London: Crecy Books Limited, 1994.
- White, Nicholas.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Malaya, 1942-195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Yong, C. F.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 Yuen Yuet Leng. *Operation Ginger*. Kuala Lumpur: Vinpress, 1998.

### 中文书籍、论文与其他参考资料：

- 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
- 单汝洪：《森美兰抗日战争回忆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
- ：《回忆往事》，香港南岛出版社，2002年。
- 阿竹、陈六、冯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出版社不明，1992年。
- 布赖恩·拉平 (Brian Lapping) 著，钱乘旦、计秋枫、陈仲丹译：《帝国斜阳》(End of Empire)，香港三联书局，1994年。
- 南大史地学会历史研究小组：《马来亚民族运动简史 (1945-1957)》，南洋大学史地学会出版，1962年。
- 蔡求真：《四十年森林游击战争生活回忆录》，泰南勿洞第一友谊村印行，2000年。
- 陈凯：《为独立而战》，香港南岛出版社，1998年。
- ：《回忆檳吉坡人民抗日斗争》，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
-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 陈剑：《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2004年。
- ： “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33-46页。
- ： “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简述”，人文杂志，第三期，2000年，第15-22页。

- ： “寻找革命之路 ---- 陈平简传”，《匡政与流变 ----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东南亚研究计划，2000年，第55-92页。
- ： “马来亚共产党早期革命纲领的演变”，槟城韩江学院：“回顾与前瞻 ---- 东南亚华人社会面对的挑战”研讨会主题演讲。2001年，未出版。
- 考南康地道委员会：《陈平是怎样的一个人》，合艾，1999年。
- ：《北马局“破获敌奸”真相》，考南康地道委员会出版，1999年。
- 李 兵：《新加坡啊！新加坡 --- 一个独立斗士的呼声》，吉隆坡，大汉山出版社，2000年。
- ：《马泰边区风云 --- 森林游击生活片段》，吉隆坡，大汉山出版社，2000年。
- ：《李兵的诗 --- 一片生疏的天地》，吉隆坡，大汉山出版社，2000年。
- 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年。
- 马来亚共产党宣传部：《南岛之春》，马来亚出版社，1945年。
- 南岛编辑部：《马来亚风云七十年》，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
- 晴 朗：《伪面具必须剥去》，出版社不明，1987年。
- 全仲仁：《马共内部风暴》，合艾，考南康地道委员会出版，1998年。
- ：《艰苦斗争岁月》，考南康地道委员会出版，2000年。
- ：《死里逃生》，考南康地道委员会出版，2000年。
- 新马桥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年。
- ：《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年。
- 夏仲成：《亚非雄风 --- 团结合作的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 秀 兰：《我要活下去！ ---- 一个前女共产党员为党斗争的惨痛经验》，星报（马来西亚）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3年。
- 罗 武：《马来亚的反抗 1942-1945》，海泉出版社，1982年。
- 林一叶：《浩气永存 --- 缅怀马来亚人民抗日抗英烈士 1941.12.8-1957.8.30》试印本，1997年。

- 苏丽雅妮·阿都拉（应敏钦）：《第十支队与独立 --- 荆棘满途的马来亚民族斗争史》，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5年。
- 贺 巾：《峥嵘岁月》，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
- 阿都拉·西迪：《抗英战争与和平》，香港，南岛出版社，2002年。
- 方 山：《见证和解与回马 --- 纪念回马十周年》，方山出版，2002年。
- ：《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 --- 新时期、新方针》，21世纪出版社，2005年。
- ：《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万水千山密林情 --- 南下、北上、肃反、分裂、土地、民族》，21世纪出版社，2005年。
- ：《历史的告白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共党军分裂纪要》，21世纪出版社，2004年。
- 见证丛书编委会：《漫漫林海路》，香港见证出版社，2003年。
- ：《激情岁月》，香港见证出版社，2005年。
-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委员会出版，2001年。
- 陈剑虹：《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2000年。
- 陈剑虹编：《一石千浪 ---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研讨会论文集》，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2002年。
- 陈凯希编：《马来亚劳工党历史图片集》，劳工党党史全国工委出版，2000年。
- 马来亚前劳工党柔佛州：《走过的历史岁月画册》，前劳工党柔州分部党史委员会出版，1999年。
- 槟州劳工党党史工委：《历史的放歌 --- 马来亚劳工党槟州分布史料图片集》，槟州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2001年。
- 万家安编：《PUTERA-AMCJA 1947年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当代本土历史研究室出版，2005年。
- 阿布·沙玛·穆哈末·卡森：《历史与独立斗争 --- 马共中央委员阿布·沙玛回忆录》，21世纪出版社，2005年。
- 张 佐：《我的半世纪 --- 张佐回忆录》，吉隆坡，张元出版，2005年。



### 马来文书籍及论文：

- Abdullah, C. D. *Darurat dan Kemerdekaan 1948-1998 - Memperingati 50 Tahun Darurat di Tanah Malayu*. Hong Kong: Nandao Publisher, 1998.
- Abdullah, C. D. *Perang Anti-British dan Perdamaian*. Hong Kong: Nandao Publisher, 1998.
- Abu Samah Mohd Kassim. *Sejarah dan Perjuangan Kemerdekaan*. Hongkong: Nandao Publisher, 1996.
- Ismail Johari. *Bukit Kepong*.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9.
- Suriani Abdullah. *Rejimen Ke-10 dan Kemerdekaan*. Hong Kong: Nandao Publisher, 1999.
- Wahba (Wan Hamzah Awang). *Detik Sejarah Rundingan Baling*.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and Distributors, 1985.

### 报纸与期刊：

- 华商报，香港  
自由报，新加坡  
南华早报，香港  
民声报，吉隆坡  
新路报，新加坡  
人民日报，北京  
人道报，怡保  
星洲日报，新加坡  
战友报，吉隆坡  
新民主报，新加坡  
亚洲周刊，香港  
New Straits Times (新海峡时报)，吉隆坡  
The Straits Times (海峡时报)，新加坡  
Straits Budget (海峡预算)，新加坡  
The Daily Worker (工人日报)，伦敦

## 尚未出版论文及其他资料：

- Coe, John.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Problems of Historicism, Ethics and Internal Antagonisms: the Cas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Unpublished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3.
- Collin, Richard. Talk to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Research Seminar on 16 June 1992.
- Mohamed Zarougi.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Guerrilla and Counter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Unpublished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92.
- Yap Hong Khuan. *Perak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57.





陈平，于1947年23岁时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总书记，是马来亚现当代史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他的政治活动受到诋毁，他正为重新评估他在东南亚历史的角色和重要性的工作努力。

1947年，他因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抵抗日本而获得勋赐。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紧急状态”的名义全面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他领导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经过四十多年的抗争之后才在1989年12月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下了和平协议，销毁武器下山。

陈平又开始新的抗争，是寻找机会诉说他那一方的历史。他想把握住从森林中、从泰马边境、从北京的视野和角度来论述事件的经过，但资料却不完整，因而开始从世界各来源收集相关资料。作为他搜寻的一个过程，他同意与一群历史学家及前敌方军事人员在澳洲国立大学会面及交换观点和见解。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是这个紧张而又引人入胜的历史性会面的全纪录。它包括会前提供的背景文献及部分会后的论述、前所未见的马共文件、英方宣传海报与传单及其他罕见的文档资料。这些从冲突双方取得的资料，给予马来亚共产党新的解说，并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呈现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

ISBN 978-983390819-6



9 789833 908196